于闐史叢考

張廣達 榮新江 著

于闐史叢考

張廣達　榮新江　著

上　海　書　店

責任編輯　楊繼東
封面設計　柯國富
版面設計　邵萬生

于 闐 史 叢 考
張廣達　榮新江 著
*
上海書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 401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中華印刷廠印刷
*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數270千字　印張11.25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1—1200
ISBN 7-80569-793-0/K·94
定價：18.00 元

滬新登字 119 號

目 錄

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

——于闐史叢考序——

今年5月，我應歷史研究所之邀，講述一些古史問題。停滯北京期間，北京大學榮新江兄嘗兩度會晤，承告知他多年以來，和張廣達教授合著有關于闐國論文，即將彙集爲《于闐史叢考》，由上海書店出版。他們兩位累歲精力所萃，結合中外史料，對塞語文獻的鑽研，對敦煌新出資料涉及于闐國號、從德太子 (Tcūm-ttehī)、使臣各種文書的斷代研究，眞是原原本本，殫見洽聞，爲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塡補了許多空白，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爲畏途，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給弄活了。這回的結集，對中古西域史貢獻之鉅，史學界都有口皆碑，無待我來饒舌！

我對于闐史涉獵至淺，承命執筆爲序，倍感惶悚，書中重要問題，我無資格參加討論；但看本書講到的"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問題，而關於在中國境內對遠古塞族名稱的推測，我有一些看法，姑且提出來，向二位先生請教。

1．上古塞種語言文字統稱爲"胡書"

和田地區出土的塞種語較于闐語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Tum-šuq)、木頭溝 (Murtuq) 語，都同屬於伊朗語系。于闐語"山"稱ggara-，即 Av.之 gari-，梵語之 giri-；淨土的"淨"，于闐語與托姆舒克語均作 vasuta-，即其一例①。語言學的研究證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種，操印歐語系中屬伊朗系東支的塞語 (Saka language)，而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發掘其頭骨特徵證明屬於高加索種。在古耨

絕國(尼雅)出土的佉盧書文書,其中有不少伊朗語借字,說明塞族語言在這一地區流布之廣。該地區在未經突厥化、伊斯蘭化以前,所有語文,相當複雜,有婆羅謎文、佉盧文、吐火羅文、窣特文、龜茲文、于闐文種種之不同,漢人都籠統地稱爲“胡書”。謝靈運說:“胡書者,梵書”,此指 Brahmi。又云:“胡字謂之佉樓書”,卽指 Kharoṣthi (日僧安然《悉曇藏》卷一引)。以後從梁僧祐《出三藏記》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至隋彥琮的《辯正論》,一概稱之爲“胡書”。《水經注》二記龍城云:“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龍城卽龍堆,說者謂卽樓蘭故地;蒲昌海卽今羅布淖爾。黃文弼據姜賴之虛一名推論樓蘭土人必有姜戎,卽塞種人之裔冑,甚是。(《西北史地論叢》頁 214)。姜賴之虛,被稱爲胡之大國,及胡書之胡,這個“胡”字應該指什麼? 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點。

2. 蚌雕白種人頭部記號與西亞 Halaf 相同

本書說道:“公元前八世紀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約前 650—620 年,以斯基泰爲名見稱於希臘史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這是很保守的說法。近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銅戟上有白種人特徵的人頭像,陝西扶風周原出土兩件蚌雕白種人頭像,說者認爲卽希臘史家所說戴尖帽的塞種人,亦有稱之爲吐火羅人。② 最令人矚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㠯(巫)記號,和西亞五千年前 Halaf 女神肩上的“㠯”號完全相同。而“㠯”這一符號作爲陶器的紋樣在 Halaf 時期屢見不鮮,這一事實我曾撰文指出,引起國際學人的注意,美國梅維恆復加以英譯。③ 遠古時代高加索地區人民與吾華可能有相當接觸。W. B. Henning 所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1978 年刊)提出:楔形文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 (Guti) 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他假定公元

前三千年的末期，古提人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到了中國，仍過着遊牧生活。"月氏"一名最初即源於Guti(Kuči 亦由 Guti 變來)。吐火羅一名源於 Tukri (此名亦見楔形文)，Guti 與 Tukri 是孿生兄弟，是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他們在波斯的出現先於赫梯人之到達小亞細亞。他這一新說，未爲一般學人所接受。④ 現在我們看"⊕"的記號，見於 Halaf 女神肩上，隔二千年後，重新出現於商周之際的塞種人雕像之上，說明高加索塞種在中國地區活動歷史的悠久，月氏和吐火羅(疏勒河南楡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論者以爲即 Tochari 的對譯)，都屬於塞種，古代遷徙頻繁，東西互相接觸，自是意中事。

3. 從胡里安(Hurrian)文件看古代東、西的馬政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有好馬、駝騾"。所以于闐馬錢用馬作花紋，標榜其特產。Hurrian 在世界史上被認爲是最早把馬政以及戰車傳入近東的民族。⑤ 他們建立的米丹尼王國 (Mitanni) 在一件與赫梯王所訂的條約中，記載養馬法及馬拖車的訓練出自米丹尼人 kikkuli，同時用了一些和梵語相同的詞彙，如"一"之 aika-相當於梵文的 eka；又出現若干吠陀的神名，像 Mi-it-ra (即 Mitra)、Aruna (Varuna)，In-da-ra (Indra)，說明 Hurrian 是扮演溝通印歐兩地、聯結伊朗與印度語的重要角色。所以米丹尼被認爲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的國家。

有人以爲中國馬車制度是從西亞傳入的。⑥ 其實米丹尼馬政記錄的這一赫梯文獻的絕對年代，據說是公元前 1400 年，相當於殷代中期。甲骨刻辭中對於馬名的記錄相當詳細，又有多馬羌、小多馬羌；方國有馬方，官名有馬亞、馬小臣，屢屢言及馬五十兩 (如《甲骨文合集》11459)，當然指戰車。以馬作爲偏旁的契文，有羇、

騽、𩣡、騖、馱、駁、駭、騇等等，䮍字見《說文》，“一曰驪馬黃脊”。𩣡可讀爲驪，卜辭又有“赤瑪”及“𩣡𩣡”之名。文云：

“庚戌卜貞：王……于麇，𩣡𩣡”。“于馬〔方〕……𩣡𩣡（沿）”（《合集》36836）。𩣡𩣡是雙音字馬名，如匈奴稱馬有“駃騠、騊駼（《逸周書·王會解》：“禺氏騊駼”）、驒騱”之比。卜辭“爻戊”亦作“學戊”，𩣡字如讀爲曉母之學（粵語），則“𩣡𩣡”可能是梵語 Haya 的對音。Haya 的意思是迅速（Speeding），亦是日神的標幟，所謂 Sapta sūrga 是“七日”之意，如楚辭的羲和爲日御，Haya 表示七個御車的太陽，如吾華的十日。周初“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劍名是外來語，人所共知；“𩣡𩣡”如果是 Haya，亦相當有趣。《蒙古秘史》：

答驛兒	孛羅	豁牙兒	曲騄	阿黑騸	思禿
dair	boro	gojar	külu-güd	ar	tastu
一隻（馬）	一孛羅馬	二隻	駿	騸	馬

蒙語的曲騄兀（Külu）表示駿馬，kikkuli 人名的取義，或與馬有關係。蒙語取自回鶻，字母借粟特文（Sogdian）爲之，源於 Aramaic script。殷代諸羌和塞種人必多有來往，血統不無混雜，印歐語滲入殷人語文，非不可能之事。卜辭對產馬方國及馬名的記載，年代與 Mitanni 正相若，東西兩地的馬政不妨同時發展，並駕齊驅，很難定它的先後，說遠東源於近東，是不必要的。

本書說：“于闐語的 aśśa，意爲馬，和瓦罕語的 Yaš 相同。”按古波斯語“馬”，爲 asa-，正與于闐語 aśśa 爲同一語源。⑦

4. 于闐馬錢王號出自波斯傳統模式

于闐通行的馬錢二面皆有文字，一面是漢文曰：“重廿四銖銅錢”，另一面是佉盧文：Maharajasa,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 意思爲：“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娑。”（夏

鼎:《和闐馬錢考》)。日本學者榎一雄以爲這是模仿大夏國王Eucratides 一世(公元前171—155年在位)的鑄幣形式。其實這種"大王,王中之王"的稱呼,是波斯王從蘇美爾以來習用誇大式的最高統治者稱謂套語,試比較如下:

蘇美爾:

Lugal Gal-u (Great King,

Lugal Lugal meš. King of kings,下同。Lugal 即 king.)

巴比侖:

Šarru rabū

šar šarrāni

古波斯:

Xšâyaθiya Vazraka

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iâm

蘇美爾在"大王,王中之王"下面本來還有"Lugal kur,kur,meš"(King of all lands, Kur 即地, Meš 指多數)一句,于闐沒有很大的版圖,故不用此句,但稱"偉大者"而已。于闐用驢唇書,是印度俗語;因其民屬於塞種,所以仍舊沿襲波斯的稱呼模式。

5. "胡"字涵義的演變

"胡"字在歷史上的涵義屢有伸縮、轉移、變遷。西方公元四世紀以降,橫行於歐洲的遊牧部族有 Huns。匈奴與 Huns 不是同族,曾經引起許多討論和質疑。⑧ 陳寅恪在《論五胡問題》中說:"胡本匈奴專名,去 na 著 hu,故音譯曰胡。"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爲 Hūna,實有二音。去 na 而僅存首音,是說似不近理。《逸周書·王會解》記西面諸蕃屬有:

禺氏(月氏)騊駼

大夏茲白牛

犬戎文馬
數楚(孔注北戎)每牛
匈奴狡犬
皆北嚮。

此處匈奴與塞種之月氏、大夏區分爲不同種屬。《漢書》晉灼注說:“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則匈奴是秦時的名稱。秦以前的文獻,有東胡(《王會解》:“東胡黃羆”),林胡(《史記·廉頗傳》:“李牧破東胡,降林胡”),三胡(《史記·趙世家》索隱:林胡、樓煩、東胡)。胡與貉聯稱(《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知原來的胡似非專屬匈奴。至秦乃以胡專指匈奴,以匈奴爲諸胡中之最強大者。讖書言“亡秦者胡”,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皆指匈奴。而匈奴亦自稱曰胡,如覩狐鹿姑單于致漢武帝書:“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以爲證。在中國人方面,則以北胡與南越對稱。東漢高誘云:“中國以鬼神之士(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要略訓》注),即其一例,胡遂成爲北方異族的統稱。漢代有“秦胡”(居延簡:“屬國秦胡盧水”),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於漢族的少數異族。⑨沮渠蒙遜即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以官爲氏。高昌有屠兒胡(《吐魯番文書》第6冊)。《北史·高昌傳》云:“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毛詩》、《論語》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此高昌用胡語讀漢人經典,實爲雙語國家,與于闐相同。⑩漢簡記有月支國胡支柱,年廿九,黑色,是分明非漢族而爲支姓者。晉有支胡官印(上海博物館藏“晉支胡率善仟長”印)。《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同書《鄧訓傳》:“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每與羌戰。”則小月支亦稱爲胡,以其曾臣屬匈奴之故。⑪

唐代,藏人專稱粟特爲胡,見 P. T. 1263 藏漢對照字彙,藏文

作 Sog. po, 首音分明是粟，或謂即西胡。⑫ 至十三世紀，Sog. po 用以指蒙古族,有人謂是"阻卜"的對音。

可見胡字涵義廣狹及轉變的大概。以胡代表西北異族的通名，遠至粟特,近及高昌皆然，于闐自然亦包括在內，故其言語文字亦可稱爲胡書。

大家都知胡名出於匈奴，匈奴且自稱爲胡，但何以有這一名稱？需要進一步加以解答。

6．虫、Hor 與 Hrw

由於于闐一帶先民頭骨多爲高加索人，令人聯想到遠古的白色人種。

周原甲骨 H. 11. 2 有"虫白(伯)"一名，有人釋蟲，讀爲崇伯，是不對的：虫應是虺，虺通作隗，隗姓在春秋時被稱爲懷姓九宗，史稱"陸終娶鬼方氏女"，他們是鬼方之族，⑬ 王國維久已提出此說，人所共悉。虫、虺與懷、隗都與胡音相近。

在西藏北部及西北部地區，至今散居着許多被稱爲 Hor 的遊牧民族。Hor 系藏文寫法，在P. T. 216 號《藏漢對照字匯》中，對回紇人稱 Hor，但在 P. 2762 中則以 Dru-gu 稱回紇人，最早記載見於 662 年。⑭ 有人謂 Hor 是秦漢小月支之苗裔，亦有說宜改譯爲畏兀兒。⑮ 我則認爲 Hor，實在應是"胡"字的音譯在西北保存下來的殘跡。 Hrw在《聖經》上稱爲 Horite。

Hurrian (胡里安人)建立的米丹尼王國在埃及歷史上被目爲雅利安民族(Aryan race)，他們的原住地在烏滸河(Oxus)和藥殺水 (Jaxartes R.) 源東北部山地之後面。米丹尼語言的影響向西擴展至奧倫特河谷 (Orontes Valley)，更東至尼尼微 (Nineveh)。他們形成一個有力而文化優越的國家，從她的異邦喀斯特 (Kassite)王朝統治下的巴比倫沿幼發拉底河(Euphrates)迤西促成商業

的成長與繁榮。⑯馬的訓練法影響最大，在哈杜沙什(Hattusas)地方(即赫梯人 Bogás-Köy 村遺址)⑰所出的文書，證明他們是人類文化上馬和戰車事業最大的貢獻者。Hurrian 在埃及文獻原稱爲 Hrw(Hur)，在楔形文史料出現於 Mari 區域所見的稱 Hur-lili。我認爲 Hrw,Hur 卽是"胡"這一名稱的來源。

北方諸胡都是騎馬民族，對馬不能不加以重視與崇拜，于闐亦不能例外，他們的錢幣卽用馬作爲標幟。匈奴所以自稱爲胡，可能卽取自此以養馬聞於世的 Hrw,Hur 之名。匈奴的前身據說是獯育，相傳爲黃帝所逐（《史記·五帝紀》："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詩》言"薄伐玁狁"，不嬰簋作"厰妿"，妿卽允，字從女。《左傳》："允姓之姦"，"允姓"自是厰允之省稱。多友鼎記"玁狁放燠，廣伐京自"，"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是一場很重要的戰役。匈奴、玁允的種別異名很多，《詩經·緜》："混夷駾矣"，混夷卽緄戎。《匈奴傳》記"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顏師古《漢書》注："混，夷也"。按混、緄亦可能是 Hur (Hrw) 的對音。漢代秦地的胡廣泛分布於河西走廊、青海，東至河北平原，由於秦穆的開拓土宇，分散爲若干部落，到了漢代還保留着"秦胡"的稱謂。

Hrw 在 Amarna 信件中稱爲 Hurrū-ḫe,或 Hurwū-ḫe。他處或稱 Hurri,Hurra，意義是洞穴，原意可能指穴居的人。

7．塞種與瓜州之戎

塞種 (Saka) 之名西方文獻始見於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21—486 年在位，相當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四年）Achaemenids 的 Behistam 碑文。漢代記載塞種更爲具體。《漢書·西域傳》："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

國皆塞種也”。從希臘史家之說，知波斯人泛稱之爲“Scythians saka”。在高加索地區，Scythian 語言有 Ossetic 者，今日仍爲人所使用。塞種人的活動地帶跨有歐陸，已爲史家共認之事實。

《左傳》昭九年記晉人率陰戎伐潁，周王責讓之，謂“先王居檮杌(凶人)於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至晉惠公夷吾自秦歸國，誘以俱來”。杜預注陰戎是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卽是此事。在襄十四年傳記晉惠公賜姜戎以可耕的田地之經過，十分詳細。結合《左傳》這三條材料，細心勘校，實在是同一樁事。楊氏《左傳注》把允姓與姜姓分爲二姓，指杜注誤混，其說不確，因彼等同爲晉惠公所徙之戎，不應强分爲二。《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用由余之計伐諸戎，益國十二，拓地千里。晉惠公擕姜戎東遷，卽在是時。襄十四年傳云：

> (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勘以昭九年傳：

> 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可見同屬瓜州之戎，雖一稱姜戎氏，一稱允姓，仍是一事。

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他認爲允姓卽是塞種，必有根據。《水經注》二：河水“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說本《漢書·西域傳》)。徐松《補注》引顏師古注塞種卽釋種。《元和姓纂》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徒，卽塞姓也。荀濟之說，徐松引用之。《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水經注》二記積石之山在西羌之

中,燒當所居也。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允谷當因允姓所居而得名。余太山新說以爲允姓是Asii(希羅多得作 Issedone)的對譯,塞人有四種屬,其中 Asii 和Tochari 卽允姓和大夏(《塞種史研究》)。按秦人迫逐的瓜州一帶諸戎,名目繁多,是否都是塞種,尙無確證。《詩經》所載文王時的混夷卽秦穆時的緄戎,不成問題;"混夷"和 Hrw 對音頗合。姜戎之祖吾離,如果是種族名,似可把"吾離"視爲"胡里" Hurri 的對譯。Mitanni 文件說明 Hur 王國在歐、印文明聯繫上的重要地位,時代與殷中葉相當。"胡"的名號在先秦後期已甚通行,可能"胡"一名先時卽取自 Hrw 的王國,以通指塞種諸戎,漢人襲用之,故"胡語"亦得通指塞種各種語言。鄯善龍城的姜賴之墟爲姜戎舊地,亦得被目爲胡之大國。我這一說,也許比較視胡作爲匈奴廣泛的異稱,更爲近實。至於周原蚌雕白種人,如果以文王時代的混夷目之,較之看作吐火羅人或廣泛的塞種人,似乎更加貼切了。

餘　　論

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混夷可代表塞種,還有羌戎,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爲是玁狁的"狁"字之異寫,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厰執",不嬰段作"厰允","允"卽"厰允"的簡稱,《西羌傳》之大允谷,卽取允姓爲名,足見"允姓"不能說是 Asii 的對譯。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爲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爲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馬羌臣",《合集》57176),當卽羌與馬方的混合。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從瓜州的內遷,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侯國騠兹,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隱》曰:

在琅邪。瓠攝爲小月氏王打者封邑，《漢書·地理志》："河東有狐讘故城。"以後況前，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水經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傳》語，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幷于月氏者也。"闞駰《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爲月氏所逐"（《太平寰宇記》引）。則古明有此說。月氏，《管子·地數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禺氏（月支）之邊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有人取突厥語玉名 qāsch，以解釋"月氏"，謂月氏卽是玉之譯名。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於茲可見。《水經注》二：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 Gomati。又于闐梵名 Gostana（瞿薩旦那），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 Cūttausanä,go 與 co 都是"牛"，"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爲印度的習俗，印度造字的聖人號 Govinda(瞿頻陀)，意義是 Obtainer of go/(牛)，⑱ Go stana 訓牛國，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附帶說明於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書的印行，略抒所見，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饒宗頤

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7月18日改訂

---

① 參看 R. 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② 參看林梅村文：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③ 見 Sino-Platonic Papers, No.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1991。

④ 參看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國古代的印歐語和印歐人》(《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 373—403),對 Henning 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都有所論列。

⑤ Hurrian 民族歷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漢譯史書,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 B.Hrozny(赫羅兹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聯書店,1958年)一書最爲詳盡。參看該書頁 146—151 討論米丹尼爲雅利安人所建之王國。

⑥ 美國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臺灣《漢學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他沒有提到 Mitanni 這一有名的文件。他從 Piggott 的文章轉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 1700 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Anatolia)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他說里海的車子比殷墟的車早三百年至五百年。他統計漢文資料,指出甲骨文中(《乎津》2,212)只言擒獲了兩輛車,(原文是"……丙車二丙"),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爲作戰主力。又引《左傳》昭公十三年,有車四千乘;昭五年,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又據多友鼎記玁狁戰役,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甲骨文"丙"字可用於車若丙,同時亦用於馬若干丙,丙殆是"兩"字異形(金文大簋作"㒳",丙爲省形。卜辭"丙"亦作數字用,如"叀丙羊用"(《合集》11364),以他辭"其鼎(卣)用三羊(《合集》30997)證之,"丙"即"兩"甚明,借"兩"爲"輛",非丙字。)"馬……丙"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馬五十丙"的記載卜辭屢見,我認爲應該釋爲馬車五十輛。《逸周書·世俘解》云:

> 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編句釋》本,引張惠言說:"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

當日單就霍、艾兩個侯國,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于郕。"以此證之,卜辭的馬五十丙,即馬車五十兩。夏氏沒有引用《逸周書》,大概認爲不可靠,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已可與埃及在 Megidan 之役俘獲 894 輛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原文無

之,或出誤記;昭十三年傳,原文是這樣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證之以春秋經,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不是如夏氏所說"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數字"。春秋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孟子》已言之),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因爲此文關係重大,承夏氏郵贈,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

⑦ 參 R.G.Kent: Old Persian: Lexicon, P.173, asa-條,又 Asagarta-, asabāya 各條。

⑧ 見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頁 242 。

⑨ 趙永復考證,秦胡亦即秦人,見《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 9 期。

⑩ 參黃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 414。

⑪ 參黃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 年第 4 期。

⑫ 王堯《吐蕃簡牘綜錄》,頁 28,粟特條。

⑬ 王暉《"虫伯"及其種族地望考》,史念海編《歷史地理論叢》,1990 年,第 2 期。

⑭ 王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新版,1992 年,頁 179;又參森安孝夫:《突厥與霍爾 (Hor)》,《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4 集,1977 年。

⑮ 韓儒林《穹廬集》,頁 91,《烏鶻、Huiur及 Hor》引美國 J.H.Edgar 說,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

⑯ 參看 J.H.Breasted: A History of Egypt, P.263 及同書有關 Mitanni 各條。

⑰ John Garstang & O.R.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 考古學研究所印行。

⑱ 參拙作《選堂集林》下册,頁 1442。

和田、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

于闐位於塔里木盆地南沿，地當絲綢之路南道交通要衝。從漢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時初見記載到公元十一世紀初滅於黑汗王朝止，尉遲（Viśa'）氏一直統治着這個地區，並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聯繫。尉遲氏治下的于闐在傳播佛教、促進東西文化交流上起過巨大作用，研究這個地區的歷史富有科學旨趣和現實意義。

由於種種原因，目前研究于闐史的史料多集中在唐代到宋初的中古于闐王國階段。大致說來，中古于闐史料可分爲文獻、文物兩類：

在文獻方面，（一）于闐自有語言和文獻。近九十年來發現的于闐語文獻無疑是研究于闐史的最直接的史料，但數量有限，內容零碎，還不能據以描述于闐國史全貌。（二）漢文正史、佛教史傳、行記、筆記保存了比較豐富的于闐史料；和田、敦煌發現的寫卷和文書又增添了新的內容。（三）七世紀初興起的吐蕃王國長期與唐朝爭奪包括于闐在內的安西四鎮，因而吐蕃文獻也記載了于闐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別是從公元791年到九世紀中葉，吐蕃占有塔里木盆地，在和田等地留下了很多古藏文材料。此外，早期佉盧文書、稍晚的突厥語文獻也有有關于闐的史料，但不如漢、藏語文獻的豐富。

在文物方面，從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帝國主義國家來的一批批探察家、考古家到和田收集古物、發掘遺址，帶走大批珍貴文物。這些文物如雕像、壁畫、木板畫、陶器、木器、錢幣等等，爲研究

于闐經濟、文化提供了實物。此外，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的沙州歸義軍政權與于闐尉遲氏（即李氏）王朝保持着密切來往和姻親關系，莫高窟的壁畫中也留下了相當數量的反映于闐史的形象材料。

本文擬分四節略述和田和敦煌發現的一些有關于闐國史的于闐、漢、藏文獻和文物材料。我們學識有限，掛一漏萬、謬誤失實之處在所不免，至希讀者指正。

一、于闐文文獻

于闐語或稱于闐塞語，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東伊朗語支，是用中亞婆羅迷字母書寫的塞語方言之一，所以又稱于闐塞語，以便與其他方言如圖木舒克塞語相區別。其使用年代據英國梵語——伊蘭語大家貝利(H.W.Bailey)教授的說法，是從公元 300 年到 1000 年，其中分爲早期和晚期兩種形式。早期于闐語字體規範，語法嚴謹，年代爲四至六世紀，大部分抄寫的是佛教經典，多出土於和田附近。晚期于闐語字體由規整變得潦草，有些合體字更難辨識，年代爲七至十世紀。晚期于闐語文獻保存較多，而且在和田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都發現了許多很有價值的世俗文書。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于闐塞語文書總數在一百二十份以上，大部分爲佛教文獻，現分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倫敦英國圖書館和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對於這種已經滅絕近千年而重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經過霍恩雷 (A.F.R.Hoernle)、洛伊曼(E.Leumann)、斯坦·柯諾夫(Sten Konow)、貝利等學者八十多年的艱辛努力，已經解讀出來。這些學者還做了許多轉寫、考釋、翻譯工作，使這批珍貴的于闐史料可以爲學界所利用。

如上所述，現存的于闐語文獻以佛教文獻居多，特別是大乘佛教的經典最爲豐富，如《僧伽吒經》(Saṅghāṭa-sūtra)、《維摩詰經》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佛說首楞嚴三昧經》(Sūr-aṅgama-samādhi-sūtra)、《佛說阿彌陀經》(Sukhāvatī—vyūha)都有發現①，這些文獻本身就是法顯、玄奘對于闐大乘佛教盛行情況記錄的強有力的注脚。晚期于闐語書寫的佛教文獻爲我們提供了一些過去我們從其他文獻所不知道的史實。我們知道，從曹魏時朱士行西至于闐求法，到武則天聘請實叉難陀東來譯經，漢地一直受于闐大乘佛教的影響，可是，敦煌卷子 P 3513 號文書第 59 葉背 1 行至 72 葉背 2 行所寫的晚期于闐語之《金光明經》(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a)，却不象用早期于闐語抄寫的《金光明經》那樣可以和梵文原本一一對勘，反而和義淨於公元 703 年所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極其相似②，考慮到敦煌出土的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數量之多，不得不使人們認爲，在唐朝，于闐佛教也受中原的影響。此外，唐宋時期于闐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翻譯梵文經典，而且開始有自己的某些解說和加工，其中最好的例證就是于闐王 Viśa' Śūra (967—977 年在位) 贊助完成的《佛本生讚》(Jātakastava，闍陀伽讚)，這件保存在敦煌的長卷(斯坦因編號 Ch. 00274，共 39 葉)是由五十一個佛本生故事所組成的，這些故事多是人們熟知的，除了約九個故事外，都可以從梵、藏、漢文本找到出處，但是，這個于闐文本並非僅僅是從另一種語言轉譯而成的譯本，而是經過作者的縮寫加工，以韻文的形式完成的新作③。又如，現存的于闐塞語最長的寫卷《贊巴斯塔書》是以印度史料爲基礎而寫成的一部獨特的于闐塞語的韻文體宗教著作，書中有些作品是對已知的佛典的解說，第六品自稱包括每一部佛經的一首詩偈，現已對證出來有採自《妙法蓮花經》(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金光明經》、《金剛經》(Vajracchedikā) 的偈子。在古代于闐，這份長詩的抄本份數之多，表明它在當地的風行④。此外，于闐人寫的一些《讚文》(Ch.00267；Or.8212.162)⑤ 使我們對于闐

佛教史的認識更進一步。晚期金剛乘(Vajra-yāna)文獻(Ch.ii004; Ch.i.0021b,a²; Ch.i.0021b,b)⑥以及多種陀羅尼咒(dhāraṇīs)則反映了于闐早期密宗的發展情況。

歷史價值更大的是世俗文書,在今和田地區多摩科(Domoko,現稱達瑪溝)、哈達里克(Khadalik)、巴拉瓦斯特(Balawaste)、丹丹烏里克(Dandan-oilik)及麻扎塔格(Mazar tagh)等古代遺址中,出土了一百餘件相當於唐代吐蕃占領和田以前的于闐語文書,這批文書主要被斯文赫定(S.Hedin)和斯坦因(M.A.Stein)拿走,藏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人種學博物館和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其內容有詔令、賬簿、契約、書信等等,根據這些文書,我們可以考察于闐王國的地方各級官制,供奉制度,徭役制度和兵制等許多問題。又因爲這批文書或許就是唐代安西四鎮之一于闐鎮下某個地區的官私文書,所以,我們可以從中發現許多唐代制度對于闐的影響。而一些雙語詔令文書,也向我們揭示唐朝是如何與當地官府一起管理這個在軍事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絲路王國的。

在晚期于闐語書寫的佛教經卷前後,往往有史料價值很高的序或跋,如P4099漢文失譯的佛經Mañjuśrī-nairatmyāvatāra-sūtra的題記使我們得知Viśa' Śūra是繼Viśa' Saṃbhava(李聖天912—966年在位)之後登位的于闐國王⑦。Ch.i.0021a卷首之漢文《燃燈文》(卽所謂C.109)及其後面的于闐語《證記文》告訴我們,繼Viśa' Śūra卽位的Viśa' Darma(978—982年在位)曾派出百人使團,由楊節使(Yam thye-si),Sera副使(Sera hvum-si)、張監使(Ca Kama-si)三人率領,前往沙州向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976—1002年在位)請求降嫁公主⑧。這裏的張監使當是在于闐語文書、敦煌漢文文書中有名的張金山。

由此可見,這批敦煌文獻主要是公元九世紀中葉吐蕃在沙州和于闐的統治垮臺以後,于闐和沙州相互交往的產物。在張曹二

氏掌握沙州歸義軍政權的一百多年中，敦煌、于闐的使者、僧侶在沙州、于闐之間往來不絕，特別是曹議金(914？—935年在位)女下嫁于闐王李聖天 (Viśa' Saṃbhava)以後，雙方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敦煌出土的漢文文獻中，不論歸義軍政府衙內的收支賬中，還是沙州大寺院的入破歷裏，都有許多供應于闐使者或僧侶酒食、紙、布的記載，與此同時，于闐的使者和僧侶也在敦煌留下了許多用他們自己的文字書寫的書信、願文和佛經，其中歷史價值最大的是一些使者上給于闐王府的報告的副本，這些使者有些是到沙州的，有些則是出使中原、西夏或河西的甘州回鶻的，他們肩負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刺探各地的軍政情報，並及時報告給于闐王府。這種報告在莫高窟藏經洞中就有七、八件，如Ch.00269，P2741，P2790，P2958等⑨。根據這些使臣報告，並參照其它于闐語和漢語文書，人們才對中古後期，特別是吐蕃占領以後直到滅於穆斯林爲止的于闐尉遲氏政權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多少弄清了它的世系、國號、年號以及沙州于闐間的交通路程和民族分布情況⑩。特別是P5538 a 號文書，保存了于闐王國的一件比較完整的官府文書，這是天尊四年(970年) 于闐王 viśa' Śūra 給其舅沙州大王曹元忠(944—974年在位)的一封信，在紙縫和文書的末尾鈐有數方同樣的印，文曰“書詔新鑄之印”，文書末尾印旁大書漢文“勅”字，和相應的兩個于闐詞Parau〔勅〕。這件官文書不僅爲沙州于闐兩地的友好交往提供了更爲豐富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其中記載了當時西域的一場十分重要的宗教戰爭，卽于闐佛教王國和疏勒的大食〔當指黑汗王朝——引者〕的對抗。信中講到Viśa' Śūra 率軍進占疏勒(于闐文作 Khyeṣa) 地區的三座城池，取得輝煌的勝利。過去，我們只是從《宋史·于闐傳》和一些稍晚的穆斯林史料或傳說中得知一星半點有關這場影響深遠的戰爭初期的情況，而我們這裏舉出的這件文書則是戰爭當時所寫的戰報，雖然可能有于闐人的渲染

誇大之詞，但它不失爲研究于闐佛教王國滅亡前和黑汗王朝早期歷史的珍貴史料。又，5538 背面還有僧人前往五臺山朝拜文殊菩薩的對話，反映了宋代遠在邊陲的于闐僧人經常往來宋地，這也應當引起研究東西文化交流的學者們的注意⑪。敦煌于闐文獻中，還有一些文學作品，如羅摩的故事（P2781，P2783，P2801）⑫、阿育王的神話（P2798，P2958）⑬、迦膩色迦的傳說（P2787）⑭以及一些抒情詩(Ch. 00266, P2022，P2025，P2896，P2956）等等，對於研究于闐文學以及音韻學都是寶貴的材料。此外，還有于闐文的醫藥、行紀和雙語詞匯表，也是十分重要的文獻材料。

二、漢文文獻

在敦煌、和田發現于闐語文書、漢語文書前，有關于闐的漢文文獻無疑比其它種文字的材料要豐富、系統得多，過去人們正是靠着這批材料來研究中古于闐史的，但從今天來講，僅僅從正史、佛傳中勾稽材料，排比事實已經遠遠不够了，我們還應該注意和田與敦煌出土的那些漢文文書。

和田地區發現的漢語文書和于闐語文書一樣，大多也被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拿走，藏在斯德哥爾摩和倫敦。斯坦因拿走的部分，已經分別由沙畹（E. Chavannes）和馬伯樂（H. Maspore）考釋發表⑮，而赫定拿走的材料，除幾件漢、于闐雙語文書由貝利刊布外，仍有許多卷子還未與學界見面。從斯坦因的收集品來看，這批漢文材料是和上面談到的于闐語文書一起出土於多摩科、哈達里克、巴拉瓦斯特、丹丹烏里克及麻扎塔格等遺址。其中保存的紀年有大曆三年(768)、七年(772)，建中三年(782)、七年(786)和貞元五年(789)、六年(790)，可見大多是于闐陷蕃以前的東西，其內容有告身、牒狀、寺院的入破歷、契約和古籍抄本等，有些或許就是雙語文書的一部分，只不過于闐文部分還沒有刊布出來或已經散佚，

這些支離破碎的文書雖難卒讀，但其中也有許多可以說明問題的材料。斯坦因在于闐古都東北約120公里的丹丹烏里克第V、VII、VIII號遺址挖掘的十八件漢文契據，主要是護國寺文書，最重要的一件是學界已熟知的VII古遺址中出土的護國寺僧虔英所放高利貸文書，其中五件之年代爲781—789年⑯。除了這些與唐朝文書格式完全相同的牒文、契約外，還有兩件很有意思的殘片，殘片原是學童練字的練習本，一片上殘存抄寫的"當"和"抗"字兩行，一片上抄"俛"、"欣"二字兩行，值得注意的是旁邊學生的題記："補仁里祖爲戶□生李仲雅仿書卅〔四十〕行謹呈上。"這自然而然使人們聯想起1969年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墓發現的《論語·鄭氏注》抄本的題記："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　"，"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學生卜天壽，年十二，狀[上]"⑰（闕字是我們據文意所補），盡管李仲雅的題記已殘，但對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兩條題記的相象之處。于闐在唐高宗上元以後立爲毗沙都督府，設十羈縻州，屬安西都護府統轄，和內地州縣統歸中央管轄雖有不同，但據李仲雅的題記，于闐也設立了"里"這種和內地鄉里制一樣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且這裏的教育，至少是漢人子弟的教育和內地沒有什麽不同，學生都遵守着一定的格式讀書習字，因此，寫出的題記格式和語氣也大致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

和田出土的文書多已成殘片。與和田出土的殘片相比，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一些有關于闐史的文書保存的情況要好得多。這批材料，有些已爲學界所知，如P3532《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對于闐雖一筆帶過，但也有助於我們了解開元時于闐鎮及其佛教寺院的情況⑱；P3918《金剛壇廣大清淨陀羅尼經》是一位叫曇倩的和尚從于闐所藏梵本譯成漢文的，這部佛經在西域廣爲流傳，却沒有收入漢文大藏經，這一新材料無疑也是我們研究于闐佛教史時不可忽視的⑲。此外，P2139吐蕃國三藏法師法成('Gos Čhos-grub)

所譯的《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講的是于闐阿羅漢的預言（授記、懸記），這也是一份未收入大藏經的文獻，並且有三個相同的敦煌藏文本可資比較，此卷也是研究于闐佛教史的必讀之物⑳。

有關于闐的敦煌漢文世俗文書和上面談到的敦煌所出于闐語文書一樣，大多是歸義軍特別是曹氏掌握政權時的東西，這裏有雙方來往使臣的牒狀、公憑、願文等，如 P3016《天興七年于闐回禮使索子全狀》、《天興九年西朝走馬使□富住狀》㉑，前節已提及的 Ch. i. 0021 a《壬午年于闐使張金山燃燈發願文》㉒，P4518.(2)《天壽二年寶勝狀》㉓等等，這些材料和于闐語文書寫的于闐使臣報告一樣，提供給我們許多有關于闐本身和于闐與沙州交往的具體情況。此外，沙州官府和寺院的入破歷以及其它一些文書表明，當時兩個政權在經濟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往來，這種往來是絲綢之路東西方貿易的一個側面，有一定的規律可尋：沙州送往于闐的往往是絲織品、工匠，于闐送往沙州的多爲玉石、佛經。至於兩地思想上的交流，也可以從文書中找到例證，P3513，76 葉背 1 行——84 葉背 4 行于闐文書寫的《從德（Tcūṃ-ttehi）太子禮懺文》中，禮懺祝願的格式、用詞與敦煌漢文寫本中的願文非常相似，而且所求之神也是漢地佛教傳統所稱之四大菩薩，表明這個曾經出使敦煌和北宋朝廷的于闐太子的佛教思想深受漢地佛教的影響㉔。

總之，和田與敦煌發現的有關于闐國史的漢文材料，一方面極大地補充、訂正了原有的正史和其它文獻材料；另一方面，它們也是解開于闐文或藏文有關史料疑難處的一把鑰匙。西方一些學者雖然能懂于闐語和藏語，但往往於漢語不甚了然，所以還有許多工作有待人們進一步研究。

三、藏文文獻

藏文文獻也是構成中古于闐史料的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自吐

蕃強大起來以後，塔里木盆地成爲它的攻取目標之一，終唐之世，吐蕃曾經數度占領于闐地區，在這裏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吐蕃的佛敎文獻、歷史典籍中也就保存了許多于闐史料。

在藏文《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大文獻結集中，有五部著作專講于闐，即(1)《淨光明佛所說經》(Dri-ma med-pa'i 'od-kyis zhus-pa)，(2)《牛角山授記》(Ri-Glang-ru lung-bstan-pa)，(3)《僧伽伐彈那授記》(Dgra-bcom-pa Dge-'dun-' phel-gyis lung-bstan-pa)，(4)《于闐阿羅漢授記》(Li-yul-gyi dgra-bcom-pas lung-bstan-pa)，(5)《于闐國授記》(Li-yul lung-bstan-pa)。這五部著作是用藏文編纂而成的，還是從于闐塞語轉譯而來，迄今沒有定論，其中第四部著作除大藏經中的本子外，還有我們上面提到的敦煌所出法成的漢譯本《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P2139)以及三個藏文寫本 Ch.08; Ch.09i3; Ch.73vii3/2)可資比勘。這些文獻不獨是研究于闐佛敎史的基本文獻，而且是研究于闐的歷史地理、語言文字所必不可少的參考書。此外，敦煌藏文文獻中還保存了一部殘缺不全的于闐佛敎史的著作《于闐敎法史》(Li-yul-chos-kyi lo-rgyus)，也提供給我們許多前所未知的情況㉕。

除佛敎文獻外，敦煌還保存了一些吐蕃王國的官修史書，如《王朝編年史》(P. t. 1288; Ch.79 viii7; Or.8212.187)、《吐蕃大事記》(P.t. 1287)，其中或者提供給我們一些唐朝和吐蕃在塔里盆地角逐的背景，或者爲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于闐陷蕃的情況㉖。

于闐陷蕃以後的情況如何？如果我們僅僅從漢文文獻着眼必然難以了解究竟，斯坦因在麻扎塔格、哈達里克發現的藏文木簡塡補了某些空白㉗。這些官府命令、私人契約、收稅派役的名簿賬單、驛傳文書等，一方面反映了吐蕃本身的軍事制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得知，吐蕃占領下的于闐在政治制度等許多方面並沒有十分重大的變化，但這個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公元九世紀中葉，吐蕃在于闐的統治垮臺以後，藏文並沒有退出于闐的歷史舞臺，從敦煌發現的文書來看，當時于闐朝廷中不僅藏文和于闐文共同使用，而且還有一些吐蕃人仕宦其國，著名的"鋼和泰雜卷"(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就是用于闐文和藏文書寫的于闐使臣報告書，其年代已爲蒲立本考訂爲925年。這批使臣當中就有吐蕃貴人[28]。此外，在敦煌文獻中，我們還可以找到不少公元十世紀于闐、沙州、甘州三個地方政權之間相互來往所寫的藏文書信。

目前看來，藏文文獻已經成爲研究于闐史所必不可少的史源之一。但是，由於還沒有人從于闐這個角度對敦煌藏文寫卷加以檢索，所以，有許多材料還沒有被人們所利用。另外，和田出土的許多藏文文書，除斯坦因拿走的一些外，還有許多卷子藏在英國、瑞典等國家的圖書館或博物館中，有待人們去整理。總的來講，我們對藏文史料的研究和利用迄今還是非常有限的。

四、文物材料

十九世紀末以來，挖寶者、探險家、考古工作者、旅行家陸續在和田數十座古代遺址中收集、挖掘了許多珍貴的古代文物和文獻，除了上面談到的于闐語、漢語和藏語卷子外，還有錢幣、雕像、金屬飾件、印章、壁畫、木板畫等，爲于闐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爲珍貴的形象史料。

在約特干(Yotkan)豐富的文化層中，陸續出土了一大批各種類型的陶器，其中有反映這裏佛教興盛的佛像，而更有意義的是雙面壺、獸面注口、陶制小猿像，它們似乎反映出于闐文化的某些地方特徵。斯文赫定在約特干收集到一件陶罐(編號03.11.335)，頸部浮雕出十二個人物，其中可以辨認出三個豎琴師，兩位排簫手，兩個鼓手和一個長笛演奏者；另一件安博爾特(N.Ambolt)收

集的陶制雕像(編號35.24),是一個女子手撥琵琶的形象,這兩件文物不僅證明了法顯、玄奘關於于闐人雅好音樂的記載,而且爲進一步探討于闐音樂史提供了形象材料㉙。

在丹丹烏里克、巴拉瓦斯特、哈達里克的一些佛敎寺院遺址中,出土了許多比較完整的壁畫和木板畫,向我們展示出一幅形象的于闐佛敎史,其中有毗盧遮那佛像,于闐的守護神毗沙門天王像,還有彌勒、觀音、地藏和訶利帝(鬼子母)、大自在天王像㉚,這些年代在八世紀的肖像所反映的當時于闐人的宗敎信仰,是和我們從于闐語佛敎文獻中所了解的情況相一致的。除佛敎題材外,斯坦因還在丹丹烏里克發現了關於絲綢傳入于闐和鼠王故事的木板畫,早已爲人所知,這裏就不多說了。

此外,時代較以上遺址稍早的拉瓦克(Rawak)佛立像的印度風格和時代較以上遺址稍晚的麻扎塔格羣馬圖的唐風影響,以及佛像和供養人像的服飾、相貌,都有進一步研究的餘地。

與和田出土物相比,敦煌莫高窟的壁畫雖然不都能反映于闐的歷史內容,但却不乏和田地區所沒有的形象資料。在這裏,有關于闐的壁畫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佛敎史迹畫,一類是眞實的供養人像。

前一類佛敎史迹畫自中唐開始出現,一直延續到西夏的到來,一般按時間先後畫在龕四披、甬道頂部和主室內,總共有四十餘窟,比較典型的如莫高窟第231和237窟,在龕頂四披處,就有中唐時所繪"于闐坎城瑞像"、"于闐媲摩城雕檀瑞像"、"毗沙門天王決海圖"、"于闐海眼寺釋迦聖像"、"牛頭山瑞像"等,這些于闐瑞像有些見於玄奘《大唐西域記》和藏文《于闐國授記》的記載,有些則提供給我們全新的于闐佛敎傳說㉛。

另一類多半是沙州曹議金女下嫁于闐王李聖天以後繪制的供養人像,在這些像中,我們目前只能從題記中分辨出幾位于闐國

王、太子或公主的肖像，如莫高窟第98窟的大寶于闐國王李聖天，第61窟的于闐公主曹延祿姬等，而另一些很可能現在仍保存的于闐僧侶、使臣像，我們目前還沒有發現或辨別出來。此外，不久以前經搬遷方才發現的第220窟甬道的"新樣文殊"中，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㉜。

清康熙朝官修《古今圖書集成》時，在《邊裔典》裏排比抄錄了正史和一些筆記中有關于闐的史料，這是對于闐漢文文獻的首次系統整理。1820年，法國漢學家雷慕沙(A. P. Rémusat)的《于闐城史》(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就是根據《邊裔典》而編譯的。1884年，美國駐華公使、藏學家柔克義(W. W. Rockhill)在《佛陀傳》(The Life of the Buddha)一書中，翻譯了部分有關于闐的藏文文獻。十九世紀末，塔里木盆地周邊的大批文物不斷出土，震驚了國際東方學界。考古者接踵而來，和田是他們獵取古物的重點目標。1893年，法國人杜特義·德·蘭斯(Dutreuil de Rhins)、費·格瑞納爾(F.Grenard)行經和田。1896年，斯文赫定在他的第一次新疆考察活動中深入和田以北的沙漠，到了丹丹烏里克、麻扎塔格、卡拉當格等遺址。1897年，瑞典傳教士霍伯格(Hogberg)和貝克倫(Backlund)到達約特干。1900—1901年，斯坦因在和田首先進行大規模的系統的發掘工作。此後，日本大谷探險隊(1902—1904)，美國人克羅斯比(O.T.Crosby,1903)，亨廷頓(E.Huntington,1903年)，德國人勒·寇克領導的第三次吐魯番考察隊(1905—1907)，大谷第二、三次考察隊(1911—1914)，芬蘭人馮·曼涅爾海姆(von Mannerheim, 1907)，俄國人奧登堡(1914—1915)，中瑞聯合西北考察團中的尼·安博爾特(N.Ambolt,1927—35)，德國人特靈克勒(E. Trinkler,1928)、德·特拉(H.de Terra,1928)、費爾希納(W.Filchner,1934—1938)等相繼進入和田。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帶走了成批的文物。這使可供比

較研究的資料大爲增多，研究工作有了新的進展。與此同時，于闐語文書被解讀出來，有關于闐的藏文文獻不斷刊布，和田史地研究的面貌因此而大不同於半個世紀之前。

今天，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展我們的和田史地研究的。我們有我們的優越條件，例如，我們可以在和田地區進行實地考察、系統考古發掘，等等。但是，爲了充分發揮我們的優勢，我們不能不調查、統計、登錄過去已經出土的文物、文獻。大批文物、文獻的流失海外，增加了我們這項工作的困難。我們不僅要系統查找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有關文獻記錄，而且要注意傳教士、外交人員帶走的東西，並且了解實物的下落。例如，勒·寇克 1905—1907 年第三次考察隊行經喀什時所獲和田文物，是從英國駐喀什總領事馬繼業 (G.Macartney) 手中得到的㉝；英國駐喀什副領事哈丁(H.I.Harding)的和田收藏品現存新德里國家博物館㉞；1924 年英國駐喀什總領事斯克萊因 (C.P.Skrine) 去和田，所得文物於 1925 年轉贈大不列顛博物館㉟；俄國駐喀什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Petrovsky)帶走的和田文物現存列寧格勒的愛米塔什博物館㊱，列寧格勒所藏未刊和田文書達百餘件之多㊲，估計也是得自同一來源；德國人特靈克勒的和田收藏品現分散在德國不來梅的海外博物館、柏林的民族博物館、紐約市立藝術博物館、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㊳(後兩者的收藏品大概購自特靈克勒，特靈克勒爲了彌補考察組的經費之不足而出售了部分掠得物㊴)，如此等等。我們要把文物資料搜集齊備，結合于闐語、漢語、藏語等文獻作相輔相成的綜合研究。這樣，定能使我們的優勢得到應有的發揮，把于闐史地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

---

① 參看恩默瑞克(R.E.Emmerick)《于闐文獻指南》(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東京，1979 年第 15—36 頁。

② 同上書第34頁。

③ 德萊斯頓(M.J.Dresden) 轉寫譯注《佛本生贊》(The Jātakastava or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費城, 1955年, 美國哲學學會叢刊新輯第45卷第5册。

④ 《贊巴斯塔 (Zambasta)書》, 學界過去因洛伊曼的編號而通稱之爲"E" 寫卷。貝利根據此書系一位名爲 Ysambasta 的于闐官員下令撰造而爲之擬名爲《贊巴斯塔書》, 現已爲學界所接受。原書當有440葉之多, 現存207葉, 24品, 4000頌, 1965年, 蘇聯學者沃羅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夫婦刊布了其中一部分, 稱之爲《術士跋陀羅皈依佛法故事》(Skazanie o Bhadra), 即《贊巴斯塔書》之第二品。1968年, 恩默瑞克刊行此書, 並附譯文, 名《贊巴斯塔書, 于闐文闡揚佛法的頌詩》(The Book of Zambasta, 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68年)。貝利教授爲此寫卷原文作了語匯索引(prolexis to the Book of Zambasta, 劍橋, 1967年), 即貝利教授刊行之六卷本《于闐語文書集》之第六集。

⑤ 貝利《Hvatanica IV》,《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學報》(以下簡稱《學報》BSOAS), 第10卷, 第4期, 1942年, 第891和893頁。貝利《塞語文書: 原文轉寫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倫敦, 1968年, 第17—33頁。

⑥ 貝利《瞿薩旦那國的金剛乘文獻》(Vajrayāna in Gostana-deśa),《國際佛教研究協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第1卷, 第1期, 1978年, 第53—56頁。

⑦ 蒲立本(E.Pulleyblank)《鋼和泰雜卷年份考》(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泰東》(Asia major), 新輯, 第4卷, 第1期, 1954年。

⑧ 金子良太《敦煌出土張金山關系文書》,《豐山學報》第19號, 1974年, 第109—118頁。

⑨ 貝利《七王子》(The Seven Princes),《學報》(BSOAS)第12卷, 1948年, 第616—624頁; 貝利《關於甘州回鶻的一件于闐語文書》(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ṇtsou),《泰東》(AM), 新輯, 第1卷, 第1期, 1949年, 第28—52頁; 貝利《室利尉遲輸羅和大王》

(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泰東》, 新輯, 第11卷, 第1期, 1964年; 貝利《金汗》(Altun Khan),《學報》(BSOAS), 第30卷, 第1期, 1967年。

⑩蒲立本《鋼和泰雜卷年份考》,《泰東》(Am), 新輯, 第4卷, 第4期, 1954年; 井之口泰淳《于闐語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系譜和年代》,《龍谷大學論集》, 第364册; 哈密屯(J.Hamilton)《公元851至1001年于闐年號考》(Les Regnes Khotanais entre 851 et 1001), 載蘇遠鳴(M.Soymié)編《敦煌學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日內瓦——巴黎刊, 1979年, 第49—55頁; 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 載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 北京, 1982年, 第179—209頁。貝利《鋼和泰雜卷》(The Staël Holstein miscellany),《泰東》(AM), 新輯, 第2卷, 第1期, 1951年, 第1—45頁; 哈密屯《鋼和泰卷子研究》(Autour de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通報》(Toung pao), 第46卷, 1958年, 第115頁—153頁。哈密屯《十世紀仲雲考》(Le Pays des Tchong-yun, Čungul, ou Čmuḍa au xe siècle),《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第265卷, 1977年, 第351—379頁。

⑪ 參看貝利《Śrī Viśa' Śūra 和大王》,《泰東》(AM), 新輯, 第11卷, 第1期, 第17—26頁。貝利《Hvatanica Ⅲ》,《學報》(BSOS)第9卷, 第3期, 1938年, 第521—542頁。

⑫ 貝利《羅摩》(Rāma),《學報》(BSOAS), 第10卷, 1940年, 第365—376, 559—598頁。

⑬ 貝利《阿育王故事》(A Tale of Aśoka),《藏學通訊》(Bulletin of Tibetology), 第3卷, 1966年, 第5—11頁。

⑭ 貝利《迦膩色迦》(Kaniṣka),《英國王家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年, 第14—28頁;《泰東》(AM), 新輯, 第11卷, 1965年, 第107—108頁。

⑮ 沙畹《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ourkestan Oriental), 牛津, 1913年; 馬伯樂《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得漢文

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倫敦,1953 年。

⑯ 詳見斯坦因《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第266、277、525—533頁。

⑰ 文物出版社《唐寫本<論語鄭氏注>說明》,《文物》1972 年 2 期。

⑱ 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1909 年,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北京,1910 年。

⑲ 上山大峻《曇倩譯<金剛壇廣大清淨陀羅尼經>》,《龍谷大學論集》第399號,1972年; 森安孝夫《回鶻與吐蕃的北庭爭奪戰及其後的西域形勢》,《東洋學報》,第55卷,1973年,第483—486頁。

⑳ 伯希和,羽田亨:《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托瑪斯 (F.W.Thomas)《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和文書》(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第1卷,倫敦,1935年。

㉑ 張廣達、榮新江上引文,第193—197頁。

㉒ 金子良太《敦煌出土張金山關系文書》,《豐山學報》,第19號,1974年,第118頁。

㉓ 張廣達、榮新江上引文,第199頁。

㉔ 貝利《從德太子禮懺文》(The profession of prince Tcūṃ-ttehi),載本德爾(E.Bender)編《布勞恩紀念印度學研究論文集》(Indologica Studies in Honor of W. Norman Brown),紐黑文,1962年, 第18—22頁。

㉕ 烏瑞 (G. Uray)《公元751年以前有關中亞的古藏文史料概述》(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A Survey),載哈瑪塔 (J.Harmatta)編《伊斯蘭時代以前中亞史史料導論》(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布達佩斯,1979年,第288—290頁。

㉖ 巴考 (J.Bacot),托瑪斯、圖森 (Ch. Toussaint)《敦煌有關吐蕃史文書》(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1946年。

㉗ 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Innermost Asia),圖版131—132,注

釋見附錄R；托瑪斯《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和文書》，第2卷，倫敦，1951年。

㉘ 貝利《鋼和泰雜卷》，《泰東》(AM)，新輯，第2卷，第1期，1951年第1—45頁。

㉙ 蒙代耳(Gosta Montell)《斯文赫定在和田的考古收集品》(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Khotan)，《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第7卷，斯德哥爾摩，1935年，第167—168，180頁。

㉚威廉斯夫人(J.Williams)《于闐繪畫中的佛像》(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載《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新輯，第23卷，第1—2期，1973年，第109—154頁。此文乃威廉斯夫人的博士論文《和闐繪畫》(哈佛大學，1969)的一部分。

㉛ 孫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一)，《敦煌研究文集》，甘肅，1982年，(二)，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研究》第一期，1982年；(三)，同上雜志第二期，1983年。

㉜ 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第220窟新發現的復壁壁畫》，《文物》1978年12期。

㉝ 格羅普(G. Gropp)《中國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不來梅市海外博物館藏特靈克勒的收集品》(Archa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Die Trinkler-Sammlung im Übersee-Museum)，布瑞門，1974年，第18頁。

㉞ 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第Ⅲ卷，第1052 1056頁。

㉟ 斯克萊因《中國的中亞》(Chinese Central Asia)，波士頓，1926年，第170—175頁。

㊱ 彼得羅夫斯基拿走的木板畫目錄見賈科諾娃(Н.Дяконова)《伊斯蘭時期以前中亞的神像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ультовй Иконографи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омусульмансокого цернода)，載蘇聯列寧格勒國立愛米塔什博物館叢刊之五《東方民族的文化和藝術》第6輯，列寧格勒，1961年，第259—271頁。彼得羅夫斯基拿走的泥陶像目錄見賈科諾娃、索羅金(С.С.Сорокин)合編的《和田古文物》(Хотан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列寧格勒，1960年。

㊲ 1973年，蘇聯印度學家、佛教學家邦嘎爾德·列文（Г.М. Бонгард Левин）在第二十九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透露，列寧格勒藏有一百多件未刊和田文書，見德萊斯頓(M.J.Dresden)《和田(塞語)寫卷草目》，載《伊朗學叢刊》(Acta Iranica)第12册《1976年雜纂卷》(Varia, 1976)，德黑蘭-列日，1977年，第27頁附注。

㊳ 見上引J·威廉斯夫人著作，第110頁，第7注。

㊴ 葉特瑪爾(K. Jettmar)《評格羅普〈中國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書》，《中亞雜志》(CAJ)，第22卷，第1—2期，1976年，第154頁。

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

前言

公元九世紀中葉前後，吐蕃內亂，勢力驟衰，它在西域的統治很快土崩瓦解了。位於絲路南道的于闐重又獨立，從漢代以來即在于闐當政的尉遲(Viśa' Vijaya')家族再次確立了統治地位。于闐本來是西域各族人民經濟、文化交往和佛教傳播中心之一，重新立國的于闐再次發揮它在這些方面的作用，而且還進一步和塔里木盆地邊緣諸國、河西的瓜州、沙州地方政權以及中原王朝加強了聯繫。1006年，尉遲家族統治下的于闐爲來自喀什的黑韓王朝所征服。此後的歷史構成了新疆歷史的轉折時期，即穆斯林化突厥化的時期。操伊朗語的于闐人本來篤信佛教，在以後的一段過程中，他們在語言、宗教上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研究這一變化情況，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歷史課題。

然而，對於這段歷史，中國古代史臣、使者留下的記述和穆斯林史料中的零星記載不足以復原其面貌，甚至難於據以考知繼吐蕃統治之後重新立國的于闐國號和王統世系。《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三于闐條載："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此當指李聖天——引者〕，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高〕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李〕聖天世次也。"① 由此可見，于闐的世系早在五代已然不得而知，而國號也只有"大寶國"一名見於史書。至於年號，只有李聖天

的"同慶二十九年"六個字保存在后晉高居誨的《于闐國行程錄》中。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人們相繼在塔里木盆地周圍的某些古代綠洲遺址和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古代文書。幾十年來中外學者整理發表了漢、藏、回鶻、粟特、焉耆、龜茲、于闐等各種語言文字的簡牘和寫本，使古代西域湮沒的歷史的若干情況重現光明。在于闐史方面，以英國伊朗語學家貝利 (H.W.Bailey) 教授爲代表的一批學者對晚期于闐塞語 (The Late Khotanese Saka Language) 文書進行了研究，使唐末五代到宋初時期含糊不清的于闐國史的某些情節因此而重映於史册。本文擬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就于闐的國號、年號和世系問題略述淺見於下，錯誤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一、關於九世紀中葉至十一世紀初于闐國號問題

在九世紀中葉到十一世紀初的不同時期內，于闐② 作爲一個王國有着不同的稱號。這些國號的于闐語形式己爲貝利教授從不同的文書中檢出，並在譯注于闐語文書時，從語言學角度進行了研究。貝利對部分于闐國號和漢語進行了比定。但是，根據漢文史料，可以看出這些國號之間存在着歷史先後次序。貝利對此似乎沒有予以充分注意。下面，我們試圖考查一下這段歷史時期的于闐國號問題。

1. 金國? (ysarrnai bāḍä)

1941 年，貝利教授在《"吐蕃"考》一文中談到吐蕃西北部的東女國即"金氏" (Suvarṇagotra, gser-rigs) 時指出，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所得 P2790 號于闐語文書中多處出現的ysarrnai bāḍä 一詞意爲"金地"，指的是沙州③。其後，貝利在研究敦煌的于闐語文書

過程中看法有變化，將“金地”有時比定爲沙州，有時比定爲于闐。在 P2741 號于闐語文書中，此詞被貝利譯爲“金國”④。法國高等研究院第四部研究員哈密屯（J.Hamilton）教授根據 P2998 號漢文寫卷背面的回鶻語文書，指出“金國”(altun el)使者旣然是從于闐派往沙州的，故沙州根本不可能以“金國”見稱。西德漢堡大學的恩默瑞克（Ronald E. Emmerick）教授也傾向於把文書中所有有關“金國”的段落都解釋爲指于闐⑤。我們從漢文文獻和文書中得知，沙州除了在十世紀初葉張承奉掌權的十年左右時間內號稱“金山國”⑥之外，一直是作爲歸義軍節度使而存在，而從我們下面的考證中可以看出，“金國”存在的時間遠較沙州的“金山國”爲長，所以我們同意哈密屯和恩默瑞克的觀點，把“金國”比定爲于闐。

從我們所能見到的有關金國的于闐語文書看，于闐在 940 年被稱爲大寶國（詳見下文）之前，一直叫作金國。關於金國一名的上限，目前只能做如下推斷。P2741 號于闐語文書是金國的使臣 Thyai paḍā-tsā 上給于闐朝廷的報告，報告他們出使沙、甘二州的情況，其中談到他們於季冬到沙州以後，會見了司空張尙書（Cā Svāṃ-śį），又在甘州會見了籍隸朔方之靈都(Dittu)的漢使，後者提及沙州人張大慶（Cā Ttäyä-Khī）⑦。人們根據漢語文書得知，867—890 年掌握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權力的張淮深因破回鶻有功，被唐朝“詔賜尙書，兼加重錫”⑧，因此，P2741 號文書中的沙州張尙書是張淮深，殆無疑義。這種比定如果不錯，那麽 P2741 號文書的年代當在 867—890 年之間。又據 P2913 號文書張景球撰《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南陽張府君〔淮深〕墓誌銘》載：“乾符之政，以功再建節髦。特降皇華，親臨紫塞，中使曰宋光廷”⑨，則 P2741 號文書的年代還可以縮小在乾符元年（874）至大順元年（890）之間。我們比定了張尙書卽張淮深以後，自然可以認爲 P 2741 號文

書中靈都漢使所提到的張大慶應即張淮深的幕僚——節度參謀張大慶⑩，他的名字又見於斯坦因敦煌千佛洞所得 S367 (G7140)號漢語文書題記："光啓元年(886)十二月廿五日張大慶因靈州安慰使嗣大夫等來至州，於嗣使邊寫得此文書訖"⑪。如果 P2741 號文書中對于闐使人談到張大慶的靈都漢使就是 S367 號文書的靈州安慰使等的話，那麼，把 P2741 的年代斷爲光啓元年，也是有把握的了。因而此時之于闐國號稱金國(ysarrnai bāḍä)也可得以間接推定。從種種跡象看，這個國號或許還可以追溯到于闐擺脫吐蕃，重新建國的851年。

此外，P2790 號于闐語文書對我們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這是于闐金國的使臣上給于闐朝廷的報告甘、沙政情書。其中特別強調了甘、沙二州之間爭戰不已，形勢復雜⑫。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因爲我們從史籍與文書得知，甘、沙爭戰不已只可能是歸義軍張氏當政時代，亦即848年沙州獨立到大約914年之間的情况⑬，而與沙州歸義軍曹氏當政時代（約914年以後直到十一世紀初）甘、沙之間維持着友好關係的情况不相符合。就在這份相當於沙州歸義軍張氏時代的文書裏，第96行提到于闐的統治者爲金汗(ysarrnai ha:nä)；又，P2958 號于闐語文書是一份內容涉及于闐、沙州、甘州乃至朔方和夏州的雜纂，在其中甘州可汗致于闐金汗的信(該文書第149—181行)裏，甘州可汗回顧了兩國早先的友好關系，談到在他的兄長爲甘州可汗時，于闐的金汗(回鶻語寫作Altun Khan)經常派遣使臣到甘州來。但是，當兩國可汗相繼去世以後，兩國的交往中斷，自此以後十年未通往來。恰值蛇年，甘州可汗致書于闐統治者，希望大寶于闐國遣使甘州⑭。文書表明，這位金汗(Altun Khan)已然去世，他是現任大寶國統治者的先人，他生活的時代似乎應早於大寶于闐國時期。P2958 號文書上的金汗 (Altun Khan)和 P2790 號文書上的金汗(ysarrnai ha:nä)是否同爲

一人，尙待考證，但是，汗(ha:nä, Khan)這種突厥族的稱號看來在唐末五代初期曾爲于闐統治者所用，至少甘州回鶻與之打交道時如此，殆無疑義，這似乎說明有兩種可能，一是在李聖天這個自稱爲唐之宗屬的國王⑮掌握政權以前，于闐的統治者和回鶻人來往十分密切，並且受其影響，在和他們往來中采用他們的稱號。另一可能是李聖天之前于闐王確實稱汗。固然，我們遍檢于闐語文書中 Viśa' Saṃbhava(尉遲僧烏波，卽李聖天)、Viśa' Śūra (尉遲輸羅)、Viśa' Dharma(尉遲達磨)和 Viśa' Saṃgrāma (尉遲僧伽羅摩) 等相當五代宋初時期的于闐王的稱號都是"王"(rruṃdä)，而不是"汗"(ha:nä)⑯，更確切地說，從著名的于闐語寫本所謂《鋼和泰雜卷》(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學者已考定其年代爲 925年)中第一次出現 Viśa' Saṃbhava 王(rruṃdä)起，直到 1006 年尉遲家族的王國滅亡爲止，在我們看到的所有于闐語文書中，這一段時期內于闐統治者的稱號一直使用"王"(rruṃdä)，但是，只要文獻不足證，就不排除李聖天以前于闐統治者稱"汗"(ha:nä)的可能。據此可以反過來推斷，在李聖天之前，于闐統治者旣然稱過"金汗"，那麽，屬於金國時期的P 2790 號文書也應在唐末或五代時期。

由此人們可以推知，"汗"這個稱號卽便是受回鶻人的影響而使用的，于闐的統治者之所以在汗上加金字而稱"金汗"，仍應出於國號叫做金國的緣故。而金國這個名稱至少在李聖天在位初年仍然使用。關於這一點，今天可以找到旁證。P2027 號于闐語文書從內容看是于闐金國的一位公主在沙州寫給于闐的父兄表達思親之情的詩篇，年代是同慶(thū-khī)六年(917)⑰。由此可見，于闐的國號直到 917 年仍叫金國。

至於 917 年至 938 年(后晉天福三年)李聖天被册爲大寶于闐國王之間的國號如何，很遺憾，我們現在接觸的史料不足以使我們

做出判斷。它也許在此期間一直使用金國這一名稱；更可能的是，它在這個時期的某一年內把國號改成了下文即將敍及的大寶國。

2．大寶國(ttayi-pū kuhä:jinave)

《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冊》三載："晉高祖天福三年(938)十月制曰：于闐王李聖天境控西陲，心馳北闕，頃屬前朝多事，久阻來庭，今當寶歷開基，乃勤述職，請備屬籍，宜降冊封，將引來遠之恩，俾樂無爲之化，宜冊封爲大寶于闐國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供奉官張光(匡)鄴充使。"見於漢文文獻的大寶國號的來歷就是如此。

大寶國在于闐語中的拼法業經貝利教授指出，P2739號于闐語文書第12行的 ttayi-pū 和第43行的 ttaya-pau 以及上面談到的 P2958 號文書第180行的 thī-pā 都可以說是漢語"大寶"的音譯⑱。在漢語文書中，除下面提到的 S6264 號文書和 P3016 號文書屬於大寶國時期外，S3180 (G3199) 號文書和 P5535 號文書分別談到了于闐大寶國。至於敦煌石窟的題名中，除莫高窟第98窟李聖天題名中的大寶國外，在莫高窟第444窟東壁盛唐畫《見寶塔品》南北兩側還有這樣的題名："南無釋迦牟尼佛說妙法華經，大寶于闐國皇太子從連供養；南無多寶佛爲聽法故來此法會，大寶于闐國皇太子琮原供養"⑲。這兩個于闐太子，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賀世哲、孫修身同志在《〈瓜沙曹氏年表補正〉之補正》一文中認爲就是 P3184 號文書背面題名的于闐太子。該文書稱："甲子年八月七日，于闐太子三人來到佛堂內，將法華經第四卷。"他們推斷這個甲子年即宋乾德二年(964)⑳。我們同意這種推斷，並試作一點補充。文書所記有三個太子，而石窟題名只有兩人，另一位是誰呢？我們認爲當是乾德四年(966)二月入貢於宋的于闐太子德從㉑。他在乾德二年八月參加了敦煌法會之後啓程，於乾德四年初來到汴梁，在時間上是很合適的。這樣，第444窟的"大寶國"的年代就可

以斷爲 964 年，它說明一直到李聖天於 966 年去世之前，于闐還在使用大寶國的稱號。至於大寶國的下限，1938 年貝利教授在《于闐語雜考》一文中指出，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斯坦因得自敦煌千佛洞的 Chi. 0021 a,a 號于闐語文書第 11 行的 gaustamị-deśa ranīje jīnịve vī，意爲"於大寶于闐國"，其年代是"菩薩王尉遲達磨中興五年七月"㉒。中興五年卽公元 982 年(見下)，這是我們見到的大寶國時期的最晚卷子。另外，賀世哲、孫修身同志在上引論文中指出，莫高窟第 61 窟東壁北側"大朝大于闐國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爲新授太傅曹延祿姬供養"的題記，是 980 年左右重畫的㉓，因爲我們發現在稍後時間同一個公主的題名中，于闐被稱爲金玉國(詳後)，這似乎可以證明，980 年前後的中興年間，于闐仍然用大寶爲國號，大寶國的下限應當斷在中興末年，卽 982 年或稍後。

3. 金玉國(ysarnai bāḍa ū ranijai janaivai)

金玉國一名，見於榆林窟第 25 窟洞口甬道北壁第一身題名："大朝大于闐金玉國皇帝的子天公〔主〕……"，其相對的南壁第一身題名："勅推誠奉化功臣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番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燉煌王譙郡開㘤図食邑一千七百図曹延祿一心供養"㉔。這個于闐公主就是上面提到的莫高窟第 61 窟中的曹延祿姬，她的題名又見於南林蔣氏所藏《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中。這幅畫的菩薩像下有小字曰："忌日畫施"，下面盛裝女子題名："故大朝大于闐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養"㉕。從上面這些題名中，特別是曹延祿的題名，可以推測出于闐金玉國的大約時間。莫高窟第 431 窟題梁稱："維大宋太平興國五年 (980) 歲次庚辰二月甲辰朔廿二日乙丑，勅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番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曹延祿之世創建此窟檐記。"㉖

比較上引榆林第 25 窟曹延祿的題銜，980 年曹延祿的加官太傅，低於太師，而且也未稱燉煌王，顯然，榆林窟的題名應在 980 年以後。S4400(G6322) 號文書和 P2649 號文書分別爲太平興國九年(984)二月和三月《曹延祿祈禱文》，其中曹延祿的題銜是"勅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燉煌王"，加官與王號和榆林窟題銜相同。所以榆林窟第 25 窟的修建時間應在 984 年前後，而于闐金玉國之稱，大致也開始於 984 年前後。這個時間恰好和上引中興最晚的年份 982 年大致相銜接，金玉國的稱號極可能是緊接着大寶國稱號而使用的一個于闐國號。

金玉國的下限，我們也可以在上面的題記中找到一些綫索。《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的題名明確告訴我們，這位于闐公主已經故去，並且說明這幅畫是"忌日"施捨的。我們無從知道她的死期，但很有可能她是和丈夫曹延祿一起在咸平五年(1002)自盡的㉗。如果事實是這樣的話，那麼，可以說有可能直到 1006 年，于闐還使用着金玉國這個國號。

金玉國的于闐語拼法，見於 P2787 號于闐語文書第 51 行，作 ysarnai bāḍa ū ranījai janaivai㉘。對這個于闐語短語，貝利教授沒有看到漢語的"金玉國"一詞，所以譯爲"金國和玉國"㉙。簡言之卽金玉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件文書告訴人們，金玉國時代的于闐國王是尉遲僧伽羅摩，文書的第 34—38 行是爲這個王寫的一篇頌詞㉚。可惜的是這件文書沒有提供和尉遲僧伽羅摩王有關的任何紀年資料。此外，藏於英國博物館的東方收集品Or.8212.162 號于闐語文書和 Ch. 00267 號于闐語文書也是有關這個國王的。但是，人們同樣沒有發現有關紀年的材料，只是前者表明，他的在位時間不少於 12 年㉛，這提供了金玉國之稱極可能延用到 1006 年的一個旁證。後者是一個叫 Tcū-syau 的大王所作的祈禱文，其中說到尉遲僧伽羅摩王已不在人世㉜。Tcū-syau 一詞大

概相當於漢語的"曹氏"㉝，于闐語 maista rraispūra tcū syau 即"曹氏大王"，考慮到這件文書出於沙州人的手筆㉞，就更使人們傾向於這種看法。這個曹氏大王不可能是 982 年(中興五年)以前的任何人，因爲那時于闐王是李聖天及其後繼者尉遲輸羅、尉遲達磨，而不是尉遲僧伽羅摩，所以這個曹氏大王很可能是曹延祿或其後的沙州統治者。由此可以推知，尉遲僧伽羅摩王的年代當在 982 年—1006 年之間，即金玉國時期。最後應當指出，日本學者井之口泰淳教授把尉遲僧伽羅摩王放在他構擬的天質年間，即 983—1006 年㉟，哈密屯教授也傾向於把他的年代放在他考訂的天興年間，即 986—999 年㊱(參看本文下節)。這些意見雖屬推測，但是，似乎兩位學者都從某些歷史背景中窺測出，這個國王很可能是于闐轉入穆斯林手之前的末代君主。這樣，我們就碰到了 982 年以後的于闐國號和末代國王，但這個國王的年號暫不能確定。

爲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和探討于闐王國的世系，有必要對同一時期的于闐諸王年號略作考查。

二、前人對于闐世系和年號的研究

在現有的于闐語文書中，《鋼和泰雜卷》的于闐語行紀部分最爲學人矚目，各國學者發表了十數篇文章研究這份卷子的豐富的地理學內容㊲。然而，關於這件文書的年代，從挪威學者科諾夫(Sten Konow)，到由德入英的霍古達(Gustav Haloun)教授，都沒有提出令人十分滿意的結論。1954 年，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 教授在《鋼和泰卷子年份考》一文中，把這卷文書的絕對年代定爲 925 年，同時根據于闐語文書和漢語史籍，考證出三個于闐王的年號，其結論如下：

912—966　尉遲僧烏波(即李聖天)，年號同慶 (于闐語作 thūkhī)

967—977？ 尉遲輸羅，年號擬爲天尊（于闐語作 thyena tcūnä）

978—982—？ 尉遲達磨，年號擬爲中興（于闐語作 cū hīṅa）[38]

蒲立本教授在于闐年號的研究上，篳路藍縷，奠定了學者們進一步考證的基礎。此外，他還在貝利《于闐語文書集》第四集的附錄上作了一篇劄記，根據斯文赫定考察隊收集的于闐語和漢語第 15、16、24 號文書考證出 851—904—912？ 年間有一個于闐王在位[39]。

在蒲立本教授研究的基礎上，日本龍谷大學教授井之口泰淳在 1960 年發表了《于闐語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系譜和年代》一文，該文第四節專門探討五代宋初的于闐世系。作者在介紹了蒲立本的論點並加以補充之後，又從敦煌發現的于闐語寫卷中檢出 thyina hina 和 thyaina śiva 或 thina sitsä 兩個年號。關於thyina hina，作者發現 S6264(G6640)號文書《南閻浮提大寶于闐國迦摩寺八關戒牒》署年是"天興十二年正月八日"，授戒師爲"左街內殿講經談論興教法性大師賜紫沙門道圓"[40]，並認爲這個道圓就是漢語文獻所記后晉天福年間(936—943)出游西域、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伴隨于闐朝貢使入朝的滄州僧人道圓。作者又找出Ch. c. 002 和 Ch 00272 號于闐語文書所反映的一個始於戌歲的統治期(年號)，因爲同慶二十九年(940)以後第一個戌年是 950 年，把這一年作爲天興年號的開始，和從有關道圓記載的年代逆推的結果正相吻合，因而得出結論：天興即 thyina hina，其年代爲 950—966 年。至於 thyaina śiva 或 thina sitsä，作者從語言學上把它構擬爲漢語的"天質"，但是加上了疑問號。作者在 Ch.00269 和 S 2469(G2199) 號于闐語文書中找出一個始於未歲的統治期（年號），於是把它和"天質？"聯繫起來，因爲中興五年(982)是目前所見尉遲達磨王最晚的年代，而 983 年恰好是個未年，於是作者就將

"天質?"這個年號放在出現於 P2787 號文書中的尉遲僧伽羅摩王的名下，定其年代爲 983 年——1006 年，這樣，井之口教授便得到下面的結論：

尉遲僧烏波	(李聖天)同慶	thūkhī	912—949	
	天興	thyina hīna	950—966	
尉遲輸羅 (男)	天尊	thyenä tcūnä	967—977	
尉遲達磨	中興	cū hīṅa	978—982	
尉遲僧伽羅摩	天質	thyaina śiva / thīna sitsä	983—1006?	[41]

1977 年中，法國的哈密屯教授在《十世紀仲雲考》一文中，據 P2028 和 P2798 號于闐語文書上天興(thyina—hīṅa)九年爲馬年的記載[42]，認爲出現在 P3016 號漢語文書的天興年號應相當於 986 年——999 年[43]。顯然，他沒有看到井之口泰淳的上引文章，因而沒有考慮到天興當在 950—966 年的意見；此外，他恪守蒲立本考證的年號框架，也沒有顧及蒲立本考訂的 851—912 年之間有一于闐王在位的可能性，便把他檢出的天興年號排到了中興(978—982—?)之後。稍後，1979 年，哈密屯教授在《公元 851—1001 年于闐年號考》一文中，把蒲立本和他本人的考證系統化。他注意到《蘇聯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第 1 册第 660 頁和第 2 册第 540 頁注錄的 Дx —1400 和 Дx—2148 號漢語文書中的"天壽"年號，將其比定爲 P2928 號于闐語文書中的 thyaina śiva，並根據 P2928 號于闐語文書的"天壽三年、牛年六月十日"的記載，把它放在天興以後的 999—1001—(1005?)年。這樣就得到了一個從 851—1001 年的看來頗爲完整的年號表：

851—904(—912?)			〔于闐某王〕
912—967	同慶	thūkhí	尉遲僧烏波(李聖天)
967—978	天尊	thyena/thyainä—tcūnä	尉遲輸羅

978—982(—986?) 中興 cū—hīṅa 尉遲達磨
986—999 天興 thyenä/thaina/thyina—hīṅa/hīja
999—1001(—1005?)天壽 thyaina-śiva㊹

在這裏，他把 thyaina śiva 比定爲"天壽"無疑是正確的，井之口泰淳教授僅據擬音而提出的"天質?"之說因此不攻自破。此外，哈密屯教授在這篇文章中的又一貢獻是，他把他認爲有比較確切年代的寫本分別放在各個年號下面，表列成目。固然，該表還未能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例如，井之口泰淳刊布的 S6264 號和下面我們刊布的 P4518 號漢語文書都未收入；又如，Ch00269 號于闐語文書，蒲立本在上引劄記中考證應在 851—912 年間，其七年恰爲牛年，哈密屯却放在天興年間，亦恐有誤，又 P2958 號文書的年份也有待進一步考訂。但是，這份有年代的于闐卷子目錄無疑爲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許多方便，他的勞績值得人們感謝。

二、關於天興、天壽兩年號起迄年份的商榷

哈密屯教授關於天興年號的考訂，簡單說來，就是排除了它也許位於蒲立本教授考訂的 851—982 年間的一切可能，天興元年被放在了 986 年丙戌歲這個狗年上。蒲立本教授當年看到的僅僅是同慶、天尊、中興三個年號，所以不作任何保留地認爲：李聖天長達五十四年的統治只有一個年號。隨着人們看到的材料之增多，這種推斷看來值得商榷。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標有天興年號的最晚一個卷子是Ch00272 號于闐語文書，其年款是"天興(thyuina—hija)十四年，猪年二月二十五日"㊺，而據蒲立本教授推斷長達 54 年的同慶年號最晚一個卷子是 Ch00275 號于闐語文書，其年款爲"三十年、牛年三月"㊻，即 941 年。同慶年號當然很可能長於 30 年，但是，不管怎樣，就今所知，在 941 年到 967 年尉遲輸羅王即位之間，存在着 27 年的間隔，這裏有沒有可能放入一個至少爲 14 年的天

興年號呢?

把這種可能性變爲現實性的根據之一，就是井之口泰淳教授已經提到的道圓還經于闐一事。井之口氏把 S6264 號文書上的天興十二年的道圓和《續資治通鑑長編》上的乾德三年的道圓推斷爲一個人。我們贊同這種看法。關於道圓，《宋會要》、《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佛祖統記》等書記載略同，明確指出他是"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㊼。如果按井之口氏的意見，把天興十二年比定爲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就和道圓"還經于闐"的時間正相吻合。此外，我們從 P2893 號漢語文書《報恩經》卷第四的末尾，檢出這樣一條題記:"僧性空與道圓僱人寫記"㊽。從僱人寫經的記載似乎可以看出，這個道圓是一個路過的行脚僧，或許無暇自抄，方才僱人寫記。這件文書正面《報恩經》正文的邊上和整個背面都是于闐文，背面的于闐文是長達二百多行的醫藥文書，其中包括許多藥方㊾。于闐和道圓的這種不解之緣，使我們認爲 P 2893 號文書上的道圓是 S 6264 號文書上的"授戒師"，也就是宋代史籍中的"滄州僧人"。

在敦煌漢語文書中，和天興年號有關的還有哈密屯教授在文章中幾次談到的 P 3016 號文書。文書的正面是題籤不詳的書和一件牒文，背面是正倒相間抄寫的五件牒狀，其中包括《天興七年十一月于闐迴禮使索子全狀》和《天興九年九月西朝走馬使□富住狀》，現依次錄於下:㊿

1. 奉辞[51]:
2. 獎擢關拜，
3. 恩輝
4. 睿澤，天波共同，
5. 臺造敢竭萬國之
6. 賚命，慶祚千里之

7. 山河，北[52]祝南山，恬然晈靖。爰於柒月柒日，告辭
8. 本道，星馳朔餘，達於
9. 朝庭。捌月貳拾貳日，
10. 宣旨迎接接[53]，便令
11. 朝見。
12. 皇帝幸於暑宮。僻袖稱臣，具
13. 奏本道迴禮進貢貢[54]
14. 大朝事，別
15. 勑宣問河隍道歸義軍使臣卿，于(予)虛受東
16. 朝之臣節，爲
17. 朕國之血屬，膺娉諸域，來
18. 朝萬里，柱國良弼，並邁遠昔，任土作貢，開
19. 天未有。仍選揀進貢
20. 皇后內殿箏妓，及添太常寺樂人，特迴
21. 天瞻。宣問
22. 皇后，于虛此理。何者，
23. 聖后所奏承
24. 天，骨肉慶幸。
25. 兩朝所爲，翼禪傳
26. 聖之君，仁德盛明之
27. 主，乩坤再祐，菩薩
28. 天子，日月重明，兆民
29. 父母，所以不懼衆雲、炎摩多，將軍將弓弩僂羅
30. 之人，盡命血戰，不慮死生，但願
31. 聖躬寶祚長春，紫陌成於洛驛。
32. 一仁有感，萬國賴之，路不拾餘(遺)，萬萬餘載，卽
33. 臣妾之，

34．后殿幸也。微臣子全⊠(？)則(？)
35．聖后所奏，道僃空愐，鼎彝鏤銘，紐清竹帛，殷
36．殷不古。叫呼
37．鸞凰，
38．聖聽奏聞，
39．后殿可賴，秉穫樂業。謹具
49．朝覲迴禮進貢
41．龍庭大寶國事儀，豈敢隱匿。
42．聖情超三邁五之化，乃文乃武
43．披圖，時惟不具。伏惟
44．指揮、都衙、都頭等，尊體起居萬福，卽日子全蒙
45．恩(偏祐)，伏惟順時，柱國善佳[55]
46．保重，卑情所望。不宣，伏惟
47．察悉，謹狀。
48．天興柒年拾壹月　日于闐迴禮史[56]內親從都頭前壽昌縣令
御史大夫檢校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索子全狀[57]。
49．指揮等　揮右
50．　　　　　謹空。

....

51．季秋霜冷，伏惟
52．指揮都衙、宋都衙、周都衙、小宋都衙及兩班諸都頭等，
53．尊體起居萬福。卽日富住蒙
54．恩不審，近日拜別賛備
55．府庭，爲
56．社稷生靈，尊用何似，伏惟　依時，倍佳(加)
57．保治，卑情所望。於陸月[58]貳拾壹日出於本道，沿路雖
58．逢奸危賊寇，上下一行，並無折欠，其於

59．國朝信物，亦無遺失，於柒月貳拾叁日得達　西朝[59]。

60．鑾駕親征西幸，富住等至捌月拾壹日出迎接

61．　朝覲，奏　奉本道

62．太師令公[60]差充走馬，　奏迴禮使索子全等貳人於伍

63．月伍日入沙州，不逢賊寇，亦無折欠，

64．宣諾軍府內外官班僧道等，興慶　欽奉

65．皇恩，天高海闊，限以參俑，守職遠方，不獲

66．朝覲。限以富住未獲迴走馬

67．參拜

68．起居。伏惟

69．照察，兼未及信物，謹狀。

70．天興玖年九月　日前檢校銀青光祿大夫新受內親侍都頭西
朝走馬使□富住狀。

71．指揮都衙等閣下

72．　　　　　謹空

在上面的文書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天興七年索子全狀》的第41行稱于闐爲"龍庭大寶國"。按後晉天福三年(938)十月晉高祖石敬塘冊封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61]，因此，天興年號似不應放在約938年以前的于闐稱金國時期。又，如本文第一節所述，中興末年(大約982年)以後，于闐的國號當稱金玉國，所以大寶國時期的長達14年的天興年號，不應放在中興以後的986—999年間，而以放在同慶之後，卽始於950年爲宜。

第二，《天興七年索子全狀》用了大量言詞"宣問"一位于闐皇后。此人是誰呢？爲何沙州的使臣要特別頌稱和尉問她呢？

人們知道，公元九、十世紀沙州和于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以及和親關係。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特別是曹氏年表的復原，對於于

闐世系和年號的考證是大有裨益的。目前所見關於曹氏年表的最好考證，是前面已經提到的賀世哲、孫修身同志的《〈瓜沙曹氏年表補正〉之補正》，現將其結論列表如下：

914—935年	曹議金
936—940年	曹元德
940—945年	曹元深
945—974年	曹元忠
974—976年	曹延恭
976—1002年	曹延祿
1002—1014年	曹宗壽

在沙州和于闐的和親關係中，最爲人稱道的莫過於李聖天的皇后曹氏。敦煌莫高窟第98窟東壁右下方第一身題名："大朝大寶于闐國大聖大明天……"，第二身題名："大朝大于闐國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養"。第一身是李聖天，第二身就是他的皇后、98窟的窟主曹議金的女兒[62]。她的名字又見於莫高窟第61窟東壁右下方第三身題名："姉大朝大于闐國大政大明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一心供養"[63]。61窟的窟主是945—974年任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的曹元忠和他的翟氏夫人[64]。所以這個于闐皇后是曹元忠的姐姐。從目前所能見到的材料看，沙州曹氏嫁給于闐的公主，只有這位皇后，因此，可以認爲P3016號文書上的皇后就是這位皇后，天興年號應大致相當於曹元忠統治時期，而不是哈密屯教授所考訂的相當於曹延祿時期(976—1002)。這樣，曹元忠時期沙州的使臣到了于闐，對節度使曹元忠的姐姐大加存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曹元德兄弟對這個嫁出去的姊姊是頗爲關心的，有關的文書除P3016號文書外，還應有P2638號文書《后唐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狀》，這是曹元德時期沙州淨土寺三年中支給

破除算會賬。該文書第 42 行載："破用數，樓機綾壹疋，寄上于闐皇后用"[65]。這大概也是曹元德對這位于闐皇后的宣問吧。更重要的是與此性質相類的P4518 號文書，該文書包括 39 件佛像、佛畫和題識一類的紙片，其中第二件的背面有如下殘文：

1 ▭寶勝今遠將情懇，

2 ▭

3 天皇后聖顏□□不

4 佐倦尤[66]，細賜照察，謹奉狀奏

5 聞，謹奏。

6 天壽二年五月 日寶勝狀奏[67]。

從上面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第一，寶勝是"遠將情懇"，來到于闐的，所以我們推測他大概是沙州的使臣。第二，他也和索子全等人一樣，在上給于闐朝廷的狀文上用于闐的年號。這似乎是沙州使臣的一種固定的禮節程式。第三，這個沙州使臣求請的天皇后，我們在敦煌石窟題名和文書中很難找出除李聖天皇后之外的任何一個和她相符的角色，所以，我們推測寶勝可能是曹元忠派遣的使臣，而這件文書中的天皇后大概就是曹元忠的姐姐、大寶于闐國王李聖天的皇后曹氏。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井之口泰淳敎授考訂的"天質"年號，依據哈密屯的考證而訂正爲"天壽"之後，放在曹元忠時期(945—974 年)。在此期間內，李聖天的同慶年號相當於 912—949 年，天興繼之，而 967 年以後則是尉遲輸羅王的天尊時期。同時，我們已經提到，天興年號最晚的一件文書的年代是天興十四年，即公元 963 年癸亥歲。而天壽年號最晚的一件文書 P2928 的年代是天壽三年、牛年。這樣，在天興十四年到尉遲輸羅王即位之間，不僅可以而且有理由再放進一個僅僅三年時間的天壽年號，天壽元年很可能就是天興十四年，公元 963 年。

我們所以將天壽元年比定爲 963 年，還因爲我們考慮到這個

年號本身具有特定的意義。于闐自漢以來和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關係，漢武帝時派張騫出使聘問諸國，其中卽有于闐。唐代，尉遲王家與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關係，唐高宗時，于闐設毗沙都督府，其地分爲十州[68]，在軍鎮之下實行類似中原的行政制度。從唐初到沒蕃，于闐許多國王或子弟都曾留宿長安，自然對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十分熟悉，因此，華夏族的制度和文化對於于闐有着深厚的影響。于闐語文書中所見到的大量漢語官名和納稅制度[69]，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漢族統治者之立年號和立年號的用意等等自然也爲于闐的統治階級所熟悉。按照漢族文化傳統，帝王改元，在當時是一件大事，都有一定的背景和原因。例如北魏太祖拓拔珪在398年改元天興，是在他定國號、正封畿、修禮樂、定律令之後，作爲稱帝建國的時間標志的[70]。又如隋文帝於600年議改年號，《隋書》記載：太史令袁充奏景短日長，以爲祥瑞，“上〔隋文帝〕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爲仁壽元年。”[71]開皇二十年恰好是隋文帝五十大壽，所以，這次改元除景長之吉和太子新立的原因外，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在隋文帝的大壽，所以年號叫仁壽。于闐王李聖天的同慶、天興年號也應當有它自己的歷史背景，李聖天的統治到963年已長達50年，他的年齡必然在五十歲以上，爲頌壽而改元“天壽”也就是合乎邏輯的了。

總之，關於天興年號，我們同意井之口泰淳教授的考證。關於天壽，我們認爲則應置於天興之後。

四、九世紀中葉至十一世紀初于闐國號、世系、年號的對照

綜合上面的論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把蒲立本、井之口泰淳和哈密屯三家有關年號的推論附表於下，以資對照，其所考

國號	世系	年號	蒲立本	井之口	哈密屯
約 851 金國 ysarranai bāḍa	851		851		851
		912 同慶 thū-khī	912	912 同慶	912
約 917?					同慶
938 大寶國 ttayi- pū- kuha:- jinave	李聖天 Viśa Sambhava	950 天興 thyina hiṅa	同慶	950 天興	
		963 天壽 thyaina śiva			
	967 Viśa' Śūra	967 天尊 thyaina- tcūnä	967 天尊	967 天尊	967 天尊
	978 Viśa' Dharma	978 中興 cū-hiṅa	978 中興	978 中興	978 中興
約983 金玉國 ysarnai bāḍa ū ranījai janaivai 約 1006	983 Viśa' Samgrama 1006	983		983 天貿 ? 1006?	986 天興 999 天壽 1005?

世系和年號的于闐語形式從略，請參看本文第二節)：

在我們的材料中，沒有一個年號有元年的記載，所以上表所列年號和年號的交替年當然會有若干年的出入。特别是中興年號，最晚只有中興五年(982)的記載，所以我們姑且用這一年作爲尉遲達磨和尉遲僧伽羅摩兩王的交替年份，事實上可能稍後一些。國號終始情况也同樣如此。又由於材料的缺乏，我們還不能知道統治 851—912 年這段時間的君主的名字和他的年號，也不知道尉遲僧伽羅摩王的年號名稱。甚至蒲立本教授早已構擬的天尊和中興兩個年號以及我們構擬的金國的漢文形式也有待最後實證，這取決於人們今後對各種語言文字材料的進一步發現、刊布和研究。

---

① 《新五代史》七四《四夷附錄》三，1974年，中華書局標點本第 917頁。

② 于闐又名和闐，但在漢文文獻中通稱"于闐"，例如，從《史記》到《明史》都是如此。至於于闐的當地名稱，在較早的佉盧文字中叫作 Khotana，在于闐語文書中作 Hvaṃna 和 Hvaṃ，後者也就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所稱之"渙那"。在周圍文明的影響下，當地還有源於梵語的 Gaustana（瞿薩旦那）和源於漢語的 Yūttina 等叫法。詳見伯希和（P. Pelliot）《馬哥波羅游記詮釋》第一卷，巴黎，1959 年，第 408 —425 頁，和闐條；貝利《于闐語文書集》（Khotanese Texts 簡作 KT，以下簡作《文書集》），第四卷，劍橋，1961 年，第 1—18 頁，《引言——瞿薩旦那：于闐的塞人王國》(Gaustana: The Kingdom of the Sakas in Khotan)。但是，在晚期于闐語文書中，一般常用于闐語的 Yanījai—janavai 來表示于闐，它有許多變體，一般轉寫爲 Ratna—janapada，原意爲"產玉之地"。參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學報》(以下簡稱《學報》 BSOAS)，第十卷，第 4 期，1942 年，第 919—920 頁；《泰東》（AM)，新輯，第七卷，第 1 至 2 期，1959 年，第 14 頁；第九卷，第二期，1965 年，第 102 頁。

③ 貝利《"吐蕃考"》(Ttāgutta)，《學報》（BSOAS)，第十卷，第 3 期，1941 年，第 602—603 頁參看哈密屯(J.Hamilton)《五代回鶻》(Les Ouïg-

hours ā L'épogue des Cinq Dynasties),巴黎,1955年,第50頁注①。

④ 貝利《關於甘州回鶻的一件于闐語文書》(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ṭṣou),《泰東》(AM),新輯,第一卷,第1期,1949年,第37頁;《室利尉遲輸羅和大王》(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泰東》,新輯,第十一卷,第2期,1965年,第110頁;《金汗》(Altun Khan),《學報》(BSOAS),第三十卷,第1期,1967年,第95頁,P2958號文書第1件。此外,此詞又見於 P4649號于闐語文書。

應該說明的一點是,這裏所用的"金國"一詞是從于闐語 ysarrnai bāḍä 譯成漢語的,是一種構擬的形式。ysarrnai bāḍä 一詞相應的漢語形式是否如此,還有待於從漢語文書和史籍進一步取證。

⑤ 參看哈密屯《十世紀于闐突厥語中的不穩定的鼻音》(Nasales Instables en Turc Khotanais du X Siécle),《學報》(BSOAS),第四十卷,第3期,1977年,第508頁。

⑥ 參看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6號,第1—28頁。

⑦ 《文書集》(KT),第2集,劍橋,1954年,第87—92頁;貝利:《關於甘州回鶻的一件于闐語文書》,《泰東》(AM),新輯,第一卷,第1期,1949年,第28—52頁;又《伊朗金石銘文匯編》,第二編《東伊朗和中亞的塞琉古和安息時期金石銘文》,第五卷《塞語編》,貝利《塞語文書:原文轉寫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倫敦,1968年,第61—67頁。

⑧ 《張淮深變文》,《敦煌變文集》,上集,第123頁。我們據 P2762號文書《張氏勳德記》,張淮深先受戶部尚書,後加兵部尚書(見羽田亨、伯希和編《燉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又《南陽張延綬別傳》稱張淮深爲"河西節度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見羅振玉輯《鳴沙石室佚書》)。

⑨ 本文所引敦煌漢文寫本,凡未注明出處者,均據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縮微膠卷迻錄。參看《敦煌變文集》,上集,第128頁,校記一。

⑩ 《張淮深變文》,《敦煌變文集》,上集,第125頁。

⑪ 參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1962年,第116頁劉銘恕先生的本卷說明。

⑫ 《文書集》(KT),第2集,第110—114頁;貝利:《室利尉遲輸羅和

大王》,《泰東》(AM),新輯,第十一卷,第1期,1964年,第1--26頁。

⑬ 關於張氏時代沙州歸義軍和回鶻的戰爭關係,參看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二,《東方學報》(京都),1942年,第12册,第3份,第58—98頁;第4份,第42—75頁;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張曹兩世家考——〈補唐書張議潮傳〉訂補》,載《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輯,第37—57頁;唐長儒《關於歸義軍節度的幾種資料跋》,第四節《歸義軍節度和甘州、涼州的關係》,載《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第285—295頁;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6號,第1—28頁。

⑭ 《文書集》(KT)第2集,第117—121頁;貝利《金汗》,《學報》(BSOAS),第三十卷第1期,2967年,第96—97頁。

⑮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條:"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年,第14106頁。

⑯ 《文書集》(KT),第2集,第72頁第1行,第73頁第7行和第74頁第32行;第123頁第436、437行;第13頁第b2行;第54頁第20行;第103頁第51行等。

⑰ 《文書集》(KT),第2集,第79—82二頁;第3集,劍橋,1956年,第53—54頁;第4集,第16頁。

⑱ 貝利:《于闐語雜考(四)》(Hvatanica IV),《學報》(BSOAS),第十卷,第4期,1942年,第919頁;又《金汗》,《學報》(BSOAS),第三十卷,第1期,1967年,第102頁;參看《文書集》(KT)、第2集,第85頁第12行,第86頁第43行,第119頁第181行。

⑲ 謝稚柳《敦煌藝術敍錄》,上海,1957年,第299頁。

⑳ 賀世哲、孫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補正〉之補正》,《甘肅師大學報》1980年第1期,第78頁。又,其錄文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281頁的錄文,皆漏一"內"字。

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稱:"乾德四年二月,于闐國王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

㉒ 貝利《于闐語雜考(三)》,《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學報》(BSOS)第九卷,第3期,1938年,第541頁;又《塞語文書、原文轉寫卷》,第67—70頁;參看《文書集》(KT),第2集,第54頁。

㉓ 賀世哲、孫修身上引論文,第78—79頁。

㉔ 《敦煌藝術敍錄》,第487—488頁。

㉕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北京,1961年,第999頁。王國維《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像跋》,據《曹夫人讚》:"辭天公主,偏照孤孀,執司空手,永別威光",認爲這個曹大王夫人爲曹元忠妻,司空爲延祿,天公主爲延恭妻,和畫上的天公主爲一人。這是作者由於當時所能利用的材料有限而產生的誤解,因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文獻通考》都僅僅記載曹元忠贈敦煌郡王,所以曹大王之夫人必爲曹元忠妻。其實,據石窟題名,曹議金早就稱"托西大王"了。謝稚柳在《敦煌藝術敍錄·概述》中認爲,這個曹夫人是曹議金妻廣平宋氏,天公主是議金另一妻迴鶻可汗女,司空是曹元德,上引《曹夫人讚》文記的是廣平宋氏將曹元忠託附給元德的事。所以畫上的天公主李氏應爲敦煌王曹延祿妻,榆林窟第25窟的于闐公主,和《曹夫人讚》的天公主沒有關係。

㉖ 《敦煌藝術敍錄》第281頁。

㉗ 《宋會要輯稿》第198册,《蕃夷》五,瓜沙二州條稱:"〔咸平〕五年八月,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曹宗壽遣牙校陰會遷入貢,且言爲叔歸義軍節度使延祿,瓜州防禦使延瑞見害,臣先知覺,即投瓜州。蓋以當道二州八鎭軍民,自前數有冤屈,備受艱辛,衆意請臣統領兵馬,不期內外合勢,使圍軍府,延祿等知其力屈,尋自盡。"

㉘ 《文書集》(KT)第2集,第103頁。

㉙ 貝利《尉遲僧伽羅考》,《泰東》(AM),新輯,第十一卷第2期,1965年,第103頁;同作者《新疆古代于闐的伊朗語系王國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Iranian Kingdom of Ancient Khotan),《東洋文庫歐文紀要》(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oyo Bunko)第29期,1971年,第23頁。

㉚ 見注㉙所引兩文,前者的第103—105頁;後者的第23頁。

㉛ 《文書集》(KT),第2集,第1—10頁;又《塞語文書·原文轉寫卷》,第17—34頁。

㉜ 貝利《于闐語佛教文書集》(Khotanese Buddhist Texts),倫敦,1951年,第146—148頁。參看恩默瑞克《于闐文獻指南》(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日本東京靈友會圖書館,1979年,第40頁。

㉝ 參看高本漢所擬古音:曹氏 K1034,879 tśau-şï<* dz'âu-źię。

㉞ 參看貝利《于闐語雜考(四)》,《學報》(BSOAS),第十卷,第4期,第888—891頁。

㉟ 井之口泰淳《于闐語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系譜和年代》,《龍谷大學論集》,第364册,第36—37頁。

㊱ 哈密屯《公元851至1001年于闐年號考》(Les Règnes Khotanais entre 851 et 1001),載蘇遠鳴(Michel Soymié)編《敦煌學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日內瓦——巴黎刊,1979年,第52頁。

㊲ 五十年代之前有關鋼泰雜卷的研究見哈密屯《鋼和泰卷子研究》,(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所輯目錄,《通報》(TP),第46卷,1958年,第116頁。

㊳ 蒲立本《鋼和泰卷子年份考》(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泰東》(AM),新輯,第四卷,第1期,1954年,第94頁。

㊴ 蒲立本《斯文赫定收集之第15、16號于闐語文書的年代》,載《文書集》(KT),第4集,第179—181頁。

㊵ S6264號文書的錄文見井之口泰淳《于闐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系譜和年代》,《龍谷大學論集》,第364册,第42—43頁,注㊿;又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238頁,現據照片,將錄文揭載於下:

1 南閻浮提大寶于闐國迊摩寺八關戒 牒
2 授戒弟子 曹清淨 牒
3 牒前件弟子久慕聖因,遐游覺海,負
4 出塵之極要,投入聖之機謀,遂厭火
5 宅之喧囂,騥出塵之路。此乃愛河
6 永別,彼岸須攀,添究室以盆□,
7 變覺花而證果。事須急牒,伋牒知
8 者,□(故)牒。
9 天興十二年正月八日授戒弟子清淨牒。
10 奉請兜率天宮彌勒菩薩爲壇頭和尚,

11 奉請阿彌陁佛爲教授阿闍梨，

12 奉請金票如來爲提摩阿闍梨，

13 奉請十方諸佛爲戒〔師〕阿闍梨，

14 奉請諸大菩薩爲同學伴侶。

15 授戒師左街內殿講經談論興教法性大師賜紫沙門道圓。

㊶ 井之口泰淳上引文，《龍谷大學論集》，第 364 册，第 37 頁。

㊷ 《文書集》（KT），第 2 集，第 82 頁；第 3 集，第 64 頁。

㊸ 哈密屯《十世紀仲雲考》（Le pays des Tchong-yun, Čungul, ou Čumnḍa au Xe Siècle），《亞洲學報》（JA）1977 年卷，第 360—361 頁。

㊹ 哈密屯《公元 851—1001 年于闐年號考》，《敦煌學論文集》第 49—54 頁。

㊺ 《文書集》（KT）第 2 集，第 51 頁，第 63 行；哈密屯上引文，第 51 頁。

㊻ 《文書集》（KT）第 3 集，第 19 頁，第 1 行；哈密屯上引文，第 51 頁。

㊼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天竺國條："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參看《宋會要輯稿》，第 197 册，《蕃夷》四，天竺條；《文獻通考》卷三三八，《四裔考》十五，天竺條；《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條；《佛祖統記》卷四三；並參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 6 册，北京，1979 年，第 334 頁。

㊽ 參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 275 頁錄文，"僱"原作"雇"，"與"原作"与"。

㊾ 《文書集》（KT），第 3 集，第 83—93 頁。參看恩默瑞克《于闐文獻指南》，第 49 頁。

㊿ P3016 號文書注記於《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 277 頁；《斯坦因敦煌文獻及研究文獻中業經引用介紹的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第一分册，東京，1964 年，第 39 頁。

51 "辞"卽"辭"，見羅振玉《干祿字書箋證》。

52 "兆"卽"兆"。

53 衍一"接"字。

54 衍一"頁"字。

55 "佳"即"加"

56 "史"應作"使"。

57 落款處有印一方；文曰："壽昌縣印"。

58 原作"月陸"，旁注√號，表明應作"陸月"。

59 "西朝"指于闐。

60 關於太師令公，曹家的統治者如曹議金、曹元忠、曹延祿都曾使用"太師"、"令公"或稱"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其中以曹元忠的材料最多。由於曹元忠和曹延祿都可以被稱作"太師令公"，所以我們不用此詞作爲考證天興年號的依據。哈密屯在《十世紀仲雲考》中用此來證明天興年號當在十世紀，似乎失之於泛泛。

61 《舊五代史》卷七七，《晉書》三，《高祖記》三，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年，第1021頁；《新五代史》卷八，《晉本紀》八，《高祖紀》，中華書局標點本，第83頁，《五代會要》卷二九，于闐條，上海，1978年，第465頁。

62 題名見《敦煌藝術敍錄》，第90頁。關於98窟窟主，參看賀世哲、孫修身上引論文，第74頁。

63 《敦煌藝術叙錄》，第134頁。

64 賀世哲、孫修身上引論文，第78頁。

65 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1979年，第649頁。

66 "恠"即"怪"；"㥄"即"愆"。

67 參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302頁錄文，其所錄"仁"、"韻"顯爲"后"、"顏"之誤。

68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中華標點本，1975年，第99頁；《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于闐條，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第6235頁。

69 關於漢語官名，見《文書集》(KT)，第4集，《引言》，第4頁，關於納稅制度，見同書第21頁以下。

70 參看《魏書》卷二，《太祖紀》二，中華標點本，1974年，第31—34頁。

71 《隋書》卷十九，《天文志》上，中華標點本，第525頁。

敦煌文書P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擬)》及其年代

——《關於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一文的補充

P3510 號敦煌寫卷,是一份紙質貝葉型寫卷,共 10 葉,內容有二:前 8 葉是用工整的晚期于闐塞語寫的一篇發願文性質的文書,首尾完整;後 2 葉是另一篇同類性質的文書,僅存開頭部分,人們要了解其全文,需看 P3513 號貝葉型文書的第 76 葉背 1 行至 84 葉背 4 行。換言之,P 3510 文書的後兩葉,即第 9 葉第 1 行至第 10 行只是一份發願文性質的文書開端,內容與之相同而完整成篇的文書另見 P 3513。

P 3510 號寫卷前 8 葉的轉寫最早由貝利 (H. W. Bailey) 教授刊布在«于闐語佛教文書集» (KBT,倫敦,1951 年) 第 47—53 頁。這份文書共 43 小節,末節之後有題記,意爲"Tcūm-ttehi 太子嘆佛功德而命人寫訖。"按 Tcūm-ttehi 當是從德太子,說詳下文。1965 年,丹麥學者阿斯木森(J.P.Asmussen)於其名著 «摩尼教懺悔詞——摩尼教研究» (哥本哈根,1965 年) 中,刊出這件文書的第 6—9 小節譯文,見該書第 256—257 頁。1960 年,貝利教授譯出第 12—13 小節,刊於 «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學報» (BSOAS),第 23 卷,第 1 期,1960 年,第 29 頁。1980 年,貝利教授在«南亞藝術和文化研究»第六卷上發表一篇短文,題爲«從德太子»,又翻譯了這篇文書的第 38—40 小節從德發願部分和末行題

記① 。與此同時，恩默瑞克 (R. E. Emmerick) 教授在同年出版的《伊朗研究》第 9 卷第 2 期上，發表了全部 43 小節及題記的英譯，并附以詞匯解釋② 。以上諸家前後發表的譯文使我們了解了文書內容的全貌。現將這份文書摘要譯載如下：

(第 1—2 小節) 一切恭敬，敬禮一切諸佛並諸菩薩、八聖賢、佛說眞諦及常住三寶。

(第 3—4 小節) 嘆佛億萬功德，不能一一稱頌，謹默誦在心，並數萬次匍匐禮拜。

(第 5 小節) 伏願諸佛慈悲於我從德太子，佑我得悟眞識。

(第 6—9 小節) 從無始時來，因癡而生身至今日，由身舌心三行，由不崇敬信徒，由衆多煩擾而有無數行爲，今並一切懺悔；因嗔、染癡而對母、對父、對諸師乃至對三寶造罪得罪，無量無間，無論記憶與否，今並發露，許我懺悔(deśanā)。

(第 10 小節) 至心發願，願借菩薩善戒力而脫我虛妄，並借菩薩五力導我以正。

(第 11—20 小節) (其內容爲羅列眞心施舍之諸寶、法具等物，從略)。

(第 21—25 小節) 至心發願，願借三寶，脫離生死 (輪回)，並借六婆羅密多而得識十地，得脫五毒。

(第 26—34 小節) 至心發願，向有生各界宣揚佛法，以此功德普及一切衆生，庇佑疾苦，共成佛道，並願自身敬信佛法無礙，徑到涅槃，如佛所行。

(第 35—37 小節) 願生而爲男，有德有勇，有智有慧，孔武健壯，盛福大貴，肢軀爲金剛 (Vajra) 身，神威無敵。

(第 38 小節) 我至親至善 (manāpa) 之父、王中之王，

聖君 (śiṃ-kūṃ) 功德無量。伏願其命居三聚 (trivarga) 而寶位恆昌。

(第39小節) 我至親至善之母、大漢皇后，予我此生性命 (gati)。伏願其命居三聚而堅遠永隆。

(第40小節) 又願諸王子、小娘子(公主)身體安泰，已躬永壽。諸臣僕效力至忠，亦願其災病俱消，福慶相資，永不分袂。

(第41小節) 又願自身我從德太子災祛孽除，瘳疾不作，破諸煩惱，永泰增壽。

(第42小節) 願我諸世皆識前生，願我拯救諸界衆生皆得涅槃。

(第43小節) 願我親見諸佛，永無疾苦，願我因虔敬而往生極樂世界 (Abhirati)。(末題)從德太子一切恭敬，敬禮佛法，命人寫訖。

這一文書實爲韻文體的禮佛偈或歸敬偈式的發願文。恩默瑞克的全譯只稱之爲《從德太子的押韻文》，並指出它和于闐文中的禮懺文 (Deśanā,提舍那)都屬於于闐的密教金剛乘傳統。

關於這篇文書的性質，如上所述。我們擬稱之爲發願文，而不稱之爲禮懺文，理由如下：

于闐塞語文書中有《禮懺文》，是日本學者田久保周譽首先確定的。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 Ch.c.001 號于闐文寫卷包括六件文書，除四件寫經外，有兩件，即該寫卷的第755—851行、第1062—1190行(即貝利《于闐語佛教文書集》所轉寫的530、531號文書，見該書第249—252，253—255頁)被田久保分別標爲Deśaña (提舍那，即禮懺文)I 和 II③。後來貝利在《于闐語佛教文書集》第112—116頁轉寫了P3513號卷的1—12行，後者被人認爲是 Ch.

c. 001號寫卷Deśanā I,II 的大同小異的文本；貝利還把 P3513 第 76 葉背 1 行—84 葉背 4 行的文書也稱爲 deśanā。如上所述，這個寫本的開頭部分與 P3510 的最後兩葉相同。

貝利在 1962 年發表了 P3513 的英譯文，直接稱作《從德太子的禮懺文 (Deśanā)》。在譯文之前，貝利解釋了 Deśanā 的涵義，認爲既可用以指頌佛宣教，也可以表示懺悔罪過④。我們對比了一下 P3513 和 P3510 前 8 葉的內容，認爲兩者性質不盡相同。另外，我們也對照了一下漢文寫卷中的禮懺文⑤，認爲 P3510 前 8 葉與之也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把此文書擬名爲《發願文》。

下面，我們主要討論一下這篇《發願文》的年代。關於它的年代，貝利教授在《從德太子》一文中只是說："十世紀于闐作者筆下的'中國'、'漢'幾乎都是指張、曹兩氏長期掌權的沙州獨立政權 (848—約 1055 年)，于闐王尉遲輸羅(967—977 年在位)是沙州大王的外甥。"恩默瑞克教授指出，從德太子發願文屬於密宗金剛乘一類的文獻，文書第 38 段提到他的父親"聖君" (śiṃ-kūṃ)王，又見於敦煌文書斯坦因收集品 Ch.1.0021b 號背面《金剛乘文獻》的第 50—51 行(《于闐語佛教文書集》KBT，第 155 頁)，其中講到願此王永保壽年。因爲Ch.1.0021b 背面文書的年代大致爲十世紀後半期(參看恩默瑞克《于闐文獻指南》，第 41—42 頁)，所以，從德太子的發願文也應寫於此時⑥。英國學者辛姆斯——威廉姆斯 (Nicholas Sims-Williams)在一篇爲恩默瑞克的《于闐文獻指南》所寫的書評中也認爲，《張金山金剛乘發願文》(Vajrayāna Verses of Cā Kīmä-śani)寫於"聖君"王在位期間，而據 P3510 第 38 段從德是"聖君"王之子，那麼表明《從德太子發願文》的年代應在十世紀後半期⑦。

看來，三位學者都認爲這篇《發願文》寫成於公元十世紀或十世紀後半期，至於具體的年代，則沒有言及。實際上，要解決文書

的年代問題,首先必須明瞭這篇《發願文》的作者從德其人。

從德,于闐文原作 Tcūm-ttehi,比定爲漢語的"從德"(高本漢擬音:* dz'i̯ung/dz'i̯wong/ts'ung-*tak/tak/tē⑧)在語音學上沒任何障礙。我們在此所以採用"從德"這兩個漢字而不用其它同音漢字的原因,主要是基於這樣兩條史料。首先,向覺明先生在《西征小記》一文中談到他 1942 年——1943 年西行途中,在武威民衆教育館陳列室中,"見一木塔,六面俱繪佛像,色彩如新,描繪極精,不失五代宋初規模。木塔中空,據說明書云,內中原有小銀塔一座,銀塔上鐫'于闐國王大師從德'云云,原出敦煌千佛洞……五代時于闐與瓜沙曹氏互爲婚姻,則此當是于闐國供養千佛洞之物。"⑨這裏的"于闐國王大師從德",應即 P3510 于闐文《發願文》的太子從德。其次,1983 年 9 月初,我們在敦煌莫高窟參觀期間,承段文杰所長、樊錦詩副所長和賀世哲、孫修身兩位同志的多方照拂,仔細參觀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敦煌洞窟,其中最引起我們興趣的是第 244 窟(張大千編號 253 窟,伯希和編號 95 窟),其甬道供養人像,南壁第一身爲曹議金像,後爲一童子像,再後是持弓箭侍從;北壁第一身爲曹元德像,後爲一童子像,再後是持弓箭侍從。其中南壁童子像未見題記,而北壁童子像旁有兩條題記,第一條是"□德太子▭",第二條是"德從子▭"。⑩第一條題記的第一個字根據其殘存的筆畫,似乎可以復原爲"從"。如果這種識讀能够成立的話,這裏的"從德太子"也即 P 3510 于闐文《發願文》的作者太子從德。

從德到底是哪位于闐王太子呢?這或許可以從他自己所寫的《發願文》中找到答案。他稱他的父親爲"王中之王"和"聖君"。關於"王中之王",P 4099 號卷子是用于闐文抄寫的一部佛經,名《文殊師利無我化身經》,在經文之後的題記中,發願人寫道:"我願王中之王尉遲僧烏波早升淨土;我願尉遲輸羅王已躬永壽。"⑪尉遲

僧烏波即 912—966 年在位的于闐王李聖天。無獨有偶，這裏也把李聖天稱爲“王中之王”。另外，“聖君”，于闐文原作 Siṃ-Kūṃ，是來自漢語的一種稱號。⑫ 我們曾在《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一文中刊布了 P3016 號背面文書，其中《天興七年(956 年)十一月于闐回禮使索子全狀》的第 25—27 行，稱李聖天爲“翼祚傳聖之君，仁德盛明之主”⑬，“聖君”或許就是“傳聖之君”的簡稱。這樣，P3510《發願文》中從德太子父親的稱號都可以在于闐王李聖天的稱號中找到。但僅僅依據這些，還不能說從德之父即李聖天，因爲我們知道，“王中之王”是來源於印度的一種尊稱，常見於貴霜王朝的錢幣上。在于闐，這一稱號最早以佉盧文的形式見於大約公元二、三世紀的一位國王尉遲僧訶(Vij'ida Simha)的稱號中⑭。到公元十世紀的晚期于闐塞語中，它除了出現在李聖天的稱號中外，還出現在 978—約 982 年在位的尉遲達磨王和大約 983—1006 年在位的于闐王尉遲僧伽羅摩王的稱號中；同時，我們在後者的稱號中還找到了“聖君”這一稱號的兩個例證⑮。所以，僅僅從“王中之王”和“聖君”兩個稱號，還難以對從德太子之父是誰作出判斷。在此應當指出的是，恩默瑞克和辛姆斯——威廉姆斯都把張金山《金剛乘發願文》中的“聖君”作爲一個王的名字而不是稱號來考訂 P3510 的年代，自然得不出滿意的結果。

更重要的證據是從德太子對他母親的描述，《發願文》稱其母是“大漢皇后”，可見這位皇后出身於一個漢族家庭。貝利教授早就指出，于闐作者筆下的“中國”或“漢”指的是張、曹兩氏先後掌權的歸義軍地方政權。這樣，可以說從德太子的母親是來自沙州的一位和親公主。我們遍檢史籍、文書和壁畫題記中有關歸義軍張、曹兩氏和于闐交往的材料，除 Ch.1.0021a 于闐文文書中記載了尉遲達摩王曾派使臣到沙州請求降嫁公主，但未知予否外⑯，只有李

聖天曾經娶曹議金女爲皇后，這在敦煌莫高窟第61窟和第98窟這位曹氏皇后的題記中可以得到明證。由此，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從德太子的母親"大漢皇后"即李聖天的皇后曹氏。這樣，我們回過頭來再看莫高窟第244窟甬道壁畫把從德太子畫在其舅曹元德的身後就不足爲奇了。我們根據從德太子在«發願文»中對其父母的稱謂，基本可以把從德比定爲于闐王李聖天及其皇后曹氏的太子。

這樣，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中的兩條記載："乾德四年二月，于闐國王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是歲，于闐國王李聖天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⑰ 我們在«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一文中認爲，這位德從太子是和在莫高窟第444窟留下題名的大寶于闐國皇太子從連和琮原一起於乾德二年(甲子,964年)八月在敦煌參加法會後，再入貢於宋的。如果我們根據P3510把«長編»中德從的名字顚倒過來，寫作"從德"，就恰好與其他兩位太子從連、琮原的名字相符合⑱。因此，我們認爲P3510«發願文»的作者從德太子，就是乾德四年入貢於宋的李聖天之子"德從"，其名字的顚倒可能是由於傳譯或宋朝國史實錄當時記錄、抄寫之誤，所以，«長編»等宋代史籍給我們留下的名字都是"德從"而不是從德，如果沒有敦煌出土的文物、文獻和保存的題記，這千年之訛是難以澄淸的。

由«長編»的"德從"一名聯繫到莫高窟第244窟甬道北壁的第二條題記："德從子□□"。看來，當時確實有一個叫德從的人，但這個德從肯定不會是«長編»所記乾德四年入貢於宋的"德從"，因爲我們已經證明«長編»的"德從"應當是第244窟第二條題記"德從子□□"之前的第一條題記所載的"從德太子"。這兩條題記目前已殘，題在甬道北壁畫的一個童子之旁，而對面南壁上的童子像目前找不到題名，那麼，"德從子"會不會是指對面南壁上的童子

呢？就我們所知，似乎很難找到這種方式的題名法。目前，我們只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北壁上的童子像應即從德太子。那麼"德從子"又如何解釋呢？日本學者金子良太先生在《敦煌出土張金山關係文書》一文中，根據敦煌文書 ch 00274 于闐文《佛本生讚》(闍陀伽讚 Jātakastava）跋文，復原了于闐王尉遲輸羅和尉遲達磨兩朝重臣張金山的家族成員的姓名。其中，張金山的叔父就叫張德從(于闐文 Cā ttaiha tcainä<Chang Tē—ts'ung)⑲。我們知道，于闐文長卷《佛本生讚》是張金山請人(一說自己)寫成獻給當時的于闐王尉遲輸羅(967—977 或 978 在位)以爲功德的⑳，由此可知張金山和尉遲輸羅是同時代人，後面我們將要證明，P3510 中的太子從德即後來的尉遲輸羅王，那麽，張金山叔父張德從之子與從德太子爲同時之人，並以貴戚之子的身份與從德太子一起題名莫高窟，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我們已經考訂了 P 3510《發願文》的作者是于闐王李聖天的太子，根據上引千佛洞所出銀塔題名"于闐國王大師從德"，可知從德後曾爲于闐王。貝利教授在《從德太子》一文中指出，于闐王尉遲輸羅即沙州曹大王的外甥。他雖然沒有作進一步的探討，看來似乎已經傾向於把從德太子比定爲尉遲輸羅王。實際上，蒲立本教授早已證明，尉遲輸羅在 967 年繼李聖天爲王，年號天尊，根據 P5538 正面于闐文文書，他曾在對疏勒的黑汗王朝的戰爭取得勝利之季，於天尊四年(970 年)致書其舅沙州曹元忠大王，報告他率軍進攻所取得的戰果㉑。從這封鈐有尉遲輸羅的"書詔新鑄之印"的國王詔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尉遲輸羅的母親就是曹元忠的姐姐，也卽嫁給李聖天爲后的曹氏。由此可推定，尉遲輸羅卽李聖天之子。㉒我們目前找不到從連、琮原曾經爲王的記載，而從千佛洞所出銀塔題銘可知從德却曾爲王，所以，這位尉遲輸羅王作爲李聖天之太子，舍"于闐國王大師從德"莫屬。也可能，從德是李聖

天的長子，所以李聖天在 964 年只派遣他到宋朝入貢，而從德因爲有東入大宋一段因緣，在兄弟中又以嫡以長最爲顯貴，所以，967 年由宋回國後就卽位爲王，年號天尊，"天尊"之義也許就是受天朝之尊而立的意思罷。

總之，把以上材料按年代排比一下，可以粗略了解從德（尉遲輸羅）的大致生平。從德還在孩童時就曾來到沙州舅家，在莫高窟第 244 窟的甬道留下了題名和畫像。待其長大成人，曾在李聖天天壽二年（宋乾德二年，964 年）八月與兄弟從連、琮原一起再到敦煌參加法會，然後登程，於天壽四年（乾德四年，966 年）二月到達汴梁，向宋朝進貢。回國後恰遇父王李聖天去世，於是卽位爲王。在他統治時期，于闐佛教更加興盛，顯教學之外，密教學金剛乘(Vajrayāna)也流行起來，«佛本生讚»、«mañjuśri-nairātmyātvatarā-sūtra»、«金剛乘發願文»等大批于闐文佛教文獻就產生在他的時代。在他統治的後半期，于闐曾經與占有疏勒的大食、當卽信仰伊斯蘭教的黑汗王朝進行過長期的宗教戰爭，並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從德也和其父李聖天（尉遲僧烏波）一樣，既有自己本民族的名字尉遲輸羅，又按漢族的習慣取了漢名"從德"，這也反映了于闐尉遲氏政權和中原的漢族政權以及沙州歸義軍地方政權之間源遠流長的密切關系。

P3510«發願文»的作者從德的生平既明，其年代也就不難考定。首先，因爲從德是以太子的身份讓人寫這篇«發願文»的，所以，它的下限不會晚於 967 年從德卽位；又因爲莫高窟第 244 窟是沙州節度使曹元德 935—940 年節度瓜沙時重修的[23]，當時從德還是個孩子，因此，保守地說，«發願文»的上限不早於 935 年。實際上，這篇保存在敦煌的完整«發願文»，很可能是 964 年前後從德在敦煌參加法會時留下的東西。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P3510«從德太子發願文»後面第9--10

葉所寫的另一篇《禮懺文》的開頭，和 P3513 文書第 76 葉背 1 行至 78 葉正 1 行《禮懺文》開頭一樣，因此，貝利教授在 1962 年所寫的《從德太子禮懺文》一文中翻譯 P3513《禮懺文》全文時，盡管 P 3513《禮懺文》中沒有“從德”一名出現，他仍然認爲其作者某太子就是從德。[24] 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在這篇完整的《禮懺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德的佛教思想深受漢地佛教的影響，但這個問題涉及于闐佛教的演變史，越出本文範圍，故在此從略。

---

① 貝利《從德太子》(The Great Prince Tcūṃ-ttehi)，載錢德拉(Lokesh Chandra)主編《南亞藝術和文化研究》第 6 卷(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Volume 6, Commemoration Volume on the 78th Birthday of Acharya Raghuvira)，新德里，1980年，第 49 頁。

② 恩默瑞克《從德太子的押韻文》(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伊朗學研究》(Studia Iranica)，第 9 卷，第 2 期，第 185—193頁。

③ 田久保周譽《敦煌出土于闐語秘密經典集的研究》，春秋社，1975年。

④ 貝利《從德太子禮懺文》(The Profession of Prince Tcūṃ-ttehi)，本德爾 (E. Bender) 主編《布勞恩紀念印度學研究論集》(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 Norman Brown)，紐黑文，1962 年，第 18—22 頁。

⑤ 如《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五卷，第 1303—1306 頁刊布的中村不折藏本兩件和 S2354；井之口泰淳《關於敦煌本〈禮懺文〉》中刊布的 P2722 (見《岩井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第 85—87 頁)。此外，我們還從膠片中檢讀了 S236、S332、S1084、S1306、P234背等號文書。

⑥ 恩默瑞克《從德太子的押韻文》，第 185 頁。

⑦ 辛姆斯——威廉姆斯《評〈于闐文獻指南〉》(Review of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RAS)1981年，第 1 期，第 85 頁。

⑧ 高本漢 (B. Karlgren)《漢語形聲新編》(Gramata Serica Recensa),《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第29卷,斯德哥爾摩,1957年, no.1191和919。

⑨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1957年,第340頁。銀塔外的木塔,現藏甘肅省博物館,承甘肅省博物館吳礽驤同志的幫助,1983年8月末我們見到了這座木塔的入藏照片及說明:"編號2486,五代木彩繪塔罩,1956年武威文物保管所移交"。根據下面考訂的從德即位年代,這裏的"五代"似應改爲宋初。

⑩ 我們檢索了陳萬里的《西行日記》、史岩的《敦煌石室畫像題識》和謝稚柳的《敦煌藝術敍錄》,均未錄這兩條題記。

⑪ 《于闐語佛教文書集》(KBT),第135頁;同作者《于闐語文書集》(KT),第2卷,劍橋,1954年,第123頁;蒲立本(E. R.Pulleyblank)《鋼和泰卷子年份考》(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泰東》(AM),新輯,第4卷,第1期,1954年,第92—93頁。

⑫ 貝利《瞿薩旦那:于闐的塞人王國》(Gaustana: The Kingdom of the Sakas in Khotan),《于闐語文書集》(KT),第4卷,劍橋,1961年,第4頁。

⑬ 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1982年,第194頁。

⑭ 恩默瑞克《于闐文獻指南》,東京,1979年,第3頁。

⑮ 同注⑫貝利文,第4—5頁。

⑯ 貝利《塞語文書轉寫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倫敦,1968年,第68—70頁;金子良太《敦煌出土張金山關係文書》,《豐山學報》第19號,1975年,第109—118頁。

⑰ 《宋史》卷490《外國傳·于闐國》略同。

⑱ 按"琮",古音通"從",《唐韻》"藏宗切";《廣韻》"疾容切"。參看高本漢《漢語形聲新編》no.1003擬音 dzŏng/dz'uong/ts' ung。

⑲ 金子良太《敦煌出土張金山關係文書》,第111頁。此外,金子良太還檢出張德從的于闐文字爲 Kharūṣa,見於《鋼和泰雜卷》第40行和第47行。

⑳德萊斯頓（M. J. Dresden）《佛本生讚》（The Jātakastara or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美國哲學學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新輯，第45卷，第5期，費城，1955年，貝利《佛本生讚題記》（The Colophon of the Jātakastava），《大印度學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第11卷，第1期，1944年，第10—12頁。

㉑ 蒲立本：《鋼和泰卷子年份考》，第91—94頁。

㉒ 貝利《室利尉遲輸羅和大王》（Srī Viśą Śūra and The Ta-uang），《泰東》新輯，第11卷，第1期，1964年，第17—26頁。

㉓ 賀世哲、孫修身《瓜沙曹氏與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242頁。

㉔ 同④。

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在和田和敦煌發現的每一件于闐語寫本或殘片，對於解明古代西域乃至河西走廊的歷史，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但是，在利用這批珍貴文獻做歷史學研究之前，除了對這些"死文字"材料進行解讀之外，還應確定各類寫本以及各寫本的年代，至少應當找出每種文獻或文書的大致年代界限。這不僅能使人們利用它們正確地解釋歷史，同時也有助於于闐語言文字的深入探討。因此，有關于闐文獻的年代學研究，應當是和于闐語的研究同步進行的。在這方面，于闐語研究的前輩學者如霍恩雷(A. F. R. Hoernle)、柯諾夫 (S. Konow)、貝利 (H. W. Bailey)以及漢學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佛教史家井之口泰淳等，都對考訂于闐文獻的年代做出過貢獻。直到今天，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仍在突厥學家哈密屯 (J. Hamilton)、伊朗語學者熊本裕和本文作者之間進行，並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的興趣，據聞現在大力研究于闐文獻的施傑我 (P. O. Skjaervø)也正準備發表新的見解。可以說，有關于闐文獻年代的探討，已經超出論題本身而大大豐富了人們對于闐歷史和語言的認識。

1982 年，我們發表了《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①。翌年，又在《敦煌文書 P3510〈從德太子發願文(擬)〉及其年代》一文中②，做了某些補充。其中前稿被譯爲法文在巴黎刊出後③，哈密屯教授④和熊本裕博士⑤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一些補充和批評意見。這使我們得到教益，促使我們深入

考慮問題。與此同時，近年來又有一些關於于闐年代的新材料被發現，促使我們核對某些原來的見解。本文就是我們根據同行的教示和新發現的材料而做的進一步探討。在本文中，我們集中討論和田範圍內出土文獻的年代，目的在於從考古、歷史、語言等不同角度來考察近年新發現的木函文書的年代，並對蒲立本提出的一大批和田出土文書的年代重做考訂，我們希望我們對這些文書年代的新考訂有助於利用這些文書說明更加確切的時代的歷史眞相。至於敦煌文獻所反映的晚唐、五代、宋初的情況，我們擬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詳細考察。

一、和田新出土的于闐文木函文書的來源及其年代

1981 年，中國的《人民畫報》第一期刊出了一件新發現的于闐文木函的部分照片。經吉田豐氏的提示，這件新發現的于闐文文獻引起了漢堡大學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的注意。1984 年，他根據新疆博物館提供的照片，轉寫、翻譯了這一木函文書⑥。這件木函文書是一份人口買賣契，年份是 salī 4 māśta 2 haḍā 5 ṣa' kṣuṇä miṣḍā gyasta hvanä rraṃdä viśa' sīmhyi(聖天于闐王 Viśa' Sīmhyi 四年二月五日)。恩默瑞克在文章中推測這位 Viśa' Sīmhyi 王是公元 851—911 年在位的統治者，因爲自從蒲立本教授根據 Hedin 24 于闐文書考訂了這段時間的王統⑦以來，人們一直沒有找到相應的統治者。其後，熊本裕氏基於九世紀于闐曆未必與中原曆一致這一認識，否定了蒲立本的年代考證以及相應建立的 851—912 年間的王統，認爲木函文書中的 viśa' Sīmhyi 似是 978 年即位的尉遲達磨(Viśa' Dharma)的繼承者⑧。

我們認爲，要正確地考訂這一木函文書的年代，首先應當對它的來龍去脈有個清楚的認識。《人民畫報》的報導說木函是在“丹

丹烏勒克"發現的，並把它和著名的"丹丹烏里克" (Dandan-uiliq) 聯繫起來。實際上，兩者並非一地。該《畫報》所繪地圖表明，發現木函的丹丹烏勒克不會越出老達瑪溝(Old Domoko)的範圍，距斯坦因 (M. A. Stein)發掘的丹丹烏里克有數十公里之遙。據 1978 年徵集這件木函時在場的殷晴先生撰文介紹⑨，這個木函實際上是在策勒縣老達瑪溝東北"鐵提克日木"遺址發現的。他還指出，距現耕地界約 11 公里的鐵提克日木，是一個範圍廣闊的古代遺址，即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所記錄的"特特爾格拉木"遺址。1977 年，策勒縣曾組織人在這一帶調查，發現過一些錢幣，裝飾品和生活用品 。

因爲文書的出土地情況對於判定文書的年代至關重要，所以，我們不妨把黃文弼先生 1929 年訪察該遺址的報告摘要錄載於下⑩：

> 通過舊達摩戈(Old Domoko)村，向北東行，入沙磧，約五、六里地，即有紅色陶片散佈，顯示已逼近古代住宅區域也。轉東行，至一爲數衆多之瓦礫場，地名特特爾格拉木。西南東北一淺綿延約數里。房屋雖已毁敗，但審其痕跡，街衢巷陌尚可辨識，中有大道一條，路向東北，顯爲一舊時市鎮之殘跡。達摩戈干河經行舊址之西，向北微偏西去。……舊達摩戈在其西南約十餘里。

黃先生在此除見到許多水波紋、聯珠紋紅陶片或邊緣爲浮雕人、獸形的器柄外，還拾到許多"龜茲小銅錢"，並斷定爲四、五世紀物。此外，遺址中心西約五、六里處有一土墩，又北里許有高土台，旁有房屋遺址和街衢，在房址中得五銖錢一枚。再北亦有建築區，陶片散佈，拾五銖錢數枚，他認爲似劉宋"荚子錢"，説明這一帶古址的年代爲五世紀。

本世紀初，斯坦因曾在其先後三次中亞探險中詳細地考察、發

掘過策勒縣東北老達瑪溝一帶的遺址。"鐵提克日木"或"特特爾格拉木"一名，未見斯坦因著錄，但在老達瑪溝東北的古遺址，他的地圖上却只有 Farhād-beg-yailaki⑪。1908 年 2 月，斯坦因從 Kara-dong 溯克里雅河南上，又轉西進入策勒境內，希望找到這個早已聽說過的遺址。但由於嚮導引錯了路，只好經老達瑪溝來到 Malaka-ālagan(瑪拉阿拉干，今爲策勒縣良種場場部所在地)。經過休整，斯坦因等人於 3 月 2 日由此出發，向東轉北進入這一遺址區。據斯坦因的記載，遺址距瑪拉阿拉干最近處爲六英里，遺址範圍由東南到西北約 4.5 英里，分佈相當廣闊。斯坦因在此總共發掘了 12 處遺址(編號作 F.I-XII)，出土了梵文貝葉寫經、木板婆羅迷 (Brāhmī) 文書以及木板佛畫、壁畫、東漢五銖錢等物，還找到了一座與和田城正北方向的遺址 Rawak Vihāra 形制相類似的殘塔基 (F.VI)。他根據出土文物推斷，除 F. XII 號遺址年代稍晚一點外，Farhād-beg-yailaki 遺址的年代應在唐朝以前，其理由有五：(1)當地只有東漢五銖而絕無唐錢；(2)封泥的形式與尼雅遺址出土者相同；(3)在繪畫上受印度影響較丹丹烏里克和哈達里克 (Khādalik) 出土的爲多；(4)書寫材料以木板爲主，而不像丹丹烏里克、哈達里克等唐代遺址那樣，紙佔統治地位；(5)文字只有婆羅謎文，而未見漢文和藏文。此外，斯坦因還指出，這裏沒有找到四世紀之前使用的佉盧文文書。他根據他推斷的捍(媲)摩城的位置(Uzun-tati)，把此地和宋雲記載的"末城"聯繫起來⑫。

對比以上三者記述的方位、里程、古河道位置、遺跡分佈和出土文物的情況，斯坦因的 Farhād-beg-yailaki 應當就是鐵提克日木或特特爾格拉木。我們近年在這一帶的實地考察爲兩者的比定提供了實證。

1983 年秋和 1986 年秋，我們曾兩次到和田的策勒縣達瑪溝 (Domoko) 一帶做短時間的踏訪。1983 年 9 月 30 日，在當地負責

人幫助下，由維吾爾族人 Asiyahan 氏嚮導，從瑪拉阿拉干乘硇車牽引車北偏東行，在紅柳(檉柳、Tamarisk) 根部多年形成的巨大沙包羣中迂曲前進。約行 12.5 公里，開始出現房屋遺址，這種遺址實際是紅柳枝編成的墻角及牆角內外的大量陶片、胡楊木片。稀疏的牆脚遺址沿古河道展開，間有窰址、桑林殘根、受火燒過的殘銅錢。房屋遺址中常可找到方孔小銅錢、銅環等。如此綿延二三公里，到達一處土台，據稱原是佛塔。自佛塔改向北行，沿渠底前進，數百米有佛塔殘基，當地百姓稱之爲“丹丹” (Dandan)。由佛塔西北行，約五公里有遺址，存牆基、紅陶片，方圓百餘米。西北300餘米有佛塔，在土阜之上，佛塔四周有房屋遺址。我們是帶着斯坦因的地圖進入沙漠的，道路任憑人們在檉柳根沙丘中迂迴選擇，全由多年在沙丘中放牧的嚮導指點。嚮導稱這一帶爲鐵提克日木(Titirkerem)。今天所見遺跡的一般面貌與斯坦因、黄文弼時期無大差別，只是佛塔等遺址已遭進一步的破壞。發現于闐文木函文書的丹丹烏勒克，顯然指的就是有這一類被稱作“丹丹”的佛塔的地方。

今天的鐵提克日木(Farhād-beg-yailaki)佈滿檉柳根沙丘，遺址的廢棄年代應當就是這裏出土的文書的年代下限。斯坦因把這片遺址和宋雲的末城相聯繫固然有待證明，但他把大部分遺址斷在五世紀却是有根據的。黄文弼先生也持有同樣的看法。對此，我們可以補充幾點意見。

斯坦因已經指出，F. VI號佛塔殘基與 Rawak Vihāra 形制格局很相似，而後者的年代約在公元三、四世紀之交⑬。據此，F. VI 號佛塔的年代也不應晚於四世紀末期。至於這裏的壁畫，雖然早期研究者如安德烈斯 (F. H. Andrews) 把它們和哈達里克、巴拉瓦斯特 (Balawaste) 等地壁畫混爲一談，認爲是七、八世紀的產物⑭，但後來的研究者們傾向於把 Farhād-beg-yailaki 區分

出來，因爲其繪畫的手法和形制都較哈達里克等唐代遺址爲古老，如 F. II. iii.2 毗盧折那主像和小像的安排，也是和 Rawak Vihāra 的壁雕形制相同⑮。甚至斯坦因認爲稍晚一些的 F. XII 號遺址，也不會太晚，因爲這裏出土的壁畫鬼子母像被藝術史家考訂在六世紀中葉⑯。同一地點出土的貝葉本梵文《妙法蓮華經》，也由梵語文學者斷定在六世紀⑰。除了 F. XII 遺址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外，在文字材料方面，斯坦因在 F. II 和 F.III 遺址找到很少一些于闐語文書。從書寫材料看，這些文書都是寫在木板之上⑱，顯然較哈達里克、巴拉瓦斯特和丹丹烏里克出土的唐代紙質文書要早得多；從文書的字體來看，也比和田其它遺址出土文書的字體顯得古老些，托瑪斯 (F. W. Thomas) 由此懷疑 F. II. i. 1 和 F. II i.006–007 等號文書是于闐語言的最早記錄⑲；從文書的語言來看，F. 05 是所謂古于闐文(Old Khotanese) 所寫的佛教文獻 Karmavibhaṅga⑳，其他則是用晚期于闐文(Late Khotanese)寫的世俗文書。下文將談到，晚期于闐文的年代至少可以推到七世紀初葉甚至更早。所以，上述一系列事實表明，鐵提克日木遺址的年代下限至少在唐代以前，其中的出土文物以屬於五、六世紀者居多。

鐵提克日木遺址新出土的木函文書和斯坦因所得木函文書形制相似，又出土於同一地區，因此不難把它的年代上溯到公元七世紀以前。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從以下事實得到佐證。

迄今所知，與恩默瑞克轉寫、翻譯的這一木函文書〔以下簡稱木函一〕相類似的木函，還有貝利教授刊佈的 Or.9268 號文書㉑〔以下簡稱木函二〕和施傑我博士在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 (India Office Library)發現的第三件木函文書〔以下簡稱木函三，未刊〕。木函二的出土地點不明，但它來源於和田地區當無疑問。這可以從恩默瑞克指出的下述事實得到證明，即在所有已知的于闐文獻

中，有兩個人名僅見於木函一和木函二㉒。這件明確標示爲 salī x māśtä 8 haḍā 27 si' kṣuṇä misḍāṃ gyastä hvaṃnä mistä rruṃdänu rruṃdä viśa' dharmä“時聖天、于闐大王、王中之王 Viśa' Dharmä 某年八月廿七日”的文書，由哈密屯教授編入他認爲的中興年間(978—982—986?)，顯然，他把木函二中的 Viśa' Dharmä 王和敦煌文書 Ch I. 0021a. a 中的 Viśa' Dharma 王勘同爲一㉓。然而，據藏文《于闐國授記》(Li-yul lung-tstan-pa)，于闐歷史上至少有三位君主名叫 Vijaya Dharma㉔，若無其他有力證據，木函二文書中的 Viśa' Dharmä 王似乎不能只考慮列入十世紀末的可能，也應參照文書的形制，考慮放在與鐵提克日木出土的木函文書同樣時代的可能。

從考古學的遺址年代和器物分期的角度考慮，木函一文書中的 Viśa'Sīmhyi 王的年代或許應列入唐代以前的五、六世紀，與之相關的木函二文書中的 Viśa' Dharmä 王的年代也可能屬於同樣的時期。這兩位國王的關係還可以從施傑我發現的木函三加以推測。施傑我於 1984 年在布達佩斯做的一次講演中，報導了他的新發現。在長方形木函的內側，寫有 salī 1 māśtä 10 haḍā 22mye kṣuṇä miṣḍā gyastä hvaṃni misti rrāṃdäna rrāṃdi viśya sīhye“聖天、于闐大王、王中之王 Viśa' Sīmhye 元年十月廿二日”的文書；而底部寫着 salī 2 10 (?) māśti 11mye kṣuṇä miḍāṃ gyasti hvaṃni misti rrāṃdä viśa dharmä“聖天、于闐大王 Viśa' Dharmä 二年十月十一日”的文書。他認爲兩件文書是先後寫成的，因此可以把 Viśa' Sīmhye 王插入蒲立本考訂的尉遲輸羅 (Viśa' śūra)和尉遲達磨 (Viśa' Dharma) 王之間，在位年代是 973—976 年㉕。由於三件木函的相似性，我們上面關於木函一和木函二的年代討論也可以用來判定這件木函文書的年代，因此，其中提到的 Viśa' Sīmhye 和 Viśa' Dharmä 王或許就是木

函一、二中分別見到的 Viśa' Sīmhyi 和 Viśa' Dharmä。關於 Viśa' Sīmhyi 和 Viśa' Dharmä 王的確切年代，目前不易考定。上文提及，藏文《于闐國授記》記載了三位 Vijaya Dharma 王，同書還記載了三位 Vijaya Siṃha㉖。但該書記載的大部分王統都沒有絕對年代，而且其所記于闐建國的年代和該書的成書年代也都在討論之中，迄無結論。因此，我們只把現象列舉於上，而不勉強做推測性的比定。總之，藏文材料所記于闐史上同名國王的大量存在使我們相信，上述三件木函文書中的 Viśa' Sīmhyi 和 Viśa Dharmä 兩王的年代，很可能要隨木函年代而上溯到五、六世紀，而不是置於九、十世紀。

我們之所以傾向於把目前發現的三件于闐文木函文書的年代追溯到唐朝以前，根據在於這種木函正是五、六世紀乃至更早的于闐王國最基本的文書形式。唐初姚思廉所撰《梁書》卷54《諸夷傳》于闐條記載當地的制度、風習，有"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的記載㉗。所謂"木札"，應當就是這種可以用繩索和封泥封住的木函，所以要開札才能閱讀。上面提到的哈密屯、恩默瑞克、熊本裕和施傑我諸氏在試圖將上述三件木函放在公元九、十世紀時，顯然都忽視了這一點。而且，敦煌發現的各種官私文書，幾乎無例外地都是用紙來書寫，特別是從于闐王府送到沙州的 P5538a《天尊四年(970)于闐王尉遲輸羅致沙州大王曹元忠書》，標識着當時的于闐文書早已不使用木函或木板的形式了。

因此，從文獻記載來看，于闐使用木函的時代至晚應當在公元六世紀上半葉的梁代。不僅如此，從目前所見新疆各地發現的文書材料來看，除了少量絲織品或獸皮類之外，主要是簡牘和紙。兩漢以來主要是以簡牘爲主，至西晉時期出現了有明確紀年的紙本文書，而簡牘和紙的交替時期應在東晉、前涼時期㉘。因此，于闐

使用木函的年代似乎還可以考慮提前。早期的于闐和三、四世紀的鄯善國一樣，在貴霜王朝的影響下，一度使用佉盧文拼寫的犍陀羅語 (Gāndhārī，卽西北印度的梵文俗語) 作爲官方語言。值得注意的是，和田、且末之間的安得悅 (Endere) 出土過一件木質佉盧文契約文書(原編號 E. VI. ii.1，一般用整理編號 No.661)㉘，其年代是 saṃvatsara 10 mase 3 dhivajha 10 4 4 ij'a ch'unami khotana maharaya rayatiraya hinajha dheva vij'ida siṃha"時于闐大王、王中之王、軍事首領、天神 Vij'ida Siṃha 十年三月十八日"㉚。由於這件文書的孤立性，目前對它的年代還未能得出一個比較滿意的結論，于闐東面的鄯善使用佉盧文的下限在公元四世紀，所以，這件文書的年代似乎不應晚於這個界限。但是，如果從整個塔里木盆地來看，佉盧文在北道龜兹地區一直使用到公元七世紀㉛。所以，也不排除把這件 No. 661 文書放在四至七世紀之間的某個年代里的可能性。前人早已指出，這件文書的特徵是其中的兩個伊朗語詞彙和幾個零星的婆羅謎字母㉜，透露出它和于闐塞語有某些關係。最近希契 (D.Hitch) 氏進一步指出，No. 661 文書末尾字母的形式也和于闐塞語相似㉝。現在拿它來和木函一和木函三加以對比，不僅國王的名字相同，而且 No.661 中國王的佉盧文稱號與木函三的于闐文相應部分，除 hinajha dheva 和 miṣḍā gyasta 有少許差異外，其它都一一相應。因此，我們不排除上述佉盧文書與于闐文文書所記同名國王爲同一人的可能性。但是，上文已經指出，于闐史上叫作 Vijaya Siṃha 的國王不止一位；另外，佉盧文書中的 khotana 則應相應於古于闐文的 hvatana，而于闐文書中的 hvanä 或 hvaṃni，則是晚期于闐文的形式，目前對所謂古于闐文和晚期于闐文的年代還沒有明確的界說，僅從上述不同點出發，我們對兩種文書中的同名國王似爲同一人的可能性持保留的態度。總起來講，佉盧文書和于闐文書之間

至少應存在着某種連續性，而這種從文書形式、語言到內涵的連續性同樣使我們傾向於把三件于闐文木函文書放在公元五、六世紀，這或許正是于闐官方語言文字從佉盧文寫的犍陀羅語轉變成婆羅謎文寫的于闐塞語的最初階段。

由於于闐文木函文書具有晚期于闐語特徵，我們在此簡要談談古于闐文和晚期于闐文的使用年代問題。研究于闐語的學者一般把現存的于闐文獻的語言，劃分爲古于闐文和晚期于闐文兩個階段㉞，以表示“于闐人、于闐語”的詞爲例，古于闐文作hvatana-，晚期于闐文則作 hvaṃna-, hvana-, hvaṃ-，後者即玄奘所記的“俗語謂之涣那國”的“涣那”。恩默瑞克由此認爲，不論是古于闐文的 hvatana-，還是晚期于闐文的 hvaṃna-，都可以追溯到七世紀以前㉟。從現存的材材看，兩種于闐文曾在很長的時期內同時並存，如編號爲 Jñ1 的古于闐文貝葉本《智炬陀羅尼》的最後一葉，却是用晚期于闐文寫的題記㊱。又如 Hedin 27《藥師經》是用古于闐文寫的㊲，但屬於同組的其他世俗文書則都是用晚期于闐文寫成的。還有大約產生於七世紀前半期的著名于闐文佛教文獻《贊巴斯塔書》(The Book of Zambasta)，基本上是用古于闐文寫的，但其中不無晚期于闐語特徵㊳。從整個現存于闐文獻來看，幾乎所有的古于闐語所寫的文獻都是和田地區出土的早期佛教文獻，除用詩頌體規範地抄寫的《贊巴斯塔書》外，大多是梵文佛典的忠實譯本，這些貝葉寫本文字古樸，語言遵循固定的格式，所以變化不大。晚期于闐語所寫的材料內容較爲廣泛，其中既有佛教典籍，又有世俗文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佛教文獻大多是于闐人自己編纂的作品，而不是完完全全的譯本；文書則更少規範，因而語言變化更大，字體也不一致，日漸草體化。由此我們能否設想，所謂古于闐文和晚期于闐文，雖然有兩個大致的年代先後關係——即先產生古于闐文，再出現晚期于闐文，但至晚從公元六世紀起，

兩者就並行不悖，而最終由晚期于闐文占據了統治地位。用這種觀點來考慮用晚期于闐文寫成的三件木函文書的年代，把它們推斷在五、六世紀也就不無可能了。三件木函中的 hvanä, hvaṃnä, hvaṇini，都是玄奘"渙那"的語源，再結合文書的形制和出土地點的年代，我們對於屬於九、十世紀的說法提出異議，而認爲公元五、六世紀可能是這些木函文書的年代界限。從種種跡象看，鐵提克日木 (Farhād-beg-yailaki) 遺址出土的木質文書，很可能是最早一批于闐語世俗文書。

二、Hedin 24號文書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于闐文木函文書的年代問題的解決，還可參照 Hedin 24 號文書以及與之相關的文書的年代考訂，因爲這涉及人們如何從總體上認識和田出土文書和敦煌出土文書的年代問題。

人們看一下哈密屯氏羅列的寫本年代表，[39] 就可以發現，目前已經明確考訂的三個國王的年代，即尉遲僧烏波的 912—966 年、尉遲輸羅的約 967—977 年、尉遲達磨的約 978—982 年，所依據的材料幾乎全部都是敦煌文獻。[40] 由此我們不得不懷疑蒲立本根據和田出土的 Hedin 24, 15, 16 等號文書推斷 851—912 年的王統的可靠性。蒲立本教授在《于闐語文書集》第 4 集的附錄中對這段王統的考定，方法很簡單。他首先根據 Hedin 15, 16 號雙語文書中漢文的"巳年"相當於于闐文的 30 5mye kṣuṇi "〔在位〕第三十五年"，確定元年爲羊年。再把他抄錄的 Hedin 24 號漢文文書中的"五十四年"定爲鼠年，根據唐曆的朔閏，同時考慮到 713—760 年間更換了五位于闐王，認爲該文書中的"五十四年閏四月"就只能是指吐蕃統治以後的 904 年這個鼠年的閏四月了。於是，他認爲從 851 年（羊年）到李聖天即位的 912 年應當有一個于闐王在位。[41] 其後，哈密屯把許多于闐語文書編排在這一王統下面。[42] 我

們過去也追隨這一做法。

熊本裕博士根據藤枝晃教授對晚唐五代敦煌曆的考證結果，提出當時的于闐也應和敦煌一樣使用當地曆本，而不是中原曆，因此，蒲立本根據 Hedin 24 推定的五十四年即 904 年之說是有問題的，其年代或許應當提前。[43] 熊本裕博士對 851—912 年的王統提出質疑是卓有見地的，這對我們有極大的啓示。現據貝利刊布的圖版[44]，迻錄 Hedin 24 號漢文文書於下，再做討論。

（前缺）

1 □史，乘駞人桒（桑）宜本口報稱：聞神山堡□

2 □三鋪囚并駞三頭，今日囝（?）時刻（?）濡（?）馬屈薩

3 得消息，便即走[45]報來者。准狀各牒所

4 由，囚畜一切，盡收入坎城防備。如[46]有漏失，

5 □罪科[47]所由者，故牒。

6 □四年閏四月四日辰時典史□牒

7 判官簡王府長史富惟謹□

8 節度副使都督王□□

（後缺）

首先應當指出，蒲立本一方面認爲 Hedin 24 中的“五十四年”是一位于闐王的紀年，一方面又根據唐曆來推斷這個五十四年的“閏四月”的具體年份，這一做法有不妥之處。就和田已出土的文書來看，漢文文書都有唐朝的年號、數字或用天干地支來表示年份，而于闐語文書則用某王在位年數或十二支紀年表示。Hedin 24 是漢語于闐語雙語文書，紀年法應和 Hedin 15,16 號文書一樣，漢文部分用中原方式，于闐文部分用于闐方式（可惜這一紀年部分殘缺）。

檢查 Hedin 24 號文書的漢文內容，人們不難看出這是一份牒文，它的格式、用詞、署名、判案等，都與和田出土的《唐大曆三年

(768)三月典成銑牒》[48]、《唐大曆十六年(781)二月傑謝百姓思略牒》[49]等文書一樣,符合唐代牒式[50]。這樣,蒲立本錄文第6行的"五十四年閏四月四日"的"五十四年"就不能成立了。首先,按照牒式,月日之上看不清的幾字只能是唐朝的年號和年份;其次,這裏絕對不會是像蒲立本推測的于闐王的年數,屬於唐朝所設羈縻州長官的于闐王不能如此僭越,而唐帝之中沒有一人的年號長達五十四年;最後,根據貝利對這件文書的于闐文部分的轉寫、注釋和翻譯,[51]原件于闐文只有與漢文"閏四月四日"相對應的 śe' semjsījsä 4mye haḍai 而沒有與蒲立本從漢文殘筆劃判斷的"五十四年"相對應的字樣。有鑒於此,Hedin 24 號文書第6行上部的年號、數字雖然難以辨認,但決非"五十四年"則可斷言。

和上述木函文書一樣,Hedin 24 號文書的年代也可以通過其出土地點而考慮其大致的階段。關於這批文書的來歷,貝利說是斯文赫定(S, Hedin)、諾林(E. Norin)和安博爾特(N. Ambolt)等人在和田得到的[52]。赫定博士早在1896年就曾進入和田地區考察,並深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挖掘了丹丹烏里克遺址。他還曾在和田買到一些 Hanguja 以東沙漠中出土的梵文和于闐文寫本[53],其中一葉于闐文佛典,已由斯密特 (H. Smith) 發表[54]。據貝利講,後者原件已不知所在[55],這顯然和 KT,IV 中所刊 Hedin 編號文書不屬於同一組。1985年,本文作者之一榮新江走訪瑞典人種學博物館(The Ethnographical Museum of Sweden)時[56],夏義普 (Bo Sommarström) 博士曾提供赫定、諾林和安博爾特等人所獲新疆出土文獻的草目稿本(Proviscrisk Katalog)。據此可知,所謂"Hedin Collection"實際主要是1929年——1932年安博爾特在新疆考察時所獲。在此期間,他曾數次進入和田地區[57],這些寫本或許就是在當地購買的。

"Hedin Collection"無疑是和田地區出土的,至於出土於何

處，也可以做進一步的考察。Hedin 15,16 號漢文于闐文雙語文書是于闐某王三十五年·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六城百姓納進奉絺紬抄[58]。無獨有偶，貝利刊布的 Dumaqu C, D 兩件文書也是完全同樣的內容[59]，而且，Dumaqu C 的日期正好和 Hedin 15 的日期相銜接。下面是有關部分錄文：

Hedin 16:

（前略）

35 六城南牟没納進奉絺紬叁丈陸尺，

36 又叁丈陸尺貳寸。巳年十二月七日判官富

37 惟謹，薩波深莫抄，行。

Hedin 15:

1 六城勿薩踵拂里勿共納進奉絺紬

2 肆拾尺。巳年十二月廿一日判官富惟謹，

3 薩波深莫〔抄〕，行。

Dumaqu C:

1 六城南牟没納進奉絺紬叁丈陸尺陸寸。

2 巳年十二月廿二日判官富惟謹，薩波深莫抄，

3 〔行〕。

Dumaqu D:

1 六城没達門納進奉絺紬貳丈叁尺，蘇里捺

2 納伍尺。午年三月六日判官富惟謹，薩波深莫

3 抄，〔行〕。

Dumaqu 即 Domoko，今稱達瑪溝。顯然，這批文書是來自策勒縣達瑪溝地區。這些納絺紬稅抄中的判官富惟謹 (hū phanä-kvanä)，也見於 Hedin 24 號文書，這就確鑿地證明了 Hedin 文書的來源。

除 Dumaqu 編號的文書之外，今藏英國圖書館的 Or.11252,

公元	文書年月日	編號	刊布或著錄出處
730	開元十八年三〔月〕	Hedin 22 verso	KT IV,129
767	永泰三年正月五日	The Ethnographical Museum of Sweden 41.33.52	
768	大曆三年三月廿三日	M9 (Hoernle Coll.)	Hoernle 1901,pl.III; Chavannes 1907,523
772	大曆七年十月廿八日	Balaw.0160＝Or. 8212.702	Maspéro 1953, 186, pl.XXXVII
781	大曆十六年二月	D. V. 6＝S5864	Stein 1907, pl. CXV; Chavannes 1907,525—6
782	大曆十七年閏囸(?)月	D. VII.4.a＝S 5871	Stein 1907, pl. CXV; Chavannes 1907,530
c.782	大曆十□年	D.VII.3.a＝S5872, S 5870	Stein 1907, pl. CXVI; Chavannes 1907, 528
782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	D. VII.2＝S5867	Stein 1907, pl. CXX; Chavannes 1907,526—7
786	建中七年七月廿日、十月五日	M9c(Hoernle Coll.)	Hoernle 1901, pl. IV; Chavannes 1907,525
786	建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MT.c.iii＝Or.8211. 974	Chavannes 1913,216—7, pl. XXXVI
787	建中八年四月廿日	D. VII.4 e＝S5869	Stein 1907, pl. CXVI; Chavannes 1907,531,529
789	貞元五年五月	Balaw.0163＝Or. 8212. 701	Maspéro 1953,186,pl. XXXV
790	貞元六年十月四日	MT.0634＝Or.8212. 709	Maspéro 1953,187
790	貞元六年	D.I.x.i＝S5862	Stein 1907, pl. CXVI; Chavannes 1907, 533
c.785 -790	貞元年間	D. VII.4.e＝S6967 D.VII.4.b＝S6971	本文注㊹引池田溫文，頁48
c.790	貞元年間	D.VII.3.c＝S6972	Chavannes 1907,528

Or.11344 兩組于闐文文書[60]也是和 Hedin 文書屬於同組的。從內容看，與文書有關的人都生活在 Kṣvā auvā “六城” 地區。我們在《唐大曆三年(768)三月典成銑牒跋》一文中[61]，考證六城爲于闐國王屬下，唐毗沙都督府的羈縻州之一，它由(1) Cira・質邏・Ji-la; (2)Phema・媲摩＝坎城・Kam-śeṅ; (3)phaṃña・潘野・pho-ña; (4)Birgamdara. Be-rga-hdra; (5)Āskvīra.'O-rgu; (6) Gayseta(?)・傑謝組成。它的大致範圍在今策勒縣達瑪溝鄉以北，即老達瑪溝及其東、西一帶。哈達里克、巴拉瓦斯特、瑪札托胡拉克(mazar-Toghrak) 等著名唐代遺址都分佈在這一帶。

明確了 Hedin 24 等構成的 Hedin Collection 出土於古代于闐的六城地區，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藉助該地區出土的其他文書來作爲考訂 Hedin 文書年代的旁證。下面先把我們搜集到的所有帶有紀年的漢文文書列表於此，其中永泰三年簡是榮新江在瑞典人種學博物館收藏的同一組 Hedin 文書中找到的，因沒有于闐文而爲貝利所忽略(表中兩件麻札塔格出土文書可做參考)。

從此表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現存和田出土漢文文書的年代基本在開元十八年(730)至貞元六年(790)前後，其他沒有年代的文書，根據出土地點和文書內容，其年代也應大致在此範圍之內。Hedin 24,15,16 號漢文文書也同樣應當在這一時段當中。因爲目前還沒有在和田出土漢文文書中找到一件確切屬於 790 年陷蕃以後的文書，更沒有晚到九世紀下半葉或十世紀的東西。

第二，于闐地區的漢文文書，除個別用甲子紀年外，大多用唐朝的年號系年，這是于闐作爲唐朝的安西四鎮之一的反映。在漢文于闐文雙語文書中，也是先寫漢文，後寫于闐文，表明唐朝在于闐人心目中的宗主地位。因此，把 Hedin 24《史環僕牒》的紀年讀作唐朝某個年號下的某年，較蒲立本的“五十四年”更切實際。

第三，唐朝年號的連續使用，表明當時于闐地區使用的是唐朝曆法。安史之亂後，吐蕃占據河西隴右，切斷了唐朝中央與于闐鎮的聯系，所以，永泰以後于闐往往不知道唐朝的改元。文書中有大曆十六、十七年，實際相當於貞元二、三年。值得注意的是，丹丹烏里克出土的 D. VII. 4. a(S5871) 號文書的年代"大曆十七年閏□□"[62]，遺憾的是文書"閏"字下面一字已漫漶不清，我們在英國圖書館校錄該文書時，曾試圖讀作"閏三月"[63]，但仍有疑問。池田溫教授讀作"閏正月"，但也謹慎地在"正"字旁加了問號[64]。從大曆十七年的紀年來看，文書寫成時，于闐肯定沒有接到唐長安都城頒發的建中三年曆。那麼，這裏的大曆十七年閏某月是否正好相當於唐德宗建中三年的閏正月，目前還很難判斷。如果文書的殘字正是"閏正月"，就可以推測當時的隨軍參謀可以在當地推定與中原相應的曆日。因此，Hedin 24 中的某年閏四月四日也可以據之認爲是唐肅宗乾三年(760)閏四月四日。但這只是一種假說，因爲與 Hedin 24 第六行的字跡不合。不過，即使于闐當時已無法使用長安頒行的唐曆，通過以上對和田地區出土的漢文文書的全面探討，至少可以說明，不論 Hedin 24 號文書的絕對年代是否是在乾元三年，它總不會晚至蒲立本考訂的 904 年，至少應當把它放在吐蕃占領于闐以前的年代裏。

于闐語文書材料還可以進一步豐富我們的看法。Hedin 編號文書中的于闐語文書應當是和上述漢文文書屬於同時的，它們一起出土於同一地區，同一遺址，記載了同樣的一些事情，甚至有些就是雙語文書，和漢文並排寫在一張紙上。在目前所能見到的于闐語文書紀年中，最長的年份就是 Hedin 20 號第八行的 36mye kṣuṇä "第卅六年"[65]。此年又見於 Or.11252.34第八行 salī kṣeradirsä[66]、Dumaqu F 第一行 30 6mye kṣuṇi[67] 等。按照Hedin 15,16 雙語文書中的"巳年"等於"第卅五年"，Dumaqu D 中的

“午年”應即此“第卅六年”(該件文書于闐文部分未記年份)。據此得知這位在位至少三十六年的于闐王是某個羊年即位的。根據井之口泰淳氏[68]和我們編制的唐代于闐王世系表,有唐一代,只有伏闍璥(一名瑕,691—705—782年)和尉遲曜(755—785—790年)兩位君主有可能在位年份在三十六年以上。伏闍璥立於天授三年辛卯臘月[69],是爲兔年,因此不會是于闐語文書的歸屬。尉遲曜的即位年份史無明確記載,但不難推知。《資治通鑑》卷二一九記,肅宗至德元載(756),“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70]據同書同卷記載,至德二載正月,西安、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纔至涼、鄯二州,可知上一年已抵達中原並被授以官爵的于闐王尉遲勝一定出發得較早。可以推想,他率領五千人馬,跋涉近萬里的路程,所花時間不會太短,他很可能是在天寶十四載(755)年底一聽到安祿山起兵的消息,就領兵入援的[71]。天寶十四載乙未歲作爲尉遲曜代其兄攝國事的第一年,恰好就是羊年,其第三十六年是貞元六年(790),上表羅列的漢文文書表明,這一年也正好就是于闐被吐蕃占領的年份或其前一年。漢文史籍和悟空行紀都記載,安史亂後,于闐王一直是尉遲曜[72]。藏文《于闐國授記》則記載,吐蕃占領之前的于闐王名叫 Vijaya Bo-han Chen po[73]。柯諾夫 (Sten Konow) 教授早已將他考訂爲尉遲曜,並比定爲于闐語文書中的 Viśa' Vāhaṃ 王[74]。目前所知,Viśa' Vāhaṃ 一名見於三個寫本:(1) Hoernle 1 的紀年是 salī 17 māśtä skarhvārä haḍā 5 hvaṃnä rruṃdä viśa' vāhaṃ[75] “于闐王 Viśa' Vāhaṃ 十七年十一月五日”;(2) Hoernle 7(=Or.6397.1) 的年代是 salī 20 māśtä cvātaja haḍā 13 ttye hvaṃnä rrāṃdä väśa' vāhaṃ[76] “于闐王Viśa, Vāhaṃ 廿年一月十三日”;(3) Or.6393.2 的紀年是 (前殘) śā māśti kaja haḍā 20 2 hvaṃnä rrāṃdi väśa' vāhaṃ[77] “于闐王

Viśa' Vāhaṃ 某年二月廿二日"。如果柯諾夫的比定不誤的話，前兩件文書的年代就分別相當於 771 和 774 年。我們傾向於接受他的考證結果，因爲在已知的于闐王紀年文書中，Viśa' Vāhaṃ 是其中在位最長的一位。

以上我們通過對和田出土的漢文和于闐文文書的詳細探討，基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 Hedin 編號的文書，大部分都屬於 755—790 年尉遲曜(Viśa' Vāhaṃ)統治時期的產物，哈密屯年表中羅列的許多于闐文獻，都可以排比在這一長達三十六年的統治時段裏。蒲立本關於 851—912 年王統的考證是值得商榷的。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節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即對和田出土文書和敦煌出土文書的總體認識。我們把原先排在 851—912 年中的和田出土文書已統統提前到 755—790 年之間，則吐蕃統治以後就只有敦煌材料了。因此可以說，敦煌出土的于闐文史料主要是九、十世紀的東西，特別是曹氏歸義軍與于闐尉遲氏王族結成姻婭之好以後的產物。和田出土者主要來自老達瑪溝和麻札塔格。前者範圍內有六城質邏，即一些著名遺址如哈達里克、巴拉瓦斯特及屬於此區的丹丹烏里克之所在，在唐朝統治時期最盛。這裏出土的大量精美繪畫品，已由藝術史家考訂在公元七、八世紀[78]，其唐代文化層的年代下限，斯坦因推測在八世紀末葉，即吐蕃 790 年占領于闐之前[79]。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新研究成果，證明他的說法大致不誤。吐蕃占領于闐後，六城地區的個別據點如哈達里克，仍然存在了一個階段，所以曾有少量藏文文書出土[80]，而且，與 Hedin 文書屬於同組的 Or.11252.37 背面文書，也有用藏文拼寫的于闐官人稱號和名字 spa sor-zhong(Kh.spāta sudārrjāṃ)[81]。但是，當時吐蕃人的軍事統治中心是在麻札塔格，從這裏出土的文獻來看，吐蕃統治時期，藏文成爲當地的官方公文用語，于闐文恐怕只是在于闐人中間使用，漢文則暫時退出了歷史舞臺。因此可以說，

和田出土的于闐文和漢文文書主要是屬於唐朝統治于闐時期的產物，很少有延續到九世紀後半和十世紀的遺跡。對和田出土文書和敦煌出土的文書做合理的區分[82]，有助於我們對漢文文書的理解，同時也有助於判定于闐語文獻的年代。

以上我們就和田地區出土的木質和紙本文書的大致年代範圍，提出了我們的意見，認爲用木函形式所寫文書的年代應提前到唐朝以前的五、六世紀，而古代于闐六城地區出土的 Hedin 編號文書及 Or.11252,Or.11344 兩組文書，則應是八世紀中葉以降唐朝統治于闐末期的產物。我們通過文獻記載以及對木函文書使用年代等多方面的考察，提出這一看法，意在使人們在把上述文書推遲到九、十世紀的傾向之外，也考慮另外一種斷代之可能，從而爲利用這些木函及紙本于闐文書研究中世紀于闐國史進一步打好了基礎，作爲史學研究者，後一點正是我們詳細探討上述文書年代的眞正目的。

---

①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82)，179—209 頁。

②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 文史·遺書編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163—175 頁。

③ Zhang Guanda et Rong Xinjiang, 'Les noms du royaume de Khotan',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Vol. III (Paris 1984), pp.23—46+4pls.

④ J. Hamilton, 'Sur la chronologie Khotanaise au IXe—Xe siècle',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Vol. III, pp. 47—53.

⑤ Kumamoto 1986, pp.227—244.

⑥ Emmerick 1984, pp. 193—198, pl.XIV; R.E. Emmerick and

P. O. Skjaervø,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 (Wien 1987), pp.131—132, s.v.

⑦ E. Pulleyblank, 'Date of (the Hedin) 15, 16', KT IV, pp. 179—181.

⑧ Kumamoto 1986, pp.11, 14.

⑨ 殷晴:《一件新發現的于闐語文書》,《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12期,1—2頁。

⑩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1958年),48頁。

⑪ M. A. Stein, Serindia (Oxford 1921), map No. 31, A4.

⑫ Ibid., pp.1246—1262, figs 296—317, plans 56—58.

⑬ B. Rowlan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07), pp. 126, 220—221. 熊谷宣夫《西域の美術》,《西域文化研究》第五(法藏館、1962), 86—87頁。

⑭ F. H. Andrews, Catalogue of Wall-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and Sīstan (Delhi 1933), p.viii, 48, 52, 53, 56, 81—82.

⑮ J. Williams, '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 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Vol. XXIII, Nos. 1—2 (Rome 1973), pp. 110-111.122.

⑯ M. Bussagli, La peinture de l'Asie Centrale (Genève 1978), p.54.

⑰ Cf. A. Yuyama, A Bibliography of the Sanskrit Text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Canberra 1970), pp.22—33 及其所引文獻。 L. de la Vallée Poussin曾提醒人們注意,這批梵文貝葉經較丹丹烏里克出土的梵本《金剛經》似更爲古老些,見所著 'Documents sanscrits de la seconde collection M. A. Stein', JRAS, 1911, p.1068.

⑱ A. F. R. Hoernle,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Serindia, pp.1455—1456.

⑲ F. W. Thomas, 'Brāhmī Script in Central-Asian Sanskrit Manuscripts', Asiatica, Festschrift F. Weller (Leipzig 1954), pp.679,

692.F.II.i.1 in KT II,p.69; F.II.i.006 in KT II, p. 69; SD IV, pl. LXXV; SDTV, pp.101—102; Cf. H. W. Bailey, 'Kusanica', BSOAS, XIV.3 (1952), p.426;F.II.i.007 and F.III.ii.001 in KT V, p.271.

⑳ KT III, p.132.

㉑ KT II,pp.13—14; SD I, pl. IV—V; SDTV, pp.5—9.

㉒ Emmerick 1984, p.194.

㉓ Hamilton 1979, p.51.

㉔ TTK, p.99.

㉕ 此據 P.O, Skjaervø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的講演稿和 1985 年 4 月 30 日的信。謹在此向 Skjaervø 博士表示感謝，並希望盡早讀到他關於木函三的詳細論說。

㉖ TTK, pp.99—100,

㉗ 中華書局標點本，冊三，814 頁。

㉘ 參看馬雍《新疆所出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文史》第七輯（中華書局，1979 年），82 頁。誠然，Hedin 編號的木簡文書屬於唐中葉以降，藏文木簡文書屬於吐蕃時期，應是由於當地缺少紙的緣故，這更是當時在不得不用木簡時，也不再使用木函的佐證。

㉙ Serindia, pp.276,291,pl.XXXVIII.

㉚ M.A. Boyer,E.J.Rapson and E. Senart,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Oxford 1927), p. 249; S. Konow, 'Notes on Khotanī Saka and the Central Asian Prakrit', AO, XIV(1936),pp.231—240;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p.137;Culture,p.2; 林梅村《佉盧文書及漢佉二體錢所記于闐大王考》，《文物》1987 年第 2 期，36—37 頁。

㉛ F. Bernhard,'Gāndhārī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isa', J.Tilakasiri(ed.), Añjali, 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 O.H. de A. Wijesekera Felicitation Volume (Peradeniya 1970), pp.55—62（筆者未見，轉引自 D. Hitch, 'Kharoṣṭhī Influences on the Saka Brāhmī Scripts', W. Skalmowski and A. vanTongerloo(eds.),

Middle Iranian Studies (Leuven 1984), p. 198. Cf. H. W. Bailey. 'Taklamakan Miscellany', BSOAS, XXXVI. 2 (1973), p. 226, pls. III-IV.

㉜ T. Burrow, 'Iranian Words in the Kharoṣ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SOS, VII.3 (1935), p.514; H. W. Bailey, 'hinaysä "general"', BSOS, VIII. 2-3 (1936), pp. 790—791; R.E. 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79), p. 4.

㉝ D. Hitch, op. cit., p.189.

㉞ Bailey 1937, p. 932; H. W. Bailey, 'Irano-Indica II' BSOAS, XIII.1 (1949), pp.138—139; KT V, pp. vii-viii; Culture, p. xi.

㉟ R. 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London 1968), p.1; cf. H. W. Bailey, 'The Bodhi sattva in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tudies in South Asian Culture, Vol. VII (Leiden 1978) p.20.

㊱ 熊本裕《コータン語文獻概說》,《敦煌胡語文獻》(大東出版社, 1985年), 109頁。

㊲ 同上文108頁。

㊳ R. E. Emmerick, 'The Transition from Old to Late Khotanese', 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Studia Iranica. Cahier 5,1987), p. 36.關於成書年代,見 S. Konow, 'The late Professor Leumann's Edition of a new Saka Text, II',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qvidenskap, XI (1939), pp.9—37.

㊴ Hamilton 1979, pp. 50—52. 應把天興、天壽的年代提到同慶之後,所列文書年份也做相應調整。

㊵ 其中,來歷不明的 Hardinge 076. 7. 2 中的 thyaina-tcūna 只是沒有上下文的單詞,無法確定其含義,見 KT V, p.281, No.611.

㊶ KT IV, pp.179—181.

㊷ Hamilton 1979, p. 50.

㊸ Kumamoto 1986, p.11.

㊹ SD I, pl. VII.

㊺ Pulleyblank 作"是",誤。見 KT IV, p.136.

㊻ Pulleyblank 漏"如"字。出處同上。

㊼ Pulleyblank 作"折",誤。出處同上。

㊽ M 9 (Hoernle Collection), See Hoernle 1901, pl.III; Chavannes 1907, p.523.

㊾ D. V.6=S 5864. See Stein 1907, pl. CXV; Chavannes 1907, pp.525—526.

㊿ P2819. See T. Yamamoto, O.Ikeda and M. Okano (co-ed.),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 A (Tokyo 1980), p.29;B (Tokyo 1978), pp.56—57.

51 KT IV, pp.37, 135; SDTV, pp.12—13.

52 KT IV, p. vii.

53 S. Hedin, En färd genom Asien 1893—97(Stockholm 1899), Vol, II, p.96.

54 H.Smith, 'Appendix to "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Khotan II" by G. Montell',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0 (1938), pp. 101—102, pl.IX.

55 KT III, p.16.

56 遺憾的是,當時該館剛移至新址,據稱 Hedin 24 等紙本文書還封在箱中,故未得寓目。

57 Cf. N. Ambolt, Lotitude and Lonqitude Determinations in Eastern Turkestan and Northern Tibet derived from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Stockholm 1938), p.12.

58 KT IV, pp.29—31, 106—108, 173—176

59 KT II, p.63; SD IV, pl. XCVI;SDTV, p. 123. 這些文書的原本留在了新疆,照片存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見 SD IV 的序言。按 Hedin 15,16 號文書最後一字爲朱筆,見 KT IV, p.177, n.3,這在 Dumaqu C, D 的黑白照片上無法認出,然原文應有,今據補。

⑥⓪ KT II, pp.15—38.兩組文書的出土地點不明，Or. 11252 是英國駐喀什領事 Sherriff 贈給 British Museum 的，見 Bailey 1937, p.924.

⑥① Zhang Guangda et Rong Xinjiang, 'Notes à propos d'un manuscrit chinois découvert à Cira de Khotan', Cahiers d'Extrême-Asie, Revue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3(1987).

⑥② Chavannes 1907,p.530 未錄出"閏"字;《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 年），464 頁亦未錄"閏"字以下。

⑥③ 藤枝晃《敦煌曆日譜》錄作"閏二〔月〕，見《東方學報》(京都)第 45 册(1973 年)，383 頁。

⑥④ 池田溫《吐魯番、敦煌契券概觀》，《漢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1986 年），48 頁。

⑥⑤ KT IV, pp.34,121,124.

⑥⑥ KT II, p.27; Cf. Bailey 1937, p.935.

⑥⑦ KT II, p.63; SD IV, pl. XCVI; SDTV,pp.123—124.

⑥⑧ 井ノ口泰淳《ウテン語資料による viśa王家の系譜と年代》，《龍谷大學論集》364 册(1960 年)，34 頁。

⑥⑨ 見《資治通鑑》卷二〇五。時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歲首，天授三年臘月實際就是天授二年辛卯歲十二月。參看《舊唐書》卷一九八。

⑦⓪ 參看《新唐書》卷一一〇"尉遲勝傳"。

⑦① 按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舉兵，至年底以前，消息應當可以傳到于闐，因軍情緊急，驛騎行程不同往常，如唐太宗時郭孝恪破焉耆的消息，在一月內就送到七千三百里以外的長安(見《資治通鑑》卷一九七)。况且，這次是徵兵赴難，而不是奏捷，更應當快馬加鞭。

⑦②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一，九八〇頁。

⑦③ TTK,pp.60—61.

⑦④ S. Konow, 'Khotan Studies', JRAS, 1914, pp. 342—343; idem, 'The Dates in Saka Texts from Khotan and Tunhuang', AO, VII (1929), p.74.

⑦⑤ KT II, p.64; Hoernle 1901, pl. VI

⑦⑥ KT II, p.66; SD II, pl. XXVIII; SDTV, p.54.

⑦ KT V, p.2; SD II, pl. XXV; SDTV, p.52.

⑱ 熊谷宣夫前揭文，92—98頁; J. Williams, op. cit., pp. 109—112; M. Bussagli, op. cit., pp.52,55,60.

⑲ Serindia, p.207.

⑳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ol. II (London 1951), pp.251,373.

㉛ KT II, p. 28;Cf. Bailey 1937, pp. 934—935; KT IV, p.56; H. W. Bailey, 'Taklamakan Miscellany', BSOAS, XXXVI.2(1973), pl. VII.

㉜ S. Konow, JRAS, 1914,pp.339—353; idem, AO, VII(1929), pp.66—76.以及井ノ口泰淳前揭文27—43頁，均曾將兩者區別看待。但自蒲立本提出851—912年王統以後，近年的研究者多把兩者混在一起來考慮問題，顯然有所不妥。現在是總結以往研究成果，做更加精細的年代學分類的時候了。

縮略詞表:

AO =Acta Orientalia.

Bailey 1937 =H. W. Bailey, "Hvatanica", BSOS, VIII.4, 1937, pp.923—936.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Chavannes 1907=Ed. Chavannes, "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ntes of Dandan-uiliq, Niya and Endere", in Stei-1907, pp.521—547.

Chavannes 1913=E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Culture =H. W. 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1982.

Emmerick 1984=R. E. Emmerick, "A New Khotanese Document from China", Studia Iranica, XIII.2, 1984, pp.193—

198+pl.XIV.

Hamilton 1979 =J. Hamilton, "Les règnes khotanais entre 851 et 1001",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ed. by M. Soymié, Genève-Paris 1979, pp.49—54.

Hoernle 1901 =A. F. R. Hoernle,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XX.1, 1901, Extra-No.1.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T I-V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1979,1980.

Kumamoto 1986=H. Kumamoto, "Some Problems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ed. by R. Schmitt and P. O. Skjaervø, München 1986, pp. 227—244.

Maspero 1953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é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SD I-VI =Saka Documents, portfolios I (1960), II (1961), III(1963),IV (1967), ed. by H. W. Bailey, and V (1971), VI(1973), ed. by R. E. Emmerick.

SDTV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London 1968.

Stein 1907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TTK =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

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陳寅恪先生就說過這樣的話："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① 今天距離陳先生說這段話的時間已經半個世紀多了。但是，人們看到，情況依然有如陳先生當年指出的那樣，敦煌藏經洞提供的寫本、刻本、紙畫、絹畫，仍是學者所取用不盡的新材料；由此而提出的種種新問題，也仍爲學者所探討不已。這證明了陳先生的睿見卓識，也反映了敦煌研究至今仍然具有推動學術發展、促成學術上形成潮流的意義。

人所共知，陳先生作爲學術界的一代宗師，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陳先生自己取用敦煌新材料以研究新問題所做的貢獻。在這方面，陳先生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爲後學留下了很重要的成果。例如，陳先生是在中國最先利用敦煌發現的于闐語文獻來探討新問題的。早在 1920 年，先生就在《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中，利用了伯希和(P.Pelliot)、洛伊曼 (E. Leumann) 刊布的于闐文《金光明經》②。于闐文是"死文字"，于闐文獻是新材料，所涉及的問題在當時是頗爲費解的新問題，就世界學術界利用于闐語文獻而言，陳先生的研究屬於最早的業績之列。今天，當人們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就的時候，不能不對這位學界大師開辟學術新潮流的貢獻深表敬意。

我輩生而晚，希風往哲，深以未得親接陳先生謦欬爲憾，然仰

慕之情，實不能已。玆謹掇拾有關敦煌之于闐文獻年代問題的資料爲文一篇，奉獻給一代宗師陳先生。陳先生當年跋《金光明最勝王經·懺悔品》利用的是 P3513 號貝葉形于闐文寫本[③]。抄寫這部文獻的功德主極可能就是本文探討的活動於十世紀的于闐國從德太子，我們亦卽就此而有所陳述，略彰陳先生學術開創之功德。筆者學殖荒落，昧於故實，舊書雅記，十不窺一，率爾動筆，錯誤必多，敬祈讀者叱正，匡其不逮。本文在內容上與筆者另文《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刊於日本《東洋學報》第 69 卷第 1、2 號，1988 年，第 59—86 頁）密切相關，尚希讀者垂覽，一並多予指教。

一、關於于闐國號問題

1982 年，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于闐文、漢文寫本及莫高窟題記所記于闐國的國號和年號，試圖確定一些于闐語寫本的年代，構擬九、十世紀于闐國的王統世系[④]。1984 年，我們的文章被譯成法文在巴黎刊出後[⑤]，法國突厥學者哈密屯 (J. Hamilton)[⑥] 和日本伊朗語學者熊本裕[⑦] 先後發表文章，針對我們的見解提出一些補充和異議。關於這些意見，下文將予評述。在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前，我們也對自己的文章補充了新材料，見於我們提交給“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的論文[⑧]。現在看來，有些成說，如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 建立的 851—912 年的王統[⑨]，我們日益確信其難以成立[⑩]；至於我們對于闐國號的個別推測，如我們未把“金國”與“大寶于闐國”的實際用法加以區別，逕把“金國”當作國名看待這一點，應接受批評者的意見而予以修正；有些史料，如關於從德太子的記載，我們也應大加補充。感謝哈密屯、熊本先生給予我們的指正，他們的批評使我們在修訂和補充我們的觀點過程中日益明確認識到：爲了在探討有關問題時避免發生

年代謬誤，必須對所依據的寫本本身的年代進行認眞仔細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闐文寫本的年代學探討，比一個個有關問題本身的研究更爲重要。基於這一認識，本文的任務在於：一、對我們過去提出的問題做補充修訂；二、根據于闐文獻的主人——于闐太子、僧侶、使臣等——在敦煌的行迹，並根據漢、藏、回鶻、于闐等多種文字材料提供的綫索，從整體上判定敦煌于闐文獻的年代。

我們關於九、十世紀于闐國號的說法⑪所引起的一些學者的異議大致如下：哈密屯教授認爲，在被我們考訂爲分屬於不同年代的一些于闐語文書之中，有些並不是孤立的文書，它們實際是屬於以 Ch00269 開頭的、由至少大約十五件于闐語文書構成的一組文書(如 Ch 00269,P 2741,P 2786,P 2028,Or.8212.186 等)，其年代應當相差不遠，理由是“這些卷子中程度極其不等地見到了同樣一批人和同樣一些事件”⑫。另外，P 2027 第 7 行除 ysarnai bāḍa “金國”一名外，還出現了 ranījai janavai “寶國”一名，因而應歸入“金玉國”時期。又 P 2787 除 51 行的 ysarnai bāḍa ū ranījai janaivai“金玉國”一名外，第 41、44、62、63、65 行都有 ranījai janavai“寶國”的例子⑬。看來，他含蓄地不同意“金國”的說法，但對“大寶國”和“金玉國”的年代界限沒有加以評論。哈密屯在他的文章結尾處說得非常正確：“人們可以期望，對全部于闐文寫卷做更深入更協調的研究，將使人們更淸楚地看出問題。”我們也完全持這種看法，本文就是沿着這一方向的努力。

熊本裕博士則明確地否定這些于闐國稱號具有任何年代學上的價値。他也舉出了P 2787 中“金玉國”和“寶國”重出的反證，並指出蒲立本考訂在 982 年的 Ch I.0021a,a號文書中有 māje ysarne bāḍi“我們的金國”一句，這與我們把“金國”的下限放在 938 年的說法相左。他又特別詳細地分析了P2958，指出除第 127 行有 mistye ysarnai bāḍä“大金國”一名外，149、216 行又出現了 ranī-

jai janavai“寶國”，而且此文書的120—123行和133—139行分別相當於P 2739號的1—3行和6—11行，而後一文書第12行則有ttayi-pū yūttyenä kuhä: jinave“大寶于闐國”的拚寫。最後，P2958第Ⅳ件文書第149—150行有 Khū thyautta ranījai janavai vīra alattuna hana pasta yai“先是，寶國的金汗命令……”語⑭。由此，他不同意把“金國”、“大寶國”“金玉國”看作是特定時代于闐的國號。

如上所述，現在有必要對我們有關國號的論說做某些修訂。

第一，“金國”、“寶國”和另一國號“大寶于闐國”的用法應有所區別。“金國”的確是于闐國一種常見的稱號，我們把它做爲一個在某段時間(約851—約938年)裏的固有名稱是不够妥當的。看來，無論是 ysarnai bāḍa“金國”，還是 ranījai janvai“寶國”，只是一種經常使用的于闐國名稱，而不是特定時期的專名。除了于闐文書的例證外，回鶻文還有 altun el“金國”(P2998第3行)⑮，梵文中有 ratnapadajana-“寶石之國”的類似用法⑯，因此，ysarnai bāḍa沒有漢文的固有名詞“金國”與之相對應，而 ranījai janavai也不能譯作“大寶國”。僅用這兩個普通名詞判定寫本的年代是根據不足的。

第二，大寶國的名稱與“金國”、“寶國”則不同。如果把 ysarnai bāḍa“金國”和 ranījai janavai “寶國”作爲于闐國一直使用的普通名稱而排除在專稱之外，那麼以上兩位學者提出的駁論對於“大寶國”的年代界限則沒有任何傷害，因爲“金國”和“寶國”是作爲于闐國的一般名稱和“大寶國”同時存在的。如果從漢文史料出發，目前還很難否定“大寶國”一名在考訂于闐文獻年代上的價值。中原王朝的文化傳統是重視名分，儒家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正名”。天福三年(938)十月后晉王朝封于闐爲“大寶于闐國”，這一方面是李聖天仍想象唐朝盛世時那樣，讓于闐作爲中原王朝的

附屬；另一方面，后晉也通過這樣的册封，來確定君臣名位。因此，在938年以後，至少是漢文文書或洞窟題記中，“大寶國”無疑是作爲于闐的專有名詞而正式使用的。下面把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大寶國的史料按年代列舉如下：

1、晉高祖天福三年(938)十月，册封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册封制書載《册府元龜》卷965；參看《舊五代史》卷77，《新五代史》卷8、74，《五代會要》卷29)。

2、晉天福三年(938)十二月，制授大寶于闐國進奉使官（《舊五代史》卷77)。

3、940年左右莫高窟第98窟重繪的李聖天像題名爲“大朝大寶于闐國大聖大明天子……”(張、榮1982，198頁；Zhang-Rong 1984,pp.41—42)。

4、P5535于闐體梵文《陀羅尼咒》後題“大寶于闐國進奉使司空劉再昇”，時在943年前後(張、榮1987，124頁)。

5、于闐天興七年(956)十一月《索子全狀》第41行提到“龍庭大寶國”(P3016，見張、榮1982，195頁；Zhang-Rong 1984, p.39)。

6、于闐天興十二年(961)正月《大寶于闐國匝摩(Tsar-ma)寺八關戒牒》(S6264，張、榮1982，207頁，注㊵；Zhang-Rong1984, p.34,n.41)。

7、莫高窟第444窟大寶于闐國皇太子從連、琮原供養像題名，時在964年前後（張、榮1982，185頁；Zhang-Rong 1984, p.29)。

8、某年某月二十八日就衙奉爲大寶國皇帝百辰追念疏(S 3180)。

以上材料表明，在938年秋到964年李聖天在位末年，漢文文獻中于闐的正式稱號是“大寶國”，這也反映到于闐文獻當中，即

P2739 第 12 和 43 行的 ttayi-pū yūttyenä kuhä: jinave 和 ttaya-pau yūttyaina kūauha⑰。但這並不排除在同一時段內，于闐仍被稱作 hvaṃ kṣīrä“于闐國”、ysarrnai bāḍä “金國”或 ranījai janavai“寶國”等。因此，我們在改變我們對“金國”、“寶國”用法的意見的同時，仍然堅持認爲漢文“大寶國”是一個專有名詞，它代表着十世紀中葉于闐國的一個歷史階段。

第三，“金玉國”一名在漢文材料中見於榆林窟第 25 窟題記和南林蔣氏藏《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⑱上。由於史料的局限性，目前還很難說這一名稱是于闐文 ysarrnai bāḍä “金國”和 ranījai janavai “玉國”的合稱，還是 ysarnai bäḍa ū ranījai janaivai 的一般譯名，抑或是北宋王朝給予李聖天以後的于闐王朝的又一正式稱呼，兩種可能有待於新史料的證明。

總之，目前對于闐國號問題的研究還不够全面，有關這些國號的于闐文史料和漢文史料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我們過去忽視了一些重要的于闐文材料，因而對所謂“金國”的論證有不妥之處。但我們也不同意完全不管漢文史料中關於“大寶國”的種種記載，僅僅根據于闐文中的倒證，而不加區別地否定所有國號具有年代學上的價值的看法。根據上述修訂意見，P 2739 號文書中出現的 ttayi-pū yūttyenä kuhä: jinave(行 12)或詩文部分的 ttaya-pau yūttyaina kūauha(行 43)，應是“大寶于闐國”一名的對應詞⑲，它標志着該寫本似應完成於 938 年后晉封于闐爲“大寶于闐國”以後。與此有關聯的是 P2958 號文書。P2958 的內容龐雜，據上引熊本氏的考證，P2739 的 1—3 行和 6—11 行分別相當於P2958 的 120—123 行和 133—139 行⑳，表明兩者抄寫的時間大致相同。此外，P2958 的 149—181 行爲甘州可汗致于闐金汗書，正是在該信結尾處的第 180—181 行，我們又看到了漢文和于闐文對應的 thī-pā ranajai janavai“大寶國”一名㉑，說明 P2958 雜纂卷也

應是在938年以後抄成的。至於該信的具體年份——蛇年[22]，似乎應置於966年李聖天去世以後。目前，我們還沒有大寶國使用下限的確切材料，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文書本身提到的史實還不够清楚，例如，P2958第182行以下出現了另外的內容（199－215行爲《朔方王子上于闐朝廷書》，216－227行爲《朔方王子稟母書》），其中183行出現的Daisai，201、202、208、218行出現的hvāṃ Capastaka，又見於P2741、P2786 Ch00269，Or8212.186等卷，因此，考慮年代需對多種因素做通盤考慮。此外，文書本身的釋讀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基於上述原因，現在還不能確指這裏的蛇年是指十世紀下半期的哪一個蛇(巳)年。

二、從德（Tcūṃ-ttehi:）太子及其相關文書

近年來，有關九、十世紀于闐年代問題的重要發現是找到了一些涉及于闐國從德太子的材料。事實上，有關Tcūṃ-ttehi:的最重要文獻P3510號寫本，早在1951年就由貝利（H. W. Bailey）教授刊布在《于闐語佛教文書集》中[23]，但在當時，人們還沒有發現它在于闐寫本年代學上的價值。1980年貝利摘譯介紹了P 3510中有關Tcūṃ-ttehi:太子及其族屬成員的最重要的一段[24]。同年，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又把P 3510前8葉的《Tcūṃ-ttehi:太子發願文》全文譯出[25]，使研究者得以全面了解該文獻的內容。在貝利和恩默瑞克上述二文的推動下，哈密屯[26]、高田時雄[27]和本文作者[28]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Tcūṃ-ttehi:身上，並各自獨立地得出結論，把他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宋代史籍所記乾德四年(966)入貢於宋的于闐王李聖天子"德從"聯系起來，並認爲"德從"是"從德"之誤，Tcūṃ-ttehi:的漢文對應詞是"從德"，此人和莫高窟第444窟題名中的從連和琮原應是兄弟行。熊本裕在文章中也接受了這種看法[29]。

除了 Tcūṃ-ttehi: 卽從德、並被宋人誤寫爲"德從"這一共同結論外，哈密屯、熊本裕和本文作者的文章中都補充了一些有關從德的新史料。由於各自完成各自的論文時，都未能讀到他人提供的新材料，所以在某些看法上難免有出入。下面首先對幾位學者已經揭示的史料加以綜合評述，而後補充一條確切屬於從德的材料以及相關文獻，最後根據敦煌漢文和于闐文文書，試行勾勒出從德太子在敦煌活動的一些情况。

哈密屯認爲，P5538 正面《天尊四年（970）于闐王尉遲輸羅(Viśa' Śūra)王致舅沙州大王曹元忠書》中提到的另一太子 Tcūṃ-hye:nä 或 Tcūṃ-hyai: nä似相當於漢文的"從賢"，並提出他是否是投入穆斯林陣營中的李聖天兒子的問題。他還引證了他認爲是"975 年沙州曹氏致于闐王書"的 P4065 號漢文文書，其中提到"向西太子領大石兵馬來侵大國"事[30]。熊本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認爲"從賢"可能是從德的同父異母兄弟，並把 P 4065 中的"大國"解釋爲于闐[31]。這種比定當然不無可能，然而，僅僅從名字的頭一個字相同就把他們看作兄弟，似有待更多材料的證實。在該文書中(行 3、14、51、76)，"從賢"一直被稱作 Ttaśī'kä Tcūṃ-hye:nä "大石的從賢"（姑用哈密屯漢譯名），而從未被稱作 rrispūrä "太子"[32]。另外，兩位先生引用的 P4065 號漢文寫本，實際是由三件表文組成。最近，李正宇先生撰文考釋，認爲三件表文之(一)、(二)是曹元深上后晉皇帝表，謝賜其父兄旌節官告，表文(三)才是提到"向西太子"的文書，李先生認爲這是開寶三年(970)秋或稍後曹元忠致于闐王李聖天的書信。本文書(二)、(三)件表文中間夾寫題記一條:

乙亥年十一月十六日乾明寺學使（仕）郎揚定千自手書記。

乙亥年被比定爲 975 年是可以成立的，並且有一些旁證材料加以

肯定[33]，但這條學郎的題記只能說明(一)、(二)件表文抄於 975 年，而不能據此斷定第(三)件信稿也寫於該年。至於 970 年或稍後曹元忠致李聖天信的說法，因李聖天 966 年已經退位或故去，由從德太子即位，所以也不能成立。目前旣不能圓滿地解釋第(三)件表文的內容，所以還很難利用它來考訂于闐文獻的年代。

相比而言，熊本博士在高田時雄教授的協助下所補充的新材料似更爲重要，此卽北京圖書館藏麗字 73 號寫本。這件寫本的背面有七行于闐文，內容是《善財童子譬喻經》(Sudhanāvadāna)，就在第 1 行于闐文的前面，殘存有三個不規則的漢字，寫着："コ常宗德"[34]。他們認爲，這裏的"宗德"應卽從德，而殘名"□常"很可能是《宋史》所記開寶二年(969)入貢於宋的于闐"國王男總嘗"。ch 00267 號文書中的太子 Tcū-syau 的名字或卽此名的于闐文對應詞[35]。在評論熊本氏關於麗字 73 號的"□常宗德"及有關人物的看法之前，有必要先對我們在《敦煌文書 P 3510〈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中引用的兩條材料略作補充說明。事實上，從德太子如果是有一定重要性的政治人物，他的活動必然還會留下其他方面的證跡。

一條材料出自敦煌莫高窟第 244 窟。該窟甬道南、北壁繪有五代供養人像，兩壁形制布局相同，都是主人在前，後有兩位侍從、在主從之間又繪一孩童。據殘題記，南壁的供養人是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北壁則是其子曹元德。南壁孩童的題記是：

1 戊□□五

2 月十□日

3 □□太子

北壁孩童的題記是：

1 德從子コ

2 □德太子[36]

1983年我們參觀該窟時，還可以看見北壁題記第2行"德"字上有"從"字的殘劃，可以據之補訂爲"從德太子"。我們考訂這裏的從德太子即 P 3510 中的 Tcūṃ-ttehi: 或宋人所記的"德從"。至於"德從子"，或許與于闐王尉遲輸羅、尉遲達磨（Viśa Dharma）兩朝重臣張金山的叔父"張德從"有關[37]。由於南壁的題記目前已無法用肉眼辨識，所以我們當時未能抄錄下任何文字。據稱，最近一、二年敦煌研究院利用紅外綫儀器，讀出了其中的部分字迹，除上面引用者外，施萍亭先生在《敦煌隨筆之一》中，又提供了一個更詳細的錄文：

1 戊辰□五

2 月十囯日

3 從□太子

她綜合南北壁的兩條題記認爲，"德從"即《宋史·太祖紀》所記乾德四年(966)入貢於宋的德從，"德從子從德太子"則是 P 3510 中的從德太子，戊辰年應是宋乾德六年(968)[38]。然而，如果"戊辰"的讀法成立的話，則968年從德還是個幾歲的孩童。按從德是李聖天和曹氏所生，據 P 4638《丙申年(938)正月歸義軍馬軍武達兒狀》、《馬軍宋和信狀》等三件文書，曹議金女下嫁于闐王的年代似在文書中談到的"辛卯年"(931年)[39]。據此可以推知從德生在932年以後不久。所以244窟從德童年時的像應繪於曹議金（920?—935年執政)末年，或補繪於曹元德（935—939年執政）時期。至968年時，從德已入壯年，而且很可能繼其父李聖天爲王了。看來，《供養人題記》一書錄作"戊□"，是比較謹慎的作法。另外，"德從子"三字下有闕文，從文理也很難把它和下一行連讀爲"德從子從德太子"[40]。由於題記本身的殘缺難識，目前還無法做出十分完滿的解釋，但它反映了從德太子童年時曾留在敦煌的事實。

另一條材料是敦煌千佛洞出土的一座銀塔上的題銘，文曰：

“于闐國王大師從德”云云。我們認爲這裏的從德即P3510和244窟題名等史料中的“從德太子”，並從“國王”的稱號出發，推測他應是繼李聖天之後的尉遲輸羅王㊶。對於從德和尉遲輸羅的比定，還可以作如下補充。于闐的王位繼承制度是嫡長子繼承制，藏文《于闐國授記》(Li-yul lung-tstan-pa)所記于闐自建國以來的王位世襲，非嫡長子繼承的只有一例，即尉遲闍耶(Vijaya Jaya)王有三個兒子，因長子和次子都遁入空門，西到印度求取功德或研習佛法，才由幼子尉遲達磨(Vijaya Dharma)繼位爲王㊷。唐史所記于闐王位交替情況也不例外㊸，值得注意的是《新唐書》卷110《尉遲勝傳》的記載:“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國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㊹代兄尉遲勝攝理國事的尉遲曜，一定想要尉遲勝的嫡子尉遲銳回國即位，更明確證明了于闐是“以嫡承嗣”。所以，繼李聖天(Viśa' Saṃbhava)爲王的尉遲輸羅應即李聖天的長子，尉遲達磨又當是尉遲輸羅的長子。現在已考證出，從德、從連、琮原爲李聖天之子。從保存下來的敦煌文獻看，從德不僅是書寫P3510和P3513等長卷的功德主，而且還在966年尊父王之命代表于闐入覲於宋並納貢品。結合銀塔所題“于闐國王大師”這一稱號，我們傾向於認爲從德即尉遲輸羅王。和其父李聖天一樣，他除了漢名“從德”外，還應有于闐文的本名，即Viśa Śūra“尉遲輸羅”。他從中原返回時，正值父王故去，於是以長子身份即位爲王，年號天尊，寫於天尊四年(970)的《尉遲輸羅王致舅沙州大王曹元忠書》㊺，也完全符合從德的身份。

現在回來檢查一下熊本氏關於麗字73號中“□常宗德”的看法。熊本氏認爲，“宗德”即從德，“□常”就是969年入宋進貢的“國王男總嘗”，並推測“□常宗德”的排列應代表着兄弟次序，因此，967—977年在位的尉遲輸羅既不是總嘗，也不是從德，而可能

是從連或綜原[46]。但是，漢文史籍明確標明總嘗是當時的"國王男"，也卽國王的兒子，而當時的國王是李聖天的長子尉遲輸羅，所以很難把總嘗放在和尉遲輸羅同一輩分上。熊本氏用于闐文的 mista rrispūra "太子"來解釋"國王男"，恰恰只能得出相反的結果。總嘗無疑是尉遲輸羅王的兒子。另外，熊本氏沒有看到銀塔上從德具有"國王"的稱號，也就完全忽視了尉遲輸羅就是從德太子的可能性，如果我們上述的比定成立的話，則總嘗應當是從德的王子，而不是兄弟，麗字 73 號的"□常"也應另求他解了。總之，只憑對音來考慮問題似過於簡單，熊本氏關於"□常"卽總嘗的看法有待更多的材料加以明證。

由於麗字 73 號文書已殘，"常"字之上有無字或有幾字均不得而知，我們不強作解人。但這條漢文題記顯然與旁邊所寫的于闐文《善財譬喻經》有關聯。所以，盡管我們有三個"從德"寫法的例證(包括"德從"一詞)，我們仍然傾向於接受熊本氏關於"宗德"卽從德的看法，除了從德的兄弟有寫作"琮原"的例子外，在敦煌于闐語文獻中可以找到更強有力的材料來支持這種說法。麗字 73 號所寫于闐文《善財譬喻經》在敦煌于闐語寫本中還有另外七個抄本，卽 P2896 的 2—15 行、P2957 的 164—171 行、P2784 的 1—7 行、P2025 的 80—267 行＋P4089 a 的 1—21 行、Ch 00266的44—223 行、P2957 的 14—160 行、P5536 bis[47]。這些寫本至少有兩個共同點：(1)有些寫本上同時寫有其他內容，而所寫者又往往是內容相同的一種抒情詩，如 P2896 的 49—53 行、P2025 的 7—79 行、Ch00266的01—42 行等[48]。(2)除兩面都是于闐文獻的寫本外，正面的漢文只有 P2025 是寫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其餘都是漢文《妙法蓮花經》[49]，麗字 73 號也是這樣[50]。這些並非出於偶然的共同點，至少可以說明這些《善財譬喻經》的寫本不無聯系，它們很可能是利用一次得到的《法華經》卷背面，在不長的時間內陸續寫成

的，因此也就很可能屬於同一組文獻，屬於同一位施主。除麗字73號有“宗德”一名外，值得注意的是P2896號寫本。該寫本主要有三項內容，(1)第1—48、56—68行是幾篇書信的草稿，(2)第2—15行是《善財譬喻經》，(3)第49—55行是抒情詩[51]。就在第(1)項書信草稿第34—36行的地方，雜寫着一些不規範的漢字，可以辨認出來的有“太子”、“從德”、“司空”、“敕”等[52]。這裏的從德應當就是我們上面討論的從德太子，因此，旁邊所寫的“太子”稱號也應屬於他。這樣，把同樣是寫在于闐文《善財譬喻經》旁的“宗德”解釋爲從德，就有了一條有力的旁證。從德太子很可能就是這批《善財譬喻經》寫本的功德主。所有《善財譬喻經》和抒情詩的寫本在敦煌保存下來，似乎表明供奉這些經典或文學作品的從德太子曾長期住在敦煌。附帶提及，在敦煌文書中有不少記載太子的材料，且有太子莊、太子宅等記載。太子似乎不是一位，其中有的與迎接于闐使有關，有的可能是敦煌府主的太子。很遺憾，現已難以區分敦煌文書所見的太子或多位太子之中哪些專指于闐太子而言，因此，有關太子的許多材料只好從略。目前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于闐自國王李聖天娶沙州曹議金女爲皇后以後，兩地結爲姻親，不斷有于闐太子來到沙州，前面談到的莫高窟第244窟從德太子的童像，表明從德太子早在童年時代就到過敦煌。此後，P3184記“甲子年(964)八月七日，于闐太子三人來到佛堂內，將《法華經》第四卷”。我們曾推測這三位太子就是從德、從連和琮原[53]。從德太子的留居敦煌，除了爲在政治上與沙州曹氏政權增進友好關係外，還有他愛慕中華文化的一面。P3510《從德太子發願文》之後的9—10葉，是一篇《禮懺文》的開頭[54]，其全文抄在P3513的第76葉背1行至78葉正1行，文中只提到作者是 aysa rraispūrrä“我太子”，而未標其名[55]。貝利根據P3513和P3510兩件寫本內容上的關係，認爲這篇《禮懺文》的作者“太子”就是 Tcūṃ-ttehi:

(從德)太子[56]。這篇完整的《禮懺文》，反映出從德太子深受漢地佛教思想的影響。而且，P3513號貝葉形寫本是一部由幾種佛教文獻組成的合集，在《禮懺文》前，依次還抄有：(1)《佛名經》(葉1—12，KT III,112—116)、(2)《般若心經疏》(葉13—42，KBT,54—61)、(3)《普賢行願贊》(葉43—58，KT I,222—230)、(4)即陳寅恪先生引用過的《金光明最勝王經·懺悔品》(葉59—75，KTI,242—249)。這些文獻的內容多與懺悔思想有關，而且連續工整地抄在一起，表明它們應同屬於從德太子。其中的《般若心經疏》是依據漢譯大本《心經》加注的[57]；《金光明最勝王經·懺悔品》很可能就出自義淨的漢譯本[58]，這都說明了從德太子對漢譯佛典了解甚深，是這位太子兼佛教大師吸取漢地佛教文化的明證。

以上論述的所有材料，豐富了我們關於從德太子的知識。這位太子是于闐王李聖天和曹議金女的長子，在兒童時期(935年前後)就被帶到敦煌，其像繪在歸義軍節度使的窟內。在十世紀中葉，從德可能長期留居在敦煌，留下了不少于闐語文獻，到966年奉命入宋朝貢。翌年，父王晏駕，他作爲合法繼承人，回于闐即位爲王，即尉遲輸羅，年號天尊。弄清楚從德太子在敦煌活動的年代，有助於我們判定一些敦煌于闐語寫本的年代，上面討論的八種《善財童子譬喻經》寫本(Ch00266,P2025＋P4089a,P2957,P2896,P2784,P5536bis，麗字73號)[59]和與之相關聯的六種《抒情詩》寫本(Ch00266,P2025,P2895,P2896,P2956,P2022)[60]，以及P3510和P3513貝葉本佛教文獻合集的完成時間，應當就是在它們的主人——從德太子在敦煌的年代，即公元十世紀中葉，約935—966年間。

三、于闐使臣及其相關文書的年代

十世紀中葉的幾十年中，居住或逗留在敦煌的不僅僅是從德

等于闐太子，而且還有數批于闐使臣，他們也和從德太子一樣，在沙州撰寫或抄錄過一些文書或文獻。敦煌出土于闐文獻中保存的一些使臣報告，幾乎都是寫於敦煌的草稿或副本，應當就是出自這些留居敦煌的使臣或僧侶的手筆。因此，敦煌漢文文書中關於這些于闐使臣或僧侶在敦煌活動的記錄，是幫助我們澄清爭論較大的一些于闐使臣報告產生年代的基本文獻之一，找出于闐使臣在敦煌的年代，就爲人們提供了于闐使臣報告或其他在敦煌完成的于闐語文獻的一些可能的參照年份，而且，漢文史料提供的豐富內容，也有助於于闐使臣報告本身的解讀。爲此，我們把目前收集到的反映于闐使臣或其他人員在敦煌活動情況的漢文文書資料按年代摘錄於下：

資料一　P4640《唐己未、庚申、辛酉年(899—901)歸義軍軍資庫司布紙破用曆》記：[61]

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又都押衙羅通達傳，支與于闐使梁明明等一行細紙壹束捌帖。

這是我們讀到的有明確年代的最早來敦煌的于闐使者記錄，但這是否標志着901年是于闐使首次訪問敦煌的年份呢？值得注意的是S4359中所抄曲子詞《謁金門·開于闐》。詞云：

開于闐，綿綾家家總滿。奉戲生龍及玉碗，將來百姓看。尙書座客典，四塞休征罷戰。但阿郎千秋歲，甘州他自離亂。

其後又抄咸通末年的韋蟾所作《送盧潘尙書之靈武》詩，末題“維大梁貞明五年(919)四月日，押衙某首(手)寫流□。”[62]這是抄寫的時間，而《開于闐》的創作年代，則應從其本身的內容來判斷。從文意看，它是歸義軍的某個文人所作頌揚府主尙書德政的歌辭，其時歸義軍剛剛和于闐建立了往來關係，即所謂“開于闐”，而和甘州回鶻則處在敵對狀態中，這和901年前後的張承奉時期正相符合，甘、沙二州處在大戰的前夜，于闐使者正好來到敦煌，而且據我們考

訂，張承奉在901—903年間的稱號正是尚書[63]。如果于闐使梁明明等人的來到敦煌，就是歸義軍方面所説的"開于闐"——開始了與于闐的往來，那麼901年很可能就是吐蕃統治結束以後歸義軍與于闐王國之間首次往來的年份，這將爲寫於敦煌的于闐文文獻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年代上限。

資料二　S1366《歸義軍宴設司面、油破曆》記載：

二十一日，于闐羅闍梨身故助葬，細供十分，胡(餅)五十枚，用面四斗四升，油八合。五月二日，支于闐使遍，面一石，油三升。漢僧三人、于闐僧一人、婆羅門僧一人、涼州僧一人，共面二斗，油一升。

文書已殘，紀年不存。從其中"迎狄寅及使命"和"賽金山王"兩項記載，可以推測文書完成于曹氏時代初期。[64]

資料三　P2704《后唐長興四、五年(933—934)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迴向疏》(共三份)中[65]，在施入大衆的襖子旁注：

其襖子，于闐宰相換得。

三份《迴向疏》又有這樣的祈願：

東朝奉使，早拜天顏；于闐使人，往來無滯。

朝貢專使，往來不滯；于闐使人，回騎無虞。

朝庭奉使，馹騎親宣；于闐專人，關山不滯。

説明這兩年中有于闐宰相及使臣在敦煌停留，然後回于闐。

資料四　P2638《後唐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狀》記癸巳年(933)六月至丙申年(936)六月間儭司出破數中有：[66]

綿綾壹匹，于闐僧鞔衣用。

説明這三年中，有于闐僧人在敦煌受到沙州僧團的款待。

資料五　P5535于闐體梵文寫《陀羅尼咒》尾部漢文題記稱：[67]

大寶于闐國進奉使司空劉再昇。

據《新五代史》卷 9《晉出帝本紀》，天福七年(943)十二月，“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昇以來。”可知這條題記應寫於 943 年前後。這件寫本應即劉再昇往來沙州時留下的。

資料六　　P3234 背有沙州淨土寺各種入破曆二十一件，其中記該寺破用數有：[68]

油一杪，于闐僧來供助用。

面二斗五升，于闐客僧來此得官料供助用。

粟三升沽酒，送路于闐僧用。

這些帳曆中的一些人名和內容又見於 P2049《同光三年(925)沙州淨土寺直歲保護手下諸色入破曆計會》和《長興二年(931)沙州淨土寺直歲願達手下諸色入破曆計會》[69]，可知其中的《甲辰年二月後東庫惠安、惠戒手下便物曆》和《壬寅年正月一日已後直歲沙彌願通手上諸色入曆》分别相當於 944 和 942 年[70]。帳中所記于闐僧人在沙州淨土寺的時間，也應在 942—944 年前後。

資料七　　P 2026 于闐文佛教文獻雜纂卷中，第 89—90 行中間，繪佛像兩軀，旁有施主作供養狀，又繪小塔，內書：[71]

維大晉天福十年乙巳，敕于闐班上監一心供養。

時在 945 年。題記使用中原年號和漢文，表明該卷寫繪於敦煌。

資料八　　P2641《丁未年六月歸義軍都頭知宴設使宋國清牒》共四份，內容相同，日期連貫，現錄其中有關供應于闐使者食料的記載如下：

十九日，壽昌迎于闐使，細供陸拾分，壹胡幷，又胡幷壹伯枚，油胡幷子肆伯枚，每面貳斗，入油壹升。廿日，太子迎于闐使，油胡幷子壹伯枚，每面貳斗，入油壹升。廿一日，馬圈口迎于闐使，用細供叁拾分，壹胡幷，又胡幷貳拾枚，灌腸面叁升。

城下迎于闐使，細供貳拾分，壹胡并，灌腸面三升。于闐使迎于闐使，細供拾分，壹胡并，中次料拾分。廿二日，太子屈于闐使，細供拾伍分，壹胡并。廿三日，大廳設于闐使，用細供貳拾捌分，內叁分貳胡并。廿四日，又太子龍興寺屈于闐使，細供拾伍分，壹胡并，又胡并捌拾伍枚。于闐使□料□下，面肆斗。

藤枝晃教授曾抄錄過這件文書的一部分，並推測這裏的丁未年應是後漢天福十二年(947)[72]。這一看法可以成立，因爲文書中的宋國忠又見於 S1898 (936 年左右)，宋遷嗣見於 P3160(951 年)，趙員子見於 P2629(964 年〈?〉)，而且，文書上的簡式鳥形畫押，據艾麗白 (D. Eliasberg) 的考證，也應出自曹元忠 (944—974 年執政)之手。[73]

資料九　　P 3160《辛亥年六月歸義軍押衙知內宅司宋遷嗣牒》記柴草支出：

廿日，看于闐使，煮肉兩束。

艾麗白據牒尾的簡式鳥形畫押，把這件文書斷在 951 年[74]。宋遷嗣一名又見於資料八 (947 年) 中，這爲上述考訂作了補充。

資料一〇　　S3728《乙卯年二、三月歸義軍押衙知柴場司安祐成牒》中，有關供應柴草的記載如下：

二月廿四日，于闐使賽神，付設司柴壹束。三月三日，支于闐博士月柴壹拾伍束。

艾麗白據牒後的簡式鳥形畫押，推定在 955 年[75]。對此可以補充的是，文書中安祐成一名又見於 S1898 歸義軍名籍文書中，作“十將安祐成”[76]，而同一名籍中的張威賢，又見於 S1285《後唐淸泰三年 (936) 揚忽律哺賣宅舍契》中[77]，據此，可以間接證明 S3728 的乙卯年應是后周顯德二年(955)。

資料一一　　P3111 是《庚申年七月十五日于闐公主新建花

樹等帳》，全文如下：

庚申年七月十五日，于闐公主新建官造花樹、新花樹陸，內壹是瓶盞樹。又新布樹壹，又舊瓶盞樹壹，又布樹壹，紙樹壹。新花葉壹伯陸拾柒，又舊花柒拾玖葉。新鏡花肆，舊鏡花陸。新綠葉壹拾捌，舊綠葉叁。紫臺子壹拾壹，紅臺子壹拾叁，青臺子壹拾壹，又新五色臺子叁拾捌，又舊五色臺子貳拾柒。磨睺羅壹拾，瓶子捌拾肆。（鳥形畫押）

艾麗白據鳥形畫押，斷定在960年的庚申。[78]

資料一二　敦煌文物研究所藏No.001＋董希文藏卷＋P2629《歸義軍官府用酒破曆》，記有關于闐使臣等用酒情況：

六月三日，太子屈于闐使，酒半瓮，釀羊皮酒叁斗五升。去正月廿四日供于闐葛祿逐日酒貳升，至六月五日夜斷，除三個月小盡，中間壹伯貳拾玖日，計給酒肆瓮壹斗捌升。去三月十九日供于闐羅尚書逐日酒伍升，至六月五日夜斷，除兩個月小盡，中間柒拾伍日，內兩日全斷，計給酒陸瓮伍升。去五月貳拾捌日，供修于闐文字孔目官逐日壹斗，至陸月伍日夜斷，除月小盡，中間柒日，計用酒壹瓮壹斗。七月一日，太子迎于闐使酒壹瓮。三日，□□□闐使，酒壹斗。廿一日，衙內看于闐使，酒壹瓮。廿六日，衙內看甘州使及于闐使僧，酒壹角。八月一日，看于闐使，酒壹瓮。廿二日，看甘州使及于闐使，酒半瓮。十月二日，東園看于闐使及南山，酒壹斗。十日，衙內看于闐使，酒壹斗。

本文前後殘缺，紀年已失，紙縫鈐有"歸義軍節度使新鑄印"，據陳祚龍、施萍亭兩位先生的考證，該印的使用期限是在961—975之間[79]。因此，這件《酒破曆》應當就是這一期間的產物。施萍亭還根據月建大小等理由，認爲其確切年份是宋乾德二年(964)，可備一説[80]。按本文書中出現的趙員子見於上面提到的P2641文書

(947年), 史骨子見於 P2236《壬申年(972)沙州敦煌鄉官布籍》[81], 都可以旁證酒帳應是曹元忠時期的文書。

資料一三　S2474《歸義軍宴設司面、油破曆》殘存的記事有:

> 于闐僧油一升。閏三月五日, 于闐使面一斗。窟上看于闐使, 細供十分, 小食子十枚, 用面二斗一升, 油一升。十二日, 太子宅于闐使一人, 用面七斗。

這份《破曆》的前面抄有《己卯、庚辰年駝官鄧留通、張憨兒牒》, 艾麗白據牒末的繁式鳥形畫押, 斷定爲979—980年[82]。《破曆》的第18—19行間, 有小字"於時太平興國七年(982)壬午歲二月五日立契"云云。藤枝晃在考慮了這些情況後, 把《破曆》中的"閏三月", 考訂爲太平興國五年(980)的閏三月[83]。《破曆》的年代應爲980年。

資料一四　P2744《歸義軍宴設司面、油破曆》保存了如下記載:

> 廿三日, 支四道使客箸節料殘, 于闐使二人, 共面二斗; 漢大師等面五斗, 油三升; 石大師、孫大師二人, 共面三斗, 油二升; 達干宰相及公主交關人, 面三斗。廿四日, 衙內看漢僧及于闐僧, 細供六分, 有饊餅小食子兩枚, 飶欣子兩格, 用面一斗五升, 油九合二勺。西衙看四道使客, 用細供五十八分, 饊餅四枚, 灌腸面六升, 用面一石一斗七升八合, 油四升八合。

此件年代已殘, 內容與資料一三相同, 所以土肥義和先生推測其年份爲980—982年左右是可以接受的。[84]

資料一五　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 Ch I.0021a《壬午年于闐使張金山供養文》全文如下: [85]

> 壬午年十二月廿一日, 于闐使張金山幸者, 來取窟頭燃燈來者, 焚香發願, 禮佛慶告者, 好轉經坐禪者, 竟發心造塔, 願

以過到來平善者，再發心造塔，諸周在世界子，有沙州人語好者，又窟更好者，木石更好，怎生暫打得者，幸者書記耳。

因本文下面所寫的于闐語文書紀年爲中興五年(982)，知此壬午爲982年[86]。這段于闐使者在沙州用漢文寫的文字，雖然文理多有不通處，但却十分珍貴。

此外，還有一些文書年月日不够完備，但它們也反映了于闐使臣在沙州的活動，現摘要如下，以保存資料的完整性。

資料一六　P2812 有«于闐宰相繪畫功德記»，文字如下(句讀爲原文所有)：

厥今青春告謝。朱夏初合。舍異類之珍財。召丹青之巧匠。繪如來之鋪席，圖菩薩之眞儀。渴仰虔恭。傾心懇切者。爲誰施作。時則有于闐宰相。先奉爲龍天八部。護大地之蒼生。梵釋四王。衞普天而安樂。西頭天子。居寶位而延祥。東府大王。並乾坤之寵祿。先亡後過。速詣蓮宮。見在枝羅。延年吉慶。己躬淸吉。得賢聖而護持。患疾痊除。靜四支而克順。一行長幼。途路□泰而無危。兩國通流。平善早臨於桑梓之福會。伏惟我宰相□德云云 加以信珠頂棒。心鏡恆明。爰召良工。廣施財寶。遂得丹青晃曜。萬菩薩親降而現形。紫磨分輝。十方佛並臨而赴會。是時也。百花競發。萬物滋榮。鳥喜林間。宮商合韻。總斯多善。莫限良緣。

這篇優美的文字，可能是于闐宰相在莫高窟修功德時留下的，從其中用"東府大王"指稱歸義軍節度使來看，應寫於十世紀托西大王曹議金、西平王曹元忠或敦煌王曹延祿節度瓜沙二州的某一時期。

資料一七　S2528 «于闐僧龍大德請公憑狀»[87]，文字如下(圓括號中是前字的校正字)：

于闐僧龍大德狀：右大德自到沙州，吃令公阿恩蔭任似(仁慈?)。近秋寒冷，依莊(衣裝)則看阿郎，隨身囊掤猻一個，

依伏(衣服)總在阿郎。伏請公憑裁下處分。牒建（件）狀如前。謹狀。九月廿五日，于闐龍大德〔狀〕。

這位于闐高僧寫的漢文也有些文理不通，但大意還是明確的。從"令公"一名指沙州統治者來看，時間也應在曹氏歸義軍時期。[88]

資料一八　　P 4705《殘油帳》記有:

二月五日，供甘州來于闐大德二人，逐日午時□供□夜(下缺)

資料一九　　S6452《某寺面破曆》記:

十月十六日，于闐大師來造飯，面叁升。十七日，又造飯，面壹斗。麩貳斗，于闐大師馬吃用。

資料二〇　　P2642《某寺粟破曆》記:

十七日，粟陸斗沽酒，于闐使就寺來吃用。

資料二一　　P3231《某寺殘帳曆》記:

于闐使十二分。

資料二二　　日本龍谷大學藏敦煌文書第 48 號寫本題:[89]

于闐册禮般若先排使張宗瀚留此殘本。

以上五條材料，目前還無法判定它們的年代。

下面根據上述敦煌資料，並結合漢文有關于闐入貢中原的使臣的記載，編成年表，來提示于闐使臣在沙州的年份和各自的身份(見 120—122 頁):

此表表明，目前所確知的最早來到沙州的于闐使者，是 901 年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在位時的梁明明等一行，而且他們很可能是歸義軍成立後來到敦煌的第一批于闐使。但上表所列的史料說明，只是在曹議金掌握歸義軍政權(920 年左右)以後，于闐的使臣、僧侶乃至宰相、尚書、公主、太子等才大批地、絡繹不絕地來到敦煌，甚至遠赴洛京或汴梁，入貢中原王朝。上文已經指出，敦煌文書中的于闐文使臣報告或其他一些文獻，應當就是這些逗留或居住在

公元紀年	在沙州時間	在中原時間	使臣情況	根據
901	辛酉年三月十二日		于闐使梁明明等一行	P4640(資料一)
C.920	某年某月廿一日		于闐羅闍梨、于闐使、僧	S1366(資料二)
923—926		后唐同光年間	于闐來胡僧	新五代史 14 皇后劉氏傳
933—934	長興四年十月九日至五年二月九日		于闐宰相、于闐使人	P2704(資料三)
933—936	癸巳年六月一日至丙申年六月一日		于闐僧	P2638(資料四)
937		后晉天福二年十一月	于闐僧曼哥羅贊嘗羅	册府元龜 52
938		后晉天福三年九至十二月	進奉使馬繼榮、副使張載通、監使吳順規	舊五代史 77 五代會要 29
943		后晉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至八年正月乙巳	劉再昇	新五代史 9, 舊五代史 81 P5535(資料五)
C.942—944	壬寅年正月至甲辰年二月		于闐僧、于闐客僧	P3234(資料六)
945	天福十年		于闐班上監	P2026(資料七)
947	丁未年六月十九至廿四日		于闐使	P2641(資料八)
947		后漢天福十二年六月	于闐使者	新五代史 10
948		后漢乾祐元年五至六月	入朝使王知鐸、副使張文達、判官秦元寶、監使劉行立	五代會要 29
951	辛亥年六月廿日		于闐使	P3160(資料九)
955	乙卯年二月廿四日至三月三日		于闐使、于闐博士	S3728(資料一〇)

公元紀年	在沙州時間	在中原時間	使臣情況	根　據
960	庚申年七月十五日		于闐公主	P3111(資料一一)
962		宋建隆二年十二月	于闐使、摩尼師使	續資治通鑑長編2、宋史490
964(?)	六月三日至十月十日		于闐使、于闐葛祿、于闐羅尙書、于闐使僧、修于闐文字孔目官	敦煌所No.1+董希文藏卷+P2629(資料一二)
964	甲子年八月七日		于闐太子三人：從德、從連、琮原	P3184、莫高窟444窟題記
965		宋乾德三年五月	于闐僧善名、善法	長編6、宋史490
965		宋乾德三年十二月戊午至癸亥	道圓、于闐使	長編6、宋史490
966		宋乾德四年二月丙辰	于闐使、德從(從德)	長編7、宋史490
968		宋開寶元年十一月	于闐使	宋會要197回鶻條
969		宋開寶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直末山、善名、總營	宋會要199、宋史490
971		宋開寶四年	僧吉祥	宋史490
980	閏三月五日前至十二月		于闐僧、于闐使	S2474 (資料一三)
C.980—982	廿三日至廿四日		于闐使、于闐僧	P2744 (資料一四)
983	壬午年十二月廿一日		于闐使張金山	Ch I.0021a(資料一五)
989		遼統和七年二日	于闐使	遼史12
989		遼統和七年十一月甲申	于闐使張文寶	遼史12

公元紀年	在沙州時間	在中原時間	使臣情況	根　據
990		遼統和八年二月丁未朔	于闐使	遼史 13
994		宋淳化五年	沙門吉祥	宋會要 200、佛祖統紀 43
十世紀	四月(朱夏初合)		于闐宰相	P2812 (資料一六)
十世紀	某年九月廿五日		于闐僧龍大德	S2528(資料一七)
不詳	某年二月五日		甘州來于闐大德二人	P4705 (資料一八)
不詳	某年十月十六日		于闐大師	S6452 (資料一九)
不詳	某年某月十七日		于闐使	P2624 (資料二〇)
不詳	不　詳		于闐使	P3231 (資料二一)
不詳	不　詳		于闐册禮般若先排使張宗瀚	龍谷大學 48 號(資料二二)

敦煌的于闐使、僧等在這裏起草或抄寫的。因此，上表所列于闐使、僧等在敦煌的年代，就很可能是這些于闐語文書完成的絕對年代。我們目前還不能一一指出哪一年來的于闐使或其他人寫的是哪一篇于闐文書，但如果上述看法成立，則可以把在敦煌完成的于闐語文獻的相對年代判定在公元十世紀。

除上表所列漢文史料所提供的證據外，還可以列舉敦煌發現的回鶻文和藏文文書來證成上述看法。

據哈密屯最近出版的新著《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回鶻文寫本集成》一書，目前確知的有關沙州、于闐往來的回鶻文文書只有兩

件。P2998 背是金國 (Altun el,即于闐) 使者在沙州寫的願文，年代是 yunt yïl bešinč ay"馬年五月"[90]。巴贊 (L. Bazin) 教授比定爲 982 年[91]；哈密屯列舉出 922、934、970、982 和 994 年作爲可能的年份[92]；森安孝夫氏更放寬到十世紀至十一世紀的前半[93]。另一件文書編號 Pelliot Ouïgour 2, 是一件處理一位在于闐去世的商人財産的訴訟文書。該商人死於 ït yïlïn yettinč ay-da yetti yegirmi-dä"狗年七月十七日"。文書還提到另一個時間 to bečin yïlïn tončor ayïn "土猴年七月"[94]。巴贊將後者定爲 948 年[95]，哈密屯和森安孝夫都沒有異議[96]。根據他們研究的成果，回鶻文所記于闐與沙州的往來，于闐使臣在敦煌的時間，也是在公元十世紀。

由於吐蕃對河西及塔里木盆地長期統治的影響，在吐蕃統治結束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藏文仍然是甘州回鶻、沙州歸義軍、于闐王國等地方政權間往來信函的一種通用語。近年，烏瑞 (G. Uray) 教授從敦煌出土藏文文獻中，找出八件與于闐有關的文書，並且考訂它們全都屬於十世紀[97]。這八件文書是：

(1)鋼和泰藏卷背«于闐使臣上沙州太保狀»;

(2)P. t.984第二殘片«河西節度使沙州曹令公上聖神之主(于闐王)書»;

(3)P. t.1106 背第一件文書«于闐天子長兄致弟令公狀»;

(4)P. t.1120 背«沙州主曹尙書致菩薩于闐聖神天子書»;

(5)P. t.1256 背猪年于闐使劉司空 (Li'u Si-kong)文書;

(6)P. t.1284 第三件文書«河西節度使曹太保致于闐王書»;

(7)P. t.2111 第七和第二件文書 «于闐王致甘州忠賢大臣長史于伽書»;

(8)P. t. 1106 正面 «于闐王天子長兄致〔沙州〕弟登里尙書書»。

其中，文書(1)可根據背面于闐語文書中李聖天十四年雞年爲 925 年的考證結果[98]，推測當在這一年左右，因爲藏文文書的內容與于闐文文書的內容有部分相關聯；文書(2)、(4)、(6)因爲標有"曹"姓，確屬十世紀掌權的歸義軍曹氏時期無疑；文書(3)的"令公"也只能是指曹氏的某位節度使；文書(5)的于闐使劉司空，已由森安孝夫氏考證爲上面提到過的劉再昇[99]，"猪年"應指 939 年或 951 年；最後，文書(7)的年代不够明確，武內紹人氏從對全體藏文書信文書格式的綜合研究出發，判定爲歸義軍後期(曹氏時期)[100]，補充了烏瑞的考訂。(8)與(3)寫在同一寫本的正背，年代應相差不遠。烏瑞指出，登里 (dang-re, 源於回鶻文 tängri) 這種突厥稱號用於沙州統治者，應是十世紀末沙州部分突厥化的時期，又因歸義軍節度使的尚書稱號不晚於 931 年，所以這裏的尚書應是十世紀末期某位節度的弟弟或兒子。這一看法可以成立。因此可以說，目前所知的記載沙州、甘州和于闐交往的敦煌藏文文書，也都是公元十世紀的產物。人們不禁要問，爲什麼距離吐蕃統治結束時間較近的九世紀後半葉沒有產生這類藏文文書呢？答案恐怕只能是當時于闐和沙州的往來或是還未開始，或是始而不久，兩地的交往還不密切的緣故。

最後，讓我們看看敦煌發現的于闐文文書本身的證據。下面先把明確標有年代並且基本考訂清楚的寫本表列如下(見125頁)：[101]

除上表所列舉的外，有些寫本可以間接推知它們的大致年代。P2782 第 1—61 行是用韻文體寫的于闐文《法華經綱要》，其第 12 行和 61 行有供養人的名字 ḍyau tceyi-śīnä 或ḍyau si-khūṃ[102]，據金子良太氏的考證，分別相當於"劉再昇"和"劉司空"[103]，也就是上文提到的 943 年入貢於晉的于闐使臣，他的名字還見於敦煌漢、藏文文書。這樣，就可以把 P2782 第 1—61 行所寫的《法華經綱要》的年代，定在 943 年左右。同一寫本下面還寫有《陀羅尼》

公元紀年	于闐文獻紀年	內　容	編　號	根　據	備注
917	同慶六年	詩	P2027	KT II,80	(102)
925	李聖天王十四年雞年二月十二日，四月廿日	于闐使臣文書	鋼和泰藏卷	KT II,72—74	
941	〔同慶〕三十年牛年三月十五日	«金剛經»寫本序	Ch00275	KTIII,19	
943	兔年五月一日、五月廿日、九月五日、十月八日	佛典題記	Ch c.001	KT V,376,252,255,KBT,143	(103)
958	天興九年馬年六月十九日	習　字	P2028	KT II,82	
958	天興九年馬年七月十日	習　字	Ch c.002	KT V,385	
958	天興九年馬年十月	«阿育王傳說»題記	P2798	KT III,64	
958—972	Abhimanyugupta 在位年間	«于闐至迦濕彌羅國行記»	ChI.0021 a,b	KT II,57	(104)
963	天興十四年猪年二月廿五日	習　字	Ch00272	KT II,51	
965	天壽三年牛年六月十日	詩　序	P2928	KT III,105	(105)
970	天尊四年馬年正月九日	尉遲輸羅王致曹元忠信	P5538	KT II,129	
971	天尊五年羊年七月十七日	«金剛乘讚文»題記	ChI.0021b	KT II,57	
967—977	尉遲輸羅王在位年間	«佛本生讚»序	Ch00274	KT I, 198	
967—977	尉遲輸羅王在位年間	«文殊師利無我化身經»題記	P4099	KT II,123	
982	中興五年馬年七月	尉遲達磨王頌辭	ChI.0021a,a	KT II,54	

(62—72 行)、于闐字母拚寫的藏文信札(73—80 行)、《使臣報告稿》(80—83 行)和另一篇《陀羅尼》[108]，它們的年代也應在 943 年前後。另外，Or8212.162 的82—90 行[109] 和 P2029背 17—21 行[110] 也是與 P2782 同樣的《法華經綱要》的不同抄本，它們的年代或許應在 943 年以後。

上引資料一五中的張金山，是另一位來過敦煌的重要于闐使臣。他的名字的于闐文拚法是 Cā kīmä-śanä，敦煌于闐語文書中與他有關聯的至少有以下幾種：(1)上表列舉的 Ch00274《佛本生讚》是張金山在尉遲輸羅王時期請娑摩若寺大師 Vedyaśīla 編譯的。張金山的名字除了以婆羅迷字母的形式寫在正文中外，還用粟特文的形式 kymš'n 寫在文末[111]。(2) Ch I.0021b, a 和 Ch I.0021b,b 所寫兩份《金剛乘讚文》，也都出自張金山的手筆[112]。前者的年代是"天尊五年"(971)，後者的年代也應相差不遠。(3) Chii 002 醫藥文獻《悉曇婆羅》(Siddhasāra) 第 156 葉背的葉邊，用粟特文寫着 čw kymš'n"張金山"[113]，説明這部現存最長的敦煌于闐文寫卷也是張金山的所有物，它被帶到沙州，很可能是 982 年張金山出使沙州的結果。

如果把上面列舉的所有已經斷定絕對或相對年代的文書，和本文第二節考訂的幾組屬於從德太子的文書結合在一起，已經構成全部敦煌于闐語文獻約三分之一的數量，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敦煌發現的于闐語文獻大部分都是公元十世紀在敦煌地區抄寫的，這一年代界限和上面從漢、藏、回鶻文文書所見的沙州、于闐間頻繁交往的年代正相符合。

以上我們對敦煌出土漢、藏、回鶻、于闐四種文獻提供的年代綫索加以綜合考察，所得結論是一致的，即從現在可以明確考知年代的文獻看，于闐使臣大批地來到敦煌和大批于闐語文獻由他們在這裏抄寫完成，主要應當是在公元十世紀的一百年裏。

然而，在這裏對一些過去考訂在九世紀下半葉的于闐文使臣報告不應避而不談。過去，我們在蒲立本關於851—912年的王統說和我們用“金國”一名斷代的看法的支配下，曾把P2741、P2790、P2958和P2027放在所謂“金國”的時段中（約851—約938年）⑭。上文已經申明，851—912年的王統和“金國”的時代界說不能成立，P2958和P2027的年代也在上文重新考訂，此不贅述。P 2790的年代也應據哈密屯指出的第10和12行的 tteyi hvāṃ “大王”一詞，放在曹氏歸義軍時期⑮。問題在於P2741及與之密切相關的Ch00269號文書的年代。早年，哈密屯曾把P2741于闐使臣報告中提到的 Cā ttäyä-khī，比定爲敦煌漢文文書S367《光啓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的抄者“張大慶”⑯。後來，他在專門討論沙州西羅布泊地區的仲雲部時，又把P2741、Ch00269等一大批于闐使臣報告統統放在了十世紀⑰。我們在他關於張大慶的比定的基礎上，認爲P2741第6行的 si-khūṃ cā śvāṃ-śī “司空張尚書”是指867—890年的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並據S367的題記，疑此文書寫於光啓元年⑱。哈密屯同意此點並做了補充，認爲P2741第46行所記中原來的使臣 Sūṃ śāṃ-śū“宋尚書”，應即乾符年間前來沙州賜節的宋光廷，並由此認爲P 2741的年代應在乾符年間（874-879）⑲。熊本則根據P2741所記甘州動亂的情況，推斷該文書寫於九世紀末葉⑳。這樣，似乎所有跡象都表明P2741是屬於九世紀張氏歸義軍時代的文書。

可是，這一孤立的結論似乎與上面綜合考察所得出的大批于闐文寫本產生於十世紀的結論格格不入。實際上，哈密屯雖然傾向於把P2741的年代放在張淮深時期，但他同時仍然堅持認爲P2741不是孤立的寫本，它是以Ch00269爲開端，至少十五份于闐文使臣文書的一部分，這些文書程度不等地記錄了同樣的一批人和同樣的一些事件，如P2741中的一些人名，又見於標有“天興

九年"(958)的 P 2028 和標有"天興十四年"(963)的 Ch 00272 等同類文書中[121]。熊本氏在研究哈密屯列舉的十五種寫本中的 P2786、Or8212.186、Or8212.162 時，認爲不同寫本中的同名之人未必是同一個人[122]。但是，個別人名可能同名不同人，而出現上述寫卷中的同名之人數不在少數，就不能全以偶然來解釋。在沒有把所涉及的每一件于闐文使臣報告的原文解釋清楚之前，不宜過早地全盤否定哈密屯所列舉的衆多相同人名爲同一人的看法，特别是當我們把大部分于闐文獻據當時的歷史背景推定在十世紀以後，就應當把哈密屯自已是否堅持都感到猶豫的觀點重新重視起來。當然，我們並不想全盤接受他的觀點，而且確信于闐文獻中名同實異的人一定存在，P2741、Ch00269 和 P 2786、Or 8212. 186 分别描繪的情况有着一定的差異。在此，我們只想在于闐使臣報告年代問題的研究進程中，利用漢文文書材料，提供把上述于闐使臣報告放在十世紀的可能依據。拿P 2741 號文書來看，哈密屯把于闐文的 Sūṃ śāṃ-śū 考訂爲"宋光廷"。但《張淮深墓志銘》中只說宋光廷是"中使"，即宦官，他能否被稱作"尙書"是值得懷疑的。又文書中的 si-khūṃ cā śvāṃ-śī"司空張尙書"，過去都把他看作是張淮深，其實，從唐朝節度使兼檢校官的制度來看，司空和尙書相差幾級，似不應同時指同一個人，這裏如果不是尙書的對音有誤，就是于闐使者用的慣稱，即因這位節度使任過尙書，所以當他升爲司空時，仍用尙書名其名。在歸義軍張姓節度使中，只有張議潮和張承奉先後有過尙書和司空兩銜，目前尙未發現張淮深有司空稱號[123]，因此，于闐文書中的"司空張尙書"指淮深的可能性極小，而議潮在世時，于闐似尙未與沙州往來。按 S1604《天復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河西都僧統帖》中仍稱張承奉爲"尙書"[124]，而 P3324 背《天復四年(904)應管衙前兵馬使隨身官劉善通狀》中則稱他爲"司空阿郎"[125]，司空的頭銜還見於 S5747《天復

五年(905)正月五日張承奉祭風伯神文》他自己的署名職稱中[126]。因此，902—904年間的張承奉，是可以作爲P2741中的“司空張尙書”的候選人的。最後，Cā ttäyä-khī 卽張大慶的比定如果不誤[127]，也可以推測他到十世紀初頭仍然健在[128]。以上解說並不是要肯定P2741就是張承奉時的產物，而僅僅是爲了表明，張承奉任節帥的十世紀最初幾年也有可能是這些于闐使臣報告產生的年份。上引資料一所記901年來沙州的于闐使臣梁明明等一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批使臣，該文書表明，當時和于闐使臣一起在敦煌的，還有天使(卽唐朝的使節)，朔方使麻大夫、甘州使押衙王保安等[129]，這和P 2741也有某些相通之處。從大的歷史背景來看，905年前後正是張承奉和剛剛在甘州立國不久的回鶻相爭戰的時候[130]，這又和P 2741,Ch00269所述史實有某些相似。因此，應把十世紀前期納入人們選擇P2741年代的範圍之內。對於明確屬於十世紀的于闐使臣報告，也同樣需要在解讀文書本身的同時，結合漢、藏、回鶻文書，從所記人物特別是歷史事實本身來判定年代。如果一些使臣報告是在十世紀相距不遠的年代中完成的，那不同文書中出現同一個人物就不足爲奇了。看來，今後的任務首先是以漢文文書爲基礎，參照藏、回鶻、于闐、粟特等文獻，搞淸九世紀末期到十世紀河西及塔里木盆地的歷史眞實面貌，而後才能據以對于闐使臣報告的年代作出正確的判斷。這就是我們下一步應認眞從事的工作。

結　語

(一)我們從敦煌漢文史料出發，結合回鶻文和藏文文書，考訂出于闐和沙州之間的密切交往以及于闐太子、使臣等在敦煌活動的年代應在公元十世紀，又根據于闐文文獻本身提供的年代證據，推測那些出自這些于闐太子或各種使臣手筆的于闐語文獻，主要

也是在公元十世紀陸續撰寫或抄成的。

(二)本文的另一目的，是在探討敦煌出土于闐文獻年代的同時，從一個側面展示公元十世紀于闐和沙州之間的友好關係，爲人們全面了解當時兩地間的交往史打下基礎。

(三)最後，在對舊有的各種成說詳細加以評價之後，我們對史料價值很高的于闐使臣報告一類文書的斷代，僅提出一點建議性的意見，在這些文書本身文字的解釋和人們對九、十世紀河西和塔里木盆地民族變遷史的認識還不充分之前，似可多提出幾種假設，不必過早地下結論。

---

①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30年，今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頁。

② 《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二號，1928年1月；今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257頁。

③ 較新的刊本見 KT I. pp.242—249.

④ 張、榮1982，179—209頁。

⑤ Zhang-Rong 1984, pp.23—46.

⑥ Hamilton 1984,pp.47—53.

⑦ Kumamoto 1986, pp.227—244.

⑧ 張、榮1983，163—175頁。

⑨ E. G. Pulleyblank, "The Date of (the Hedin) 15, 16", KT IV, pp.179—181.

⑩ 參看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東洋學報》第69卷第1.2號，1988年，59—86頁。和田地區出土的木函或紙本文獻的年代考訂以及我們不同意蒲立本年代的理由已詳該文，茲不贅述。

⑪ 張、榮1982，181—188頁；Zhang-Rong 1984, pp. 25—33.

⑫ Hamilton 1984, p.50.

⑬ Hamilton 1984, p.52, n.18,19.

⑭ Kumamoto 1986, pp.227—230.

⑮ Hamilton 1986,pp.93,95.

⑯ G.Uray,"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1979),p.294.

⑰ KT II, pp.85—86.

⑱ 王國維《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跋》，《觀堂集林》卷20，北京，1959年，999頁；張、榮1982，186頁；Zhang-Rong 1984, p. 31.

⑲ KT II, pp.85,86.節譯見H. W. Bailey,"Māhyāra", Bulletin of the 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XX. 1—4 (Poona 1960), p.277.

⑳ KT II, pp.85, 117, 118.

㉑ KT II, p.119; H. W. Bailey, "Altun Khan", BSOAS,XXX. 1(1967), pp.97,102.

㉒ KT II, pp.118—119; H. W. Bailey, op. cit., pp.96—97. Cf. Hamilton 1984,pp.51—52.

㉓ KBT,pp.47—52.

㉔ H. W. Bailey, "The Great Prince Tcūṃ-ttehi", 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VI (1980) pp.49—50.

㉕ R. E. Emmerick, "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Studia Iranica, IX.2(1980), pp. 185—193.

㉖ Hamilton 1984, pp.48—49.

㉗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 ed. by R. E. Emmerick and P. O. Skjaervø(Wein 1987), pp.49—50, s. v. Tcūṃ-ttehi:.

㉘ 張、榮1983，169—170頁。

㉙ Kumamoto 1986,pp.231—232.

㉚ Hamilton 1984, p.49, n.7.

㉛ Kumamoto 1986, p.231.

㉜ KT II, pp. 125—129; H. W. Bailey, "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 AM, XI.1 (1964),pp.17—20.

㉝ 參看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37頁; 又《歸義軍曹氏"表文三件"考釋》,《文獻》1988年第3期,3—14頁; 又《敦煌遺書P4065表文三件的初步考釋》,《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94—101頁。

㉞ 野村博最早注意到這件于闐文寫本,見所著《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書"麗字73號"于闐文》,載《東洋史苑》第7號(1973年),16—25頁。但他沒有詳論這三個漢字。按陳垣《敦煌劫餘錄》第七帙(北京,1931年),葉323背,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上輯(商務印書館,1937年),葉4背都把"常宗德"看作一個人名。

㉟ Kumamoto 1986,p.232.

㊱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08頁。兩條題記有編者注:"此題記可能是宋初于闐太子補寫"。

㊲ 張、榮1983,168—171頁。

㊳ 《敦煌研究》第3期(1985年),73頁。

㊴ 蔣斧《沙州文錄》錄有部分文字。池田溫先生推測此辛卯年爲931年,見《講座敦煌》第3卷《敦煌の社會》,大東出版社,1980年,339頁,注㊳。參看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四),《東方學報》(京都)第13冊第2分(1943年)73頁。

㊵ 高田時雄:《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匯》,《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1988年,83頁也不接受"德從子從德"的讀法。

㊶ 張、榮1983,167,171頁。

㊷ 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London 1967), pp.34—35.

㊸ 《舊唐書》卷198《西戎傳》于闐條。

㊹ 《舊唐書》卷144本傳略同。

㊺ KT II,pp.125—129; H. W. Bailey, "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 AM, XI.1 (1964),pp.17—20.

㊻ Kumamoto 1986, p.232, p.242, n.7.

㊼ KBT, pp.11—39; KT V, p. 327. 關於最後一種，詳見 R. E. Emmerick, "A Khotanese fragment: P5536bis", Monumentum H. S. Nyberg, I (Acta Iranica 4), Leiden 1975, pp.223—236. 對這批寫本的綜合研究，見 H. W. Bailey, "Sudhana and the Kinnarī", Bhāratīya Vidyā, XX—XXI (Bombay 1963), pp. 192—195; idem, "The Sudhana Poem of Ṛddhiprabhāva", BSOAS, XXIX. 3 (1966), pp. 506—532.

㊽ KT III, pp.34—36, 45—48;M. J. Dresden, "A Lyrical Poem in Khotanese", 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80. Geburtstag gewidmet (Berlin 1977), pp.81-103. Cf. H. W. Bailey, "Lyrical Poems of the Sakas", Dr. Unvala Memorial Volume (Bombay 1964),pp.1—5.

㊾ Ch00266 見 Enoki 1962, p.247. 伯希和編號寫本，見張、榮 1987, 111—112、117、105、97 頁。

㊿ 陳垣:《敦煌劫餘錄》第七帙，葉 323 背。

51 分別見 KT III,pp.94—96; KBT, pp.11—12; KT III, p.36.

52 張、榮 1987, 111頁; 圖見黃永武《敦煌寶藏》第 125 册, 100 頁。

53 張、榮 1982, 185—186 頁; Zhang-Rong 1984,pp.29—30.

54 KBT,p.53.

55 KBT,pp.62—66.

56 H. W. Bailey, "The Profession of Prince Tcūṃ-ttehi", 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 Norman Brown, ed. by E. Bender (New Haven 1962), pp. 18—22; idem,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1982),p.68.

57 L. Lancaster, "A Study of a Khotanese Prajñāpāramitā Text: After the work of Sir Harold Bailey",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 Studies in Honour of Edward Conze, ed. by L. Lancaster (Berkeley 1977), pp. 163—183.

58 R. E. Emmerick, The Sūtra of Golden Light (London 19

70),p.xi.

⑲ KBT, pp. 11—39; KT III, p.118; KT V, p. 327; Kumamoto 1986, p.242, n.6.

⑳ KT III. pp.34—41, 42—48.

㉑ 《籍帳》610頁。該《曆》中還記有"于闐使押衙張良眞",是歸義軍派往于闐的使者,故不錄。參看盧向前 《關於歸義軍時期一份布紙破用曆的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三,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年, 460—463頁。

㉒ Jao Jsong-yi, Air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71, P.237;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1987年,463頁。

㉓ 榮新江《沙州歸義軍歷任節度使稱號研究》, 《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 1990年,787—790頁。

㉔ 參看《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I, 東京東洋文庫,1964年, 127頁。其中關於駝官鄧留通的比定不足取。

㉕參看伯希和、羽田亨編《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 上海,1926年, 9—14頁。

㉖ 《籍帳》649頁。

㉗ 張、榮 1987,124頁。

㉘ 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4年,315頁錄第一條。

㉙ 《籍帳》617—644頁。

㉚ Cf.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III (Paris 1983), pp.184—185.

㉛ 參看饒宗頤《敦煌白畫》第二卷, 巴黎,1978年,44—45頁; 張、榮 1987,98頁。

㉜ 藤枝晃上引文,82頁。

㉝ Eliasberg 1979, pp.30—33,39.

㉞㉟ Ibid., p.32.

㊱ 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編 《敦煌資料》 第一輯, 中華書局,1961年,207頁。

⑰ 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編《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 1961 年，312—313頁。

⑱ Eliasberg 1979, p. 32.

⑲ 陳祚龍《古代敦煌及其他地區流行之公私印章圖記文字錄》，《敦煌學要篇》，臺北，1982 年，330 頁；施萍亭《本所藏〈酒帳〉研究》，《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 年)，146 頁。

⑳ 施萍亭上引文，146—150 頁。

㉑ 《籍帳》615—616 頁。

㉒ Eliasberg 1979, p.34.

㉓ 藤枝晃《敦煌曆日譜》，《東方學報》(京都)第 45 冊(1973 年)，427 頁。

㉔ 土肥義和《歸義軍時代》，《講座敦煌》第二卷《敦煌の歷史》，大東出版社，1980 年，244 頁。

㉕ 圖見 H. W. Bailey (ed.), Saka Documents, III (London 1963), pl.xlix. 錄文見 Enoki 1962, pp. 261—262; 金子1974，48 頁；金岡照光《敦煌本讚偈類數則》，《東方宗教》第 46 號(1975 年)，7 頁。

㉖ E. G. Pulle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AM, IV.1(1954),p.94; 金子1974，112 頁。

㉗ 圖見土肥義和上引文，240 頁。

㉘ 同注㉓。

㉙ 龍谷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會編《龍谷大學所藏敦煌古經現存目錄》，《西域文化研究》第一，京都，1958 年，240 頁。

㉚ Hamilton 1986, pp. 93—94.

㉛ L. Bazin, Les Calendriers turcs anciens et médiévaux (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1974), pp.303—305.

㉜ Hamilton 1986, p.95.

㉝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獻》，《講座敦煌》第六卷《敦煌胡語文獻》，大東出版社，1985 年，23 頁。

㉞ Hamilton 1986, pp.103—104.

㉟ Bazin, op. cit., pp.298—302.

㊱ Hamilton 1986, pp.103,105;森安孝夫上引文 19 頁。

⑰ G. Uray,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E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á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JA, CCLXIX (1981), pp.81—90; idem,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ed. by H. Uebach and J. L. Panglung, Munchen 1988, pp. 520—521.

⑱ Cf. E. G. Pulleyblank, op. cit., pp.90—97.

⑲ 森安孝夫《イスラム化以前の中央アジア史研究の現狀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89編第10號(1980年),66頁。

⑳ 武内紹人《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說》,山口瑞鳳編《チベットの佛教と社會》,春秋社,1986年,588—592頁。

(101) Cf. Hamilton 1979, pp,50—52;張、榮1982,192—202頁; Zhang-Rong 1984, pp.36—45.

(102) 按:這裏的"同慶六年"是詩人父親的生年,見 Kumamoto 1986, p.242, n.7; Cf. H. W. Bailey, "Iranian miṣṣa, Indian bīja",BSOAS, XVIII.1(1956),pp.33—34.我們曾誤作文書的年代(張、榮1982, 184頁; Zhang-Rong 1984, p.28.)。該文書應完成於同慶六年以後。

(103) Cf. Hamilton 1979, pp. 53—54; R. E. 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79), p.19.

(104) Cf. H. W. Bailey, "An Itinerary in Khotanese Saka", Acta Orientalia, XIV.4 (1936), p.258.

(105) 熊本裕認爲天壽始於987年(H. Kumamoto, Khotanese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Tenth Century A.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issertation 1982), p.59; Kumamoto 1986, p.235)。但這只是從動物紀年一點推斷的,不足以說服人。天壽年號的最終考訂有賴於新史料的發現,特別是我們還無法讀到蘇聯列寧格勒藏 Dx1400 (M1629)和 Dx2148 (M 2920)兩件天壽二年漢文文書的原貌,無法從內容上加以判斷。所以此處仍用我們的考證結果斷代。

(106) KT III, pp.58, 62. Cf. H. W. Bailey, "A Metrical Summary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in Gostana-deśa", Bulletin of

Tibetology, II.2 (1965), pp.5—7; idem,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the Summary in Khotan Saka, Canberra 1970.

⑩⑦ 金子良太:《Pelliot 2782 文書所見の Ḍyau Tceyi-śīṅä》,《豐山學報》第 22 號(1977 年),128—125 頁; KT VII, p. 13.

⑩⑧ KT III, pp.62—63.

⑩⑨ KT II, pp.5—6.

⑪⓪ KT III, p.55.

⑪① KT I,pp.198—219; Cf.H. W. Bailey, "The Colophon of the Jātaka-stava",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 XI. 1 (1944), pp.10—12; M. J. Dresden, The Jātaka-stava or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XLV. 5, Philadelphia 1955), pp.397—508, esp pp. 445—446.

⑪② KBT, pp.149—156;參看金子 1974,114—113 頁; H. W. Bailey, "Vajrayāna in Gostana-deśa",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1 (1978), pp. 53—56.

⑪③ KT I, p.104.

⑪④ 張、榮 1982, 181—184 頁; Zhang-Rong 1984, pp.25—29.

⑪⑤ Hamilton 1984, p. 50. 熊本認爲 P2790 描述的情況很可能是九世紀的最後十年 (Kumamoto 1986, p.229),似有未諦。

⑪⑥ J. Hamilton,"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oung Pao, XLVI (1958), p.151.

⑪⑦ Hamilton 1977, pp.364—369.

⑪⑧ 張、榮 1982,182 頁; Zhang-Rong 1984, pp.26—27.

⑪⑨ Hamilton 1984,pp. 52—53.

⑫⓪ Kumamoto 1986, pp. 240—241, n. 1.

⑫① Hamilton 1977, p.366, n. 32; Hamilton 1984, p.50.

⑫② H. Kumamoto, Khotanese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Tenth Century A. D., pp. 59—60, n. 16;pp.150,206—207,235,237,238,243,249.

⑫③⑫④⑫⑤⑫⑥ 同注⑥③。

⑫ Cf. R. E. Emmerick, "Cā tteya khī in the Musée Guimet", Studia Iranica, XIII.2 (1984), pp.251—252. 此文爲這一比定提供了新的佐證。

⑫ 按 P3322《卜筮書》末題: "庚辰年正月十七日學生張大慶書記之也。"李正宇考證爲 860 年(見上引文,《敦煌學輯刊》1987 年第 1 期, 34 頁), 時張大慶還是學生,據此推測十世紀初他仍健在是沒有什麽問題的。

⑫ 《籍帳》610 頁。

⑬ 參看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敦煌書遺論文集》, 中華書局, 1984 年, 86—99 頁。

縮寫語:

AM=Asia Major, new series

BSOA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CETH I, III=Contributions aus études sur Touen-houang(I), Genève 1979; III, paris 1984

Eliasberg 1979=D. Eliasberg, "Les signatures en forme d'oiseau dans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CETH I, pp.29—44, pls.x-xvii

Enoki 1962=K. Enoki, "Chinese Manuscript Fragments",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by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Oxford 1962, pp. 244-269

Hamilton 1977=J. Hamilton, "Le Pays des Tchong-yun, čungul ou Cumuḍa au X[e] siécle", JA, CCLXV (1977), pp. 351—379

Hamilton 1979=J. Hamilton, "Les Régnes khotanais entre 851 et 1001", CETH I, pp.49—54

Hamilton 1984=J. Hamilton, "Sur la chronologie au IX[e]-X[e] siècle", CETH III, pp.47—53

Hamilton 1986=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I, Paris 1986

JA＝Journal Asiatique

《籍帳》＝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 年。

金子 1974＝金子良太《敦煌出土張金山關係文書》，《豐山學報》第 19 號（1974 年），109－118 頁。

KBT＝H. W. Bailey,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London 1951

KT I-III, V, VII＝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I-III, V, VII, Cambridge 1969,1980,1985

Kumamoto 1986＝H. Kumamoto, "Some Problems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ed. by R. Schmitt and P.O.Skjaervø, München 1986, pp.227—244.

張、榮 1982＝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82 年，179－209 頁。

張、榮 1983＝張廣達、榮新江《敦煌文書 P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163－175 頁。

Zhang-Rong 1984＝Zhang Guangda et Rong Xinjiang, "Les Noms du Royaume de Khotan",CETH III, pp.23—46

張、榮 1987＝張廣達、榮新江《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4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90－127 頁。

《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

一

敦煌出土的文書中有許多珍貴的于闐史料。這些有關于闐的史料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于闐語寫的各種文書。在整理和研究于闐語文書方面，貝利（H. W. Bailey）做了奠基的工作。德萊斯頓（W. J. Dresden）編有《于闐塞語寫本草目》①，我們以這份目錄的部分內容爲基礎，編纂了《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刊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另一部分是敦煌漢、藏文寫本中有關于闐的記載，我們也做了登錄，將以錄文（或轉寫）附校注的形式發表。對於于闐史的研究來說，更重要的是和田本地出土的于闐文、漢文和藏文文書，目前，我們正做搜集工作。沙畹（Ed. Chavannes）、馬伯樂（H. Maspero）等已刊布的這種漢文文書有五十餘件，我們現在重新予以校錄，並參考本地出土的于闐文、藏文文書做一些注釋。本文只就其中最重要的文書之一——《唐大曆三年（768）毗沙都督府六城質邏典成銑牒》談幾點粗淺的意見。

二

這件文書編號 M9,，出土地點不明，是馬繼業（Ceorge Macartney）從和田的一名商人巴德魯丁（Badruddin）手中得到的。霍恩雷（A. F. Rudolf Hoernle）獲得包括這件文書在內的十件漢文文書以後，根據文書中出現的“傑謝”一名，推測它們來自和田東

北沙漠中的丹丹烏里克遺址②。後來，斯坦因挖掘了這個遺址，證實了霍恩雷的看法③。沙畹根據霍恩雷提供的圖版，把這件文書和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發現的其他文書放在一起，做了錄文、注釋和翻譯④。沙畹的錄文爲研究于闐的歷史提供了一份基本史料。1984年，森安孝夫在池田溫教授的協助下，重新迻錄並做了訂正和探討⑤。我們在上述學者們的勞績的基礎上，結合于闐文、藏文材料，僅就本文書提出的問題，做幾點史實注釋。

三

本文書稍有殘缺，但文意尚完整。下面根據圖版，參考沙畹、森安兩氏的錄文，按原文書的格式迻錄如下：

1　□□　傑謝百姓并□□
2　　　傑謝百姓狀訴雜差科等
3　右被鎮守軍牒稱：得傑謝百姓胡書，翻稱．"上件百
4　姓□□深憂養，蒼生頻年被賊損，莫知爲
5　計。近日蒙差使移到六城。去載所着差科，并納
6　足。□□慈流，今年有小小差科，放至秋熟，依限輸
7　納。緣人糧并在傑謝，未敢就取，伏望商量者。"
8　使判："一切并放者。"其人糧，狀稱并〔在〕傑謝，未有處
9　分。□傑謝百姓胡書狀訴雜差科，准使判，牒所
10　由放。其人糧并在傑謝，欲往使人就取糧，未敢
11　□擅，執案諮取處分訖。各牒所由者。使又
12　判："任自般運者。"故牒。
13　　　　大曆三年三月廿三日典成銑牒
14　六城質邏刺史阿摩支尉遲信(?)

四

本文書中出現的地名傑謝、質邏、六城，是于闐歷史上的重要城鎮。傑謝一名，馬繼業、霍普金斯（L. C. Hopkins）和沙畹都作

"梨謝" (Li-hsieh)。後者已說可能是"傑謝",但認爲只有從其他漢文文書找到這個地名時,方能最後決定⑥。托瑪斯 (F. W. Thomas) 據"梨謝"的讀法,和藏文的 Ling-sked- chad 聯系起來⑦。實際上,"梨"字不過是"傑"字的異體, 藤田豐八、岑仲勉和森安孝夫均已指出⑧。因此,傑謝與藏文 Ling-sked-chad 沒有關係。傑謝一名另見於 M9(b)(=Hoernle MS 2) «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知鎮官楊晉卿帖»第 1 行,該處傑謝稱"傑謝鎮"⑨。又見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發現的 D. V. 6(=S5864)«大曆十六年 (781) 二月傑謝百姓思略牒»第 5 行,該處稱"六城傑謝"⑩。另外,M9c (=Hoernle MS 3)«建中七年(786)七月二十日蘇門悌舉錢契»後, 有"建中七年十月五日傑謝薩波斯略"云云⑪。上面已經談到,霍恩雷和斯坦因都認爲傑謝就是丹丹烏里克, 這一看法已爲一些學者所接受。至於傑謝的原語,現在還沒有肯定的答案。與上述 D. V. 6 «傑謝百姓思略牒» 同出於一座房屋遺址的 D. V. 4 號于闐語文書, 是 «Spāta Tturgäśi (薩波突騎施?)致 Spāta Siḍaki 書»⑫, 其中的收信人 Spāta Siḍaki 又見於 Hoernle 2 號于闐語文書第 1 行: Gayseta Spāta Siḍaka⑬,意爲"Gayseta 的 Spāta Sīḍaki"。Spāta 卽薩波⑭,"傑謝薩波斯(思)略"或許就是 Gayseta Spāta Sīḍaki 的漢文音譯, 傑謝(«切韻»音 gi̯at zi̯a)相當於 Gayseta, 斯略卽 Sīḍaki,這種看法還有待於證明。

六城,于闐文作 Kṣvā auvā⑮。沙畹以爲六城是用來指于闐的一種名稱⑯。夏倫 (G. Haloun) 已辨其誤, 並認爲六城是毗沙都督府下的十州之一, 地點在于闐東北的策勒、固拉合瑪、達瑪溝綠洲地區⑰。其中,達瑪溝又作 Domoko 或 Dumaqu,,在杜特義·德·蘭斯 (J. L. Dutreuil de Rhins) 和費·格瑞納爾 (F. Grenard)的書中作 Doumakou⑱。于闐語文書Hedin 3 背第 1—2 行有 Kṣvā auvā Spāta u Tsiṣī"六城薩波與刺史"的表述法⑲,

爲夏倫關於六城爲十州之一的論斷提供了一條佐證。關於六城的地理位置,夏倫的推測大致不誤。森安孝夫沒有指出質邏的方位,但懷疑六城位於丹丹烏里克[20]。後一看法顯然難以成立。根據本文書和斯坦因、斯文赫定收集的其他漢文、于闐文文書,質邏、潘野、媲摩以及傑謝等城鎮都是六城的下屬。其中,質邏應卽于闐文的 Cira、藏文的 ji-la[21],也就是今天作爲縣名的"策勒"(Chira)。潘野見 Hedin 16 號漢文于闐文雙語文書,于闐文作 phaṃña[22],藏文作 pho-nya 或 pha-nya[23]。媲摩于闐文作 phema, 也卽坎城,藏文作 Kam-sheng[24],斯坦因考訂其地當在今烏曾塔提(Uzun-Tati)[25]。傑謝(Gayseta?)極可能是在丹丹烏里克。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藏文史籍《于闐國授記》(Li-yul Lung-bstan-pa)的有關記載。該書最後分三個區域統計于闐境內佛寺僧伽數目時,對于闐東北地區的記錄如下:"自 Ji-la 至 Kam-sheng,pho-nya, Be-rga-'dra 和 O-rgu,城堡內外,計大寺二十三,中寺二十一,小寺二十三,私家所供蘭若及小塔八百三十九,二部衆(saṃgha)、寺戶及居士,計四百三十八人。"[26]

這裏的 Ji-la, Kam-Sheng 已如上述,餘下的 Ba-rga-'dra 和 O-rgu 分別相當於于闐文的 Birgaṃdara 和 Āskvīra或Ustāka[27],這兩個地名也和 Cira, phema, phaṃña 等一樣,經常出現在達瑪溝一帶遺址出土的文書中。如從阿什瑪(Achma)得到的一件六城收稅文書,納稅者分屬 phamña, Birgaṃdara 和 Āskūra 三地[28]。綜合于闐、漢、藏文史料,我們似乎可以排出六城的具體名稱:

(1) Cira 質邏 Ji-la

(2) phema 媲摩=坎城 Kam-sheng

(3) phaṃña 潘野 pho-nya

(4) Birgaṃdara Be-rga-'dra

(5) Āskvīra O-rgu

(6) Gayseta(?)傑謝

由此可見，六城的範圍大致應在今策勒縣以東 24.6 公里處的達瑪溝鄉，位於 80°55′—— 81°15′ 和 37°00′—— 37°20′ 之間，東有達瑪溝雅兒，西有帕納克雅爾灌溉，南以馬拉阿拉干，北以烏曾塔提爲界，也卽考古上稱之爲老達瑪溝 (Old Domoko) 及其以西的綠洲，許多著名的唐代遺址，如 Balawaste, Khadalik, Mazar-Toghrak 等都分布在這一帶[29]。這一帶古遺址星羅棋布，表明六城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城鎭聚落組成的。至於位於其北部偏西的傑謝，孤懸於北方的沙漠邊緣，作爲六城地區的前硝，在軍政編制上，應屬六城州管轄，本文書是最好的證明。

五

以下按文字順序，就其中出現的幾個專有名詞，做一些歷史評注。

行 1. 帖　唐人避太宗諱，將“牒”字寫作“帖”。本文書和和田出土的其他漢文文書均作“帖”，而且，牒文本身也完全按照唐朝的《公式令》中規定的《帖式》寫成[30]。這表明唐朝安西四鎭屬下的羈縻州所遵從的公文程式，與內地無異。

行 1. 百姓　在唐代文獻中，百姓一詞是指區別於賤人的良人。這個專有名詞被借入于闐文，作 pa' kisina，見 Hedin 3 背第 2 行、Hedin 21 第 1 行、Or. 11252. 15 第 2 行、Or. 11252. 12 第 2 行[31]，意思與漢文同。

行 2. 差科　沙畹作“差秫”，誤，但譯文仍可通。森安孝夫錄文已改正，譯作“年貢”(一意爲地租)。按《唐律疏議》卷十三載：“依《賦役令》：‘每丁，租二石；調絁、絹二丈，綿三兩，布輸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此是每年以法賦斂，皆行公文，依數輸

納；若臨時别差科者，自依臨時處分。”[32] 據此，差科是官府臨時設的徭役，隨着差科制的發展，後來有以租代役的現象[33]，本文書應當就屬於這種情况，但將這種臨時設置的徭役或租税譯作每年按時交納的“年貢”(地租)，似有未妥。

行 3．鎮守軍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龜兹》載：“則天臨朝，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獲龜兹、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兹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以鎮之。即徵發内地精兵，遠逾沙磧，並資遣衣糧等，甚爲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請棄之，則天竟不許。”[34] 武則天這種徵發内地精兵鎮守四鎮的措施，對穩固唐朝在西域的統治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唐玄宗以後，仍然採用這種方式來控制西域。以于闐爲例，敦煌寫本 P 2005《沙州圖經》卷三“張芝墨池”條記：“去開元二年九月，正議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事行沙州刺史兼豆盧軍使上柱國杜楚臣赴任，尋坟典，文武俱明，訪睹此池，未獲安厝。乃勸諸張族一十八代孫，上柱國張仁會……游擊將軍守右玉鈐衛西州蒲昌府折沖都尉攝本衛中郎將充于闐鎵守使敦煌郡開國公張懷福……等，令修葺墨池，中立廟及張芝容。”[35] 菊池英夫指出，這裏的“于闐鎵守使”應是“于闐鎮守使”[36]，其説不誤。從這條材料得知，沙州籍的西州府兵，被派到于闐鎮守。慧超於開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走訪五天竺歸來，也記載了這支鎮軍：“又安西南去于闐二千里，亦是漢軍馬領押，……從此已東，並是大唐境界，諸人共知，不言而悉。”[37] 可見，于闐在開元中葉仍是由漢軍馬領押的。楊炎撰《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稱，天寶中，楊和“自武衛將軍四鎮經略副使，加雲麾將軍兼于闐軍大使。其他兵甲之富，寶玉之林，公鎮以清静，同其習俗，如鼓簧琴，政用大康。又遷金吾大將軍、四鎮節度副使。……以十四載五月，薨於鎮西官舍，春秋若干。”[38] 碑文中的于闐軍，應即于闐鎮守軍，于闐軍大使即于闐軍鎮守使。直到貞

元初年，也卽于闐陷蕃的前夜，行經西域的悟空還記載，這裏有漢人鎭守使鄭據[39]。可見從武則天長壽元年(692)到貞元初(785—787)，從諸州調來的漢軍馬，一直鎭守在于闐。本文書中的鎭守軍，應指六城一帶的漢族鎭守軍。

行 8、9、11．使　從文意看，這裏的“使”顯然是指管轄于闐地區的唐朝最高軍政長官。乍看起來，他可能是鎭守使[40]。但是，從現存的史料來看，于闐地區最高的軍政首腦並不是鎭守使，而是節度副使。上文“鎭守軍”條注引楊炎《楊公神道碑》稱楊和以雲麾將軍兼于闐軍大使(卽鎭守使)，又遷四鎭節度副使。遷官之際，碑文沒有說他曾移駐他處。又《資治通鑒》卷二二一載：“上元元年春正月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鎭節度副使，權知國事。”[41] 可知尉遲曜也曾一度任“同四鎭節度副使”。因此，可以比較肯定地說，四鎭節度副使駐扎在于闐，或任以漢人，或由于闐王兼職，是于闐地區最高的軍政長官。這一點也可以從出土文書中得到驗證。Hedin 24《某年閏四月四日典史環僕牒》[42] 和 M. Tagh c.iii(＝Or.8211.974)《建中七年(786)十一月十九日節度副使榜牒》[43]，分別出土於于闐東部的六城地區和北部的神山堡 (Mazar Tagh)，判牒均由節度副使發布。因此，本文書應是六城質邏刺史根據節度副使判案的文牒，簽署下發給傑謝百姓並告鎭守軍的牒文。“使”似指節度副使，而不是鎭守使。

行 9—10、11．所由　《資治通鑒》卷二四四穆宗長慶二年條胡三省注：“所由，綰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44] 又同書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條胡注：“所由，謂催督租稅之吏卒。”[45] 可見，所由是官府衙門中的小吏，所掌職事不一[46]。本文書中的所由，應是“催督租稅之吏卒。”

行 13、典　《唐六典》卷二載：“凡別敕差使，事務繁劇要重者給判官二人，每判官並使及副使各給典二人。非繁劇者，判官一

人，典二人，使及副使各給典一人。”[47] 典雖然是不具品階的流外胥吏，但從敦煌、吐魯番文書來看，典是掌管文案的重要人員。于闐文中有一個表示“屬下、部下”的官稱 dīna，常與人名連稱，如Hedin 3 第 17 行 Vageve dina,Hedin 10 第 3 行 Spāta Vīsa dīna,Hedin 57 第 1 行 Vagivi dīna 和 Hedin 16 第 26 行 pharṣa Sudarana dīna Vidarjū[48]，其中最後一件是漢文于闐文雙語文書，dīna 的漢文對應詞是“下”。但是，不論是轉譯于闐文部分的貝利，還是注錄漢文部分的夏倫，都認爲這裏的“下”字不可解[49]。我們懷疑這個 dīna 是漢文“典”(*tian/tien:/ tien) 的音譯[50]。在 Hedin 16 中，它的漢文對應詞寫作“下”，這或許因爲原文是“典”的同音字“了”，形近而訛作“下”；也有可能是因爲 dīna 的于闐文詞根 dī 原有“下面”的意思[51]，于是，于闐書手薩波深莫 (śem' maki) 就用“下”來表示意爲“屬下”的“典”了。從 dīna 在文書中的位置和它所扮演的角色來看，似是唐朝軍政體制中的典。

行 14. 刺史　　唐朝每州置刺史一人，爲州之長官，其職掌詳見《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52]，這裏一般指的是大唐直屬的州的情況。至於象于闐這樣的羈縻州，《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羈縻州條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於《令》、《式》。”[53] 是羈縻州也置刺史，與本文書合。“刺史”一名也被直接借入于闐文，作 tsīṣi 或 tciṣi[54]。

行 14. 阿摩支　　漢文“阿摩支”應當是于闐文 āmāca 的音譯，而于闐文 āmāca 又是來源於佛教梵語的 āmātya-或 amātya-。āmātya 的原意是國王的顧問、親信的意思[55]。在于闐，阿摩支一詞應是一種榮譽稱號，而不是職事官名。除本文書外，“刺史阿摩支”一詞又見於 Balaw.0160(=Or.8212.702)第 2 行[56]，與

之相對應的于闐文 tciṣi āmāca, 見 M. Tagh c. 0018 第2行[57]。又 Hoernle 6 第1行, Hedin 2 第1行有 hiyaudä āmācä ṣṣau 的說法。[58] 此外, āmāca 一詞還單獨出現在 Hedin 18, 48, 69 等號文書中[59]。最後,《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冊二載:"(開元)十六年正月, 封于闐阿摩支知王事右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尉遲伏師爲于闐王。"[60] 以上材料中的阿摩支都可以作爲一種榮譽稱號而不是實際官職來理解。āmāca 一詞還以藏文 a-ma-ca, a-ma-cha 的形式, 出現在吐蕃統治時期的文書中[61]。

行 14. 尉遲信(?)　尉遲, 于闐文作 Viśa', 是于闐王族的姓[62]。最後一字是署名, 字形似"信", 但筆順不對, 沙畹表示懷疑[63], 但井之口泰淳、森安孝夫仍錄作"信"[64]。我們暫錄作"信", 但仍存疑。據上引《新唐書·地理志》羈縻州條,"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 皆得世襲。"這裏的六城質邏刺史, 顯然是由王族尉遲氏世襲擔任的, 這從 Baw. 0160《大曆七年(772)納布條記》第2行"刺史阿摩支尉遲□□"的題名中也可以看出[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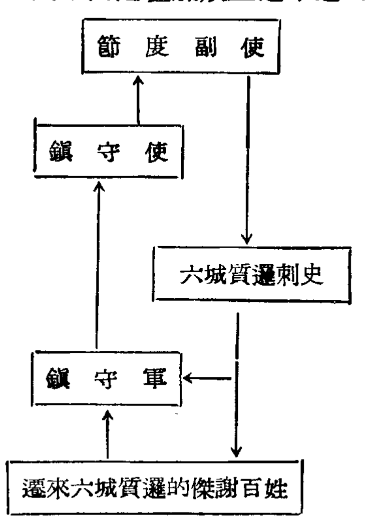
六

這件文書成於大曆三年(768), 時在尉遲曜代其兄尉遲勝爲王的時期。看來, 自武則天長壽元年(692)以後, 唐軍一直鎮守在于闐, 而且, 安史之亂以後, 盡管尉遲勝率兵五千赴難中原[66], 仍有部分唐軍馬鎮守在那裏。

從刺史 (tsīsi), 百姓 (pa'kisina) 等詞滙及其于闐文的借詞形式, 和本文書的公文程式、用語, 都可以看出唐朝軍政體制對于闐的深刻影響。同時, 節度副使的存在和尉遲氏的職任, 表明當地存在着一種胡漢結合的軍政體制。從本文書來看, 移到六城的傑謝百姓, 在申請緩納本年差科和使人往傑謝取糧兩件事時, 由於身屬軍事性質較強的傑謝鎮, 所以首先把用于闐文寫的狀遞交給當

地的鎮守軍。鎮守軍譯成漢文，送交上司于闐鎮守使；又因爲差科屬於民政，所以，鎮守使上報節度副使，由節度副使判給六城質邏刺史。六城質邏的典成銑草成此牒，由刺史簽署，將節度副使的判案結果，牒下傑謝百姓，告知今年差科可放至秋熟時再納。同時牒報鎮守軍，因爲傑謝一帶常常有"賊"出沒，百姓取糧，恐怕得由鎮守軍派兵護衛，方能完成。

歸納起來，可以圖示出這種牒狀上通下達的情況如下圖：



這件牒文所反映的于闐胡漢結合的軍政體制，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深入探討這一問題，對於理解唐朝羈縻州的性質，以及安西四鎮的內部結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

① M. J. Dresden, "Khotanese (Saka) Manuscripts: a Provisional Handlist", Acta Iranica 12(1977), pp.72—77.

② Hoernle 1901, pp.22—24, pl. Ⅲ.

③ Stein 1907, pp.266—268.

④ Chavannes 1907,pp.521—524.

⑤ 森安 1984，52—56 頁，圖版二。

⑥ Hoernle 1901, p.22; Chavannes 1907, p.521, n.1.

⑦ TLTD II, pp. 239, 246—247, 249.

⑧ 藤田豐八《東西交涉史研究》，東京，1933 年，270—271 頁；岑仲勉《唐史餘瀋》，上海，1979 年，259 頁；森安 1984，52 頁，75—76 頁，注(236)。

⑨ Hoernle 1901, p.24; Chavannes 1907, p.524.

⑩ Stein 1907, pl. CXV; Chavannes 1907, p.526.

⑪ Hoernle 1901, pp.24—25, pl. IV; Chavannes 1907, p. 525 沒有錄出"薩波斯略"四字。

⑫ KT V, p.259; SDTV; pp.40—41,42.

⑬ KT II, p.65.

⑭ KT IV, p.55.

⑮ KT IV, p.72

⑯ Chavannes 1907, p.522, n.5.

⑰ KT IV, pp.176—177,n.1

⑱ J.L.Dutreuil de Rhins et F. Grenard,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Paris 1897—1898, iii, p.45.

⑲ KT IV, p.23.

⑳ 森安 1984，54 頁，76 頁，注(245)。

㉑ 夏倫將質邏比定爲藏文的 Ji-la(KT IV, pp.176—177, n.1); 貝利和恩默瑞克,(R. E. Emmerick)都將 Ji-la 比定爲于闐文的 Cira (KT IV, pp.104—105; TTK, p. 96)。所以，質邏即 Cira 的音譯。貝利却又將 cira 一名和麻扎塔格出土漢文文書 M.Tagh b.003 中的"薛刺"聯繫起來(KT IV,p.105)。顯然是不可取的。

㉒ KT IV, pp.30, 173, 178.

㉓ SDTV, p.8; TTK,p.99.

㉔ 見Hedin 24 漢文于闐文雙語文書，載KT IV, pp. 37, 135, 137. Cf. TTK,p.93; 張廣達、榮新江《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敦

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1—112頁。

㉕ Stein 1907, pp. 452—464.

㉖ TTK, pp.72—75.

㉗ KT IV, pp.74,76,87,105; SDTV, pp.12, 39, 43,76; TTK, pp. 101, 17.

㉘ KT II, p.62; Cf.SDTV, pp.121—122.

㉙ 關於老達瑪溝一帶的遺址，Cf.G.Gropp, Archa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remen 1974. p.17,Abb. 2, pp. 23—25.

㉚ 參看敦煌發現的《唐公式令·條式》(P2819)，載 T.Yamamoto, O.Ikeda and M.Okano(co—ed.),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 (A), Tokyo 1980, p.29; (B),Tokyo 1978,pp.56—57.

㉛ KT IV,pp.23,24,72; KT II,pp.20,21.

㉜ 《唐律疏議》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52頁。

㉝ 關於差科和敦煌出土差科簿的詳細研究，參看西村元佑《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京都，1968年，467—706頁；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1979年，98—115頁。

㉞ 《舊唐書》卷一九八，中華書局，1975年，5304頁。參看 Chavannes 1903, p.119.

㉟ 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75年，75—76頁。

㊱ 菊池英夫《從西域出土文書看唐玄宗時代府兵制的運用(上)》，《東洋學報》第52卷第3號，1969年，37—38頁，注(10)。

㊲ 伯希和、羽田亨編《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冊，京都，1926年；羽田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逐錄》，《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京都，1957年，626—627頁。

㊳ 《文苑英華》卷九一七，中華書局，1966年，4829頁。

㊴ 《悟空入竺記》，《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一，980頁C欄。Cf.S.Lévi et Ed. Chavannes, "L'itinéraire d'Ou-k'ong (751—790)", Journal

Asiatique, VI(1895),pp.362—363.

㊵ 參看森安1984，53頁。

㊶ 胡三省注:"于闐王與四鎮節度使皆在行營，故令其弟與節度副使同權國事"(《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76年，7090頁)。這裏的"同"是職同正員的"同"，胡注似誤。參看Chavannes 1903, p.127.

㊷ H.W.Bailey, Saka Documents I, pl. VII; KT IV, p. 136. 關於本文書的年代和出土地點等問題，詳見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日本《東洋學報》第69卷1、2期，1988年，59—86頁。

㊸ Ed.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p.217, pl.XXXVI.

㊹ 《資治通鑒》7815頁。

㊺ 同上書8169頁。

㊻ 參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上海，1981年，30—33頁。

㊼ 《大唐六典》，千葉縣廣池學園，1973年，卷二，37頁。

㊽ KT IV, pp.22,27,47,31.

㊾ KT IV p.71, p. 177, n.5.

㊿ Cf.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9 (1957), no.476a.

(51) H. W.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1979, p.153, s.v.di.

(52) 《舊唐書》1919—1920頁。Cf.R.des Rotours, Traite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l' armée, Leyde 1948, p.721.

(53) 《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1119頁。

(54) KT IV, p.54.

(55) KT IV, p.62.

(56) H.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 186, pl.

XXXVII. 馬伯樂錄作"史口釋支"。

57 KT II, p.72; Cf.KT IV, p.54.

58 KT II, p.66; KT IV, p.21.

59 KT IV,pp.32,45,49.

60 《册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11344頁。Cf,Chavannes 1903, p.207.

61 A. H. Francke, "Konigsnamen von Khotan (a—ma—ca) auf Tibetischen Documenten der Turkistan—sammlung von London und Berlin", SPAW, Phil. hist.klasse, 1928, XXXI. pp.671—676; TLTD II, pp. 191—194.

62 H.W.Bailey,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1982, p.26.

63 Chavannes 1907, p.524, n.13.

64 井之口泰淳《于闐語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系譜和年代》,《龍谷大學論集》第364册,1960年,34頁,42頁,注(2); 森安1984, 54頁,76頁,注(242)。

65 見上注(56)

66 《舊唐書》卷一四四《尉遲勝傳》,3924頁。

縮略詞表:

Chavannes 1903=Ed.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pétersbourg 1903.

Chavannes 1907=Ed. Chavannes, "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Uiliq, Niya and Endere", in Stein 1907, pp. 521—547.

Hoernle 1901=A. F. R. Hoernle,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xx-1(1901), Extra-No.1.

KT II,IV, V=H.W.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s. II, IV, V,Cambridge 1969, 1979, 1980.

SDTV=H.W.Bailey,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London 1968.
Stein 1907=M.A.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2 Vols.
TLTD II=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London 1951.
TTK=R.E.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
森安 1984 =森安孝夫《吐蕃的中亞進出》,《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史學科篇》第4號, 1984年, 1—85頁, 圖版一、二。

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

前　言

十九世紀末，一些貝葉形梵文文獻首先在庫車和和田兩地出土。包括這種貝葉經在內的大批文物是被挖寶人在沙漠廢墟、洞窟或古城殘壁中找到的，經商人、傳教士和駐新疆、克什米爾和拉達克的西方外交官之手，轉到一些學者手中。例如，著名的佉盧文《法句經》(Dharmapada)寫本，即出土於和田的牛角山 (Kohmari) 某洞窟，被法國探察家杜特伊・德・蘭斯(Dutrèuil de Rhins) 和俄國駐喀什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所分別收購。這些文物引起了世人的震驚，尤其是在它們的學術價值被確認之後，一大批以收集古物爲目的的地理探險家、考古學者和東方學家爭先恐後，湧進我國新、甘、蒙、藏等地，攫取文書寫卷、絲織品、金石碑誌以及他們所能拿走的各種文物。其中爲中國人發現但在晚清腐敗政局下未被妥善保存的敦煌藏經洞的寶藏，精華部分也先後爲英、法、日、俄掠走，現分藏在這些國家的主要博物館和圖書館中。數十年來，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主的這批材料，解決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疑難問題，其中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書寫的一批經卷和文書，提供了研究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語言文化的十分豐富的材料，更具有獨特的科學價值。與此同時，人們又在吐魯番卷子中找到了梵文、中古波斯文、三種粟特文、回鶻文以及所謂吐火羅文的殘卷，在和田和敦煌等地出土的文獻中找到了一種當時稱之爲“不知名的

語言”、後來定名爲于闐塞語或于闐語書寫的各種殘卷。已經刊佈的于闐語寫卷至少在一千個號碼以上,① 其中分藏在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英國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英國圖書館的敦煌出土文獻,就有一百二十一卷。于闐語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東伊朗語支,文字是使用印度婆羅謎字母的一種中亞變體。由於這種語言自十一世紀以後就被回鶻語取代而不再流行,因此,在發現之初,無人能識,因而稱之爲“不知名的語言”。八十多年來,經西方學者霍恩雷 (A.F.R.Hoernle)、洛伊曼 (E.Leumann)、柯諾夫 (S.Konow)、貝利 (H.W.Bailey)及其弟子德萊斯頓 (M.J.Dresden)和恩默瑞克 (R.E.Emmerick)等人的持續努力,大部分材料已經用轉寫的形式刊佈,在中亞史地和佛教傳播特別是歷史語源學的研究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由於語言的隔閡,這批材料在我國還沒有被充分利用。②

在敦煌出土的各種語言書寫的材料中,已經刊佈的一百多卷于闐語寫卷,就數量和史料價值而言,大概是僅次於漢、藏文的材料。其中有譯自梵文的佛經,于闐人自已編輯加工的本生故事,弘法人的發願、禮懺文等宗教文獻,也有愛情詩、藥方和習字等世俗文書。後者之中史料價值最高的是地理行紀和使臣報告。當時,于闐朝廷經常向河西一帶派遣使臣或送王子、高僧等人員東來,有的足跡遠到中原王朝。這些使臣或僧人留下的行紀和報告抄本,爲我們研究九、十世紀模糊不清的河西以及塔里木盆地的歷史地理、民族分佈情況,有着無比重要的價值。然而,由於這些世俗文書不象佛經那樣有對應的梵、漢、藏文文獻可資幫助解讀,所以,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進展十分緩慢,文書的全譯目前尚無可能,就連文書的全部定名和編目工作也不完善。

早年,王重民先生在爲巴黎國立圖書館敦煌漢文寫卷編目時,常將漢文佛經背面的某些民族語文,包括于闐文文獻,標作梵

文。[3] 儘管這些材料早在五十年代之初即經貝利刊佈在《于闐語佛教文獻集》和《于闐語文書集》中，但是在 1962 年出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和二十年後此書的重版中，[4] 有關的標注都沒有做相應的更正。法國國立圖書館 1970 年刊佈的《敦煌漢文寫卷目錄》第一卷，正確地標明了于闐語寫卷，並給出貝利的刊本所在，但沒有像注錄漢文寫卷那樣，逐項加以注記。德萊斯頓在 1976 年發表了他編寫的《于闐(塞語)寫卷草目》，把已刊佈的于闐語文獻編了一個索引，爲人們檢索利用這批材料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過，這份草目在內容的注記上仍有不足之處。1979 年，恩默瑞克出版了《于闐文獻指南》，補充了德萊斯頓編目以後新刊或待刊的論著，以及其它語言中的參照文獻。但《指南》重在佛教文獻，關於敦煌出土的地理行紀和使臣報告，除《鋼和泰雜卷》外，未置一詞，[5] 這令人不無遺憾。

我們在工作中日益體會到于闐文寫卷之重要，在對照漢文文獻和漢文文書研讀這些于闐文材料時，深感有必要將敦煌出土的于闐文獻編出一個內容較爲詳儘的目錄。學界在研究于闐文獻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儘管于闐語特別是書寫在敦煌卷子上的晚期于闐語的研究還未儘完善，另外，部分寫卷也還難以斷定其確切的內涵，但大部分文獻的定名已成爲可能。因此，我們不揣淺陋，將我們幾年來積累的卡片和讀書所得，初步整理如下。這里刊佈的是伯希和敦煌文獻中的于闐文材料。這份目錄僅僅是爲學界利用這批材料提供一個線索，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惠予指正。

說　　明

1．本目按流散到國外的收藏者的編號順序排列。專門研究于闐語的學者常用 a,b 表示寫卷正背面，a,b 並不表示年代的先後。

2．于闐語文獻常常是多種內容抄在一起的雜纂。[6] 本目依先

後爲序，逐項注記。確切內容難以比定的部分，用“佛教文獻”和“文書”的一般名稱暫作歸類。遇到可以決定年代的題記和人名轉寫翻譯在該項之內。與于闐文有關的漢、藏文字和圖畫，略加注記，餘則僅提名稱。

3．本目舉列的參考文獻分以下三項：

① 圖：指該項圖版所在。

② 轉寫：指該項于闐文的羅馬字母轉寫所在。

③ 研究：指隨轉寫一起刊佈的翻譯、注釋以及解題或後三項，單獨出現的文獻。西文參考文獻，譯名後均附原文，以便查找。

④ 本目所用縮略語如下(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草目》＝德萊斯頓《于闐（塞語）寫卷草目》（Khotanese (Saka) Manuscripts, a Provisional Handlist)，《伊朗學叢刊》（Act Iranica）第 12 冊《1976 年雜纂卷》(Varia 1976)，1977 年萊頓—德黑蘭—列日，27—85 頁。

《法館漢目》＝法國國立圖書館寫本部編《(伯希和漢文文庫)敦煌漢文寫卷目錄》(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Fonds Pelliot chinois)，第 1 卷，巴黎，1970 年。

《法館藏目》＝拉露 (M. Lalou)編《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卷目錄》(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Fonds Pelliot tibetain)，第1—3冊，巴黎，1939—1961 年。

《佛教集》＝貝利《于闐語佛教文獻集》(Khotanese Buddhist Texts)，倫敦，1951 年；修訂版，劍橋，1981 年。

《國年號考》＝張廣達、榮新江《關於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1982 年，179—209 頁；本文法譯“Les noms du royaume de Khotan, les noms d'ère et la fin des

Tang au début des Song'', «敦煌研究論文集»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第 3 集, 巴黎, 1984 年, 23—46 頁。

«會刊» = «英國王家亞洲學會會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抒情詩» = 德萊斯頓 «于闐文抒情詩» (A Lyrical in Khotanese, Part I: Text), «瓦爾德施密特八十壽辰紀念印度學論集» Beite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 geburtstag gewidmet), 柏林, 1977 年, 81—103 頁。

«泰東»新輯 = Asia Major, new series。

«文書» = «伊朗金石銘文彙編»第二編 «東伊朗和中亞的塞琉古和安息時期金石銘文»第 5 卷«塞語編»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II, 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Vol. V. Saka), 貝利與恩默瑞克合編«塞語文書» (Saka Documents)第 1—6 輯, 倫敦, 1960—1973 年。

«文書集» = 貝利«于闐語文書集» (Khotanese Texts)第 1—6 集, 劍橋, 1945—1967 年; 第 1—3 集合訂本第二版, 1969 年。

«學報» =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報»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劄記(四)» = «于闐語劄記(四)» (Hvaitanica IV), «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 1912 年, 886—924 頁。

«指南» = 恩默瑞克«于闐文獻指南»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日本靈友會圖書館, 1979 年。

«轉寫卷» = 貝利«塞語文書原文轉寫卷»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倫敦, 1968 年。

«總目» =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2 年。

注釋：

① 參看《草目》。

① 中國較早注意及于闐文材料者，當推陳寅恪和岑仲勉兩位先生。見前者的《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7頁；後者的《"回回"一詞之語源》，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5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432—434頁。

③ 例如《總目》253—254頁，P 2022—2031號文書說明。

④ 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⑤ 《指南》49—51頁。

⑥ 參看恩默瑞克《于闐文寫卷的史料價值》(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Khotanese Manuscripts)，哈瑪塔(J.Harmatta)編《伊斯蘭時代以前中亞史史料導論》(Prolegomena to the Souces on the History fo Pre-Islamic Central Asia)，布達佩斯，1979年，171頁。

目　錄

P.t.821

毘沙門天王像題記

本卷繪毘沙門天王，左手以雲氣蓮花托寶塔，右手持長矛。其左侍繪一魔鬼形像，右侍爲一寬服闊帶的供養人像，旁有漢文題記，從右向左讀："王上卿一心供養。"毘沙門腳踏女神，右下角繪長鼻大耳的魔鬼，左下方繪執香供養的漢人形像，旁有漢文題記。從左向右讀："發心供養，張儒者。" 兩者之間，有于闐文題記三行：(1) hvāṃ: śāṃ khīñä pasti pīḍe bu'ysye jsīña (2) priyaugä udiśāyä sahaicä salya (3)didye māśta lomye haḍai

nauda"王上卿令繪(此圖),惟願長生福慶,(卯)兎年三月十日敬禮訖。"同樣的圖畫和題記又見P 4518 (27)。類似的發題文,又見 Ch c.001 第 1102—1106 行。正面,藏文《入楞伽經》。圖:拉露《印度神祇與中亞繪畫(一):佛教財神》(Mythologie indienne et peintures de Haute-Asie I: Le dieu bouddhique de la fortune), 《亞洲藝術》Artibus Asiae) 第 9 卷第 1—3 期, 1946 年, 102 頁,圖版二;巴黎國立圖書館編《東方寶藏》(Trésors d'orient), 巴黎, 1973 年, 143 頁,解說見 142 頁,No. 372;部分圖版,見達德布里奇(G. Dudbridge)與恩默瑞克合撰《伯希和藏文文書 0821 號》(Pelliot tibétain 0821),《伊朗學研究》(Studia Iranica)第 7 卷第 2 期, 1978 年, 圖版一五。轉寫:《文書集》第 3 集, 138 頁, 編號作 Paris W。研究:達德布里奇與恩默瑞克上引文, 283—285 頁。

P2022

抒情詩

存 61 行,四行一個詩節,與此卷一些詩節相同的抒情詩,見P 2025, 7—9 行;P 2895, 1—41 行;P 2896, 49—55 行; P 2965, 1—77 行;Ch 00266,01—42行。正面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圖:《抒情詩》,103 頁插圖 22。轉寫:《文書集》第 3 集,42—44 頁;《抒情詩》,88,92—93頁研究:第 1—3 行譯文,見貝利《印度伊朗語研究的曲折道路》(Ambages indoiranicae), 《那波利東方學院年報·語言卷》(Annali 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Sez. Ling.) 第 1 卷第 2 期,1959 年,127 頁; 12—13 行譯文,見貝利《雅利安語雜考》(Araina), 《尼伯格紀念論文集》(Donŭm Natalicium H. S. Nyberg Oblatŭm),烏普薩

拉，1954年，11頁；17—19行譯注，見貝利《雅利安語札記》(Ariaca)，《學報》第15卷第3期，1953年，537—538頁。《抒情詩》81—103頁。

P2023

于闐人發願文

存16行。其後應接P 2929（參看《法館漢目》第1卷，18頁。）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七。轉寫：《文書集》第3集，45頁。

P2024

布帛破曆

背62行，正面漢文《勝天王般若波羅密經》卷三葉邊空白處也抄兩行。圖：背，《文書》第5輯，圖版97—100；正，《文書》第6輯，圖版127—130。轉寫：《文書集》第2集，76—78頁。

P2025

1. 于闐使臣上書殘稿

   1—7行。轉寫：《文書集》第2集，79頁。

2. 抒情詩

   7—79行。參看P2032項。轉寫：《文書集》第3集，45—48頁；《抒情詩》85—93頁。研究：第7—14，37—40行譯文，見貝利《塞人的抒情詩》(Lyrical Poems of the Sakas)，《安瓦拉博士紀念文集》(Dr. J. M. Unvala Memorial Volume)，孟買，1964年，3頁；《抒情詩》81—103頁；第56行譯文，見《文書集》第6集，315頁。圖：以上兩部分圖版，見《抒情詩》100頁，插圖18。

3. 神威(Ṛddhiprabhāva)《善財譬喻經》(Sudhana-avadāna)

   80—267行。此爲佛教傳說中的善財童子故事，以韻文

詩體寫成。本卷與 P4089 正面所抄于闐文銜接。同一寫卷的另一鈔本是 Ch00266 第 44—223 行。此外，P 2784，1—7；P2896，2—15 行；P2957，14—161 行；161—171 行以及 P5536bis 背面，都是這首韻文體詩的不同鈔本，內容也略有差異。據 P2957 卷末的題記，此詩作者名叫神威。全卷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五六三。轉寫：《佛教集》13—20 頁。研究：貝利《善財與緊那羅》(Sudhana and Kinnarī)，《門西紀念印度學論集》(Munshi Indological Felicitation Volume)，孟買，1963 年，192—195 頁；貝利《神威的善財譬喻詩》(The Sudhana Poem of Ṛddhiprabhāva)，《學報》第 29 卷第 3 期，1966 年，506—532 頁。

P2026

1. 維摩詰書

   1—60 行。

2. 佛名經

   61—63 行。

3. 禮佛讚文

   64—89 行。研究：第 64—72 行轉寫譯注，見《劄記(四)》894—895，906—907 頁。

4. 佛像兩軀

   坐貌，旁繪一桌，上置茶具及紙札，施主執香作供養狀，旁繪小塔，內書"維天晉天福十年乙巳，敕于闐班上監一心供養"。此外，旁邊雜記"韓宰相"、"秦宰相"等名號共十三人。研究：饒宗頤《敦煌白》(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巴黎，1978 年，第 1 卷，24—25 頁，第 2 卷，44—45 頁。

5. 戒文

90—99 行。研究：第99 行譯文，見恩默瑞克《芥子之喩》(The Mustard upama)，《會刊》年 1967 號，25 頁。

6. 佛教文獻

100—121 行。正面，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三。

全卷轉寫：《文書集》第 3 集，58—53 頁。

P2027

1. 游方僧人詩等

1—66 行。其中包括一位旅行僧的詩和一位于闐公主在沙州寫的思親詩。後者提到 thū-khī kṣailmye kṣūṇa "同慶六年(917—918)年"的紀年，系指其父之生年。轉寫：《文書集》第 2 集，79—82 頁。研究：關於 16—19 行，見貝利《伊朗語 miṣṣa 和印度語 bīja》(Iranian miṣṣa, Indian bīja)，《學報》第 18 卷第1期，1956 年，33—34 頁。參看《文書集》第 4 集，16 頁。

2. 佛名經

67—86 行。同類文獻有 P 2742，P3513，1—12 行等。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七。轉寫：《文書集》第 3 集，53—54 頁。

全卷圖版：《文書》第 5 輯，圖版 101—106。

P2028

學生習字

間有其它短文。第三行是用粟特文寫成的。88—90 行有紀年：thyina hīna nāmye kṣuṇä aśi salya rarūyi māśta nausamye haḍi "天興九年〔午〕馬歲 (958) 六月十九日"。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三三〇。圖：《文書》第 5 輯，圖版 107—113 。轉寫：《文書集》第 2 集，

82--83 頁(不全)。

P2029

1. 佛教文獻

正面 1—11 行，背面 12—16 行。

2. 《妙法蓮華經綱要》

背 17—21 行。韻文體，不全。同類卷子有P2782，1—61 行；Or.8212.162，82—92 行。轉寫：《文書集》第 3 集，54—55 頁。

P2030

文書殘片

共四行。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八九。轉寫：《文書集》第 2 集，83 頁。

P2031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共 23 行。本卷下接P 2788 。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二二七。圖：《文書》第 5 輯，圖版 114 。轉寫：《文書集》 第 2 集，83—84 頁。研究：熊本裕 《有關 Thyai Paḍä-tsā 的兩件于闐語殘卷》(Two Khotanese Fragments concerning Thyai Paḍä-tsā)，《東京大學語言學論集》第 11 號，1991 年，101—120 頁。

P2739

1. 文書

1—37 行。第 12 行有 ttayi-pū yūttyenä kuhä "大寶于闐國"，據此可定文書年代約在 938—982 年之間。(參看《國年號考》 185 頁。)

2. 詩

38—57 行。系一位詩人讚揚其兄長的詩篇。第 43 行有

ttaya-pau yūttyaina kūauha“大寶于闐國”，年代同上。正面，漢文《大智度論》卷七四、七五。研究：38—44行譯文，見貝利《Mā'hyāra》，《德幹學院研究所紀要》(Bulletin of the 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第20卷第1—4期，1960年，277頁。圖：《文書》第5輯，圖版115—119。轉寫：《文書集》第2集，85—87頁。

P2740

嗢呾羅神變 (Uttaratantra)文獻

共13行，用于闐體梵文書寫。文中夾有漢字，如“田家”等。正面，漢文《大乘無量壽經》。轉寫：《文書集》第5集，239—240頁。

P2741

于闐使臣 Thyai Paḍā-tsā上于闐朝廷書

共135行，寫於沙州，與Ch00269等使臣報告所記爲同一件事。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圖：《文書》第2輯，圖版39—48。轉寫：貝利《伊朗—印度語札記》(Irano-Indica)，《學報》第12卷第2期，1948年，319—323頁；《文書集》第2集，87—92頁。研究：貝利《關於甘州回鶻的一件于闐語文書》(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泰東》新輯第1卷第1期，1949年，28—52頁；《轉寫卷》61—67頁。

P2742

佛名經

共63行。中間夾有漢文“南無師子佛”等，應屬同一文獻。正面，漢文《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三。轉寫：《文書集》第3集，55—57頁。

P2745

文書殘卷

共 10 行,詩體書寫。正面,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八。圖:《文書》第 5 輯,圖版115。轉寫:《文書集》第 2 集,92—93 頁。

P2781

羅摩故事

共 93 行,另有一行(161a),寫於第 65 行以下葉邊。按此卷上接P2801,下續P2783,三卷原爲同一寫卷,後被撕成三段。此卷相當於全卷的 69—161 行。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一。三卷轉寫:貝利《羅摩考》(Rāma),《學報》第 10 卷第 2 期,1940 年,366—376 頁;《文書集》第 3 集,65—76 頁。研究:貝利《于闐文羅摩故事》(The Rāma Story in Khotanese),《美國東方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第 59 卷第 4 期,1939 年,461—468 頁;貝利《羅摩考(二)》(Rāma II),《學報》第 10 卷第 3 期,1940 年,559—598 頁;榎一雄《于闐語的羅摩王故事》,《從絲綢之路的歷史說起》,東京,1979 年,100—112,205—208 頁;恩默瑞克《于闐文羅摩衍那中的兩個問題》(Two problems in the Khotanese Rāmayana),提交第二屆歐洲中亞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倫敦,1987 年,1—4 頁;季羡林《羅摩衍那在中國》,《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南昌,1990 年,103—112 頁。

P2782

1.《妙法蓮華經綱要》

1—61 行,韻文體。同文獻的另外兩件鈔本是 Or. 8212. 162,82—90 行和P2029 背 17—21 行,而以此卷最完整。

本卷供養人之一 ḍyau tceyi-śiṅä 或ḍyau sikhūṃ，分別見於第 12 行和 61 行，據金子良太的考證，分別相當於“劉再昇”和“劉司空”，即後晉天福七年(942)入貢於晉的于闐使臣。(見《新五代史》卷九，晉出帝紀；卷七四，四夷附錄于闐條；《舊五代史》卷八一，晉少帝紀。參看金子良太《P2782 文書所見的 Ḍyau Tceyi-śiṅä》，《豐山學報》第 22 號，1977 年，125—130 頁。)劉再昇一名還見於P5535 第 9 行，漢文作“大寶于闐國進奉使司空劉再昇”，及 P.t. 1256，藏文作 yu-then gi pho-nya li'u si-koug“于闐使臣劉司空”(參看《法館藏目》第 2 冊，93 頁；烏瑞 (G. Uray)《吐蕃統治以後河西與于闐諸國行政事務中使用藏文的情況》(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第 269 卷，1981 年，84 頁；森安孝夫《關於伊斯蘭時期以前的中亞史研究之現狀》，《史學雜誌》第 89 卷第 10 號，1980 年，66頁)。由此可以確定文書的年代應在942—943 年前後。研究：本卷和 Or.8212.162 相應部分的研究，見貝利《瞿薩旦那國的一篇韻文體妙法蓮華經綱要》(A Metrical Summary of the Saddharima-puṇḍarīka-sūtra in Costana-deśa)，《藏學集刊》(Bulletin of Tibetology)第 2 卷第 2 期，1965 年，5—7 頁；貝利《妙法蓮華經的于闐塞語綱要》(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the Summary in Khotan Saka)，《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研究系特刊》(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第 10 卷，堪培拉，1971 年；貝利《妙法蓮華經的于闐語綱要》

(The Khotanese Summary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大正大學研究紀要》第 57 號, 1972 年, 526—530 頁。最後一篇有金子良太的日譯文《貝利講演——關於于闐語法華經綱要》,《豐山學報》第 16 號, 1971 年, 130—154 頁。

2. 陀羅尼

62—72 行, 用佛教梵語書寫。

3. 一位巡禮僧人的書札

73—80 行, 用于闐文字母和正字法拼寫的藏文寫成。圖: 貝利《塔克拉瑪幹雜纂》(Taklamakan Miscellany),《學報》第 36 卷第 2 期, 1973 年, 圖版 2 。研究: 金子良太曾爲貝利做了轉寫和英譯, 見貝利上引文, 224—225 頁; 金子良太《關於敦煌出土的一、二未解明文書》,《豐山學報》第17, 18 合併號, 1973 年, 142—150 頁。

4.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殘片

80—83 行。其中提到的 āśarī dharmaidrākarapūña 又見 Or.8212.162, 155 行和 Paris Z, 23 行, 這兩件內容相近的文書, 都是于闐使臣在沙州起草的報告(參看《指南》27—28 頁; 熊本裕的博士論文《公元十世紀的于闐語官文書》(Khotanese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Tenth Century A. D.), 賓夕法尼亞大學, 1982 年, 264 頁。)

5. 陀羅尼

84—86 行。正面前二行爲粟特語文書 紀年: prβγy n'm m'kr srδ wγšmyk m'γy 20 sγδ “金猴〔申〕年六月廿日”(貝利《評邦旺尼斯特〈粟特語文獻選刊〉》(Review of Codices Sogdiani by E. Benveniste),《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 1021 頁; 熊本裕上引論文 264 頁)。以下全卷抄

漢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一五四。

全卷轉寫:《文書集》第3集,57—63頁。

P2783

羅摩故事

共94行,上接 P2801 和 P2781,相當於全卷的162—255行。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轉寫和研究:參見 P 2781 條。

P2784

神威《善財譬喻經》

共7行。參看 P2025 第3項。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四。轉寫:《佛教集》13頁。

P2786

1. 于闐使臣 Ana Saṃgai 上于闐朝廷書

   1—77行,抄本。同文書的另一抄本,見本卷85—165行。後者抄寫時間較前者爲晚。

2. 于闐使臣上于闐樞密使書

   78—84行;166—171行重復,情况同上。

3. 于闐使臣 Ana Saṃgai 上于闐朝廷書(二)

   172—250行,另一抄本見 Or.8212.186 正面6—59行以及背面1—21行。三份報告的年代均在966年前後。另外, Or.8212.162 正面125—164行和背1—5行書寫的文書也記載了同一件事,但出自另一人的手筆。正面,漢文《維摩詰經》卷下。圖:《文書》第4輯,圖版 131—149。轉寫:《文書集》第2集,93—101頁。熊本裕《公元十世紀的于闐語官文書》67—98頁。研究:熊本裕上引論文;同作者《伯希和寫本 P2786 號于闐語文書》(The Khotanese Documents of the Pelliot MS P2786),第31屆

國際亞非人文科學會議(1983年)提交的論文。

P2787

1、尉遲僧伽羅摩 (Viśa' Saṃgrāma)王頌詞

1—154行。除34—83行爲頌詞的主體外，還包括阿闍利爲俗人講道、説法，建立伽藍等傳説。按，尉遲僧伽羅摩王又見於 Or. 8212. 162 的139行和Ch00267的53行。此王或許就是約983—1006年在位的于闐統治者(參看《國年號考》187—188頁)。研究：26—37，43—52，59—60行譯文，見貝利《尉遲僧伽羅摩王考》(Vijaya Sangrāma)，《泰東》新輯第7卷第1—2期，1959年，22—24頁。

2、迦膩色迦王傳説

155—195行。正面，漢文《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五。研究：貝利《迦膩色迦》(Kanaiṣka)，《會刊》1942年號，14—28頁；補正，同上出處，250頁；貝利《栴檀考》(Candra and Caṇḍa)，《會刊》1949年號，2—4頁；貝利《迦膩色迦考》(Kaniṣka)，巴沙姆(A. L. Basham)編《迦膩色迦年代論集》(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萊頓，1968年，35頁。

全卷轉寫：《文書集》第2集，101—108頁。研究：全卷翻譯和1—154行的注釋，見貝利《尉遲僧伽羅摩考》(Viśa' Saṃgrāma)，《泰東》新輯第11卷第2期，101—119頁。

P2788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共13行，首行殘，末行寫在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二七旁。本卷上接P2031。圖：正面1行，《文書》第4輯，圖版150；背面，同上，圖版151。轉寫：《文書

集》第 2 集，108—109 頁。研究：見 P2031 條熊本裕文。

P2789

文書

共 30 行。正面，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轉寫：《文書集》第 2 集，109—110 頁。

P2790

1.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1—126 行，寫於沙州。轉寫：《文書集》第 2 集，110—114 頁。研究：貝利《室利尉遲輸羅與大王》(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泰東》新輯第 11 卷第 2 期，1—17 頁。

2. 佛教文獻

127—144 行，其中 140 行以下寫在正面。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八四。

轉寫：《文書集》第 3 集，63 頁。

P2798

1. 習字

1—122行。

2. 阿育王傳說

123—212 行。此卷和 P 2958，1—120 行是同一文獻的不同抄本。轉寫：《佛教集》42—44 頁。研究：貝利《阿育王傳說》(A Tale of Aśoka)，《藏學集刊》第 3 卷第 3 期，1966 年，5—11 頁。

3. 阿育王傳說題記

213—223 行。其中第 213 行有紀年爲 thyina hīṅi nāmyi kṣuṅi aśi salya muñāji māśta"天興九年〔午〕馬歲(958)十月"。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六九。

轉寫:《文書集》第3集,64頁。

P2800

歸依三寶文

共23行。同類文獻有P 2787, 7—8行和 Ch 00263。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九四。轉寫:《文書集》第3集,64頁。

P2801

羅摩故事

共68行。下續P2781和P2783。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一。轉寫和研究:見P2781條。

P2834

1. 文書殘片

1—5行,每行殘缺十二或二十六個字母。轉寫:《文書集》第3集,77頁。

2. 商人難陀的故事。

6—58行。正面,漢文《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五。轉寫:《佛教集》45—47頁。研究:恩默瑞克《商人難陀》(Nanda the Merchant),《學報》第33卷第1期,1970年,72—81頁;恩默瑞克《〈商人難陀〉中的于闐語詞彙》(Khotanese Glossary to "Nanda the Merchant"),《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第35卷,1973年,115—126頁。

P2855 (=P.t.243)

1. 藏文毘盧折那佛命名儀軌殘卷

共33行,正面,中間夾有漢文咒語。

2. 漢文《迴向發願文》

3. 于闐文《阿難陀目佉 Nirhāri 陀羅尼咒》

正面，自標行數 1—24 行。

4. 藏文曼陀羅

5. 同 3 陀羅尼咒

背面，自標行數 25—26 行。

6. 漢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轉寫：《文書集》第 3 集，77—78 頁。研究：參看《法館藏目》第 1 册，67—68 頁；辛姆斯-威廉姆斯 (N. Sims-Williams)《評〈于闐文獻指南〉》，《會刊》1981 年號，85 頁。

P2889

藥方

共 15 行。正面，漢文《須摩提長者經》，卷端題"于闐開元寺一切經"。轉寫：《文書集》第 3 集，78 頁。

P2891

游方僧人詩

共 43 行。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七七。轉寫：《文書集》第 3 集，79—81 頁。

P2892

1. 印度醫藥文獻《悉曇娑羅》 (Siddhasāra)

1—166 行，相當於 Ch ii 002 第 5 葉背第 4 行—14 葉背 4 行。轉寫：《文書集》第 5 集，315—324 頁。

2. 突厥-于闐雙語詞彙表

157—185行。突厥語均用于闐文使用的婆羅謎字母拼寫，內容涉及射箭術和身體各部位的名詞，似爲學突厥語者所書。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一一。圖：貝利《塔克拉瑪幹雜纂》，《學報》第 36 卷第 2 期，圖版 1 。轉寫：《文書集》第 3 集，81—82 頁。研究：貝利《一份突厥-于闐語詞彙表》 (A Turkish-Khotanese Vocabulary),

《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 1944 年, 290—296 頁; 霍德豪根 (E. Hovdhaugen)《于闐文獻中的突厥語彙——語言學的分析》(Turkish Words in Khotanese Texts: A Linguistic Analysis), 《挪威語言學雜誌》(Norsk Tidsskrift for Spragvidenskap)第 24 卷, 1971 年, 163—206 頁; 貝利《塔克拉瑪幹雜纂》, 出處見上, 224 頁; 克勞森(G. Clauson), 《重刊突厥-于闐語詞彙表》(The Turkish-Khotanese Vocabulary re-edited), 《伊斯蘭研究院院刊》(Islâm Tetkikleri Enstitüsü Dergisi) 第 5 卷第 1—4 期, 1973 年, 37—45 頁。

P2893

1. 于闐人發願文

1—31 行。研究: 第 7—19 行譯注, 見《劄記(四)》892—893, 904—905 頁; 張廣達、榮新江《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3 輯, 北京, 1987 年。

2. 醫藥文獻

32—267 行。以上兩部分轉寫: 《文書集》第 3 集, 82—93 頁。

3. 文書

寫於正面漢文《報恩經》卷四的葉邊。此經漢文題記作: "僧性空與道圓儭人寫記"。這里的道圓即《宋會要》、《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等書所記乾德三年(965)由西域與于闐使一起回到中原的沙門道圓, 也即 S6264《天興十二年 (961) 正月八日南閻浮提大寶于闐國匝摩寺八關戒牒》中的授戒師道圓 (參看《國年號考》189—193頁)。轉寫: 《文書集》第 5 集, 394 頁。

P2895

抒情詩

共41行。參看P2022條。正面，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圖:《抒情詩》101頁，插圖19。轉寫:《文書集》第3集，40—41（編號作 Paris Y）；《抒情詩》85—87，90—92頁。研究:《抒情詩》81—103頁。

P2896

1．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1．16—48和56—71行，書寫不連貫，其中一行(35a)寫於葉邊。第35行雜有漢字“從德”、“司空”等，此行于闐文有rrispūra“太子”，似乎表明這里的從德即 P3510于闐文《禮懺發願文》及其它史料中的從德太子，也即後來的尉遲輸羅王。據此，本卷年代在960年前後。另外，第56行開頭部分，繪馬一匹，白畫。轉寫:《文書集》第3集，94—96頁。研究:張廣達、榮新江《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1989年，290頁。

2．神威《善財譬喻經》

2—15行，韻體詩，參看 P2025條第3項。轉寫:《佛教集》11—12頁。

3．抒情詩

49—55行，參看 P 2022條。正面，漢文《大乘密嚴經》卷中。圖:《抒情詩》101頁，圖20。轉寫:《文書集》第3集，36頁;《抒情詩》85—86頁。研究:《抒情詩》81—103頁。

2897

1、佛教文獻

1—13 行。

2. 于闐使臣報告雜抄

14—44 行。此節文字除最後一節(39—43行)外，可能屬於《書儀》類文字，或抄自其它人寫的文書，可細分爲三項：(1)書札草稿(或書儀)：14—34 行。(2) 詩體書信：35—38 行，其中 35—36 行是逐字逐句地抄自 Or.8212.162 第 64—65 行，屬於一位叫 Nāgendravardhana 的于闐大德在沙州寫給于闐佛教團的詩體書信中的一部分(參看熊本裕《公元十世紀的于闐語官文書》47—49頁)。(3)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39—44 行。寫於沙州，年代是 mauya salay ttāṃjarrai māśta didyai haḍai tta "〔寅〕虎年七月三日"。據考爲 965/966 年。正面，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圖：《文書》第 6 輯，圖版 151—153。轉寫：《文書集》第 2 集，114—116 頁。研究：熊本裕上引文 44—51 頁。

P2898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共 14 行。寫於沙州，下接 Ch 00327。正面，漢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圖：《文書》第 5 輯，圖版 120。轉寫：《文書集》第 2 集，116—117 頁。研究：見 P2031 條熊本裕文。

P2900

佛名經

共 8 行，用佛教梵文書寫。正面，漢文《藥師經》，題記："上元二年十月廿七日，弟子女人索八娘爲難月，願無諸苦惱，分難平安。" 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38 頁。研究：第 1—3 行轉寫譯注，見《劄記(四)》894—895，907 頁。

P2806

佛名經

共 33 行，最末一行寫在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一的集邊，其第 27—31 行與P2910 第 31—36 行大致相同，32—33 行爲殘題記。轉寫：《文書集》第 3 集，97—98 頁。

P2910

佛名經

共 37 行。其中 31—36 行與 P2906 第 27—31 行相同。正面，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轉寫：《文書集》第 3 集，98—99 頁。

P2925

1．文書

1—58 行。內容不一，其中 15—17，22—25 行與 S5212 內容大致相同。

2．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59—60 行。用于闐體梵文書寫，同類文獻見 P5537 和 Ch0044。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四。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00—102 頁。

P2927

1．殘字

1—3 行。

2．漢文于闐文雙語詞彙表

4—25 行。每行先用于闐婆羅謎字母拼寫漢文，然後是對應的于闐文。同類文獻有 Ch 00271，2—5 行；S5212 正面和Or 8212.162，1—12 行。研究：高田時雄《敦煌資料所見之漢語史的研究》，東京，1988 年，197，206—207，224—227 頁。

3．文書

36—55 行，其中 44—47 行和 P2936 第 4—6 行相同。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〇一。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02—105 頁。

P2928

凡夫俗子和貴臣之女的愛情故事詩

共 41 行，1—3 行爲詩序，首標年代爲 thyaina śiva dīde kṣuṇa gūha salye rarūya māśta dasamye haḍai "天壽三年〔丑〕牛歲(965)六月十日"(參看《國年號考》200 頁。)。正面，漢文《藥師經》。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05—106 頁。研究：貝利《早期于闐的浪漫主義文學》(Romantic Literature in early Khotan)，《亨利·馬西七十五歲壽辰紀念東方學論集》(Mélanges d'orientalisme offerts à Henri Massé à l'occasion de son 75 ème anniversaire)，德黑蘭，1963 年，19 頁。

P2929

于闐人發願文

共 21 行。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七。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07 頁。研究：3—13 行譯注，見《劄記(四)》892—895，905—906 頁。

P2933

佛陀弟子大劫賓那的故事詩

共 10 行，詩體。葉邊有漢字"天子"、"皇帝"、"皇后"等。正面，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八。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07—108 頁。

P2936

抒情詩

共 12 行，其中 4—6 行與 P2927，44—47 行相同。正面，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三。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08—109 頁。

P2942

發願文

共 19 行，詩體。正面，漢文《唐永泰元年(765)至大曆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1979 年，493—497 頁；安家瑤《唐永泰元年—大曆元年河西巡撫使判集(P 2942)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232—243 頁）。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09—100 頁。研究：5—7 行譯注，見《劄記(四)》894—895，907 頁。

P2949

賢劫千佛名經序

共 18 行。此經于闐文正文部分，見Ch c.001 第 32 葉。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三。轉寫：《佛教集》75 頁。

P2956

抒情詩

共 77 行。參看 P 2022 條。正面，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六〇。圖：《抒情詩》102 頁，插圖 21。轉寫：《文書集》第 3 集，36—39 頁；《抒情詩》86—93 頁。研究：《抒情詩》81—103 頁。第 28—31 行譯文，又見貝利《塞人的抒情詩》，《安瓦拉博士紀念文集》4 頁。

P2957

1. 前 13 行模糊不清，無轉寫研究發表。
2. 神威《善財譬喻經》

14—160 行，與P2025 等寫卷屬於同一文獻的不同抄本，

參看 P 2025 條第三項。轉寫：《佛教集》31—39 頁。研究：見 P2025 條第三項。

3. 殘文書

160—163 行。

4. 神威《善財譬喻經》

164—171 行，是與上不同的另一抄本。轉寫：《佛教集》12—13 頁。

5. 正面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三葉邊有雜寫于闐文字。轉寫：《文書集》第 5 集，324 頁。

P2958

1. 阿育王傳說

1—120，與P2798 爲同一文獻的不同抄本，參看該條。轉寫：《佛教集》42—44 頁。研究：參看 P2798 條第二項。

2. 于闐官文書雜纂

內容可細分爲七項：（一）于闐使臣上沙州敦煌王書：121—131 行，此爲精心書寫的草稿開端；（二）Kim Tun Śan 與某人書：132--139 行，也是草稿開端；（三）于闐使上沙州官府書：140—148 行，開端部分的草稿；（四）甘州可汗致于闐金汗書：149—181 行，最後一行提到 thī-pā ranajai janavai "大寶于闐國"，知此節當寫於 938—982 年間（參看《國年號考》183—184 頁）；（五）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182—198 行；（六）朔方王子上于闐朝廷書：199—215 行；（七）朔方王子致母書：216—227 行。正面，漢文《金光明經》卷二，葉邊有雜寫于闐文字句。轉寫：《文書集》第 2 集，117—121 頁。研究：貝利《金汗考》(Altun Khan)，《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1967 年，95—

104 頁。

P3510

貝葉形寫本，帶有文字的共 18 葉。以下按貝利的編號和分行，分四項著錄：

1．從德太子禮懺發願文

1—8 葉，韻文體，4 行爲一節。據張廣達、榮新江《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所考從德生平，此卷年代當在 965 年前後。轉寫：《佛教集》47—52 頁；部分轉寫，見《文書集》第 2 集，121—122 頁。研究：第 6—9 節譯文，見阿斯木森 (J. P. Asmussen)《摩尼教讚美詩——摩尼教研究》(Xuāstvā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哥本哈根，1965 年，256—257 頁；貝利《從德太子》(The Great Prince Tcūṃ-ttehi)，載錢德拉 (L.Chandra) 主編《南亞藝術和文化研究》(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第 6 卷，新德里，1980 年，49 頁；恩默瑞克《從德太子的押韻文》(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伊朗學研究》第 9 卷第 2 期，1980 年，185—193 頁；恩默瑞克《從德太子押韻文的一個詩節》(A Stanza from 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古代近東的社會與語言論集》(Societies and Languag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瓦爾敏斯特，1982 年，62—63 頁；張廣達、榮新江《敦煌文書 P3510 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 文史遺書編》上，蘭州，1987 年，163—175 頁。

2．禮懺文

9—10 葉，與 P3513 第 76 葉背 1 行至 78 葉背 1 行大致相同。轉寫：《佛教集》52 頁。

3．般若心經

c,d,g,f.a,b,e 七葉，每葉正背面各 3 行。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10—112 頁。研究：施傑我(P. O.Skjaervø)《于闐文〈般若心經〉》(The Khotanese Hrdayasūtra)，《阿斯木森教授紀念論文集》(A Green Leaf.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es P, Asmussen, = Acta Iranica 28)，萊頓，1988 年，157—171 頁。

4．陀羅尼

A 1 葉，正 3 行，背 2 行，用于闐體梵文書寫。轉寫：《文書集》第 5 集，324—325 頁。

P3513

貝葉形寫本，共 85 葉，分爲五項內容：

1．佛名經

1— 12 葉。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12—116 頁。

2．般若心經疏

13—42 葉。轉寫：《佛教集》54—61 頁。研究：13 葉背 1 行至 14 葉正 4 行譯文，見貝利《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中的菩薩》(The Bodhisattva in the Prajñā-pāramitā)，《南亞文化研究》(Studies in South Asian Culture)第 7 卷，萊頓，1978 年，20—21 頁；39 葉正 2 行至背 4 行譯文，見貝利《伊朗語印度語札記(四)》，《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1951 年，934—936 頁；全譯見貝利《于闐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蘭卡斯特編《般若波羅蜜多及其相關體系：愛德華・孔茲紀念文集》(P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 Studies in Honor of Edward Conze)，伯克利，1977 年，153—162 頁；蘭卡斯特《于闐文般若波羅蜜多文獻研究：寫在哈羅

德·貝利爵士的著作之後》(A Study of a Khotanese Prajñāpāramitā Text: After the Work of Sir Harold Bailey),同上書,163—183 頁;P3510 條第 3 項引施傑我文。

3. 普賢行願讚

43—58 葉。轉寫:《文書集》第 1 集,222—230 頁。研究:井之口泰淳《于闐語普賢行願讚考》,《佛教學研究》第 16 卷第 17 號,1959 年,87—97 頁;阿斯木森《于闐語普賢行願讚》(The Khotanese Bhadracaryādeśanā),哥本哈根,1961 年。參看井之口泰淳《佛教文獻在敦煌的傳譯》(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at Tun-huang),《亞洲學報》第 269 卷,1981 年,100 頁。

4. 金光明最勝王經·懺悔品

59—75 葉。轉寫:《文書集》第 1 集,242—249 頁。研究:59 葉背 1 行至 64 頁正 1 行譯文,見伯希和《一件東伊朗語寫的金光明經殘卷》(Un fragment du Suvarṇabhāsasūtra en iranien oriental),《巴黎語言學會論集》(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guistique de Paris)第 18 卷,1913 年,89—125 頁; 60 葉背 2 行至 63 葉正 4 行譯文,見洛伊曼《佛教文獻》(Buddhistische Literatur)第 1 卷,1920 年,57—63 頁。

5. 禮懺文

76—84 葉。參看 P3510 條第 2 項。轉寫:《佛教集》62—66 頁。研究:84 葉正 1 行至 4 行譯文,見阿斯木森《摩尼教讚美詩》257 頁。全譯見貝利《從德太子禮懺文》(The Profession of Prince Tcūm-ttehi),本德爾(E. Bender)編《布勞恩紀念印度學論文集》(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 Norman Brown), 紐黑文, 1962 年, 18—22 頁。

P3861 (=P.t.85)

冊子本, 三種文字寫三項內容:

1、于闐文發願文

共 3 行。轉寫:《文書集》第 2 集, 122 頁。

2、漢文《金剛二十八戒》、《散食法》、《三窠法體儀》等。

3、藏文和漢文相間書寫的曼陀羅 (參看《法館藏目》第 1 冊, 28 頁。)

P4068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共 9 行。正面, 漢文《妙法蓮華經》卷三。圖:《文書》第 6 輯, 圖版 154。轉寫:《文書集》第 2 集, 122—123 頁。

P4089

1. 神威《善財譬喻經》

正面, 共 21 行, 上接 P2025, 參看該條第 3 項。轉寫:《佛教集》20—21 頁。研究: 參看 P2025 條第 3 項。

2. 文書

背面, 共 22 行。轉寫:《文書集》第 3 集, 116—117 頁。

P4091

1. 文書

1—3 行。

2. 詔敕

4—7 行。第 6 行有 PARAU"敕"字, 幷有印數方。圖:《文書》第 6 輯, 圖版 155—156。轉寫:《文書集》第 2 集, 123 頁。

P4099

文殊師利無我化身經 (Mañjuśrīnairātmyāvatāra-sūtra)

兩面書，共 445 行。此經或爲于闐人編纂，其中第 267—277 行和 Ch00275《金剛經》第 41 葉正 4 行至 43 葉背 4 行相同。另外，還有數段文字和《贊巴斯塔書》的一些段落相同。卷末題記稱：rradāna rrada viśa' sabava jsa habrrīhe baysaśta brruva "我願王中之王尉遲僧烏波早生淨土"，rrada viśa' śūra jsa habrrīha jsana hūṣaya "我願尉遲輸羅王己躬永壽"。據此，本卷年代應在 967—977 年尉遲輸羅天尊年間。轉寫：《佛教集》113—135 頁。題記部分轉寫，又見《文書集》第 2 集，123—124 頁。研究：與《贊巴斯塔書》相同的部分，見恩默瑞克《贊巴斯塔書—— 于闐文闡揚佛法的頌詩》(The Book of Zambasta, 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附錄二，倫敦，1968 年，437—453 頁；54—82 行，見恩默瑞克《于闐佛教教義中的三種煩惱》(Three Monsters in Khotan)，《伊朗學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77 年，65—74 行；261—277 行，見恩默瑞克《于闐文〈金剛經〉的尾讚》(The Concluding Verses of the Khotanese Vajracchedikā)，《般若波羅蜜多及其相關體系》83—92；又見德格奈 (A. Degener)《于闐文中的四"無窮"》(The Four Infinitudes in Khotanese)，《伊朗學研究》第 15 卷第 2 期，1986 年，259—264 頁；恩默瑞克《于闐文中譯自〈楞伽經〉的幾個詩節》(Some Verses from the Laṅkāvatārasūtra in Khotanese)，《阿斯木森教授紀念論文集》125—133 頁。題記部分，見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鋼和泰卷子年份考》(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泰東》新輯第 4 卷第 1 期，1954 年，92—93 頁；張廣達、

榮新江《敦煌文書 P3510 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168 頁。

P4518 (27)

毘沙門天王像題記

參看 P.t.821 條。

P4649

于闐人發願文

共 22 行。正面繪六手觀自在菩薩，手執法器，坐於蓮座上。又有漢文《丙申年報恩寺殘牒》。圖:《文書》第 5 輯，圖版 121 。轉寫:《文書集》第 2 集，124—125 頁。研究: 6—7 行譯注，見《劄記(四)》894—895 ，907 頁。正面菩薩像，參看饒宗頤《敦煌白畫》第 1 卷，22 頁; 第 2 卷，43 頁;第 3 卷，圖版 29 。

P5532

不空羂索咒心經

共 53 行。文末有漢字殘文 "□□□諸比丘□□□"。轉寫:《文書集》第 5 集，325—326 頁。

P5535

陀羅尼咒

共 8 行，用于闐體梵文書寫。第 9 行爲漢文: "大寶于闐國進奉使司空劉再昇"，據此知本件年代當在942—943年前後(參看 P2782 條第 1 項)。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38—139 頁。

P5536

佛名經

正背面共 11 行。其中提到的 Hūyī Kīmä-tcūnä是 S2471 佛教文獻的作者。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17 頁。

P5536 bis

1. 正面第1行僅殘存兩字。
2. 書儀類文書

   正面2—7行。
3. 神威《善財譬喻經》

   背面1—8行。參看 P2025 條第3項。圖：恩默瑞克刊載《奈伯格紀念文集》第三卷(Monumentum H. S. Nyberg III. Acta Iranica 6)萊頓，1975年，圖版35—36。轉寫：《文書集》第3集，118頁；《文書集》第5集，327頁。研究：恩默瑞克《一件于闐文殘卷：P5536 bis》(A Khotanese Fragment: P5536 bs)，同上論文集第一卷(Acta Iranica 4)，萊頓，1975年，223—236頁。

P5537

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共76行，其中部分是用于闐體梵文書寫的。此卷開頭出自一個學生的手筆，第25行以下則爲教師所寫，學生照抄。正面，漢文《辯中邊論頌》。轉寫：《文書集》第3集，118—120頁。

P5538

1. 天尊四年(970)于闐王尉遲輸羅致沙州大王舅曹元忠書

   正面，共81行。本卷有紀年 thyenä tcūnä sūhye bāḍä tcūrmye kṣūṇä aśä salya paḍauysye māśti nāmye haḍai"天尊四年〔午〕馬歲吉祥之時正月九日"，已由蒲立本考訂爲公元970年(見《鋼和泰卷子年份考》91—92頁)。這是尉遲輸羅致曹元忠信的正本，紙縫及最後年份上共鈐漢文朱印九方，文曰："書詔新鑄之印"；年份前還有一個很大的漢字"敕"和相對應的于闐文 PARAU"敕"。圖：

《文書》第 2 輯，圖版 30—38 。轉寫：《文書集》第 2 集，125—129 頁。研究：貝利《室利尉遲輸羅與大王》，《泰東》新輯第 1 卷第 1 期，1964 年，17—26 頁；《轉寫卷》58—61 頁；黃盛璋《和田文〈于闐王尉遲徐拉與沙州大王曹元忠書〉與西北史地問題》，《歷史地理》第 3 輯，1983 年，203—219 頁。

2．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背 1—8 行。

3．梵文于闐文雙語對照文書

背 9—87 行。似是一位往五臺山朝聖的天竺僧人和一位甘州(?)人的對話。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21—124 頁。研究：貝利《于闐語札記（三）》(Hvatanica III)，《學報》第 9 卷第 3 期，1938 年，521—543 頁；熊本裕《西域旅行者用梵語于闐語會話練習簿》，《西南亞研究》第 28 號，1988 年，53—82 頁。

P5597

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序

共 5 行，每行殘存一半。恩默瑞克將此殘片綴合到 Ch 00120 的左上角(參看《草目》38 頁)。按，Ch 00120 的主要部分（24—93 行)，是用于闐婆羅謎字母拼寫的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托瑪斯 (F. W. Thomas) 在《一件用婆羅謎文拼寫的漢文佛教文獻》(A Buddhist Chinese Text in Brāhmī Script)一文中，刊佈了這一部分的轉寫研究和此卷的全部圖版，載《德國東方學會雜誌》(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第 91 卷，1937 年，1—48 頁。翌年，貝利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考》(Vajra-prajñāpāramitā)一文中，又轉寫了此

卷前 24 行《啓請文》，載同上雜誌第 92 卷，1938 年，579—593 頁。關於此卷，還可參看西門華德 (W. Simon)《藏文轉寫的漢文文獻札記 (A Notes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學報》第 21 卷第 2 期，1958 年，335 頁；瓦雷·普散(L. de la Vallee Poussin)《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卷目錄》(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及附錄：榎一雄編《漢文寫本目錄》，倫敦，1962 年，267—268，251—252 頁；聰果爾 (B. M. Csongor)《一篇婆羅謎字母拼寫的漢文佛教文獻》(A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Brāhmī Script)，《麒麟》(Unicorn)第 10 號，1972 年，36—77 頁。正面，漢文《金光明經》卷一。轉寫：《文書集》第 5 集，394 頁。此處貝利編號作 FM.25，《草目》稱不知何意。按，P5597 是法國國立圖書館在王重民等編目後又找到的碎片之一。FM 應即法文 fragment "碎片，殘片" 的縮寫。研究：高田時雄《敦煌資料所見之漢語史的研究》38—40 頁。

Paris Z

于闐使臣上于闐朝廷書

共 24 行，其中 1—17 行與 Or.8212.162，36—52 行相同，18—22 行與其 99—104 行相同。轉寫：《文書集》第 3 集，126—127 頁。

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邊緣地區和甘肅敦煌，隨同多種古代語言文字的文書和文獻之發現，也找到了屬於中期伊朗語東支的塞語文書和文獻。根據出土情況，塞語文書和文獻可分爲四羣，卽：今和田地區以東至安得悅(Endere)諸遺址出土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者；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由駐喀什的英國總領事馬繼業(G. Macartney)、俄國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 (Petrovsky) 等人在當地通過購買等途徑多方搜求的收集品；塔里木盆地其它地點的少量出品。這些文書和文獻在年代上絕大多數屬於七至十世紀，在內容上絕大多數屬於佛教典籍。這些塞語文書和文獻的出土及其以後解讀的成功揭示了如下已被淹沒的史實：

1. 公元後第一千紀前半期，今和田地區已出現了和田塞語文獻，記錄了佛教內容；

2. 這個時期的和田地區的居民，至少統治上層當是操塞語、信佛教的塞種；

3. 于闐塞語分爲早晚兩期。在喀什東北之今巴楚縣，鄰近古代吐火羅語流行區的圖木舒克 (Tumshuq)，存在着比于闐塞語更古老的圖木舒克塞語①。在吐魯番的木頭溝 (Murtuq) 也發現了一片木頭溝塞語殘片②。木頭溝塞語與圖木舒克塞語的關係類似早期與晚期于闐塞語的關係③。在樓蘭、鄯善地區，特别是鄰接古代于闐國的精絕(尼雅)，以佉盧字體書寫的犍陀羅語 (Gāndhārī) 文書中保存了或混入了某些塞語單詞④。下文將述及，莎車、小石

城等西域古國名稱極可能與塞語有關。至于古代喀什的居民，文獻記載指明，他們講一種稱爲 Känchäk 的塞語⑤（藏文文獻中作 Ga-'Jag）。

基於以上史實，人們更新了概念。今天塔里木地區的人文面貌，乃是九世紀中葉以後不斷突厥化、伊斯蘭化的結果。以和田地區爲例，1004 或 1006 年，建都於喀什不久的黑韓王朝（哈拉汗朝）征服了于闐，操塞語的居民不斷突厥化，維吾爾族逐漸成爲主要民族⑥，于闐作爲佛教中心也變爲伊斯蘭教流行的地區。

一

研究和田地區的古代歷史，亦卽于闐國史，必然涉及塞種，而從古代歐亞內陸的民族活動來觀察，和田地區塞種的活動只是塞種在更廣大地區移徙活動的一部分。具體地說，出現於今和田地區的第一批居民——塞種，是和公元前一千紀前在天山南北、葱嶺（帕米爾）以西直到頓河、多瑙河的整個塞種的活動聯繫在一起的。

關於塞人的起源地點，至今尙無定論。在阿爾泰地區的考古發掘，特別是帕兹里克(Pazirik)墓葬的發掘，提示了一種迹象，塞人不無起源於西部西伯利亞的可能。公元前八世紀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更廣大的地區。約前 650—620 年，塞人立足於南俄草原，以斯基泰之名見稱於希臘典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威脇及於猶太國；另一支越喀爾巴阡山，侵襲巴爾干半島，直抵多瑙河中游，波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都曾對塞人用兵討伐。公元前三世紀，黑海北岸的塞人逐漸融入 Sarmatae 人。巴爾干的塞人則爲 Celts 所消滅。

如果說，活動於歐亞內陸西部的塞種於公元前一千紀末已漸消失，那麽，活動於歐亞內陸東部的塞種則保持其活動較久，而且文獻文書保留了較多的有關他們活動蹤迹的記載。

塞種在漢文典籍如《漢書·西域傳》中稱爲"塞"(sa<sək), 古波斯語作 sakā, 希臘拉丁古典作家作 saca-或 saga-, 印度兩部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多次提到 Saka, 另外, 在佉盧字體文獻中作 saka-(k表示 γ), 婆羅迷字體文獻中作 saka-或 śaka, 其實指的都是一個民族。

古波斯磨崖碑銘中保留了三種不同的塞人名稱: 戴高尖帽塞(Sakā tigraxauda-)、海外(或河外)塞 (Sakā para draya, 此處之河多半指 Ister 河, 今多瑙河)和 Sakā humvrg。後一種塞語的定語有 haumavarga-, haumavrga-等不同讀法, 其意義頗難考釋。有的學者釋爲"食用壓榨汁液者", 有的解釋爲非拜火教僧的宗教禮儀所用"敬畏汁液"。這些解釋未被學界普遍接受, 有的學者甚至視爲"引人發笑之名詞"⑦。另一些學者(如 R. N. Frye, I. Gershevitch, O. Szemerényi)認爲, 古波斯人不可能對不同的塞種作出確切的區分, Saka 一詞的本義無非是"游蕩""游牧"⑧。

相比之下, 漢文史籍對東部塞種的分佈與去向留下了確切得多的記載。東漢初年成書的《漢書·西域傳》在記述西漢時期的西域諸國時, 順便提到了一些塞種的分佈:

> 休循國, 王治鳥飛谷, 在葱嶺西。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 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 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 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 因畜隨水草, 本故塞種也。
>
> 捐毒國, 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 無人民。西上葱嶺, 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 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 隨水草, 依葱嶺, 本塞種也。
>
> 烏孫國, 大昆彌治赤谷城。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東與匈奴, 西北與康居, 西與大

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又，在罽賓國條中有總結性的記述：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另外，同書卷 61《張騫李廣利傳》也有類似記載：

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

上述記載中，休循、捐毒二國的確切地點不可考，但都在帕米爾山中當無疑義，即所謂都城皆在山谷之中。位於其西北方的大宛，即今費爾干納，那裏似是古波斯磨崖碑中 Sakā humvrg 的住地。烏孫在漢代是以伊犂河流域爲中心的大國，它東與佔據蒙古高原到阿爾泰山的匈奴爲鄰，西接大宛，南抵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諸國，這一廣闊領域原本都是塞人的住地，這就和錫爾河以北以東處的高尖帽塞人連成一片。由《漢書·西域傳》上述記載得知，塞種在公元前一世紀的西域分佈很廣，從天山北麓的伊犂河流域，西南經帕米爾高原到克什米爾的罽賓，都是塞人的故地，而且從地理位置上看，天山、帕米爾一帶的塞種應屬於古波斯磨崖碑銘中的戴高尖帽塞人的範圍。

然而，《漢書·西域傳》所記錄的時代，塞種在天山北部地區當家作主的時代已經過去，烏孫已經成爲這裡的主人，所以把這裡稱之爲"本塞地也"，而稱其人民爲"故塞種也"。而且，《漢書》的作者關於塞種的記載，多是和大月氏的西遷引起塞人南遷罽賓這件事聯繫在一起。因此，除了烏孫、休循、捐毒之外，在公元前二世紀前半月氏西徙伊犂河流域之前，西域其它地方是否有塞種，《漢書》等

文獻並沒有留下記錄。值得慶幸的是，近年新疆考古的新收獲補充了史籍的不足，擴大了人們關於塞人的認識。

對於錫爾河以東以北直到新疆地區的戴高尖帽塞人，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書有如下記載：

> 塞人，是斯基泰部落，他們頭戴高聳的尖頂厚毡帽，穿着褲子，有當地產的弓、短劍和特殊的鉞……

蘇聯考古學家在東帕米爾和伊塞克湖（熱海）地區的考古發掘，揭示了據認爲是塞人的墓葬，出土文物反映了物質生活、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內容，也提供了初步判斷是否塞人遺物的許多標準器物。在新疆境內，1966—1967 年，在地處帕米爾山中的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縣城北約四公里處塔什庫爾干河谷西岸第二臺地上的香寶寶（又名香巴拜），發掘了四十座墓葬，年代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紀左右，根據頭骨特徵、埋葬方式和出土器物與蘇聯在此地區發掘的塞人墓葬及出土物的一致性，可以認爲是塞人的遺迹⑨。1983 年，在伊犁新源縣東北二十多公里處鞏乃斯河南岸，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其中有一尊半跪的武士俑，展現了尖帽塞人的一種典型形象，他頭上戴的那頂高高的頂部向前彎曲的圓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與著名的貝希斯通（Behistun）磨崖碑表現的波斯大流士一世（公元前？—486 年）俘獲的塞王斯孔哈（Skunkha）所戴尖頂略向後彎曲的圓帽略有不同，但屬於同一類型。此外，出土物中還有一件方盤，盤內兩角有蹲獸，表現出比較典型的塞人藝術風格⑩。這應是一組先於烏孫的塞人的文物遺迹。1976—1978 年間，在烏魯木齊市南山礦區，天山阿拉溝東口，發掘了四座豎穴木槨墓，年代在公元前五至前一世紀。從豎穴木槨、封丘成鏈向排列的埋葬習俗以及與新源出土方盤風格相同的承獸銅盤來看，可以認爲是塞人的墓葬⑪。

與上述伊犁、阿拉溝發現的游牧塞人文化略有區別，在塔克拉

瑪干沙漠南緣，發現了一些走向定居的塞人文化遺存。1980年，在樓蘭古城東北郊找到兩處墓地，發掘墓葬九座，年代在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紀元前後)，隨葬品多爲實用的陶器、絲、毛、棉織品。據所測六個頭骨的結果，五個與帕米爾塞人的人類學特徵一致，一個屬於蒙古人種⑫，表明兩漢時期樓蘭一帶的居民中，塞人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在我們所關心的和田地區，也有新的發現。1984年，在位於和田洛普縣山普拉鄉南三公里處古河床上(當地人稱作"沙依巴赫"，意爲"河床上的菓園")，先後發掘了52座墓葬，根據碳14測定，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三世紀之間，其葬俗和隨葬物品據說與樓蘭地區發現的塞人遺迹、遺物有某些相似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有個死者的頭上戴着一頂不太高的尖頂毡帽，該墓(編號M01)的年代大致屬於西漢時期⑬。由于這種尖頂毡帽與貝希斯通碑及新源出土武士俑的尖帽不同，因此不能據此判定是否屬於塞人，但最近人類學家對該處發現的頭骨特徵所作的研究表明，他們與帕米爾塞人的頭骨特徵是一致的⑭。這一成果從考古學、人類學角度，確定了塞人在和田地區的存在，我們相信，這批墓葬出土文物的正式公佈，將有助於認淸古代于闐早期居民塞人的文化特徵。

此外，解放前斯坦因、黃文弼、貝格曼等人在羅布泊地區，解放後在孔雀河下游古墓溝、哈密五堡、且末等地，也發現過一些早期人類文化遺迹，其特徵之一是死者頭戴略微尖頂的毡帽。有些學者認爲是塞人的遺迹⑮，可備一說。但如上所述，這種尖帽與確知的塞人所戴尖帽不同，而且古墓溝的人種也與帕米爾塞人有別⑯，有些資料還未做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詳細研究，所以上述文化遺迹是否屬於塞種或尖帽塞人尙需進一步探討。

以上所引史籍和考古材料所展示的天山南北廣大地區的一些塞人遺迹，說明在月氏西遷以前，塞種或文化面貌與尖帽塞種相近

的民族,是新疆境內的主要居民之一,和田地區的塞種正是這個分散的塞種大家庭中的一員。

二

除了考古學的根據外,語言學的研究也爲塞種在和田乃至新疆的存在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人們首次在和田地區發現于闐語寫本的時候,對于這種自十一世紀中葉以來就滅絕的"死語言"毫無所知,只好稱作"不知名的語言"⑰。不久,德國語言學家洛伊曼把這種語言稱作"北雅利安語"(Nordarisch),認爲是印度和伊朗語之外的第三支雅利安語⑱。但這一看法很快就遭到反對,法國的伯希和認爲這種語言與伊朗語最接近,因而稱之爲"東伊朗語"(Iranien oriental)⑲。挪威語言學家斯坦·柯諾夫根據文書的來源和所記內容,證明這是古代于闐國的居民所使用的語言,幷稱之爲"于闐語"(Khotanese)⑳。第三支"雅利安語"的說法顯然有誤,東伊朗語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又過於空泛,仍不能確定于闐語在伊朗語支中的具體位置。這一難點最終爲德國梵文學家呂德斯圓滿解決,他發現這種語言中有一個表示 z 音的特殊字母 ys,而這個同樣的字母又見於印度西北塞種統治者的名稱裡,表明兩地說的都是一種塞語,因此定名爲"塞語"(Saka)㉑。這一說法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于闐古代的語言無疑是一種塞語,現通稱于闐塞語(Khotan Saka),簡稱爲于闐語(Khotanese)。這樣,從于闐使用的語言也證明了古代土著的于闐人應是塞種。

和田,古名于闐,在古代于闐文中作 hvatana,德國于闐文專家恩默瑞克對此詞做了語源學分析,認爲它來自 *hu-vat-ana,意爲"非常強有力的";而 Saka(塞種)一詞來源於 *sak-,意爲"是強有力的",由此從語義上把兩個詞聯繫起來,說明"于闐"一詞和

"塞種"一詞本義無異[22]，從一個側面證明于闐是塞人之地。另外，于闐語中的許多基本詞彙和保存在帕米爾地區的另一種塞語——瓦罕語的基本詞彙幾乎完全相同，如于闐語中的 hīśśana-，晚期作 hīśana-，意爲"鐵"，和瓦罕語的 ĭšn 相同；于闐語的 aśśa-，意爲"馬"，和瓦罕語的 yaš 相同，等等[23]。這也揭示了于闐塞種和帕米爾塞種的親密關係。

學者們對中亞古代語言的研究還豐富了我們對南疆其他地區塞種痕跡的認識，本文開頭提到的圖木舒克塞語和木頭溝塞語的發現，反映了塞人在巴楚地區甚至吐魯番盆地的存在。另外，庫車發現的一件佛教梵語文書記錄了三個國王，由東到西依次爲 Bharuka-rāja, Saka-rāja 和 Hečyuka-rāja。其中之 Bharuka 當是玄奘所記之跋祿迦，漢代稱姑墨，唐代稱撥換，可能即今阿克蘇。Hečyuka 當是漢代之溫宿，唐代之于祝，今之烏什。根據唐代賈耽的《皇華四達記》(《新唐書·地理志》)，原撥換和于祝之間是小石城。據此，文書中的 Saka-rāja 即"塞王"，應是小石城的統治者[24]，表明這裡也是塞種的住地。還有和田、喀什之間的莎車，漢代即以此名著稱，其古音可擬爲 suâ-ki̯wo，與 Saka (塞種)一名非常接近，因此也有人認爲莎車也是塞人的住地[25]。最後，喀什的塞種遺迹也由上述《突厥語詞典》所記 Känchäk 語的詞彙表露出來。

總之，語言學的材料和研究結果表明，和田地區的早期居民和新疆其他某些地區一樣，主要是操印歐語的塞人，更具體地說，是操印歐語系中伊朗語東支的塞語。但是，上述考古、歷史、語言學的材料都表明，各個地區的塞人文化面貌也存在着相當大的差別，所以，把塞種看作是中亞廣闊地域內一大羣不同部落的總名[26]，似乎更爲恰當。作爲于闐最早居民的這支塞人，在新疆地區延續時間較長，直到十一世紀中葉以後，才逐漸融合於突厥回鶻族當中。

但是，我們同時並不否認在很早的時期于闐地區也有其他民族。于闐處在東西交通幹道上，東面的月氏，西面的印度、大夏人都可能來此定居；另外，沿和田河北上抵龜茲範圍，與所謂"吐火羅人"相鄰；南入山嶺，則和諸羌作伴，土著之中也很難不雜入羌人血統。總之，有關上古時代的于闐材料很少，目前還無法指出這些部族在于闐境內所佔的比重，甚至于闐居民的主體民族塞種在于闐的出現，我們也只是依據考古材料和出土文書作出如上的判斷，因爲在晚期于闐人中流傳的建國傳說，沒有給塞人明確地安排任何重要的角色。

三

塞人是否參與了于闐的建國活動，是和于闐塞種的來歷、塞種統治的建立等一系列問題相聯繫的，有必要加以詳細的考察。

于闐何時建立起獨立的王國，早期的歷史典籍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公元七世紀以後的一些佛教著作却詳細地記述了于闐建國的傳說。這種傳說首先見之於唐朝初年去印度取經的三藏法師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中；稍後，慧立、彥悰所作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也記下了同一傳說，但兩書的內容並不一致。在藏文《大藏經》中保存的《牛角山授記》(Riglang-ru Lung-bstan-pa)和《于闐國授記》(Li-yul Lung-bstan-pa)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其成書年代當在八、九世紀，因爲在敦煌發現的《于闐國教法史》(Li-yul Chos-kyilo-rgyus)中有內容相同但文字比較簡略的記述。這些文獻是佛教徒爲了宣揚佛教而寫的，後兩種藏文文獻特別是爲了記錄于闐大小佛寺興建的緣起而編纂的，因而都充滿了佛教的色彩。但有些段落，特別是關於建國的傳說，應是在于闐的古老傳說基礎上蒙上佛教的外衣，因此仍可以多少追尋出某些原始傳說的蹤迹。下面先選錄二、三種有代表性的傳說記載，而後

對其眞僞試加分析。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條的記載如下:

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遣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牧,至此西界,推擧酋豪,尊立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于是回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剋,自古已來,未有能勝。

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回駕,國人稱慶。既不飮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飮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27]。

《慈恩傳》卷五相應的記載有所不同:

其王雄智勇武,尊受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

水草，至此建都，久而無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上剖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向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併諸國，今王卽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㉘。

《慈恩傳》與《西域記》最大的不同點是把阿育王的太子說成是于闐的建國者，而《西域記》則說是豪譴流徙的東土帝子，在殺掉被阿育王譴出興都庫什山北的豪族酋長後建立了王國，這些豪酋是因犯了使阿育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剜掉雙眼的罪而遭譴的，在這裡，阿育王太子只是作爲故事的背景人物而被提及。看來，《西域記》保存的傳說要比《慈恩傳》古老。

藏文典籍《牛角山授記》、《于闐國授記》和《于闐國教法史》三者記載的這一傳說內容詳略不同，但大體一致，應屬同一個系統。現將記載最詳的《于闐國授記》中的有關文字節譯如下：

佛涅槃後二百三十四年，天竺有王名法阿育者。爲向釋迦牟尼佛所加持之南贍部洲所存諸寺塔作禮拜，此王乃出尋善力加持之處而建八萬四千塔寺。

爾時，于闐國海子雖已干涸，然虛曠無人，爲使今于闐城堡處之 Kus-po-yen 不至空曠，此王於夜間在此紮營，而正妃生一男，相貌絕好。先是，王妃入一園林中，當她在蓮池中沐浴時，見毗沙門天及其眷屬於其上履空而過。王妃旣見毗沙門天絕妙之形，竊而思之，受孕而於 Kus-po-yen 生產。法阿育王集諸相士問曰："此嬰之壽命長短？其相好壞？其命苦何？"相者答道："此子相貌端好，命運弘通，非凡人也！其父王壽命未終，卽作國王。"法阿育王以妒恨故，怒曰："其命卽如此弘大，或將在我有生之年篡奪王位。我無需此子，須將其拋棄！"言罷，其母不忍。王怒甚，其母懼王殺此子，忍痛遺棄。爾後，地上隆起一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後因得名曰地乳

(Sa-nu)。

尋有一漢王，乃一大菩薩，擁有千子。先是，此王有九百九十又九子，因少一子，難成千數，故祈求於毗沙門天。毗沙門天即受其請，見功德子地乳恰被遺棄，乃攜送漢王爲子，漢王遂養育之。爾後，地乳漸漸長大，乃請於漢王曰："願尋本生之國，請准出尋其地。"漢王乃給地乳王子以諸種方便，集一萬大軍，送其西向，尋找國土，來至于闐國之平川(Me-skar)。

地乳抵達此地後，法阿育王之宰臣耶舍 (Yasha) 因反對國王而在天竺國身敗名裂，遂親率其子及隨侍臣僕七千餘衆遠離國土，東西尋覓新境，來至于闐玉河上游處。

地乳率其從者來至于闐玉河上游，二者相會於 'Di-nya 下方之杭桂 (Hang-gu-dzo)。王子與宰臣耶舍商談未妥，尋諸干戈，兩邊鋒刃交戰，忽有毗沙門天及功德天女現於空中，兩邊息甲休兵，不再紛爭。地乳王子與宰臣耶舍言歸於好，地乳爲王，耶舍爲臣，漢、梵雙方共同敬立此國而創建都城㉘。

與《西域傳》和《慈恩傳》相比，《授記》的記述要豐富、完備得多。首先，《授記》和《慈恩傳》相同，把建國者說成是阿育王的太子，但又把這個阿育王的太子說成是王的正妃見毗沙門天而感孕生出的，並由地乳養育而成，因名地乳。這就把《西域記》和《慈恩傳》中所記的建國者和在神祠毗沙天王像上剖出的地乳合成一人了。其次，《授記》又把地乳說成是漢王的帝子之一，似乎是想和《西域記》的東土帝子建國說相吻合。最後，《授記》把于闐的建國歸結爲西進的地乳王子所率漢人集團和東來的阿育王大臣耶舍所率印度人集團共同締造的結果。此外，《授記》還增加了不少未見於《西域記》和《慈恩傳》的細節，而且加重了整個傳說的佛教色彩，表明它是建國傳說最晚出的文本。

上引諸書對于闐建國傳說的記載雖然不盡一致，但這顯然是

一種傳說不斷演化、完善的結果。那麽,這些相對晚出的傳說記錄能否反映于闐建國的歷史事實? 對於這個問題, 有的學者給以肯定的答復, 把傳說看作信史, 認爲于闐的建國是阿育王時代的事情; 而另一些學者則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以下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分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關於傳說本身的發展。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傳說,都是七世紀以後由佛教徒記載下來的。綜合幾種漢、藏文獻的內容,至少有三個共同點: (1)此地原本虛曠無人,是外來的殖民團體在此興邦立國;(2)王室的祖先是毗沙門天王; (3)因地乳哺育了王子,他所建之國因而名爲地乳(梵文音譯漢字作瞿薩旦那)。後兩項的主要內容無疑是佛教傳入于闐以後增加的,而第(1)項內容多少保存了一些原始的民間傳說, 但後來也不斷被塗上佛教的色彩。佛教傳入于闐應是公元二世紀以後的事,所以,與佛教有關的種種成份只能是這以後的產物。佛教徒爲了增添佛教的榮光, 先是把于闐王國的建立年代,比附在佛滅後 100 年內的輝煌時代 (見«日藏經»護塔品), 而後又和大力推行佛教的印度阿育王直接聯繫起來(«西域記»),到«授記»時, 更按于闐的王統史, 建國的年代被置於佛滅後 234 年以後的絕對年代裡[80]。因此,現存傳說的第(1)點內容可以追溯到較早的歷史年代; 與佛教有關的(2)、(3)點內容,除國名"地乳"尚需做語源學的考察外, 其產生的年代只能與佛教的傳入相聯繫,而不會早於公元二世紀。

第二,與阿育王傳說的關係。阿育王(Aśoka,?——前 232 年)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的國王。他立佛教爲國教, 派傳教師到各地傳教,被佛教徒尊爲大法王, 有關他的傳說非常多, 在漢譯佛典中就有«阿育王傳»七卷(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經»十卷(南朝梁僧伽婆羅譯)、«阿育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前秦曇摩難提譯)等。由於阿育王在佛教徒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在印度周圍的各佛教王

國都有一種傾向，即把本國的歷史上的重要人物與阿育王的太子比附在一起[31]，晚期于闐建國傳說也是一樣。實際上，上述三種漢譯阿育王傳說只記載阿育王的長子拘那羅（Kuṇāla、法益）被王妃謀抉雙目，並提及王妃及其他預謀者被殺或被監禁，而沒有說遣出雪山以北，當然更談不到遠到于闐。唯《大唐西域記》卷三呾叉始羅國條記載這一傳說時提到，"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祿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32]，爲同書卷十二記他們來到于闐埋下伏筆。到《于闐國授記》成書的時代，阿育王太子乃至阿育王本人都直接成爲于闐建國傳說中的重要角色。比較《阿育王傳》等早期著作，《西域記》和《授記》關於阿育王的輔臣或太子爲于闐建國者的說法顯然是于闐佛教徒的杜撰。不僅如此，于闐的傳說把阿育王描寫成一個多忌好殺的人，他的太子反被說成是相貌絕倫，能力超凡，這顯然是傳說竄改者爲了抬高于闐佛教王國的地位而精心制作的[33]。可以斷言，建國傳說中的阿育王及其太子、大臣只是傳說中的人物，而不是于闐歷史上的眞正建國者，與之相聯繫的大批印度人參與了于闐建國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而且，把于闐建國的年代放在阿育王時期是缺少根據的。

第三，東土帝子或漢王之子的意義。《西域記》明確說于闐是在東土帝子打敗阿育王謫臣後建立的王國，《授記》則把阿育王的太子換成漢王之子，再西至于闐建國，這種傾向也有一定的歷史根源，極可能是于闐受中原王朝強大影響的反映。從歷史上看，這種影響開始於西漢武帝時期（前 140——前88 年），該傳說反映了漢武帝以後漢朝對于闐影響增大的某些事實[34]。但是，《西域記》只說是東土帝子，這還不等於《授記》的漢王之子。或許晚出的《授記》中的漢王之子地乳反映了漢朝逗留長安的于闐質子的情況[35]，漢王之子——漢王身邊的于闐質子回于闐建國，似反映了漢朝勢力的西進。無論事實眞相如何，東土帝子特别是漢王之子建國的

說法，也只能是晚出的傳說，而不是歷史的現實，所謂大批漢人參與了于闐建國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以上分析表明，儘管現存于闐建國傳說講得繪聲繪色，但可信的內容却很少。其中的共同因素是于闐原爲虛曠之地，外來的殖民團體在此興邦立國，這或許是唯一的眞正古老的建國傳說的核心。這些外來的殖民團體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漢人，値得考慮的另一候選者是我們前面指出的于闐早期居民塞種。于闐塞種的來源雖然沒有明確的材料說明，但在公元前二世紀上半葉，天山北部塞種受月氏壓迫大批南遷之際，“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或許可以認爲當時有一支塞種遷到了虛曠無人的于闐一帶，建立了城郭，過起定居的生活。這種假說有待於將來出土的考古材料加以驗證。

幾種于闐建國傳說記載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塞人，但其中提到的一些專有名詞，却透露出一些塞語的痕迹。

《授記》記地乳王子和耶舍分別來到于闐但還未見面的時候，有一段佛教色彩淡薄的文字，似屬於原始傳說的一部分，現轉譯如下：

> 地乳王子從者中有二商人，名 Shel 和 Zang，喜有一牛已孕，卽將分娩，此牛自平川跑到奴盧 (To-la) 之 Zhugs-ngams。二人追尋至奴盧，此牛已生一犢，故而此地因牛犢出生而得名 'Bru-so-lo-nya，而奴盧之 Zhugs-ngams 亦得于闐語之名，曰 Sher-bzang。二人四處眺望，見此地虛曠幽美，曰：“此地最宜爲地乳王子之國。”二人相議於此建國。既至于闐玉河上游，偶遇宰臣耶舍從者，對方問曰：“你等何人？自何處而來？”二人細說地乳王子之事。耶舍派使者至平川謂地乳王子曰：“你乃王系，我是臣族，既合在一處，何不在此于闐地區共建一國，你作國王，我爲臣子。”地乳王子遂率其從者來到于

闐玉河上游。二衆相會於 'Di-nya 下方之杭桂 (Hang-gu-dzo)[36]。

這裡提到的幾個地名應是于闐的原始居民或建國者命名的，找出這些藏文拼寫的地名的原語，有助於說明建國者的族屬。所幸的是，其中兩個地名已由恩默瑞克從語言學角度找出了它們的于闐塞語根源。一個詞是 Sher-bzang，藏文本身就明說是拼寫的于闐文，此詞顯然是兩個商人名字 Sher 和 Zang 的合寫，Sher 應是于闐文 śśära-的轉寫，意爲"好"；Zang 則是于闐文 ysaṃggā-的音譯，意爲"生育"，兩者拼合而成的詞還未在于闐文中發現，但可以構擬爲 śśäraysaṃggā，意思是指那個生犢的牛[37]。這個明確說明是用于闐塞語叫起來的地名，表明這批前來建國的民衆是塞人。另一個詞是 Hang-gu-dzo，此爲東西兩支殖民團體會見處的地名，可以毫無疑問地指出它的于闐文原語是 haṃggūj-，意爲"會見"[38]。這個塞語地名的含意應當也是首批遷來的塞人所賦予的。

最後，着重就"地乳"及由此產生的國名"瞿薩旦那"這個關鍵性的專有名詞加以說明。《西域記》稱："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卽其俗之雅言也"[39]。由地乳養育的神童，是建國傳說中的中心人物，因而地乳就成了這位王子的名字，並進而成爲于闐的雅號。然而，仔細分析一下構成這個名稱的詞素，上述由佛教徒披上層層神秘外衣的地乳之說實際並沒有存在的基礎。"瞿薩旦那"的梵文原形應是 gostana，這已爲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闐文雙語文書證實，于闐字母的拼法是 gaustana,gāstana[40]。如果用梵文語義來解釋，go-意爲"牛"，stana-意爲"乳"，合意應是"牛乳"[41]。"地乳"之說，顯系杜撰。對於"瞿薩旦那"一詞，伯希和有更詳細的考證。他認爲此詞的另一種復原法是 gosthāna，梵文意爲"牛國"，但梵文的 -sthāna有伊朗語的對應詞 -stāna，因此，"瞿薩旦那"也可以說是

由 go＋伊朗語的後綴 -stāna（意爲“國”）構成的，而此詞作爲于闐的雅名，其早期于闐語的形式可以構擬爲 *Gostan。根據這一構擬，“地乳”一說同樣失去了原有的根據。伯希和進一步指出，*Gostāna 或 Gostana 是從公元前二世紀的古老形式 *Godan 演化而來的，不論在哪種語言中，其含義都是“*Go 地（或國）”。而且 Go 這個詞素常見於于闐的專名當中，如梵文化的 Gomatī（瞿摩帝寺），以及 *Gomasālagandha（瞿摩娑羅乾陀塔）等，因此，他懷疑 *Go 可能是國名和人種名[42]。

根據上述前人考證結果，Gostāna 或 Gostana 一名顯然與“地乳”沒有直接的聯繫，用梵文來解釋，意爲“牛乳”或“牛地”，用伊朗語解釋，意爲“牛國”，其中共同的因素是“牛”（go-），這似乎和建國傳說中所述在產牛之地建國不無聯繫。Go 這一共同因素常見於于闐的一些梵文化專名中，除伯希和舉出的外，還可以補上 Gośṛṅga（牛頭山）。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這個詞素在于闐塞語中的情况。上文已經提到，Gostana 的于闐文拼法是 Gaustana 或 Gāstana；另外，“牛頭山”的于闐文拼法是 Gūttauṣanä，“瞿摩帝”的于闐文拼法作 Gūmattīrä；藏文所記于闐寺名 'Gu-zhan-ta 的于闐文原語作 Gūśa'dau[43]。由此可見，Go-在于闐文中作Gau-或 Gū-，這使我們聯想到于闐文中表示“牛”的字 gūha-（牛、公牛）、gūhā-（母牛、乳牛），其佛教梵文對譯詞是 Go-danta-[44]。因此，于闐塞語的詞根 Gau-或 Gū-和梵文 Go-一樣，也有“牛”的意思。于闐的國名（瞿薩旦那）、于闐的最著名山（牛頭山）、于闐的大寺（瞿摩帝、'Gu-zhan-ta）和于闐的大塔（瞿摩娑羅乾陀）等名中都包含表“牛”意的塞語詞根，說明了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或崇拜，這和建國傳說中找牛的那兩位塞種商人的事迹有相通之處，或許露透出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

以上根據考古、人類和語言學資料，論證了新疆古代塞種的存

在，特別闡明了古代于闐的早期居民主體應是塞種，並且詳細分析了被佛教徒歪曲了的于闐建國傳說，指出其中原始內容所包含的塞種活動的遺迹。我們相信，隨着考古工作的進步和研究的深入開展，將進一步弄淸于闐塞種的眞實面貌。

---

① H. W. Bailey, "Languages of the Saka",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tik, I-4-i, Leiden 1958, p.134., R. E. Emmerick, The Tumshuquese Karmavācauā Text, Wiesbaden 1985.

② S. Konow, "Ein neuer Saka-Dialekt"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 1935, pp.43-45, pl.8., idem, "The oldest Dialect of Khotanese Saka".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XIV, 1947, pp.172-173.

③ 赫爾岑恩格《伊朗語言學基礎·中期伊朗語》(Основы Иран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莫斯科，1981 年，234 頁。

④ T. Burrow, "Iranian Words in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II.3, 1935, pp.509—516; VII. 4, 1935, pp.779—790

⑤ 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語詞典》(Maḥmūd Kāshgharī, Dīvān lughāt al-Turk), B. Atalay 土耳其文刊本，安卡拉，1939—1941 年，卷 I，原作者總序部分，9--12，9--19，29—5，32□25，32—28 頁；詞典部分，480—10 頁；卷四，118—26，136—26，442—11 頁；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1985, pp.50-54.

⑥ 參看榮新江《九、十世紀于闐族屬考辨，《新疆社會科學》1987 年第 4 期，76—83 頁。

⑦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II, p.69.

⑧ O.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Wien 1980, pp.44-46.

⑨ 陳戈《帕米爾高原古墓》，《考古學報》1981 年第 2 期；韓康信《塔吉克縣香寶寶古墓出土人頭骨》，《新疆文物》1987年第 1 期，32—36 頁。

⑩ 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鈎沉》; 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兩文均載《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1期, 48—58頁與59—64頁, 附彩色圖版。

⑪ 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 18—22頁,圖版捌; 參看(蘇)李特文斯基等著、李琪譯《論東突厥斯坦塞人的早期歷史》,《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120—121頁。

⑫ 新疆樓蘭考古隊《樓蘭城郊古墓羣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7期, 23—39頁並附圖版; 韓康信《新疆樓蘭城郊古墓人骨人類學特徵的研究》,《人類學學報》第5卷第3期, 1986年, 227—242頁。

⑬ 阿合買提·熱西提《洛浦縣山普拉古墓地》,《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109—111頁。

⑭ 韓康信、左崇新《新疆洛普桑普拉古代叢墓葬頭骨的研究與復原》,《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5期, 91—99頁。

⑮ 王炳華上引文; 王小甫《先秦我國西北的塞種》,《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57—64頁。

⑯ 韓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溝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學報》1986年第3期, 361—384頁, 圖版17—20; 又《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的初步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6期, 61—71頁。

⑰ A. F. R. Hoernle,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u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y of Bengal, LXX. 1,Extra No.1, Calcutta 1901.

⑱ E. Leumann, Zur nordar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Strassburg 1912.

⑲ P.Pelliot,"Un fragment du Suvarṇaprabhāsasutra en iranien oriental",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XVIII, 1913, pp.89-215.

⑳ S.Konow, "Khot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pp.339—353.

㉑ H.Lüders,"Die Śakas und die 'nordarische' Sprache", Sitz-

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 1913, pp. 406-427 (=Philologica Indica, Göttingen 1940, pp.236-255); S.Konow, Saka Studies, Oslo 1932.

㉒ R. E. Emmerick, "Names from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II.2, 1968, pp.88-89.

㉓ H.W.Bailey, "Saka of Khotan and Wakhān", Pratidānạm: Indian, Iran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presented to Franciscus Bernardus Jacobus Kuiper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 by J. C. Heesterman et al., The Hague 1968, pp. 157-159; idem. "Khotan Saka Metal and Mineral Names", Studia Orientalia, 47, Helsinki 1977, p.21.

㉔㉕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II, pp.71-73.

㉖ O.Franke, "Beitra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s der Turkvolker und Skythea Zentralasiens", Sup. to Abhanlungen de Koniglichen P.A.W. zu Berlin, 1904, p.47.

㉗ 季羡林、張廣達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1006—1007頁。

㉘ 孫毓棠、謝方點校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華書局，1983年，120頁。

㉙ R.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pp.14-21.

㉚ 參看山崎元一《于闐建國傳說之一考察》，《山本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72年，469—480頁。

㉛ 參看山崎元一《摩哂陀傳說考》，《東洋學報》第48卷第2號，1966年，第33—34頁。

㉜ 《大唐西域記校注》309頁。

㉝ 參看山崎元一《于闐建國傳說成立之背影》，《國學院雜誌》第73卷第3號，1972年，10—11頁。

㉞ 同上，11—13頁。山崎元一有《阿育王傳說之研究》一書，春秋社1979年版，筆者未見。

㉟ 《漢書·西域傳》傳贊。

㊱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pp.18-19.

㊲㊳ Emmerick, "Names from Central Asia", pp.90,91.

㊴ 《大唐西域記校注》1000頁

㊵ H.Kumamoto, "A Sanskrit-Khotanese Conversation Manual or Central Asian Travelers",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de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Kyoto 1988, pp. 5, 14,25.

㊶ Emmerick,"Names from Central Asia", p.89.

㊷ P.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 1959, s.v. Cotan,

㊸ 以上比定見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p.95.

㊹ H.W.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1979 p.89, s.v.gūha-.

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

前　言

本文將介紹四份敦煌文書，即 P3033 背、P3352、S5659 和 S2113。四份文書的內容爲瑞像目錄和佛教聖蹟的扼要表述，涉及的區域有天竺、尼波羅、于闐、河西、江南等地。其中，簡短條目只用幾字點明其一名稱，如"指日月瑞像記"、"石佛瑞像記"、"于闐牛頭山"；表述聖蹟的條目文字稍長，然而也不過一事數語，行文往往欠連貫。此外，條目之間大多漫無次序，而且每每重出，甚至一份文書之內一事兩、三見。從種種蹟象判斷，這些文書應是佛教壁畫的榜題匯輯或文字設計。例如，P 3033 背面文書第 10 行下有"己東"二字，說明 10 行以上的榜題標記的畫面位於洞窟的東壁或龕頂的東披。又如 S2113 前半(本文以下稱 S2113A 件)文書第 50 行最下方注記"北"字，同文書後半(本文以下稱作 S 2113 B 件)的第 26 行上端注記"東"字，27 行上端注記"西"字。不僅如此，該文書許多條目之旁注有"下，其頭上有冠"，"下，其像承雲"，"其像兩手立"，"其像坐貌"，"下，其像手把袈裟"，"其像海內行"，"其下像側"等等字樣，這不僅僅標明了畫像位置，而且也指示出來畫像的姿勢、裝具等要領；此外，有的條目開頭處標有"丿"或"ろ"等符號，可能是畫匠繪圖時做的標志。有的條目行文作："……時"，如"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決海時"，更是壁畫榜題的標準表達用語。因此，我們推斷以上四份文書應是壁畫的文字設計或繪後記錄，殆無大誤。

四份文書中有相當多的條目稱某某"瑞像"、某某神護某某地，因而，許多爲敦煌文書編目的學者多爲之擬題爲"瑞像記"、"佛像榜題抄"、"佛像題記"等等。四份文書中以記載"瑞像"爲最多，本文在未找到這種性質的文書的本名之前，暫且統稱之爲"瑞像記"，並加引號。

"瑞像記"著錄的榜題很自然地使人們聯想到敦煌壁畫中的瑞像圖。敦煌洞窟壁畫中的瑞像圖從時代上看，多出現於晚唐、五代、宋初，直到西夏的來臨，從其被彩繪的位置看，除莫高第220窟已毀的一組繪在主室南壁外，幾乎全都畫在特定的部位，即甬道頂部南北披、主室龕頂四披，令人仰望諦視的部位。此外，從瑞像反映的內容來分析，它也不同於佛本生故事畫、佛傳畫、譬喻故事畫、因緣故事畫等佛教形像資料，更不同於大乘諸宗大肆宣揚的經變畫，就某些點來說，瑞像圖接近佛教史迹畫，但是，就瑞像的功用而言，看來亦應與史迹畫加以區分。

瑞像不僅見於洞窟壁畫，而且也見於敦煌出土的絹畫和于闐寺院遺址出土的木板畫。爲了全面了解這些瑞像的涵義和功用，人們還需要參照某些文獻記載，除了人們常常引用的《大唐西域記》等佛教僧侶行紀和有關佛典之外，古藏文有關文獻和中世紀于闐語文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看來，只有把敦煌文書中的"瑞像記"、敦煌洞窟壁畫和于闐寺院遺址出土的木板畫中的瑞像圖、敦煌瑞像絹畫以及漢、藏文獻和于闐語文書中的有關材料放在一起作對照研究，才可以看出孤立地、單獨地研究"瑞像記"或瑞像圖所看不出來的某些問題。

本文擬對"瑞像記"和瑞像圖分類加以介紹，而後考察"瑞像記"和瑞像圖特別反映的于闐的情況。通過藏文文獻和敦煌漢、藏語文書，我們看到，在唐末、五代、宋初的于闐，關於佛教像法(Saddharma-pratirūpaka)階段即將過去，末法階段即將到來的

思想在這個佛教國家中廣泛流行起來。自九世紀中葉以後，于闐雖然從吐蕃貴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仍然"常與吐蕃相攻劫"①，十世紀中葉前後，東有勇而好戰的仲雲部族，西有皈依回教的黑汗王朝，嚴重阻礙着于闐使人僧侶的東往西去，也威脅着這個佛教王國本身的安全。在長期戰亂過程中，當疏勒(今喀什)等地佛廟被"不行法賊"②破壞後，于闐的地位一方面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于闐統治階級也對內憂外患之紛至沓來深感畏懼，因而企求神靈的呵護，特別是求助於佛典中所記載的于闐守護神們的佑持，這些神靈於是大量以瑞像的形式出現。因此，瑞像之較多地出現在于闐，並非時間上的巧合，而有其現實的背景。佛教包含着龐雜的、豐富的說教，在特定時期流行的某種說教，必然有其適合現實世界之需要的理由；前已存在的某些神祇在特定情況下被賦予了某些新的功能，應該說是曲折地反映着被宗教顛倒了的現實世界的某些歷史變動。

文獻資料還表明，"瑞像記"中出現的某些于闐護法神祇，顯然與于闐流行密宗或金剛乘有關。而在敦煌的瑞像中，于闐瑞像占很大比重，這種情況除了從一個側面證實敦煌和于闐長期存在着的親密關係外，還反映了于闐在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經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瑞像記"(P3033背、P3352、S5659、S2113)校錄

P3033背：法國科研中心敦煌研究組編《敦煌漢文寫卷目錄》第三卷擬題作"畫榜題抄"③，缺首，未抄完，爲天竺、中亞、中國聖地、塔、佛瑞像的簡短題記。全卷長47公分，寬26.5—26.8公分，"榜題抄"寫在背面，共20行，行17—22字。

P3352第4部分：王重民先生《伯希和劫經錄》對此部分擬題

作"諸佛瑞像記"④。上揭法國敦煌研究組所編目錄爲全卷擬題作"已繪圖像榜題匯抄"或"將繪圖像榜題草稿"，對其第4部分，即第2—3葉第30—44行，擬作"佛瑞像題記"⑤。共15行。全卷長100.9公分，寬28.7公分。

S5659：翟理斯（L. Giles）擬目作"神護于闐的諸佛和菩薩錄"⑥。劉銘恕先生《斯坦因劫經錄》擬作"石佛瑞像記"，並加了問號⑦。共15行，正反面書。全卷長21公分，寬30公分。

S2113：翟理斯擬作"釋迦牟尼佛瑞像記"、"于闐守護神記"和"瑞像簡記"三個子目⑧。劉銘恕先生擬題作"瑞像記"。⑨"瑞像記"中間插入《唐乾寧三年（公元896年）沙州龍興寺上座沙門俗姓馬氏香號德勝宕泉創修功德記》，從而把瑞像等榜題匯編分割爲前後（以下簡稱A,B）兩部分，A共61行，B共27行。全卷長15.5英尺，寬32公分，全卷抄錄年份當在896年之後。

下面是四個寫卷的錄文和校記。

P3033背錄文：

1 舍衛城南大樹林中是釋迦如來生地，沐太子水成油河，
2 今現流不絕立塔記。　此菩提寺高廣大塔，舍利
3 如指，齋日示之，皆便放光，天雨花。此俱睒彌國西石窟前
4 樹下，佛化毒龍已，龍念言，佛今已去，我起惡念，廣損
5 衆生，佛便留影，更無復起惡。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
6 未測(1)其地，羅漢以手遮日，日光所下之處，而便立之。王
7 舍城北那羅陀寺東有迦葉佛時三億羅漢舍利，
8 立塔記之，於今(2)現在。　此像從憍賞彌國飛往于
9 闐東媲摩(3)城中，今現在，殊靈瑞。大目犍連已神
10 通力將三十二匠，往天各貌如來一相時。已東。
11 南天竺國王信邪謗佛一言不〔伏〕(4)，龍樹菩薩手持赤幡，便

12 於王〔前〕(5)立曰，我是大智人，今日天共阿脩〔羅〕(6)戰，須臾身〔首〕(7)從

13 空而下。　北天竺烏杖國石塔高四十尺，佛爲天人說法，

14 塔從地踊出，至今見在。　此是百梯山延法師隱處。

15 後漢恆帝上(8)，安息國王太子出家，名世高，長大來漢

16 地游化，廣度衆生，廟神舍物，世高泛舟於江中，其神

17 又於山頂上出送世高，舉手重別時。佛在毗耶離

18 國巡城行化紫檀瑞像。　世高行至(9)廟所，見同學

19 者爲發願受犯(10)，令神施物已，於江南豫章造寺立

20 塔。　世高施物置寺。　張掖郡西影像古月支王時現。

校記:

(1) 測:原作"側"，據 S2113A 第 59 行改。

(2) 於今:原作"手令"，據 S2113 A 第 4 行改。

(3) 媲摩:《大唐西域記》作"媲摩"，于闐文作phema，見貝利(H. W. Bailey)《于闐語文書集》(Khotanese Texts)第四集，劍橋，1961 年，第 135 頁。

(4) 伏:據 S2113B第 21 行補。

(5) 前:據 S2113B第 22 行補。

(6) 羅:據 S2113B第 23 行補。

(7) 首:原作"道"，據 S2113B第 23 行改。

(8) 上:S2113B 第 19 行作"王"，莫高窟第 108 窟榜題作"二"。疑應作"末"。

(9) 至:原作"立"，S2113 B第 4 行改。

(10) 受犯:似當爲"受記"。

P3352 第 4 部分錄文:

1 分身像者，胸上分現，胸下合體，其像遂爲變形。　南天

竺國彌勒

2 白佛瑞像記。 阿波羅質多神護于闐國。 釋迦牟尼佛眞容

3 從王舍城騰空而來在于闐國海眼寺住。中印度境，佛額上

4 寶珠。時有貧士，既見寶珠，乃生盜心，像便曲躬授珠與賊。

5 毗婆尸佛〔從〕(1)舍衛國騰空而來在于闐國住，有人欽仰，不可思議。

6 濮(2)州鐵彌勒瑞像，今改爲濮(2)陽郡。如意輪菩薩手

7 掌日月。 指日月瑞像記。石佛瑞像記。迦葉佛從舍

8 衛國騰空而來在于闐國住，國人虔敬，無不遂願。

9 觀世音菩薩〔於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3)憍賞彌國佛來住于闐國。 張掖郡

10 西影像古月支王時現瑞像記。 老王莊北佛在地中

11 焉。 中天竺國憍賞彌寶檀〔刻瑞像〕(4)。于闐國舍

12 利弗毗沙門天王决海時。 佛在毗耶離巡城

13 行化時紫檀瑞像。 中天竺摩伽陀國〔放光瑞像〕(5)。

14 摩竭陀國須彌座釋〔迦並銀菩薩瑞像〕(6)。天竺白銀彌勒瑞像。

15 鹿野院中瑞像。

校記：

(1) 從：據文意補。

(2) 濮：原作“瀵”，據 S2113 A 第 26 行改。

(3) 於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據莫高第 231 窟榜題補。

(4) 刻瑞像：據莫高第 231 窟榜題補。

(5) 放光瑞像：據莫高第 231 窟榜題補。

(6) 迦並銀菩薩瑞像：據莫高第 231 窟榜題補。

S5659 錄文：

1 金剛藏菩薩護于闐國。　毗婆尸佛〔從〕(1)舍衛國騰空而來

2 在于闐國住，有人欽仰，不可思議。　虛空藏菩薩〔於西玉河薩伽耶僊寺住〕(2)。分身

3 像者，胸上分現，胸下合體，其像遂爲變形。　南天

4 竺國彌勒白佛瑞像記。　阿婆羅質多神護于闐國。

5 釋迦牟尼佛眞容從王舍城騰空而來在于闐國海

6 眼寺住。　中印度境(3)佛額上寶珠，時有貧士，旣見寶

7 珠，乃生盜心，像便曲躬授珠與賊。　提頭賴吒天王。

8 恭陀那天女(4)守護于闐國。　張掖(5)郡西影像古月支王(6)

9 時現瑞像記。　憍賞彌國佛來住于闐國。觀世音

10 菩薩〔於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7)。　迦葉佛從舍衛國騰空而來在于闐國住，

11 　　　國人虔敬，無不遂願。　石佛　　瑞像記。

12 指日月瑞像記。　如意輪菩薩手掌日月。　濮(8)州鐵彌

13 勒瑞像，今改爲濮(8)陽郡。　本師釋迦牟尼佛令

14 住(9)牛頭山。　觀世音菩薩助于闐國。　寶壇花菩

15 薩助于闐國。　于闐牛頭山，此是于闐國。

校記：

(1) 從：參看 P3352 校記(1)。

(2) 於西玉河薩伽耶僊寺住：據 S2113 A第 55—57 行補。

(3) 境：原作"鏡"，據 S2113 A第 4 行改。

(4) 恭陀那天女：據 S2113 A 第 52 行當是"悉他那天女"。

(5) 張掖：原作"張涙"，據 P3033 第 20 行、S2113 A第 12 行改。

(6) 王：原作"士"，據 S2113 A 第 12 行改。

(7) 於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參看 P3352 校注(3)。

(8) 濮：原作"漠"，據 S2113 A 第 26 行改。

(9) 住：原作"注"，據文意改。

S2113 A 錄文：

1 釋迦牟尼佛從靈鷲山向牛頭山[1]

2 說法來。 王舍城那羅陀寺園[2]

3 有迦葉佛時三億羅漢舍利，立塔記[3]

4 之，於今見在。下，其頭上有冠。 中印度境有寺，佛高

5 二丈，額上寶珠[4]。時有貧士，既見寶珠[4]，

6 乃生盜心，詐見淸君，盡量長短[5]□

7 構梯逮乎欲登，其梯猶短，日日如□

8 漸增高，便興念曰，我聞諸佛求者不

9 違，今此素像吝此明珠如姓明(性命)，並爲座闡(坐

10 禪)，語訖，像便曲躬授珠與賊。

11 此像從憍賞彌國飛往于闐東媲摩[6]

12 城，今見在，殊[7]靈瑞。下，其像承雲。 張掖郡西影像月之[8]王時現[9]

13 瑞像。其像兩足返。 高浮(伯錄浮下有"圖"字)寺放光佛，其光聲如

14 爆。其像兩手立。 指日月瑞像記。 南天竺國彌勒[10]

15 白佛瑞像記。其像坐貌。

16 釋迦牟尼佛眞容白檀身從〔摩揭陀〕[11]國王舍城

17 騰空而來在于闐海眼寺住。其像手把袈裟。

18 釋迦牟尼佛眞容白檀香爲身從漢國騰[12]

19 空而來在于闐坎城住。下其像手把袈裟。

20 釋迦牟尼佛從舍衛國騰空於固城住。

21 結迦宋佛亦從舍衛國來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

22 于闐玉河浴佛瑞像，身丈餘，杖錫持鉢，

23 盡形而立。其像赤體立。 佛在天，又王[13]思欲見，乃

24 令目健連日[14]三十二匠往天圖佛，令匠

25 取各一相。非從[15]降下，其檀〔像〕[16] 乃迎本形禮拜。其像□□□

26 濮州鐵彌勒瑞像，今改爲濮陽郡是。

27 南天竺國達㖼[17]國北，有迦葉佛寺，五香盤

28 石爲之，今見在山中。其像坐。 老莊王地[18]，佛㘣

29 城中，[19]因馬掊[20] 地而出。其像□小佛□□。大目健連已(以)神通𠚤[21]，

30 將三十二匠，往天各貌如來一相。

31 釋迦牟尼亦從舍衛國騰空同來在于闐固

32 城住。手把袈裟。 徽波施佛從舍衛國住，騰

33 空而同來在于闐城住，城人欽敬，不可思

34 議。其下像側。酒泉郡呼輦河瑞像奇異，不可思

35 議，有人求□，獲無量福。其像坐菩薩形。

36 迦葉佛亦從舍衛國騰空而來住于闐國，人

37 皆虔敬，不可思議。其像亦把袈裟。

38 迦葉佛。 伽你迦牟尼佛從舍衛國騰空而來

39 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 此菩提寺高廣大塔，舍利如𢼸[22]，

40 齋日示人，放光，天雨𦆯陀羅花。

41 分身像者，中印度[23]境犍馱邏國東大窣覩波

42 所，有畫像一丈，胸上分現，胸下合體。有一貧女，將

43 金錢一文，謂□我今圖如來妙相，匠功取錢，指

44 前施主像示，其像遂爲變形。

45 北天竺國泥婆羅國有彌〔勒〕[24]冠櫃在水中，有人來

46 取，水中火出。

47 此寺每年正月十六日現大神變，放大光明，一切

48 奔凑，希見此瑞。　　迦迦耶莎利神守護于闐

49 國。　　莎耶末利神守護于闐國。　　莎耶摩利神守護

50 于闐國。阿隅闍天女守護〔于〕(25)闐國。北

51 毗沙〔門〕(26)天王神守護于闐國。　　阿婆羅質多神守護于闐國。

52 摩訶迦羅神守護于闐國。　　悉他那天女護于闐國。

53 世高施物置寺。　　提頭賴咤天王。　毗樓博叉天王。毗樓勒

54 叉天王。　舍利弗共毗沙門神決海至于闐國。　于闐牛

55 頭山。　　虛空藏菩薩如來于薩迦耶僊寺住。

56 彌勒菩薩隨釋迦牟尼佛來住漢城。虛空藏菩薩

57 於西玉河薩伽耶僊寺住。　　佛在毗耶離國巡

58 城行化紫檀瑞像。其佛在海內行。　　此是于闐城。阿育王造八萬

59 四千塔，未測其地，羅漢以手遮日，日光所下之處，

60 而便立之。　　釋迦如來從靈鷲山至牛頭山頂會

61 八部衆說法。舍衞城南樹林中是釋迦如來生地，沐太子水成油河，今現流不絕立塔記。

S2113 B錄文：

1 昔仁(27)王相侵，行陣兩邊，鋒刃交戰，忽有

2 此佛，踊現軍前，仁王睹己，息甲休兵，□□□

3 略，淨心便息，其像便住于闐勃伽夷城。

4 世高行至廟所，見同學者爲發願受記(28)，

5 令神施物，施物已，於江南(28)豫章寺造塔。

6 廟神捨物，世高泛舟於江中，其神又於山頂出

7 送世高，舉手重別時。

8 其寺無憂王之所建立，寺中佛牙舍利，白月圓

9 滿時輝神光，睹者衆庶，咸來供養，見斯瑞□

10 流傳，咸欣授記。其塔阿育王建造，神瑞多[30]

11 能，餘有神變，庶如斯記。

12 北天竺烏杖國石塔高四十尺，佛爲天人說因[31]，

13 其塔從地踊出，至今見在。

14 此是百梯[32]延法師隱處。

15 拘尸那城中純陀故宅，當爲佛設供穿井，

16 其井見在，水香甘味不絕。

17 育王懷地獄已，造寺，咸集四十萬衆僧百過

18 養，又執香爐，請尊者賓頭盧聖僧受

19 供養時。　　後漢桓帝王[33]，安息國王太子出

20 家，名世高，長大來漢地游化，廣度衆生[34]。

21 南天竺國王信邪謗佛一言不伏，龍樹菩薩手擎[35]

22 赤幡，便於王前立言曰，我是大智人，今日因與[36]

23 阿修羅戰，身首而下[37]。

24 柏林寺放光佛，每有潔淨人以手摩佛光□，

25 光明散出，都似火爆。

26 金翅鳥王。東　　乾闥婆王。　　緊那羅王。　　迦樓羅王[38]。

27 龍王。西　　阿修羅王。　　摩喉羅迦[39]王。　　夜叉王[40]。

校記：

(1) 頭山：據本卷 A 第 60 行補。

(2) 東：據 P 3033第 7 行補。

(3) 塔記：據 P3033 第 8 行補

(4) 寶珠：據 P3352 第 4 行、S5659 第 6—7 行補。

(5) 短：據殘存筆劃和文意補。

(6) 娓摩：參看 P3033 校記(3)。

(7) 殊：原作"珠"，據 P3033 第 9 行改。

(8) 月之：伯 P3033 第 20 行、P3352 第 10 行、S5659第 9 行均作"古月支"。

(9) 現：據 P3352 第 10 行、S5659 第 9 行補。

(10) 勒：據 P3352 第 1 行、S5659 第 4 行補。

(11) 摩揭陀：據上下文意補。

(12) 國騰：據莫高第 220 窟榜題及文意補。

(13) 叉王：據《大唐西域記》應作"優塡王"。

(14) 日：疑應作"以"。

(15) 非從：文句不通，似應據莫高第 231 窟榜題作"時佛從天"。

(16) 像：據莫高第 231 窟榜題補。

(17) 達倸：原作"建倸"，據《法顯傳》改。達倸，梵文作 dakṣiṇa，卽今德干高原。參看饒宗頤《達倸國考》，《選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華書局，1982 年，第 459—467 頁。

(18) 老莊王地：P3352 第 10 行作"老王莊北"，莫高第 231 窟榜題作"老王□比"。似應以 P3352 爲是。

(19) 佛在城中：P3352 第 10 行、莫高第 231 窟榜題作"佛在地中"，據補"在"字。又，"城"似應作"地"。

(20) 捂：原作"捂"，據莫高第 231 窟榜題改。

(21) 力：據 P3033 第 10 行補。

(22) 指：據 P3033 第 3 行補。

(23) 中印度：據下文應作"北天竺"。又下第 45 行"北天竺"，據下文應作"中天竺"。

(24) 勒：據莫高 237 窟榜題補。參看孫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

故事畫介紹》(一),《敦煌研究文集》,甘肅,1982年,第337頁。

(25) 于:據上下文意補。

(26) 門:據上下文意補。

(27) 仁:在此意爲“二”。莫高第76窟題記作“二”。

(28) 記:參看 P3033 校記(10)。

(29) 江南:原作“西南”據 P3033 第19行改。

(30) 多:據莫高第108窟榜題補。

(31) 法:據P3033 第13行補。

(32) 百梯:據 P3033 第14行,“百梯”下當有“山”字。

(33) 王:參看 P3033 校記(8)。

(34) 廣度衆生:據 P3033,以下缺一行。

(35) 持:據 P3033 第11行補。

(36) 天共:據 P3033 第12行補。

(37) 身首而下:P3033 作“須臾身道(首)從空而下”。

(38) 羅王:據上下文意補。

(39) 迦:據上下文意補。

(40) 王:據文意補。

二、敦煌壁畫中的瑞像圖及部分榜題抄

就我們的見聞所及,敦煌莫高窟至少有二十七座洞窟中繪有瑞像。很多瑞像圖在畫面之旁附有榜題。這些瑞像圖及其榜題是和敦煌文書中的“瑞像記”相輔而行的,因而,配合起來研究可以互相補充內容。例如,我們在上節“瑞像記”的校訂中,用瑞像圖的榜題添補了某些字句。同樣,瑞像圖旁榜題中漫漶不清的字迹,往往可據“瑞像記”中的條目校補。茲根據謝稚柳先生的《敦煌藝術敍錄》⑩、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⑪、伯希和的《敦

窟號	年代	位置	現存簡況
5	五代	甬道盝形頂南北披	瑞像圖：南披殘存八幅，北披殘存六副。
9	歸義軍張氏	甬道頂南北披	甬道頂中央有毗沙門、舍利弗決海圖等；瑞像圖：南披存八幅，北披存七幅。
25	宋	甬道盝形頂北披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瑞像圖：北披存四幅。
39	五代	甬道盝形頂南北披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南北披爲瑞像圖。
45	五代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南北披爲瑞像圖。
53	五代、宋	主室西壁盝頂帳形龕頂四披	龕頂中央棋格柿蒂花，四披爲瑞像圖。
72	五代	主室西壁盝頂帳形龕頂四披	龕頂中央棋格團花；瑞像圖：西披存八幅，南北披各存五幅，東披藥師佛八身，供養菩薩二身。
85	歸義軍張氏	甬道盝形頂南北披	南北披有瑞像圖。
98	五代	甬道盝形頂南北披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殘)，孫修身同志曾發表其中的于闐牛頭山圖等，見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研究》第二期，甘肅，1983年，第93頁，插圖四。瑞像圖：南披存六幅(東端殘)，北披存七幅(東端殘)。
100	五代	甬道盝形頂南披	殘存瑞像圖二幅。

108	五　代	甬道盝形頂南北披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瑞像圖:南北披各存十幅。伯希和記錄了有關題記,即他的編號第52窟題記(下文)。值得注意的是,此窟的佛教史迹畫與瑞像圖區分得清清楚楚。
126	五　代	甬道盝形頂南北披	甬道頂中央殘存與瑞像有關的畫,孫修身同志介紹過"于闐國太子出家時"的圖像與榜題,見《敦煌研究文集》,第348—349頁,圖版114。南北披有瑞像圖。
144	五　代	前室北壁龕	龕上有毗沙門天王、舍利弗決海圖。
146	五　代	甬道盝形頂南北披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孫修身同志曾細心觀察,發現有榜題作"釋迦牟尼佛騰空至于闐國",見《敦煌研究》第2期,第92頁。瑞像圖:南披存九幅。北披存十幅。
220	五　代	主室南壁	1943年以前存瑞像圖三十餘幅。此主室南壁瑞像畫至堪注意。可惜的是,全壁瑞像圖在1943年爲了剝出下層初唐時期富麗堂皇的經變畫而被破壞無遺,今天只能靠伯希和、羅寄梅拍攝的照片和伯希和記錄的部分榜題了解其概貌,見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第1—6卷,巴黎,1921年,圖版第111幅;松本榮一《敦煌畫的研究》,附圖卷,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圖版93 b 轉載,松本稱之爲"諸佛圖",實應稱爲"瑞像圖";伯希和抄錄了該壁(伯希和稱之爲右側壁)瑞像圖的部分榜題,見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第2分册,第34頁(見下)。羅寄梅夫婦敦煌石窟壁畫攝影No.220—7;韋陀(R. Whitfield)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日文版,第2卷,講談社,1982年,308頁轉載。
231	唐文宗開成四年(839)陰嘉政開窟,歸義軍張氏至宋。	主室西壁盝頂帳形龕龕頂	龕頂中央棋格團花;四披瑞像圖:西披十三幅,南披各八幅,東披十一幅。

236		主室西壁盝頂帳形龕龕頂	龕頂中央棋格團花；四披瑞像圖：西披八幅及供養菩薩、比丘各一身，南披五幅，北披四幅，東披八幅。
237		主室西壁盝頂帳形龕龕頂	龕頂中央棋格團花；四披瑞像圖：西披十三幅，南披八幅，北披八幅，東披十二幅。
313	西　夏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瑞像圖一幅，南北披各畫佛(?)五身。
334	五　代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畫于闐牛頭山、毗沙門天王決海等；南北披瑞像圖(模糊)
340	晚　唐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瑞像圖：南披存七幅，北披存六幅。
342	五　代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南北披爲瑞像圖。
345		甬道盝形頂	據《總錄》：“甬道頂盛唐畫于闐佛敎史迹故事畫一鋪。”（第127頁）。
397	五　代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于闐等地瑞像有關的畫；南北披爲瑞像圖。
401	五　代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于闐瑞像有關的畫；南北披瑞像圖，各存五幅。
449	中唐、宋	主室西壁盝頂帳形龕龕頂	龕頂中央棋格千佛，四披瑞像圖共二十五幅，供養菩薩四身。
454	宋	甬道盝形頂	甬道頂中央當是與瑞像有關的畫，孫修身同志發表了于闐牛頭山圖等，見《敦煌研究》第2期，第92頁，插圖3。南北披瑞像圖，各十六幅。

煌石窟筆記》一、二分册⑫ 諸書，按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爲序，將瑞像圖的年代(本表列舉的只是洞窟中所繪瑞像圖的年代，而非洞窟年代)、位置和簡況表列於下(見 225—227 頁)：

從上表列舉的情況來看，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處有關瑞像情況，因缺乏參考資料而暫不具列)，瑞像圖大多出現於晚唐、五代、宋初，尤以五代宋初曹氏掌權時爲多。其出現部位集中於甬道頂部中央及其南北兩披，主室西龕龕頂四披，唯 220 窟主室南壁已被剝離的瑞像羣爲例外。

據伯希和於 1908 年 2 月至 5 月之間某日所拍攝的 220 窟(伯希和編號第 64 窟)南壁照片，除了一兩身瑞像結跏而坐外，全部單個而立，計最上排存十三身，自上而下第二排存十一身，第三排殘存十身，第四排殘存正中一身及其左側小瑞像一身；照片上尚有個別圖形，疑是屬於其覆蓋着的下層初唐經變畫上的佛像而未計入數內。到四十年代初，當羅寄梅夫婦拍攝同一幅壁畫的時候，上排西端瑞像已損毀，自上而下第二排瑞像還殘存八身，再下第三排殘存五身，其他部位已全被剝脫。現在僅就這點天壤僅存的資料來看，瑞像的數目當在三十餘身以上。這一點也爲 231 、237 窟正室西壁龕頂四披瑞像的數量所證實，所不同的只是 220 窟正室南壁瑞像成排而列於平面，231 、237 窟則分列在龕頂四披之上。

瑞像圖出現的年代集中於晚唐、五代、宋初，它們在石窟中被放置的地位如此固定，這些情況強烈地提示人們注意瑞像的特點，它們在敦煌壁畫中似乎是自成體系。這一點如從瑞像整體內容，其繪制上某些特有表現方法進行研究則更明顯。

目前，瑞像的特點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伴隨瑞像的榜題自然也受到重視。在瑞像榜題還沒有做系統的、完整的登錄之前，我們只好滿足於使用前人已刊布的某些重要的瑞像榜題資料。下面就是一些殘存的瑞像畫榜題，由於有些字迹漫漶難辨，當年抄

錄的文字不免時有錯訛，今據上揭敦煌寫卷"瑞像記"匯輯的榜題錄文略加補苴校正：

第72窟：孫修身同志《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一)中，抄錄了此窟主室西龕盝頂四披的兩條榜題：

1 分身瑞像者，胸上分現，胸下體合，其像隨形神變。

2 中印度境，佛頭上寶珠，時有貧士，既見寶珠，乃生盔(應爲貪)(1)心，像便曲既(2)躬授珠於(3)賊⑬。

校記：

(1) 盔：據 P 3352 第4行、S 5659 第7行、S 2113 A第6行應作"盜"。

(2) 既：衍。

(3) 於：據 P 3352 第4行、S 5659 第7行、S 2113 A 第10行應作"與"。第108窟(伯希和編號52窟)：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第2分冊錄此窟甬道頂南北披瑞像榜題：

1 毗沙門天王守護于闐國。

2 摩訶迦羅神護于闐國。

3 □□□□□□□護于闐國。

4 莎耶[末][利]護[于][闐]國(1)。

甬道頂之湮蝕之榜題字迹有：

1 此是百梯山延法師隱處(2)。

2 其塔阿育王造，神瑞多能，餘有神變。

3 后漢恆帝二(3)安[息]國⑭。

校記：

(1) 莎耶末利護于闐國："莎"原作"苾"，據 S 2113 A第49行改；"末"、"利"、"于"、"闐"四字據補，又"末"，一作"摩"。

(2) 孫修身同志《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一)錄此條榜題同，見《敦煌研究文集》第344頁。

(3) 二：參看上節 P 3033 校記(8)。

第 220 窟(伯希和編號 64 窟)：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第 2 分冊錄此窟主室南壁瑞像榜題(參看上文 220 窟瑞像畫介紹)：

1 迦葉如來從舍衛國騰空至于闐國。

2 分身佛從中印度揵馱羅國來。

3 石佛應現于闐國時。

4 釋迦牟尼佛白檀真容從漢國來𡊨(坎？)[1]城住。

5 □毗婆尸佛從舍衛國騰空至于闐國時。

6 濮州鑲[2]□□□至于闐國時。

7 南無拘留孫佛□□來住于闐國。

8 北方衆□天王決海至于闐國⑯。

校記：

(1) 𡊨：據 S 2113 A第 19 行作"坎"是。

(2) 鑲：據 P 3352 第 6 行、S 5659 第 12 行、S 2113 A第 26 行應作"鐵"。

第 231 窟(張大千編號 47 窟)：本窟內容與 237 窟大致相同。可參看 237 窟主室西壁盝頂帳形龕龕頂四披所畫瑞像圖：西披畫犍陀羅瑞像等十三身，南披畫于闐媲摩城瑞像等八身，北披畫酒泉郡瑞像等八身，東披畫中天竺摩伽陀瑞像等十二身⑯。謝稚柳先生《敦煌藝術敍錄》稱 231 窟同樣位置有"小佛三十五軀"，並抄錄了四披瑞像的榜題：

東披，自左至右：

1 塔(無題字)。

2 業力自遠事將來，業自近事將去，非山非海石□[1]。

3 彌勒菩薩隨釋朱謠城[2]。

4 (題字剝落。)

5 中天竺波羅奈國鹿野院中瑞像。

6 張掖郡佛瀑像月支王時(3)。

7 盤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縣北聖容瑞像(4)。

8 天□白銀彌勒瑞像(5)。

9 摩竭國須彌□釋(6)

10 虛空藏菩薩於西玉河

11 ··························

薩迦耶倦寺住瑞像(7)。

12 中天竺摩加陀國放光瑞像。

13 塔,山中一大手(無題記)。

南披,自左至右:

1 塔(題字剝落)。

2 二佛並立(無題字)。

3 佛在毗耶離巡城行化紫檀瑞像。

4 觀世音菩薩於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于闐媲摩城中雕檀瑞像(8)。

5 中天竺摩訶菩提寺造釋迦瑞像。

6 此牛頭山像,從耆山履空而來(9)。

7 ······································

指日月像。

8 塔(無題字)。

西披,自左至右:

1 ···············

2 ···············

3 足揞出

老王□比佛在地中,馬(10)。

4 迦葉佛從舍□□□於固城住瑞像(11)。

5 陳國聖容像。

6 于闐海眼寺釋迦聖容像。

7 分身瑞像者，乾陀羅國二人出錢畫像，其功畢，一身二頭[12]。

8 微波施佛從舍衛城騰空於國城住[13]。

9 于闐坎城瑞像[14]。

10 中天竺憍怕彌寶檀刻瑞像[15]。

11 高浮寺放光佛，其光如火[16]。

12 時佛從天降下，其檀像及仰禮拜時[17]。

北披，自左至右：

1 塔(無題名)。

2 ……………

3 于闐國石瑞像。

……………

4 釋迦牟尼眞容從王舍城騰空住海眼寺。

5 酒泉釋迦牟尼瑞像[18]。

天竺摩加國觀世音□[19]。

6 于闐古城瑞像[20]。

7 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決海時[21]。

8 塔(第七題字在此)⑰

校記：

(1) 此條孫修身同志錄作“業力自遠牽將來，業力自近牽將去，非山非海非石”，見《敦煌研究文集》第337頁。伯希和錄文同。

(2) 此條似即 S 2113 A 第56行“彌勒菩薩隨釋迦牟尼來住漢城”。

(3) 此條史葦湘同志錄文“濕”作“影”，“月支”作“月氏”，“時”下有“見”字(見史葦湘《關於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敦煌莫

高窟內容總錄»第199頁。下引史錄頁數並同此)，上節所刊四件“瑞像記”文書同史錄，應據改。

(4) 此條孫修身同志錄文“討”作”府”，“禾”作“和”，“比”作“北”(«敦煌研究»第2期，第106頁)。史錄同。應據改。又，史葦湘同志錄文“仰容山”作“御谷山”。武威新出殘碑有“御山”名；見«敦煌研究»創刊號，第102—103頁。

(5) 據 P3352 第14行“天”下當補“竺”字。

(6) 此條孫修身同志錄作“摩伽(陀)國須彌座釋迦並銀菩薩瑞像”(«敦煌研究»第1期，甘肅，1982年，第105頁)，史錄同，唯“摩伽”作“摩竭”，與謝錄同。此條應據孫錄補。

(7) 據 S 2113 A 第55—57行、孫修身同志237窟錄文(«敦煌研究»第1期，第100頁)，“虛空藏菩薩於西玉河”和“薩迦耶倦寺住瑞像”兩句應連讀爲一句，“倦”應作“僊”。

(8) 嬤摩，孫修身(«敦煌研究»第1期，第98頁)、史葦湘同志錄作“媲摩”。參看 P 3033 校記(3)。

(9) 此條孫修身同志錄文“像”前有“瑞”字(«敦煌研究»第2期，第93頁)。

(10) 據 P 3352 第10行、S 2113 A第28—29行，此條應作“老王莊北，佛在地中，馬足掊出”。

(11) 據 P 3352 第7—8行、S 5659 第10—11行、S 2113 A第36行，此條應作“迦葉佛從舍衛國騰空而來於固城住瑞像”。

(12) 此條史葦湘同志錄文“乾”作“健”，“二人”上有“貧者”二字。

(13) S 2113 A 第32—33行，“微”作“徽”，“國”上有“于闐”二字。

(14) 孫修身同志237窟同條錄文同(«敦煌研究»第1期，第99

頁)。

(15) 據 P 3352 第 11 行,此條"憍惛彌"應作"憍賞彌"。

(16) 其光如火,據 S 2113 A 第 14 行作"其光聲如爆"。

(17) 據孫修身同志錄文(《敦煌研究文集》第 333 頁)、S 2113 A 第 25 行,"及"應作"乃"。

(18) 史葦湘同志錄文"酒泉"下有"郡"字;"像"上無"瑞"字。

(19) 史葦湘同志錄文"摩加"作"摩迦","音"下有"菩薩"二字。

(20) 史葦湘同志錄文同。

(21) 孫修身同志 237 窟同條錄文同 (《敦煌研究文集》第 352 頁)。

三、新德里、倫敦分藏的一幅瑞像絹畫 (Ch. xxii 0023) 和于闐寺院遺址出土的瑞像圖

在斯坦因從敦煌莫高窟拿走的絹本、麻布、紙本畫和綉幡之中,有一幅表現天竺、于闐乃至河西走廊地區瑞像的絹本着色繪畫,編號ch.〔千佛洞〕xxii 0023, 一些學者將其定名爲"釋迦瑞像圖"⑱。這幅絹畫早已碎爲多段,當英國博物館和印度新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國立博物館)根據 1917 年去世的比利時學者佩特魯齊 (R. Petrucci) 制定的分配方案而瓜分斯坦因從我國新疆、甘肅拿走的文物時,這幅絹畫比較完整的一大片(應是原畫的左半部)分給了新德里博物館,另外幾段碎片交英國博物館收藏⑲。據說,列寧格勒的埃米塔什 (Эрмитаж) 博物館還收藏着這幅絹畫的殘片⑳。我國文物流失海外,而且一物分尸數地,嚴重地阻礙着研究工作的進行,這又是一個令人心傷的典型例證。

這幅瑞像絹畫既然已碎爲多段,因此,如何排列或裱裝便成了

問題。自 1910 年起，日本人大橋氏、滚原氏就參預過斯坦因盜走的敦煌繪畫的復制裱裝工作，滚原氏是否研究過這一幅瑞像絹畫的排列,我們不了解情況。二十年代初,斯坦因大概在得到一些研究繪畫的專家學者幫助的情况下,提出一種排列方式,卽將英國博物館收藏的最大殘片拼接在新德里博物館收藏的殘片的上部，這就是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刊布的樣式。其後，索珀依據的是英國博物館的排列法㉑。最近，英國博物館專門從事整理和刊布斯坦因蒐集的中亞藝術品的韋陀博士認爲，斯坦因發表的拼接排列次序,反映了幾大碎片之間正確的相對位置,他以此爲基礎提出了一種新的排列法，但仍有零星碎片無法安置㉒。考慮到這幅絹畫的某些碎片據傳還在列寧格勒，此畫的進一步復原或許尙需俟諸異日。

這幅絹畫的各段殘片盡管在排列上存在着問題，但是很早以來就吸引着學者們的注意,有的甚至被譽爲"斯坦因在敦煌洞窟發現的最引人矚目的文物之一"㉓。這幅瑞像圖，或者更正確地說，這幅由若干瑞像集合而成的瑞像羣體圖之所以如此引人注意，看來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敦煌，繪畫、刺綉等藝術品中，大約一半或一半以上是菩薩像。菩薩像有的單獨只畫菩薩一身，有的伴以菩薩的隨侍和供養人像。菩薩像在敦煌大量存在的事實，正如斯坦因指出的,再好不過地證明,在大乘佛教影響之下，菩薩尤其是觀世音菩薩在東方佛徒中享有巨大的優勢㉔。相比之下，這幅絹本"釋迦瑞像(羣體)圖"就占有着獨特的地位。此外，吸引着更多學者注意的是這幅絹畫的圖像學和造像藝術方面的特色，幾位研究印度和西域藝術的專家指出，這幅瑞像畫中某些佛像的相好、寶冠、裝身具乃至天蓋、火焰光等許多細部表現，反映了犍陀羅藝術的影響，或體現了犍陀羅和六世紀北魏風格的混合形式㉕。有些學者,例如韋陀,正是根據佛像學和藝術風格兩方面的特色而傾向

於把這幅瑞像絹畫的年代盡量提前，提到早於斯坦因從敦煌帶回來的其他絕大多數繪畫的時期，並推斷它極可能是七世紀的作品，至少不是晚到八世紀末之物，因而把該絹畫列入初唐期(七世紀至八世紀初繪畫之內)[26]。

我們對於佛像學和佛教藝術了解不多，對於通過藝術風格對這幅瑞像畫所作的斷代不能多加評論。在這裏，我們感興趣的是這幅瑞像畫的內容。如前所述，這幅絹畫上繪有尺寸大小不同的瑞像十八身以上，有的獨自一尊，有的伴有隨侍。玆將其中有前人比定結果的瑞像匯總介紹如下：

藏於新德里博物館的斷片：

1. 上排左側坐像：佛交脚坐於石上，作指地印 (bhūmisparśamudrā)，原榜題殘存："中天竺摩伽陀國放光瑞像。圖讚曰：此圖形令儀顏首，絡以明珠，飾以美璧，方座稜層，圓光□瞻仰尊顏功德。"[27] (方格中字是我們補加，下同。) 斯坦因最早將其比定爲釋迦初成正覺瑞像[28]；魏禮、羅蘭德則據題記認爲是摩伽陀國金剛座上放光佛瑞像[29]；而索珀却據莫高第231窟所繪瑞像圖及榜題，認爲是"中天竺摩訶菩提寺〔造釋迦〕瑞像"[30]。按孫修身同志在《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二)中刊布的231窟摩訶菩提寺瑞像[31]，作立像，而非交脚而坐，故索珀之說不足取，此像應以榜題所示內容爲準。

2. 上排中間立像：佛立於蓮臺之上，右手上舉作施無畏印 (abhaya-mudrā)，左手下垂，捻袈裟，身光中繪滿對稱而坐的半身小佛像。斯坦因、魏禮比定爲舍衛城釋迦牟尼〔分身億萬〕瑞像[32]；羅蘭德認爲難以肯定，同時指出這尊瑞像的衣褶、身光千佛與和田熱瓦克 (Rawak) 佛寺遺址殘存的佛雕像下半完全相同[33]；索珀則依據"瑞像記"文書

和洞窟榜題，疑是媲摩城檀像㉞。

3. 中排左側四小瑞像之左上角像：佛交脚而坐於華蓋下椅上，兩手上舉，手掌朝外，兩旁上有飛天，下有雄獅，殘榜題作："迦毗羅𠀤國銀瑞像。圖讚曰……眞容……像則功德"㉟。魏禮據殘題記定爲迦毗羅衞 (Kapilavastu) 國銀瑞像㊱。

4. 中排左側四小瑞像之右下角像：佛坐於三個象首之上，魏禮比定爲佛在王舍城戰勝象王時瑞像㊲。

5. 中排中間坐像：此像交脚坐於龍座之上。魏禮根據其衣飾認爲是一尊菩薩㊳；羅蘭德一方面認爲此像確實爲菩薩狀，一方面又根據其座下的龍，推斷爲佛陀征服龍王瑞像㊴；索珀疑是張掖郡西影像㊵。

6. 中排右側立像：佛立於蓮臺之上，身光頂端有小佛坐於蓮花之上，兩菩薩侍之，有鹿跪於菩薩之下，下層殘存此像的榜題："中〔天竺〕婆羅痆斯國鹿野苑中……像。圖讚曰……尊面。"㊶ 斯坦因認爲即佛在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㊷；魏禮遵從其說㊸；索珀參照洞窟榜題，指此原題應爲"中天竺波羅痆斯國鹿野苑中瑞像"㊹。

7. 下排左側立像：菩薩立於蓮臺之上，右手持蓮，左手提瓶，兩旁有小坐佛和供養人及鳥、獅等，背景爲岩石，魏禮、羅蘭德認爲是伽耶城菩提樹精舍三重洞外龕室左側的觀世音菩薩像㊺；索珀則比定爲觀世音菩薩於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㊻。

8. 下排右側立像：佛立於蓮臺之上，右手下垂，左手把袈裟，背景爲岩石。斯坦因、魏禮、羅蘭德一致比定爲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瑞像㊼；索珀據"瑞像記"和洞窟榜題，勘定爲"釋迦牟尼佛眞容從王舍城騰空而來在于闐國海眼寺

住”[48]。

藏於英國博物館的斷片：

1. 絹畫殘片，繪右手指托日輪立佛像。索珀指出，西安陝西省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同形制的石刻佛像，像下的題記寫作“釋迦牟尼佛降服外道時”，但“瑞像記”文書中沒有這個條目，因此，這裏所畫的或許是“瑞像記”中的“指日月瑞像”[49]。

2. 絹畫殘片，繪二人攜梯於殘佛像旁。索珀比定爲“中印度境佛額上寶珠，時有貧士旣見寶珠，乃生盜心，像便曲躬授珠與賊”[50]。其中的梯子，見 S 2113“瑞像記”，可知其比定不誤。

3. 絹畫殘片，繪矛與塔。此當是毗沙門天王像。

羅蘭德、索珀等人在比定這些瑞像過程中，發現瑞像都有形制相同的原型，如新德里藏斷片上排中間之立像，即比定爲舍衛城釋迦瑞像者，與和田熱瓦克寺院遺址出土的立佛雕像殘存之下部完全相同；中排中間佛或菩薩像和白沙瓦省立博物館所藏一尊犍陀羅式雕像極其相似[51]；索珀在考證倫敦英國博物館所藏殘片上的指日月瑞像時，則發現與西安的陝西省博物館的石像同一形制。絹畫瑞像與石刻瑞像之如此近似或一致的事實告訴人們，瑞像的造作，無論是雕刻，還是繪畫，都嚴格地遵循着某一原型。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從于闐廢寺出土的一些佛像木板畫中尋找瑞像的原形或其復制品，這些文物在本世紀初被外國探險家掠走，現分藏在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和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據美國學者威廉斯（J. Williams）夫人的收集考訂[52]，和闐出土的瑞像有：

1. F. II. iii.002：木板正面畫蘭邊白袈裟立佛瑞像，左手握

袈裟，右手作施無畏印。

2. F. II. iii. 4：木板上繪蘭邊白袈裟立佛瑞像，左手握袈裟，右手作施無畏印。

3. Met.30.32.96：木板上繪白邊紅袈裟立佛瑞像，右手作施無畏印。

4. Met,30.32.95. 木板上繪紅袈裟坐佛瑞像，作禪定印。

這些瑞像都拘泥於一定的形制，人們正是根據其固定化了的形制才在沒有榜題的情况下判斷其屬於瑞像。

此外，和闐還出土了一批毗沙門天王像、藥叉大將散脂(Sainj-aya)像，爲研究敦煌的"瑞像記"、瑞像圖添加了參考資料[53]（見下文）。

此外，前蘇聯還藏有若干于闐出土的佛像[54]，其中有無瑞像，因有關材料未得寓目，不敢妄説。

我們根據上述材料所反映的情况而產生了一種不成熟的看法：瑞像既然十分拘泥於其原型，則瑞像反映的某些藝術風格只是時代較早的原型的模寫，並非瑞像本身時代絕對特徵。我們認爲敦煌出土的這幅絹本瑞像羣體圖和敦煌壁畫上的瑞像圖、敦煌寫卷中的"瑞像記"是同一性質的東西，其時代仍應屬於敦煌洞窟大量繪制瑞像的時期，即公元九世紀下半葉或稍早時期直至十一世紀初。

四、瑞像概説

上文粗略介紹了敦煌寫卷中的"瑞像記"文書、敦煌壁畫中的瑞像圖及其若干榜題、敦煌瑞像絹畫及其榜題、于闐地區一些寺院廢址出土的瑞像木板畫。這些瑞像資料的表現形式各異，有的形諸文字，有的圖爲形象，但是性質完全相同，圖文正可互相補充、互相印證，共同反映着瑞像的某些特徵。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看出：

(一)、"瑞像記"、瑞像圖及其榜題等等表現的瑞像圖幅數目是穩定的,總數大約三十幾幅。

(二)、數目相對穩定的瑞像,就其內容而言,可分爲幾類,幾類之間還有着發展關係。首先,釋迦牟尼眞容或聖容、釋迦的傳說在印度某些地點顯示靈迹或聖迹的形象在"瑞像記"、瑞像圖中占着中心地位。在這裏,概未收入譬如彈多落迦山蘇達拏太子栖隱、醯羅山捨身聞偈、屍毗王割肉貿鴿、摩訶薩埵捨身飼虎一類的佛本生故事;如果說這裏有釋尊以外的佛陀的話,那也是與前世佛迦葉等其他過去六佛有關的瑞像。同樣,這裏除了"舍衛城南沐太子水成油河"個別條目或圖幅之外,也不收入佛傳故事,因而孤零零收入的上一條文也給人以偶然闌入瑞像之中的印象。以上一類瑞像核以佛典和僧記中有關記載,當與起源於印度的傳說有關。

其次,在瑞像中,釋尊等神祇運用神力飛來于闐的瑞像在數量上占了絕對優勢,在這一類瑞像中,牛頭山以及與牛頭山有關的瑞像占着中心位置。所有與于闐有關的瑞像的特點在於他們都負有呵護于闐的使命。核以佛典、僧記和藏文、于闐文資料,這一類瑞像的出現顯然與當地政治形勢的變化和佛教某些教派的流行有關。

再次,"瑞像記"、瑞像圖中有些內容類似佛教史迹畫和感應故事畫。其中屬於印度境內的有阿育王造塔、北天竺烏杖國石塔涌出、尼婆羅水火池等等。這一類瑞像的存在開了先例,使得漢地也增殖出來"張掖郡西影像,古月支王時現瑞像"、"濮州鐵彌勒瑞像"、"酒泉郡呼蓳河瑞像"、"安世高化度同學,於江南舍物置寺"、"百梯山延法師隱處"幾個內容。和《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等書出現的道理一樣,漢地佛徒總是需從本地找出同樣的某些靈異,於是,某些地點的傳說便有幸被賦予了瑞像的屬性,經過固定化的過程而傳開,因此,最後一類內容的瑞像即便形式上與佛教史迹畫或感

應故事畫相似，實際作用也不盡相同。具體說來，某些與佛教史迹畫或感應故事畫相似的圖像一旦被納入瑞像範疇，便受到與其他瑞像同樣的崇拜，這就把它們和孫浩迎康僧會、西晉石佛浮江等一般史迹畫或感應故事畫區別開來。

(三)、瑞像隨佛像的產生而產生[55] 但又與大量存在的一般佛教造像不同。在佛教徒心目中，凡被稱爲瑞像的應是釋迦眞容或聖容的模寫[56]，至少是和釋迦以及其他神祇或聖者的某些靈迹(例如放光、飛來等等)聯系在一起。眞容或具有靈異，這不妨說是瑞像所以成爲瑞像的必須具備的條件。瑞像見於記載之最早者應該說是憍賞彌國 (Kauśāmbī) 優塡王 (Udayana, 又作鄔陀衍那王，漢名又譯作出愛王)造旃檀瑞像和拘薩羅國 (Kosala) 波斯匿王 (Prasenajit) 造黃金瑞像。後日的佛徒們深信，這是佛陀在世時的直接眞貌，當優塡王(以及波斯匿王)渴思佛陀聖容時，佛陀十六弟子之中最具神通的大目犍連運用神通力，把三十二名工匠帶至天上，使每位工匠各自模寫了佛陀三十二相之一相。優塡王造旃檀佛像的傳說流布甚廣[57]；優塡王所造旃檀像的仿制像或模擬像也很早傳入中國。這些傳入中國的仿制像也被稱爲瑞像，例如《梁書》記載，519 年(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扶南國遣使所送天竺旃檀像即被稱爲"天竺旃檀瑞像"[58]。以上所說是取海路經南海而來到中國金陵的瑞像。另外，優塡王造像也經天竺西北從陸路傳到中國，例如慧乘於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圖寫的檀像，就是鳩摩羅什帶到東都的[59]。總之，瑞像作爲佛像的一種類型產生於印度之後，即被模寫倣造，傳播極廣。王玄策於 643—661 年間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至高宗龍朔元年) 數度出使印度，曾建銘靈鷲山 (耆闍崛山 Gṛdhrakūṭa)[60]、立碑摩訶菩提寺 (Mahābodhi)[61]，這些都是"瑞像記"、瑞像圖中一再出現的地點。王玄策歸國後撰述的記載稱"西國瑞像無窮"[62]，這是親履印度的人的目睹記錄。玄奘求法印

度稍早於王玄策之出使的年份，他在643年歸國時帶回一系列佛像，佛像名目列在他帶回的經書之前，計有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擬憍賞彌國出愛王（即優塡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眞像刻檀佛像一軀（參看前文），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疑應作檀）像銀佛像一軀，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63]。除了一個例外外，所有這些佛像前面都有一個"擬"字，也就是說，這些都是傳說眞有靈迹的"瑞像"的模擬像。

（四）、由此可見，到了中土仍稱瑞像之佛像，多與傳說中的佛像原型有關。玄奘帶回來的都稱擬像，雖非原像，但必然力求逼眞。在這裏，我們又間接得到了瑞像爲什麼拘泥原型、恪守原型的原因的解釋，即擬像應竭力追蹤原像。《酉陽雜俎》續集卷五寺塔記上靖善坊大興善寺條記："《新記》云：優塡像，總章（668—669年）初爲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塡在荆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開目，其工頗拙，猶差謬矣"[64]。大興善寺新雕旃檀像之所以被譏爲旣差且謬，除了其工頗拙之外，顯然還因爲它背離了已固定化了的原型。因此，瑞像的又一特徵應該說是具有一定的固定化的型式。

總而言之，瑞像的主要特徵是它遵循着固定的原型；每個瑞像一般只有一個畫面，往往表現顯示靈瑞的瞬間；瑞像總數有限，這和一般的可以繁衍的佛敎史迹畫或感應故事畫不同。這種固定化的、數目有限的、顯示靈瑞的瑞像的功用不僅僅象一般佛畫那樣是爲了宣揚佛敎，而主要地着眼於以靈瑞來護持日益受到各種威脅的佛法。由於瑞像的研究還處在初步探討階段，以上對瑞像的一般特徵的敍述容有不當，敬盼讀者給予指正。

五、"瑞像記"、瑞像圖等資料反映的于闐

如前所述,"瑞像記"、瑞像圖及其榜題著錄的大批佛陀、菩薩、天王、龍王等等紛紛飛來于闐,其中既有源於印度傳說的神祇,也有于闐當地添加於其中的成員。現即分類舉例如下,略示于闐佛教萬神殿的內容。

(一)佛陀類

(1)釋迦:釋迦自天竺飛來或住牛頭山,或住于闐海眼寺,或住坎城,或住媲摩城。

住牛頭山的記載有:

"本師釋迦牟尼佛令住牛頭山"(S 5659 第 13—14 行)。

"釋迦牟尼佛從靈鷲山向牛頭山說法來"(S 2113 A 第 1—2 行)。

"釋迦如來從靈鷲山至牛頭山頂會八部衆說法"(S 2113 A 第 60—61 行,莫高窟第 98、146、231、237 等窟瑞像榜題)。

"于闐牛頭山,此是于闐國"(S 5659 第 15 行,S 2113 A 第 54—55 行,莫高第 98、354 等窟瑞像)。

查釋迦自印度騰空而來于闐牛頭山的記載甚多,較早的有《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五日藏分護塔品第十三:"佛告龍王:'我今不久住瞿摩娑羅牟尼住處,結(迦)〔跏〕七日受解脫樂,今于闐國於我滅度後一百年,是時彼國還復興立……'"[65] 按瞿摩娑羅(Gomasāra)早經烈維(S. Lévi)比定爲于闐南方的牛頭山,也就是五世紀初安陽侯遇梵僧佛馱斯那(Buddasena)的衢摩帝寺[66]。

《一切經音義》卷十一于闐條下注:"彼城中有毗沙門天神廟,七層木樓,神居樓上,甚有靈驗。其國界有牛頭山,天神時來,棲宅此山。"[67]

藏文《甘珠經》中的《牛角山授記》(Gośṛṅga-Vyākaraṇa, *Ri-*

Glang-ru-lung-bstan-pa）當是不早於七世紀下半期的作品[68]，其中記載說：“如是我聞，世尊釋迦牟尼佛經歷無數劫後……而成正果，在瞻部洲化衆之後曾住吠（或作毗）舍釐國王舍城（按王舍城不屬吠舍釐）大瑜伽仙人（Yoga-Ṛṣi）之處”[69]，“……爾時世尊深思未來〔于闐境內〕Dge-ba 之地，而對衆隨侍說：‘善男子！北方 Go-ma（按即于闐之哈拉哈什河之土名[70]）河岸牛角山（即牛頭山）旁有聖者大仙人之塔，名瞿摩娑羅香，應加修飾。’爾時世尊及其全部隨侍升空……來到牛角山處。”[71] 按釋迦來到牛角山瞿摩寺後，當衆隨侍面賜予牛頭山及諸寺以種種福祐，並對佑護該地做了種種部署，這也就是構成《牛角山授記》一書的內容。

又《于闐國授記》（*Gostana Vyākaraṇa，Li-yul-lung-bstan-pa）錄自《瞿摩娑羅乾陀寶塔及牛頭山釋迦牟尼大像安置功德經抄》的記載稱：“爾時于闐久爲湖泊（Saras），釋迦牟尼佛爲預言：該湖將成陸地獲治之國，乃引菩薩、聲聞弟子在內之二十萬衆，龍王、天人等八部衆於靈鷲山升空。既至于闐，時爲湖泊，乃坐於今mgo-ma（按即 Go-ma，哈拉哈什河）河附近水中蓮華座上。釋迦預言該湖泊將變爲獲治之陸地之國，乃口申敎勅，命包括八大菩薩在內之二萬隨侍、三萬五千五百〇七眷屬之護法神祇護持該國的這一供養聖地。舍利弗、毗沙門奉勅而開通墨水山，排除湖水，而得地基。佛於原來蓮華座上，在牛頭山現今立有釋迦牟尼大佛像處結跏七日，而後返回天竺國之吠舍釐城。”[72]

關於牛頭山，學者已比定爲今和田縣城（伊里奇城）南偏西二十餘公里處的 Kohmarì 山[73]。牛頭山在敦煌瑞像圖中表現爲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首先畫出一組山峯，其頂部畫出牛頭，嘴、鼻、眼、耳、角等具全，牛頭之上爲蘑菇雲狀佛座，座上爲佛像或殿堂式建築；另一形式是首先畫出蘑菇雲狀佛座，其上爲牛頭，牛頭之上爲佛像而沒有殿堂建築[74]。

佛陀住于闐海眼寺的記載有:

"釋迦牟尼佛眞容白檀身從摩揭陀國王舍城騰空而來在于闐海眼寺住"(P 3352 第2—3行,S 5659 第5—6行、S 2113 A第16—17行)。

"釋迦牟尼眞容從王舍城騰空住海眼寺"(莫高第231窟龕頂北披左數第四身瑞像榜題)。

"于闐海眼寺釋迦聖容像"(同上窟龕頂西披左數第六身瑞像榜題)。

伯希和敦煌藏文寫卷 P. T. 960(舊編P. T.254)《于闐教法史》(Li-yul-Chos-kyi Lo-rgyus)第109—110行稱:"關於李域(即于闐地區)于闐(Hu-ten)正中的海眼(mchohi-myig):它今在于闐的那丹(lngar-ldan)城堡的大集市上方,瞿摩帝寺的光佛(pra-ba-sha,托瑪斯疑指月光佛 Candraprabhasa;恩默瑞克認爲是瞿摩帝寺的一個殿堂名稱)瑞像脚下。海眼今乃受光佛瑞像脚之踏壓。"[75]

瞿摩帝寺,藏文作 'gum-tir,于闐文作 Gūmattīrä,有些學者認爲,這個名稱無疑是《水經注》卷一所記于闐以南山嶺的當地名稱仇摩置[76]。

佛陀也飛來于闐固城住:

"釋迦牟尼佛從舍衛國騰空於固城住" S 2113 A第20行,又第31—32行)。

藏文《牛角山授記》稱:"爾時世尊應諸諸天人曰:'善哉!此國已獲我祝祐,此國將因我之福祐而地位特出。在即將來臨的戰亂之世,孫波(Sum-pas)及其大軍、各部突厥(Drug-gus)、回鶻(Hor)和其他不奉佛法者將到此國,毁滅此國。爾時如來諸瑞像將從各地來到此國,守護此國邊境。此國將借其神通力而免於徹底毁滅。繼諸瑞像之到來而諸菩薩、衆多天人、威武龍王也將接踵而至,

他們將打翻在各國作惡者，挽救衆生免遭敵人毁滅。名富那生(puṇya-saṃbhava)之瑞像者，來自 Dge-ba-can 城，立於西城——固城 (Ku-Sheng)，守護此國邊境；名 Shen-zha 之如來瑞像者，出自陰府，于北部名 Shen-zhe 之地，守護此國邊境……名 Kihn-lang 之如來瑞像者，來居東部之媲摩 (phye-ma)城，守護此國邊境……名 phye-se 之如來瑞像者，來住牛角山之迦葉佛寶塔，將於北部守護如來之法和此國邊境……（按以下還有六如來瑞像分守十方之其他各方，略）。'"[77]

藏文《丹珠經》Rgyud 85，葉 142 b：“此旃檀瑞像曾在漢地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六十八年間在于闐固城 (Khu-sen)，而後四十年在弭藥 (mi-nyag，按指黨項之一部)……”[78]。

藏文《于闐教法史》第 78—84 行：“釋迦佛言曰：‘爲守護此國和永保聖教長存，我已指派諸菩薩，Sheng-yong-phur 諸瑞像，Hbyor-hbyi 寺、于闐市集之光明寺諸瑞像，羅闍卓瑪 (Ro-je-groma)瑞像，……固城(Ko-Sheng)砦堡入口處之六瑞像…… 爲此國邊境守護者。’”[79]

固城，藏文作 Ku-Sheng 或 Ko-Sheng，其地無疑在于闐之西，託瑪斯推測其爲皮山[80]，但還無法肯定。

釋迦佛瑞像曾飛來于闐坎城：

“釋迦牟尼佛眞容白檀香爲身從漢國騰空而來在于闐坎城住” S 2113 A 第 18—19 行)。

“釋迦牟尼佛白檀眞容從漢國來坎城住” (莫高第 220 窟南壁瑞像榜題)。

“于闐坎城瑞像” (莫高第 231 窟主室西壁龕頂西披左數第九身瑞像榜題)。

“于闐坎城瑞像” (莫高第 237 窟主室西壁龕頂西披北數第三身瑞像榜題)。

藏文文獻中也有坎城（Kam-Sheng）之名，言及坎城及質羅(Ji-la、今策勒)一帶有大、中、小廟宇爲數甚多，但未提到坎城的瑞像[81]。唐賈耽《皇華四達記》入西安路記載之"于闐東三百里有坎城鎮"[82]；五代后晉高居誨《于闐國行程錄》中的"紺州"，[83]均當爲此城。有的學者還比定《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宋雲、惠生行紀之"捍麼城"亦卽此城，其南十五里有一大寺，"有金佛一軀……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84]這條材料似可補藏文記載之不足。然而，由於坎城與下文談到的媲摩城是一是二的問題尚未解決，故此像通常被主張坎城卽媲摩城的學者比定爲媲摩瑞像。

釋迦瑞像亦來媲摩城：

"此像從憍賞彌國飛往于闐東娓摩城，今現在，殊靈瑞"（P 3032 第 8—9 行），P 3352 第 9 行，S 2113 A 第 11—12 行)。

"憍賞彌國佛來住于闐國"（S 5659 第 9 行)。

"于闐媲摩城中雕檀瑞像"(莫高 231 窟瑞像榜題)。

"于闐媲摩城中雕檀瑞像"(莫高 237 窟瑞像榜題)。

媲摩城瑞像見於漢、藏文獻的記載頗多。

《洛陽伽藍記》卷五："……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卽得陰愈"[85]。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至媲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箔帖像，卽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淩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86]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所記略同。

藏文《牛角山授記》稱："名 Kihu-lang(憍賞彌？)之如來瑞像

者，來居東部之媲摩城，守護此國邊境。”[87]

貝利（H. W.Bailey）教授通過研究于闐語文獻提出一種解釋，即于闐語中，媲摩城作 phema，是得自于闐語“瑞像” pema 一詞，而後者可能又是從梵語 pratimā“瑞像”一詞衍化而來[88]。

關於坎城和媲摩的關係，學界一直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坎城和媲摩應是同地異名，對這一種見解最有力的證據是斯文赫定在和田東北沙漠古城中發現的一件同一內容的漢——于闐語雙語文書（紙本文書編號 Hedin24），其中漢文“坎城”相應的于闐語對譯詞即作“媲摩”（(phema)[89]。另一種意見認爲坎城和媲摩城爲不同的兩城，“瑞像記”、“瑞像圖中兩地瑞像分別畫出，可爲兩城不是同地的最有力的佐證[90]。但如果貝利教授將媲摩城名的于闐文 phema 解爲“瑞像”之說今後得到有力旁證，則坎城即媲摩之說似可確定。這樣，藏文文獻中不記坎城有瑞像之闕或許也因而得到合理的解釋。

此外，釋迦牟尼佛還來至于闐玉河沐浴：

“于闐玉河浴佛瑞像，身丈餘，杖錫持鉢，盡形而立。其像赤體立。”（S 2113 A 第 22—23 行）。

而且還有“石佛應現于闐國時”（莫高第 220 窟瑞像榜題）、“于闐國石瑞像”（莫高第 231 窟瑞像榜題）、“石佛瑞像記”（P 3352 第 7 行，S 5659 第 11 行），這幾條瑞像內容過於空泛，與文獻所記衆多瑞像難於對比。

(2) 七佛（Sapta Buddha）中的其他佛陀：在大乘佛教中，一種說法是佛有三身，即涅槃佛、Dhyāni 佛和 Mānuṣī 佛。大乘佛典對這些佛名有若干種排列法，其中最後七佛稱爲 Mānuṣī 佛，亦即有生死的佛[91]。現先列舉其名如下：

毗婆尸佛　Vipaśyin

尸棄佛　Śikhin

毗舍婆佛　Viśvabhū

以上三佛又稱過去莊嚴三佛。

拘留孫佛　Krakucchanda

拘那含牟尼佛　Kanakamuni

迦葉佛　Kāśyapa

釋迦牟尼佛　Śakyamuni

以上四佛又稱現在賢劫（Bhadrakalpa）四佛。

七佛中的釋迦牟尼瑞像已如上述，它的瑞像及其榜題在瑞像中數量最多。其餘六佛，見於"瑞像記"和瑞像圖的有過去莊嚴三佛之第一佛和現在賢劫四佛中除釋迦之外的所有三佛，現分列如下：

過去莊嚴佛：

"毗婆尸佛從舍衛國騰空來在于闐國住，有人欽仰，不可思議"P 3352 第 5 行，S 5659 第 1—2 行，莫高第 220 窟瑞像榜題)。

"徽波施佛從舍衛國住，騰空而同來在于闐城住，城人欽敬，不可思議"(S 2113 A 第 32—34 行)。

"微波施佛從舍衛城騰空於于闐國城住"（莫高第 231 窟瑞像榜題)。

微波施或徽波施是梵文 vipaśyin (毗婆尸)的另一種譯法。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毗婆尸佛在瑞像中地位頗爲重要。

現在賢劫佛：

"南無拘留孫佛□□來住于闐國"（莫高窟第 220 窟瑞像榜題)。

"結迦宋佛亦從舍衛國來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S 2113 A第 21 行)。按結迦宋佛，梵文作 Krakucchanda，亦作 Krakusunda，後者更接近結迦宋的對音。此佛漢譯名較多，有羯洛迦孫、羯羅迦寸地、羯句忖那、迦羅鳩餐陀、鳩樓孫、俱留孫、枸樓秦、拘留

孫等[92]，以拘留孫佛一名最爲通行。結迦宋無疑即拘留孫。

“伽你迦牟尼佛從舍衛國騰空而來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S 2113 A 第38—39行)。按伽你迦牟尼 (Kanakamuni) 又譯迦諾迦牟尼、拘那含牟尼，以後者的譯法最爲通行。

“迦葉佛亦從舍衛國騰空而來住于闐國，人皆虔敬，不可思議。其像亦把袈裟。”(P 3352 第7—8行，S 5659 第10—11行，S 2113 A 第36—37行)。

“迦葉如來從舍衛國騰空至于闐國”(莫高第220窟瑞像榜題)。

“迦葉佛從舍□□□於固城住瑞像”(莫高第321窟瑞像榜題)。

關於迦葉佛，《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五日藏分護塔品第十三：“僧兒耶言：我念往昔迦葉佛時，此牛角山聖人住處，迦葉如來亦於彼處七日結跏受解脱樂，過七日已從禪定起。我時到彼瞿摩娑羅香牢尼住處禮拜供養。彼迦葉佛亦以平等法行比丘，精勤方便坐禪正慧，修善法者付囑於我。”[93]

同《大方等大集經》日藏分護塔品稱：“佛言：……我念往昔迦葉佛時，彼于闐國名迦羅沙摩，國土廣大，安穩豐樂，種種華果，衆生受用……。以其國土安穩豐樂，彼土衆生多行放逸，貪著五欲，謗毁聖人，爲作惡名，以灰塵土坌聖人。時諸行者受斯辱已，各離彼國，散向餘方。時彼衆生見聖人去，心大歡喜。是因緣故，彼國土中水天、火天皆生瞋忿，所有諸水、河、池、泉、井一切枯竭。時彼國衆生無水、火故，飢渴皆死，是時國土自然丘荒。”[94]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以灰塵土坌聖人，被玄奘《大唐西域記》記錄爲曷勞洛迦大丘阜的土俗傳説[95]。

據藏文《于闐國授記》，釋迦之飛來牛頭山，是迦葉佛以後的靈迹。《于闐國授記》引《于闐國史》稱：“昔，迦葉佛出世時代，于闐剛

剛成爲陸地，定居該地的人民信奉佛法。與迦葉佛教法衰微同時，于闐國佛法也趨於凌替。包括羯羅濕婆(kha-ra-shva)和羯列宇顛(Kha-rehu-steng) 在內的許多神儇曾短期住在于闐的 Rtsa-dag 山。後某些惡人篾視虐待諸神儇，諸神儇怒而升空離開于闐。于闐人衆旣不信法，皆墮迷途。龍王怒而降雨，于闐變爲湖泊。其後該地長期爲湖泊，而釋迦牟尼誕生於天竺，轉法輪，利衆生 (Sattva)，及近寂滅，乃於王舍城之靈鷲山說《月藏經》(Candragarbha)，在將各地付囑與護法神及天王、龍等守護者的時候，也作了于闐的預言，並交付與毗沙門、散脂(或稱僧兒耶)夜叉大將、阿闍世王女、無垢光、……曷利帝天女等及其眷屬。世尊率四部衆數萬升入空中，來到于闐，在今瞿摩帝大寶塔處坐在蓮華座上……世尊爲利衆生而住於牛頭山今爲小寶塔之左側立有大像的廟內七日。"[96]

上引藏文文獻中有關迦葉佛從舍衛城飛來于闐之說的段落，可以說是釋迦繼之而來于闐的序幕。該段落提到了教法衰微問題、釋迦在靈鷲山說《月藏經》及將于闐付囑於諸護法神、天王、諸龍的問題，這實際是給瑞像羣體增添不見於天竺的神祇提供了佛典的依據。

(3) "瑞像記"和瑞像圖沒有強調作爲未來佛的彌勒，在"瑞像記"和瑞像榜題中，彌勒或伴隨釋迦而來于闐爲護法菩薩之一而與其他菩薩並列。

(4) 敦煌出土的于闐文卷子中有十方佛的名稱[97]，核以"瑞像記"和瑞像圖榜題，十方佛名無一收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于闐因爲大乘華嚴部頗爲流行而十方佛中的毗盧遮那 (Vairocana) 的神像較多[98]，但在敦煌的這組瑞像中，毗盧遮那佛的形象却沒有因爲于闐地方的影響而躋入瑞像之列。

(二)、菩薩類

敦煌出土的于闐語寫卷 Ch.00267 第 19—24 行首先列出了住

在兜率天的護于闐國八位菩薩的名字，這些名稱也大多見於 P 3510、P 3513、S 2471 等于闐語文書[99]。在漢文瑞像資料中，只有金剛藏菩薩護于闐國的反映。

于闐語寫卷 P 2893 和藏文《于闐教法史》(卽 P. T.960)、《牛角山授記》還提供了住于闐的八位菩薩的名字及其在于闐的各自住地[100]。八位菩薩的名字除觀世音一名在藏文文獻中作 'ar-ya ba-lo 之外，其他均與于闐語文書中住于闐菩薩的名字相同。漢文瑞像資料中住于闐國的菩薩有彌勒、觀世音、虛空藏、寶壇花。茲將于闐文獻 (Ch.00267、P 2893 以及 P 3510、P 3513、S 2471 等)、藏文文獻(《牛角山授記》、《于闐國授記》、《于闐教法史》、《無垢光問經》等)和漢文瑞像資料 (P 3352、S 5659、S 2113 及莫高第 231、237、220 等窟榜題等)所記菩薩表列如下(見 253 頁)[101]：

在菩薩類瑞像中，唯一舉出具體住地的是虛空藏菩薩。正如上表所示，其住地在西玉河之薩迦耶仙寺，此寺旣見於于闐語文書，也見於藏文文書。值得注意的是，虛空藏菩薩所住此寺在于闐文獻中作 Sạkāya-gīra，藏文《于闐國授記》中作 Sa-ka-ya-gyi-ri，均意爲"薩迦耶之山"，薩迦耶乃一山谷名稱殆無疑議，該山谷位于僧伽伐彈那羅漢(Arhat Saṃghavardhana)居住的僧伽修寺(Śaṅ-ka-prahāṇa' 'jigs-tshogs-spong-byed) 近旁。僧伽伐彈那卽藏文文獻《僧伽伐彈那授記》的傳說作者。他的一名弟子從其學律（毗奈耶)。一天，弟子依《月藏經》和律研習佛陀教訓，讀到于闐、疏勒、安息三國正法階段的佛法、尊像、寶塔等將在佛滅後若干年亦歸滅亡而提出滅法者爲誰，最終結果如何等問題。羅漢根據《日藏經》、《月藏經》中的如來授記，作出了像法階段之終結與三國民衆耽於利欲而放棄佛法以及赭面國、突厥、回鶻等入侵戰亂的預言，此卽《僧伽伐彈那授記》的緣起[102]。這一事實說明，藏文文獻中的某些與于闐有關的《授記》或《懸記》之作，當與薩伽耶仙寺有關。法成所

護于闐菩薩			住于闐菩薩					
于闐文文書	藏文文書	漢文瑞像資料	于闐文文書		藏文文書		漢文瑞像資料	
			菩薩名	住地	菩薩名	住地	菩薩名	住地
彌勒	彌勒				彌勒	bi-si-mo-nya	彌勒	漢城
觀音	觀音		觀音	jūsña	'ar-ya ba-lo	'jnsna	觀音	于闐國
文殊	文殊		文殊	kāšaviśela	文殊	牛頭山上之 Par-spong-byed		
地藏	地藏		地藏	ñānagīrai	地藏	nyon-bgyir; Ye-shes-ri		
虛空藏	虛空藏		虛空藏	Sakāya-gīra	虛空藏	Sa-ka-ya-ka-ri; Skohi-brong	虛空藏	西玉河之薩迦耶僊寺
藥上 Bēṣajarayi	藥王 Bhaiṣajyā-rāja		藥王	banācvā	藥王	ba-no-co		
普賢	普賢		普賢	ttula 的 sagapālām	普賢	to la 的 Sang-ga-po-long 等處		
金剛手		金剛藏			金剛手	Shong-pya		
			māna bhava 摩尼跋陀羅-(Manibhad-ra)	Kā	ma-ni-b'a-ba	牛頭山	寶壇花	于闐國

譯《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的藏文原本《于闐國阿羅漢授記》(Li-yul-gyi dgra-bcom-pas lung-bstan-pa, 敦煌藏文寫卷 Ch.8、Ch.0913、Ch.73 Vii 3/2)[103] 也應出於同一文獻來源。

(三)、天王或天子類

關於天王的文獻也很豐富。

敦煌于闐語卷子 P 2893 號稱:"爾後八部菩薩取其國,居於各有所依的住地(寺廟)之區,以造福衆生;彼(指釋尊?)爲衆生福祉而來 Bisināña 村(?),大加稱許。藥師住 Banācvā (或Banāca),普賢居 Ttula 之 Sagapālāṃ, 地藏住 ñānagīrai, 觀世音救護衆生於 Jūsna, 文殊及其眷屬居迦葉佛舍利堂,摩尼跋婆居……,虚空藏爲護持養育衆生住薩迦耶山谷……八護法者威力強大, 現形庇護周圍之地。虔誠皈依信佛法的各位天王毗沙門、散脂、阿婆羅質多、迦迦那莎伐羅、莎伐那末(或作摩)利、闍訶伐達馱,而後阿隅闍,悉他那率其眷屬……悉來護持于闐國。"[104]

P.T. 960 藏文《于闐教法史》第 32—33 行記:"爲了李域 (于闐)聖教之不衰及該地八大依住護法神,毗沙門天王、散脂大將、阿婆羅質多、迦迦那莎伐利、莎伐那末(摩)利、阿隅闍(阿緊首)天女、悉他那天女、闍訶伐達龍王等起誓隨侍。"[105]

《牛角山授記》也記載:"爾時世尊對毗沙門天王、散脂大菩薩、阿質多天王、闍訶多訶龍王、虚空頭陀天王 (Ākāsadhātu)、莎伐那末利天王、阿隅闍(阿緊首)天女、悉他那天女言曰:'善男女! 我今將瞿摩娑羅香寶塔、牛角山以及該國和我的教法一皆付囑於汝等,由汝等加以護持養育, 永爲衆人供奉膜拜。願此國敬信佛法之諸王、諸臣宰、諸供養人亦若此護持供養。願此《牛角山授記》經籍彼等已施捨而永行不衰。若此國因水、火、外敵之侵而遭苦難, 誦讀此經、膜拜此經,默念此經皆可消除此國之受害。'"[106]

藏文《于闐國授記》載:"世尊爲了造福衆生, 於牛頭山今爲小

寶塔之左側立有像的廟宇內留住七日……於是文殊、觀世音等八菩薩、毗沙門、散脂藥叉大將、淨光明 (Vimalaprabhā) 天女、Kumāra Vajra 兄妹諸天人、諸龍王等被如來指定爲永遠的守護神。於是文殊、彌勒、觀世音、虛空藏、地藏、普賢、大勢至、藥王諸菩薩，毗沙門及三千夜叉，夜叉大將散脂及其十萬眷屬，阿婆羅質多(難勝)天子及其一千眷屬，虛空眼 (Ākāśacakṣus) 及其八千眷屬，莎伐那末利及其五百眷屬，Sthānatapta 龍王及其一千眷屬，〔阿隅闍〕鐵鈎天女(Devī Ankasavatī)及其一萬眷屬，悉他那天女及其五千眷屬，淨光明夫人，Kumāra Vajrasena, Deva-putra Susthiramati，曷利帝天女及其眷屬以及其他部衆在世尊面前起誓守護李域(于闐)。從彼時至今，世尊由八菩薩、毗沙門和其他護法神、諸天人、諸龍、諸天女、侍從來至牛頭山，住在該地，由其無數眷屬、諸菩薩、諸護法神、諸天人、諸龍王環繞居留該地，各在其所居之地區及他們起誓的地點，守護至今，控制李域，呈衆瑞徵。"[107]

以上主要神祇亦見於漢文《大方等大集經》卷五十五月藏分分布閻浮提品："爾時世尊以于填(闐)國土付囑難勝天子千眷屬，散脂夜叉大將十千眷屬，羖羊脚大夜叉八千眷屬，金華鬘夜叉五百眷屬，熱舍龍王千眷屬，阿那緊首天女十千眷屬，他難闍梨天女五千眷屬，毗沙門王神力所共汝護持于闐國土，乃至佛及大衆咸皆讚言：善哉！善哉！"[108]

與以上文獻對比，S 2113 A第 48—54 行的一段文字至堪注意，它提供了漢文其他文獻所不見的一系列天王或天子等的譯名，可以補苴烈維、貝利等前輩學者引用藏文、于闐文神名對應漢譯名之不足。

下面是S 2113 "瑞像" 記中的神名與其它文獻所記神名的對照表(見 256 頁)：

上表揭示了S 2113 著錄的天王類神祇系統與于闐語文書、《日

S 2113"瑞像記"	梵文名	漢譯《月藏經》	于闐語寫卷 P2893	藏文文獻
毗沙(門)天王神	Vaiśramaṇa Vaisravana	毗沙門王神	Vrrīśamaṃ (又見於 Ch.i0021a;P2896;P2900;P2022等)	be-sha-ra-ma-ni
……	Sañjaya	散脂 (《日藏經》中作僧兒耶)	Samñī (又見於 P2900等)	Sa-nye ('du-shes-can),(min-can),(yang-dag shes)
阿婆羅質多神 (又見於P3352、S5659)	Aparājita	難勝天子	Aparajai[ja]tta (又見於 P2900,S2471)	apara-ajita (lha mi-pham-pa)
迦迦那莎利神	Gaganasvara	羖羊脚大夜叉	Gaganasvarä	gha-gha-na-svara (nam-mkhahi dhyangs)
莎那末利神 莎那摩利神	Suvarṇamāla	金華鬘夜叉	Svarṇamāla	Su-gar-na-ma-la (lha gser-gyi phreng-ba-can)
……		熱舍龍王 (《日藏經》中作吃利呵婆達多)	Grrahavadatti (又見於Ch.00267;P2787;Ch.i0021a; S2471)	'gra-ha-bad-ta (Khyim-'tshig或 khyim-tshig)
阿隅闍天女	Aṅgūsa	阿那緊首天女	Amgūśa' (又見於S2471、作 aguśa)	lcags-kyu-can或 lcags-kyu
悉他那天女		他難闍梨天女	Sthānāva (又見於 S2471;Ch.i0021a)	Sta-na-ba-ti (lha-mo gnas-can)

藏經》、《月藏經》等漢文文獻、諸種藏文《授記》中有關材料的異同。應該說，除了下文即將指出的不同點外，四者之間是基本一致的，這種基本一致證明幾種語言的文獻至少就記載于闐守護神這一點而言必有密切關係，或許同出於一種史源也未可知。無論如何，幾種語言的材料在記載于闐守護神上的基本一致是值得人們研究的現象。

上表揭示的最主要的一個不同點是，在漢文《日藏經》、《月藏經》、藏文《授記》類文獻、于闐語有關文書中記載的散脂或僧兒耶沒有出現在 S 2113"瑞像記"文書中；反之，在 S 2113 A 第 52 行中出現的摩訶迦羅神又未見於上述文獻。散脂是一個重要的于闐護法神，這不僅僅反映在上述文獻記載中它與釋迦對話的地位上，並且在于闐流行頗廣的《金光明經》中占有一品；而且還反映在于闐佛寺出土木板畫上有他的形象出現[10]。為什麼他沒有反映到"瑞像記"或瑞像圖之中，其原因目前還不易解釋。至於摩訶迦羅神出現在 S 2113 之中，這反映了一些可以注意的情況。

摩訶迦羅 (mahākāla) 是密宗或金剛乘(Vajrayāna)從印度教吸收入佛教的典型神祇之一。在印度教中，這是著名的兇神惡煞。它的形象有二臂、四臂、六臂和八面十六臂的形式，青面獠牙，袒胸凸肚，身着虎皮，有蛇纏身作為裝飾。它可以生吃罪犯或獸類。摩訶迦羅作為兇神而受崇拜，是人們企求借助於它而抵御仇敵，佛徒希望以它的獰惡形象使不敬信三寶之徒心懷畏懼[10]。

由此可見，金剛乘引入的神祇摩訶迦羅進而被列入于闐守護神羣，其用意仍在求其庇佑，所不同者只是更看重於利用其設想中的暴力而已。

在上述天王類于闐守護神中，毗沙門天王被賦予了特殊的作用，這就是人們從瑞像圖中常常看到的毗沙門與釋迦弟子舍利弗(或作舍利子，Śāriputra)曾在于闐共同決海造地的業績：

“舍利弗共毗沙門神決海至于闐國”(P 3352 第 11—12 行，S 2113 A 第 54 行)。

“北方衆□天王決海至于闐國”(莫高第 220 窟瑞像榜題)。

“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決海時”(莫高第 231 窟瑞像榜題)。

“毗沙門天王神守護于闐國”(S 2113 A第 51 行)。

藏文《牛角山授記》稱:“爾時釋尊乃告舍利弗和毗沙門:‘善男子，汝二人且去……破沙(sha)山決海……保護水族不使受損,並使此國呈露明確陸地邊界。’大弟子舍利弗乃借神通力以錫杖尖,毗沙門以矛頭決海,使沙山半干,並導流而西,成一大河,二人將大湖及其族類轉移至索贊波之中段,因而開拓出瞿摩娑羅香寶塔、牛角山和于闐國土。”⑪ 又《于闐國授記》⑫、《于闐國教法史》⑬ 所記略同。

此外,住勃伽夷城瑞像當與毗沙門有關。S 2113 B 第 1—3 行稱:“昔仁(卽二)王相侵,行陣兩邊,鋒刃交戰,忽有此佛踊現軍前,仁(二)王睹已,息甲收兵,……其像便住于闐勃伽夷城。”《大唐西域記》卷十二、《大慈恩傳三藏法師傳》卷五和藏文《于闐國授記》、《于闐教法史》都有相應的記載,重要的是後兩部書告訴我們,陣前踊現之佛實爲毗沙門和室利提婆⑭ 。

又，毗沙門和提頭賴吒、毗樓勒叉、毗樓博叉等一起出現在 S 2113 A 第 53—54 行中,但這裏的毗沙門等四大天王與瑞像性質有所不同,故此處不多論述。

在《日藏經》、《月藏經》和藏文《授記》類文獻中,作爲于闐守護神祇的龍王、天女亦爲數甚顆,而且行動非常活躍。貝利教授研究于闐語 S 2471 等相應文書時,舉出于闐衆神譜中有龍王十位，天女十三位⑮ 。然而在“瑞像記”中,熱舍龍王沒有出現,天女雖然出現兩位 (阿隅闍、悉他那)，但依然被列入天王類于闐守護神羣之

中。由於"瑞像記"、"瑞像圖及其榜題沒有涉及更多的龍王、天女兩類神祇，本文也隨之從略。

六、守護于闐的瑞像增多的社會原因和與金剛乘發展的關係

上文列舉的資料表明，"瑞像記"、瑞像圖反映的于闐瑞像的數目旣超過了印度境內的瑞像原型數目，也超過了漢地增殖的瑞像數目。守護于闐的瑞像的增多有着明顯的原因，這就是當地戰亂相尋、社會動盪，統治階級和僧俗佛徒需要祈求神明庇護。

對我們的課題說來，有助於闡明這一歷史背景的材料首先應舉大乘佛典中的《大集部》經書。大方等大集部中有《日藏經》(Sūryagarbha Sūtra)、《月藏經》(Candragarbha Sūtra)，兩經記載了釋迦牟尼爲護持佛法長存而做的大量預言，佛徒形諸文字而稱之爲"授記"或"懸記"。按佛教教義中本來就有正法、像法、末法三階段之說，《日藏經》、《月藏經》藉助於釋迦牟尼所做的一系列"授記"而對正法將滅、像法凌夷的前景做了極其悲觀的描述。兩經的許多敍述好似釋迦的遺囑，釋迦預見到了自身的滅度，因而把閻浮提五十五國一一地付囑給衆菩薩、衆天人、諸龍王乃至諸星宿，命其好生加以護持。在這裏，護持佛法實際上就是護持現實世界的現行秩序，因爲宗教本身就是顛倒着的世界。關於護持佛法的社會原因及其必要性，《月藏經》法滅盡品講得最爲明白透澈：釋迦和月藏菩薩、月燈菩薩看到了世人貪瞋癡惑，不敬三寶，躭於嗜欲，投身俗業，因而佛法面臨着衰微毀滅的前景。針對這一前景，釋迦提出對策，其中包括爲諸國諸地指定大批守護神祇、授予神咒或指定誦讀某某經或某某"授記"以護持該國該地，從而達到守護佛法長在的目的。在《日藏經》、《月藏經》一一列舉的受到釋迦佑護的諸國諸地中，于闐占着相當突出的地位。

《日藏經》、《月藏經》依託釋迦"授記"而記載的這些內容，有些明顯易見是于闐當地的增添和創造。人們知道，于闐長期以來是大乘佛教的中心之一，這裏不斷出現一些有才能的人物對佛典進行銓釋解說或加工改造[16]。早在大約是六世紀成書的于闐文讚頌佛法的韻文體著作《贊巴斯塔(Zambasta)書》之中，有些情節就是四至六世紀社會動盪和民族衝突的反映。正像《贊巴斯塔書》記載木骨閭(柔然)、赭面、匈奴、蘇毗等部蹂躪于闐國土的情況一樣，七世紀以來繼續解說《日藏經》、《月藏經》中末法思想的于闐作品也曲折地反映着當時的社會動亂和戰爭衝突的情況。其後，從八世紀中葉以來，于闐地區和唐中原地區一樣，進入了外患、內亂頻仍、疫癘、天災流行時期，與此相應，末法思想更爲盛行，這有漢、藏文獻爲證。

敦煌漢文寫卷 P 2139 號法成譯《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提及，在于闐國薩迦般囉訶那寺不遠的娑迦耶幾那山谷之中有一羅漢，羅漢有一苾蒭弟子從其學習律儀。這個弟子讀到了《月藏菩薩所問經》和《月藏菩薩受經記》[17]，即問尊師羅漢說："佛滅度後，于闐、疎勒及與安息如來像法、窣覩波等幾時住世？誰當毀滅？究竟至其何所？愿爲解說！"羅漢回答說："…… 釋迦牟尼如來滅後，彼法影像及以塔廟二千年在世，然後滅沒。"這是羅漢對他的弟子的第一個問題的"解說"。然後羅漢繼續講道："此三之國，漢與赤面〔即《贊巴斯塔書》的赭面〕、蘇毗、突厥、回鶻等賊動其干戈而來侵損，是故佛法以漸衰微毀滅，塔寺、衆僧、資具亦皆斷絕。此三國中，安息、疎勒不行法賊被侵擾故，塔寺多分焚燒毀滅，皆悉空棄；諸寺衆僧多分移從于闐。"這是羅漢對他的弟子的第二、三兩個問題的"解說"。在羅漢的繼續"解說"中，于闐的地位受到了進一步推崇：由於五百菩薩(二百五十出家、二百五十在俗)護持于闐塔寺，由於賢劫一千五佛以牛頭山寺爲宮殿"常當履踐"，"爲諸聖

賢威德悲慈加持于闐塔寺妙法",[118] 于闐的"行法人"多過了其他國度。

這樣,人們便看到了一個過程:在末法思想流行時,如果說,在《日藏經》中,于闐塔寺在全世界塔寺中占據的是榮譽的地位;在《月藏經》的統計數字中于闐進而取得了神聖位置[119];那麽,在法成所譯的《像法滅盡之記》中,于闐則由於鄰國疎勒等國的沒落而躍爲佛徒聚集的中心。不僅如此,《華嚴經》列舉的二十五聖地之一牛頭旃檀,在實叉難陀譯本中位於疎勒,在佛馱跋陀羅譯本中位於邊地[120],到了《月藏經》和《像法滅盡之記》中則確定不移地固定到了于闐。凡此種種,無一不是于闐地位提高的反映。然而,也正是由於它的地位提高,它成了四周"不行法賊"的更加集中攻擊的目標。《像法滅盡之記》稱:"爾時諸國王等爲欲取于闐國故,斗爭紛紜",而"斗爭紛紜"的諸國之中,又以"赤面國王有大威勢,多侵餘國,以爲自境"[121]。

藏文文獻《牛角山授記》、《僧伽伐彈那授記》、《于闐教法史》等記述的有關動亂的內容與法成譯成漢文的《像法滅盡之記》完全一致。藏文寫卷伯希和編號960號文書《于闐教法史》卷末明確揭示該《教法史》係據《日藏經》、《月藏經》、《無垢光請問經》節錄、重譯而成[122]。按:《無垢光請問經》也是一部既有混合說教,又曲折地反映民族侵襲、社會動亂的作品。然藏文文獻在數量上多過於《像法滅盡之記》等漢文文獻,因而其中更多可值得注意之處。例如,在藏文文獻中,隨着于闐地位的不斷提高,被釋迦付囑呵護于闐的八部菩薩、八部龍王等等神祇被一一安排在有具體名稱的地點和各自"依住"的寺院、廟宇之中;于闐在釋尊的二十一處世間依住的福田中也有了超過其他二十處的功德(guṇa);等等。

以上漢藏文獻有關赤面(吐蕃)、突厥、回鶻活動的記載完全符合八世紀以來的實際歷史情況。及至九世紀中葉,吐蕃勢力轉衰,

不再是“有大威勢、多侵餘國”的強權，但是，終唐末、五代、宋初之世，重得立國的于闐始終不能擺脫干戈擾攘的局面。在它的南部和東部，吐蕃的煊赫固然已成陳迹，但殘部仍有餘力不時侵犯鄰國；在它的西方，以疎勒爲基地而興起的黑韓王朝從十世紀中葉皈依伊斯蘭以來，勢力不斷膨脹。誠然，于闐有遠征疎勒而暫時獲勝的記錄[123]，但這不足以解除黑韓王朝勢力東漸的隱憂。從敦煌寫卷中有關于闐、敦煌之間使節往來祈求道路平安的許多記載看，于闐的對外交通都受着諸如仲雲等部的干擾和威脇。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統治者和僧俗徒衆倍加渴望神明保祐。

“在即將到來的干戈擾攘的年代，孫波大軍、各部突厥、回鶻和其他不行法者將來此國，毁滅此國。爾時諸如來瑞像將從各地來至此國，護此國邊境”[124]——《牛角山授記》既然如此明確地指出瑞像具有呵護于闐的作用，那麽，人們也就不難由此看出于闐的佛陀瑞像增加的消息了。

又，《于闐國授記》引《大釋迦牟尼佛像安置功德經》稱：“于闐國遇有疫癘、外患諸難時，且誦大乘經部之《大集經》（按：《大集經》中有《日藏分》、《月藏分》）和《法華經》，災難可靖”[125]。

又，《牛角山授記》稱：“若此國因水、火、外敵之侵而遭苦難，且誦讀此經〔按指《牛角山授記經》〕，膜拜此經，默念此經，禍即可脫”[126]——以上兩部《授記》既然如此明確地強調誦讀其中列舉的佛經即可脱禍，那麽，人們也就不難由此理解，上舉諸經記錄的守護于闐的八部菩薩、八部天王等神祇自然也就受到特殊的崇奉，乃至其中某些神祇被納入瑞像之列了。

除了上述社會原因之外，于闐瑞像的增多還因爲于闐開始流行金剛乘，或者說，還因爲于闐正從流行大乘向流行密宗或金剛乘過渡。上述《日藏經》、《月藏經》等幾部經典在于闐流行這一事實

本身就起着促進向金剛乘轉變的作用，人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大方等大集經》，還是《金光明經》、《無垢光問經》，都收錄了大量咒語(陀羅尼)，意在向佛徒提供具有超凡的禳災祛禍的"保證"。

于闐語文獻也證實了金剛乘在于闐的流行。八世紀或更早一些的時候，于闐就有了明顯屬於金剛乘性質的《理趣般若經》。在敦煌寫卷中，有許多用于闐語寫的和用于闐婆羅謎字體梵文寫的咒語(陀羅尼)。金剛乘文獻中某些偈子或《禮懺文》還和于闐國王尉遲輸羅(967—977)、尉遲達磨(978—982)及其臣宰張金山、劉再昇有關。于闐語《佛本生讚》(Jātakastava)卷末題記載明，抄寫此經，用意在於爲所有信仰金剛乘的僧俗荐福。[127]

金剛乘趨於流行，自然也把金剛乘從印度教吸收的神祇帶入于闐的衆神譜系之中。金剛乘的教義係從大乘的瑜伽行派發展而來，金剛乘的神祇則吸收了印度教的神祇。早在大約四世紀纂成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Laṅkāvatāra Sūtra，亦作《入楞伽經》)已不再批判印度教，反而開始調協佛教和印度教的歧異，解釋兩者在哲學觀點上的相似。在印度教的影響之下，佛陀也自稱有無數多的化身。印度教的許多主尊神不僅變成了佛陀的隨侍，而且也成了佛教金剛乘萬神殿裏具有充分資格的成員[128]。這樣，我們便在于闐瑞像之中看到了典型的金剛乘神祇——摩訶迦羅的亮相。因此，通過對護佑于闐的瑞像的考察，人們也應該注意于闐地區金剛乘的流行，金剛乘的流行爲佛教形象資料添加了前所未有的內容。研究這一問題應是于闐佛教史的重要篇章。

結　語

以上我們對瑞像資料做了大致的分類排比，計從敦煌寫卷中找出有關文書四件；爲了說明這四件文書的內容，我們對文書、敦煌洞窟壁畫瑞像圖及其榜題、敦煌瑞像絹畫和于闐瑞像木板畫四

者做了簡單的比照；然後，根據我們所能找到的于闐文、藏文、漢文文獻對護持于闐的瑞像的名稱、特點、作用和產生背景做了粗略的說明。工作是初步的，文中對于闐瑞像所做的介紹或許是片面的、殘缺不全的，更無可能顧及印度境內和漢地的瑞像。不僅如此，關於瑞像的形象學的對證問題，我們也沒有起碼的交待。我們撰寫本文的意圖在於搜集有關于闐的資料，通過于闐瑞像從一個側面來闡明于闐和敦煌的密切關係，並考察于闐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

① 高居誨《于闐國行程錄》，《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于闐條，中華書局標點本，第 919 頁。

② 敦煌漢文文書 P2139《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第 8—9 行。圖版見伯希和、羽田亨編《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錄文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一卷史傳部，No.2090，第 996 頁。

③ 法國敦煌研究組編《敦煌漢文寫卷目錄》(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第三卷，三〇〇一——三五〇〇號，巴黎，1983 年，第 27 頁。

④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1962 年，第 285 頁。

⑤ 《敦煌漢文寫卷目錄》第 287—288 頁。

⑥ 翟理斯《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Descriptive Casta 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倫敦，1957 年，第 214 頁，G.6722 號。

⑦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 225 頁。

⑧ 《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第 168 頁，G.5553 號。

⑨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 151 頁。

⑩ 謝稚柳《敦煌藝術敍錄》，上海，1957 年。

⑪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

⑫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第一分册,第二分册,巴黎,1981 年,1983 年。

⑬ 《敦煌研究文集》第 351 頁,圖版 116;第 350 頁,圖版 116。

⑭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第二分册,第 21 頁;插圖 132 和插圖 133。

⑮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第二分册,第 34 頁,插圖 164。

⑯ 《敦煌莫高窟内容總錄》第 82--83 頁。

⑰ 謝稚柳《敦煌藝術敍錄》第 103—105 頁。

⑱ 見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 第二卷,牛津,1921 年,第 1024—1026 頁對本絹畫的描述及第四卷圖版 LXX 原絹畫照片;又斯坦因和賓雍 (L.Binyon) 合刊的《千佛洞圖錄》(The Thousand Buddhas),倫敦,1921 年,第 26—28 頁及原版 XIV。

⑲ 韋陀《西域美術》第一卷,序言,第 10—11 頁。

⑳ 韋陀上引書,第二卷,第 307 頁。此説系據里布夫人 (K. Riboud) 的報導,見《絲綢之路和鑽石之道》(The Silk Road and the Diamond Path),加利福尼亞,1983 年,第 126 頁。

㉑ 索伯 (Alexander C. Soper)《敦煌的瑞像圖》(Representations of Famous Images at Tun-huang),載《亞洲藝術》(Artibus Asiae)第二七卷,瑞士阿斯庫那,1965 年,第 349—364 頁,插圖一。

㉒ 韋陀上引書,第二卷,單色圖版第 9d圖。

㉓ 索伯上引文,第 349 頁。

㉔ 斯坦因上引書,第二卷,第 861 頁。

㉕ 參看佩特魯奇《集美博物館年鑒》(Annales du Musée Guimet),第四一卷,第 121 頁以下文;魏禮 (A.Waley)《斯坦因敦煌所獲繪畫目錄》(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倫敦,1931 年,第 84 頁 (LI)、第 95 頁 (LIII)、第 268—271 頁 (CDL);安德列斯 (F.H.Andrews)《中亞和塞斯坦古寺出土壁畫目錄》(Catalogue of Wall 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and Sistan, re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德里,1933 年,第 224 頁;羅蘭德 (B. Rowland)《中國雕塑中的印度瑞像》(Indian Images in Chinese Sculpture),載《亞洲藝術》(AAs),第一〇卷,1947 年,

第5—20頁;索伯上引文;巴塔恰里耶(B.Bhattacharyya)對這幅瑞像絹畫的解説,載《絲綢之路和鑽石之道》,第128—129頁;韋陀的解説,載《西域美術》第二卷,第11—12頁及第307—312頁。

㉖ 韋陀上引書,第二卷,第11頁。

㉗ 魏禮上引目錄,第268—269頁。

㉘ 斯坦因上引書,第二卷,第877頁。

㉙ 魏禮上引目錄,第268頁;羅蘭德上引文,第9頁。

㉚ 索珀上引文,第362頁。

㉛ 《敦煌研究》第1期,第108頁,插圖8。

㉜ 斯坦因上引書,第二卷,第878頁;魏禮上引目錄,第269頁。

㉝ 羅蘭德上引文,第11頁,又第9—10頁插圖2—3。

㉞ 索珀上引文,第262頁。

㉟ 魏禮上引目錄,第269頁。

㊱ 同上。

㊲ 魏禮上引目錄,第270頁。

㊳ 同上。

㊴ 羅蘭德上引文,第10—12頁。

㊵ 索珀上引文,第362頁。

㊶ 魏禮上引目錄,第270頁。

㊷ 斯坦因上引書,第二卷,第878頁。

㊸ 魏禮上引目錄,第270頁。

㊹ 索珀上引文,第362頁。

㊺ 魏禮上引目錄,第270—271頁;羅蘭德上引文,第16頁。

㊻ 索珀上引文,第362頁。

㊼ 斯坦因上引書,第二卷,第879頁;魏禮上引目錄,第271頁;羅蘭德上引文,第17—18頁。

㊽ 索珀上引文,第361頁。

㊾ 索珀上引文,第351、362頁。

㊿ 索珀上引文,第363頁。

(51) 羅蘭德上引文,第10頁,插圖4、5。

52 威廉斯夫人《于闐繪畫中的佛像》(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載《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新輯,第二三卷,第1—2期,羅馬,1973年,第125—129頁,插圖23—26。

53 同上,第132—135、136—138頁,插圖34、36—38、40—43。

54 參看賈可諾娃(Н. Цяконова)《伊斯蘭時期以前中亞的神像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ультовой Nконограф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а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載蘇聯列寧格勒國立愛米塔什博物館叢刊之五《東方民族的文化和藝術》第六輯,列寧格勒,1961年,第259頁。

55 學者們根據近年考古學發現而進行的研究表明,佛教初傳時期既不存在佛陀本尊像,也不存在佛弟子像。這和《增一阿含經》的記載是相符的。該經指出,超凡的"如來身者不可造作"、"不可模則"(《增一阿含經》卷二一,《大正藏》卷二,第659頁)、"諸天人自然梵生……也不可貌像"(同上,卷二二,《大正藏》卷二,第664頁)。至於佛教神譜及佛陀等衆神像的起源,學者們正在探討,認爲這當與大乘佛教於公元200年前後,在貴霜王朝統治下的西北天竺興起有關,也和犍陀羅藝術和秣兔羅藝術的相應發展有關。參看高田修《佛像的起源》(東京,1967年),第266—267頁。還有的學者強調佛教神譜及其造型的出現與密宗或金剛乘密切相關,而密宗或金剛乘在公元300年前後已與小乘、大乘同時存在。參看巴塔恰里耶《印度佛教神像學》(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加爾各答,1958年增訂版,第31—33、8頁。

56 參看李伯特(G.Liebert)編《印度宗教神像辭典》(Iconographic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Religions, 萊頓,1976年)第27頁中對 pratimā(瑞像)一條的解釋。

57 優塡王及波斯匿王造像傳說僅在漢文中即見於以下佛典和僧記:後漢末譯出的《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三(《大正藏》卷三,第136頁),384—385年譯出的《增一阿含經》卷二八(《大正藏》卷二,第705—706頁),五世紀初的法顯《佛國記》,五世紀上半期的《觀佛三昧海經》卷六(《大正藏》卷一五,第677—678頁),七世紀上半期《大唐西域記》卷五,691年譯出的《大乘造像功德經》卷上(《大正藏》卷一六,第290—291頁),宋代的《三寶感應要略錄》卷上(《大正藏》卷五一,第27頁)。此據高田修上引書,第15頁。

⑱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扶南國條，標點本，第790頁。關於優塡王造像之入中國，有如下記載：《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法苑珠林》卷十二、《三寶感應要略錄》卷上，《佛祖統紀》卷三三提及公元64年(後漢永平七年)派使者蔡愔攜來"優塡王畫釋迦像"。釋道宣稱此傳說出自南齊王琰之《冥祥記》。關於梁武帝於511年（天監十年）派郝騫等迎優塡王最初所造眞像之第二像(按卽仿制像)事，見《廣弘明集》卷一五、《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法苑珠林》卷十四、《三寶感應要略錄》卷上。此像經歷陳朝、隋朝而入唐（《續高僧傳》卷二九法力傳、《法苑珠林》卷二三。)參看高田修上引書，第16—17頁。該像經唐、吳揚、南唐入宋的情況，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有所敍述（中華書局，1983年，第82—83頁。

⑲ 《續高僧傳》卷二四慧乘傳，《大正藏》卷五〇史傳部，第633頁。

⑳ 《法苑珠林》卷二九引王玄策傳，《大正藏》卷五三事匯部，第504頁。馮承鈞《王玄策事輯》並引及李義表撰《登闍崛山銘》，見《全唐文》卷一六二。參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書局，1957年，第114頁。

㉑ 《法苑珠林》卷二九引王玄策傳，《大正藏》卷五三，第503頁。

㉒ 《法苑珠林》卷二九引王玄策傳，《大正藏》卷五三，第502頁。

㉓ 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第126—127頁。

㉔ 《酉陽雜俎》，中華書局，1981年，第245頁。

㉕ 《大正藏》卷一三，第294—295頁。

㉖ 《出三藏記集》卷一四；參看烈維《漢文記載中的印度》(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四，載《法國遠東學院院刊》(BEFEO) 第四卷，第三期，1904年，第555—556頁。

㉗ 《大正藏》卷五四事匯部，第375頁。

㉘ 托瑪斯 (F.W.Thomas)《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和文書》(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第一卷(以下簡稱此卷爲托瑪斯書)，倫敦，1935年，第9頁。

㉙ 托瑪斯書，第11頁。

㉚ 參看烏瑞(G. Uray)《有關公元751年以前中亞史的古藏文史料概述》(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 D: A Survey), 載哈瑪塔 (J. Harmatta) 編《伊斯蘭時代以前中亞史料導論》(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布達佩斯,1979 年,第 292 頁。

⑪ 托瑪斯書,第 12 頁。

⑫ 托瑪斯書,第 89—90 頁; 恩默瑞克 (R.E.Emmerick)《關於于闐的藏文文獻》(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以下簡稱恩默瑞克書), 倫敦,1967 年,第 2—5 頁。

⑬ 斯坦因《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 牛津,1907 年, 第 185—190 頁。

⑭ 參看孫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三),《敦煌研究》第 2 期,第 91 頁。

⑮ 托瑪斯書,第 322 頁; 恩默瑞克書,第 91 頁。

⑯ 參看恩默瑞克書第 95 頁專名索引 hgumtir 條所引意大利藏學家伯戴克 (L.Petech)《水經注中所記載的北天竺》(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及加拿大漢學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意見。

⑰ 托瑪斯書,第 24—25 頁。

⑱ 托瑪斯書,第 263 頁。關於弭藥,參看石泰安 (R.A.Stein)《弭藥和西夏》(mi-nyag et Si-hia,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légendes ancestrales),載《法國遠東學院院刊》(BEFEO),第四四卷,第 1 期,第 223—265 頁。

⑲ 托瑪斯書,第 317 頁; 恩默瑞克書,第 87—88 頁。

⑳ 托瑪斯書,第 318 頁,注③。

㉑ 托瑪斯書,第 135—136、322—323 頁; 恩默瑞克書,第 72—75 頁,第 90—91 頁。

㉒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標點本第 1150 頁。

㉓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于闐條,第 918 頁。

㉔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1958 年,第 265 頁。

㉕ 同上。

㉖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上海,1977 年,第 302 頁。

⑧⑦ 托瑪斯書，第 24 頁。

⑧⑧ 貝利《于闐語雜考》(Hvatanica) 四，《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學報》(BSOS)，第十卷，第 4 期，1942 年，第 609 頁；又同作者《于闐塞語辭典》(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劍橋，1979 年，第 263 頁。

⑧⑨ 貝利《于闐語文書集》第 4 集，第 135－136 頁。

⑨⓪ 孫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二)，《敦煌研究》第 1 期，第 108－110 頁，注③。

⑨① 巴塔恰里耶上引書，第 76 頁。

⑨② 參看蘇熙勒 (W.Ed.Soothill)、霍都斯 (L.Hodous) 編《中國佛教術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倫敦，1937 年)，"七佛"條，見該書第 10 頁。

⑨③ 《大正藏》卷十三，第 295 頁。

⑨④ 《大正藏》卷十三，第 294－295 頁。

⑨⑤ 參看《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第 303－304 頁。

⑨⑥ 托瑪斯書，第 93—95 頁；恩默瑞克書，第 6—11 頁。

⑨⑦ 貝利《于闐語雜考》四，第 908－909 頁。

⑨⑧ 威廉斯夫人上引文，第 117—124 頁，插圖 1－22。

⑨⑨ 貝利上引文，第 910－911 頁。

⑩⓪ 同上，第 892－893、911 頁。

⑩① 此表是在貝利上引文第 911 頁所列表的基礎上繪制的。

⑩② 參看托瑪斯書，第 41－96 頁。

⑩③ 參看托瑪斯書，第 73—87 頁；烏瑞上引文，第 288—289 頁。

⑩④ 貝利上引文，第 892、892 頁。

⑩⑤ 托瑪斯書，第 310 頁；恩默瑞克書，第 82 頁。

⑩⑥ 托瑪斯書，第 19—20 頁。

⑩⑦ 托瑪斯書，第 95—97 頁；恩默瑞克書，第 11—15 頁。

⑩⑧ 《大正藏》卷一三，第 368 頁。

⑩⑨ 威廉斯夫人上引文，第 136—138，插圖 34、40—43。

⑪⓪ 巴塔恰里耶上引書，第 344—348 頁。

⑪① 托瑪斯書，第 34－35 頁。

⑫ 托瑪斯書，第95頁；恩默瑞克書，第10—11頁。

⑬ 托瑪斯書，第307頁；恩默瑞克書，第80頁。

⑭ 托瑪斯書，第101、309頁；恩默瑞克書，第21、82頁。

⑮ 貝利上引文，第915—917頁。

⑯ 烈維上引文，第五卷，第256頁；參看馮承鈞譯《大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九編，中華書局，1958年，第162頁；玉貝爾（Ed. Huber）《佛教文獻研究》八，載《法國遠東學院院刊》第六卷，1906年，第339頁；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賀昌羣譯本，商務印書館，1956年，第262—263頁。

⑰ 法成譯《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第4、18、67行。

⑱ 同上注，第9—11行。

⑲ 烈維上引文(五)，1905年，第五卷，第285頁。

⑳ 同上注，第282頁。

㉑ 法成譯《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第13行。

㉒ 托瑪斯書，第323頁；恩默瑞克書，第91頁。

㉓ P5538號文書《于闐王尉遲輸羅致舅沙州大王曹元忠書》；參看《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傳有關于闐破疏勒國事，標點本第14107頁。

㉔ 托瑪斯書，第91頁；恩默瑞克書，第4—5頁。

㉕ 托瑪斯書，第91頁；恩默瑞克書，第4—5頁。

㉖ 托瑪斯書，第20頁。

㉗ 德萊斯頓（M.J.Dresden）轉寫譯注《佛本生讚》（The Jātakastava or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費城，1955年，美國哲學學會叢刊新輯第五卷，第5册，第446頁。

㉘ 巴塔恰里耶上引書，第10—12頁、第384—386頁；威廉斯夫人上引文，第115—116頁。

附　記

本文從1984年4月完稿到付印，經過了將近一年半的間隔。在這段時間內，我們看到了我們在寫作本文時沒有見到的材料。在

這裏,有必要做些補充說明。

我們在寫作時曾經檢索蘇遠鳴(M. Soymié)先生領導下的法國敦煌資料研究組編纂的《敦煌漢文寫卷目錄》第一卷(巴黎,1970年)、第三卷(巴黎,1983年)。該目錄第三卷第27頁P 3032號寫卷注記下載明:蘇先生有專文論述《瑞像榜題抄》,刊於該研究組編纂的《敦煌研究論文集》第三輯(Contributions aux Etudes de Touen-houang, vol. III)。後我們接到蘇先生寄贈的上揭論文集(巴黎,1984年,該論集被列爲法國遠東學院專刊第135種),蘇文的題目爲《敦煌洞窟中的一些瑞像圖》,載該文集第77—102頁。該文根據作者本人對敦煌莫高窟第231窟的實地考察,詳盡地研究了P 3352號寫卷有關瑞像的題記,並對P 3033背、S 5659、S 2113寫卷有關瑞像題記部分也做了描述。我們高興地看到,蘇文對P 3352號等寫卷的研究比我們的文章完整而且細緻。文章的結尾部分扼要地論述了于闐及于闐王國轄境內的瑞像的重要意義,指出瑞像已超出了宗教範圍而應引起歷史學者的注意,瑞像實際反映了當時于闐和敦煌保持着的某種形式的聯繫(參看上揭論文集第102頁)。稍後,蘇先生就瑞像及有關瑞像的敦煌寫卷又寫了一篇文章,題作《敦煌寫卷中蒐集的若干壁畫題記》,刊於1983年2月中法學者聯合討論會論文集《敦煌壁畫和敦煌寫卷》(Les Peintures Murales et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巴黎,1984年)第35—39頁。我們深感遺憾的是,我們讀到蘇先生的文章爲時過晚,因而未能將科研的最新成果反映到我們的文章之中。

另外,我們在同一期間內陸續得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筆記》第三分册(巴黎、1983年)、第四分册(巴黎,1984年)。兩分册中有伯希和在1908年2月至5月間抄錄於第72(伯希和編號第106窟)、76(P.102)、98(P.74)、231(P.81)、237(P.84)、453(P.119)諸窟的瑞像榜題。我們的文章無法大動,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將上述諸窟的伯希和的瑞像榜題錄文附載於後，以補我們的文章的第二部分的嚴重缺陷，以供讀者參考。

第72窟(伯希和編號106窟)

1 結迦宋佛亦從舍衛國來在……
2 彌勒佛隨釋迦牟尼佛現
3 分身像者胷上分現胷下體其像變形隨□
4 中印度境佛額上寶珠時有貧士旣見寶珠乃生盜心像便曲旣躬授珠與賊
5 觀音菩薩瑞像記
6 伽你釋迦牟尼佛從舍衛國來在固城
7 南天竺國彌勒白佛瑞像記
8 濮州鐵彌勒瑞像今改爲濮陽郡是
9 于闐河浴佛瑞像身丈餘杖錫持鉢形而立
10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1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2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3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4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5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6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7 南無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瑠璃光佛
18 南無寶境如來像佛
19 南無郊(?)吉祥菩薩
20 南無聖容像來住牛頭山
21 南無觀音菩薩
22 南無聖容諸像來住山

23 南無聖容諸像來住山

24 指日月瑞像紀

25 張掖郡西影像古月之王時見在瑞像

26 釋迦牟尼佛眞容從王舍城騰空如來在于闐海眼寺住

第 76 窟(伯希和編號 102 窟)

1 盲王願造
聖者羅惹(?)躬(?)
之巖而(?)…

2 大目乹連現神通… 士(?)
二相住水(?)谷戶 如來所(?)日(?)

3 南天竹達親□□□□□□上
香盤石爲□□□在(?)□□

4 濮州鐵彌勒瑞像今改濮陽郡是□

5 釋迦佛亦從舍衛國□空同來在于
闐國城□□

6 天立□□佛在城…

7 … 印…

12 此像從憍(?)慆(?)彌國飛往于闐東(?)媲摩城中今見在殊
靈瑞(寺?)

13

14 微波施佛亦從□□□□□而同來在于闐□□□□

15 結(?)迦佲(?)佛亦從舍衛…

16

17

18 于闐國平赴中…

19

20

21 湏徽郡…　　不…　　無量福

22 迦葉佛亦從舍衛國騰空而來于闐國人虔敬不可思議

23 伽你□□□□佛□□□國騰空□□在□□□

24 昔二王相修行作靈…　　二王覩已捍申□上
無明(?)…　　住于闐勸伽(?)…

25 印度境□□□高…　　寶珠乃盗心詐見贍…　　乃
……乎欲　　登其□…　　如其將□增高
便興念(?)曰□諸佛求□□違今世(?)索(?)
□上怯(?)□知…　　爲靈闡誨記(?)

26 南天竺國彌勒現佛(?)瑞像記

27 釋迦□□□□□□□□□□□□騰空而來住于闐□□

28 彳休(林)□□□佛舟(?)□□竿(羊?)汉(奴?)(炇?)㚕
摩佛□□□□□□□化□火爆

29

30

31 南無大勢至菩薩來降于闐國

32

33

34

35

36 南天竺王…　　菩薩手持龍(?)…　　白天…

第98窟(伯希和編號第74窟)

1 北天竺國尼婆羅國有彌勒頭衬噴(?)在水中有人來取水中
火出

第231窟(伯希和編號第81窟)

1

2 微波施佛從舍衞城騰空於國城住

3 于闐坎城瑞像

4 中天竺憍惱彌尅瑞像

5 高浮啚寺放光佛其光如火

6 時佛從天降下其檀像乃仰禮拜時

7 釋迦牟尼　眞容從王舍城騰□□　海眼寺

8 于闐國石瑞像

10 天竺摩加國　觀世音井

11 于闐古城瑞像

12 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決海時

13 業力自遠牽將來業　自近　將去非山非海非石中

14 彌勒菩薩隨釋　朱滔城

15 中天竺波羅柰國鹿野院中瑞像

16 張掖郡佛濕像月支王時

17 盤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縣北聖容瑞像

18 天竺　白銀彌勒瑞像

19 摩竭國須彌座釋加並銀菩薩瑞像

20

21 虛空藏菩薩於西玉河薩迦耶倦寺住瑞像

22 中天竺摩加陁國放光瑞像

24 佛在毗耶離巡城行化紫檀像瑞

25 觀世音菩薩於蒲特山放光成道像瑞

26 于闐媲摩城　琱檀瑞像

27 中天竺摩□

28 此牛頭山像從耆山履空而來

29 指日月像

33 老王在北佛在地中馬足搯出

3] 朱具半國佛騰空於奴

34 迦葉佛從舍衛　騰空於固城住瑞像

35 陳國聖容像

1 分身瑞像者乹陁羅國　二人出錢畫像其功畢一身二頭

36 于闐海眼寺釋迦聖容像

第237窟(伯希和編號84窟)

1 佛在毗耶離巡城行化紫檀瑞像

2 　　　　□肓至(?)□

3 觀世音菩薩於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

4 于闐媲摩城　珊檀瑞像

5 中天竺摩□

6 此牛頭山像從耆山履空而來

7 指日月像

8

9 朱俱半國佛騰空於奴越寺住

10

11 陳國聖容像

12 分身瑞像者乹陁邏國貧者二人出錢畫像其功至已一身兩頭

13 于闐海眼寺釋迦聖空

14 □□□□　舍　城□□　園(國)□像

15 于闐坎城瑞像

16

17 高浮啚寺放光佛其光如火

18

19 釋迦牟尼佛眞容從王舍城騰□□海眼寺

20

21 酒泉郡釋迦牟尼瑞像

22

23 天竺摩伽國救苦觀世音菩薩

24 于闐故城瑞像

25 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决海時

26 業力自遠　將來業力自近　將去非山非海非石中無有晄諸不受者

27

28

29 彌勒菩薩隨釋迦來漢城住

30 中天竺波羅奈國鹿野院中瑞像

31 張掖郡佛影像月支王時現

32 盤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縣北聖容瑞像

33 天竺國白銀彌勒瑞像

34 摩竭國須彌座釋迦並銀菩薩瑞像

35

36 虛空藏菩薩於西玉河薩迦耶倦寺住瑞像

37 中天竺摩伽陁國放光瑞像

第453窟(伯希和編號119窟)

龕頂:

1 北天竺烏仗國有老(?)塔高四十三丈人不可思儀

2 □皮毗曰匚　　　仏(?)巡

3 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羅漢與手遮日日光下處見之。

甬道頂兩披:

1 此(?) 國騰空飛來在于闐國

2 此印…… ……

…… ………

3 南無清涼山頂聖

4 慈氏如來現□□□□往于闐國

5 飛來往于闐國

于闐佛寺志

于闐國在中國佛教史中的地位之重要，已爲人所共知。我國大乘佛典，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諸部經原本，大多來自于闐；我國早期西行求法高僧，從曹魏朱士行起，也大多以于闐爲目的地。凡此種種，學者們的硏究旣詳且備，無待贅言。値得注意的是，于闐不僅僅是大乘佛典的傳播中心，于闐自身也孕育發展出來若干佛敎經典，或爲某些佛典添加了出自當地的內容。在這方面，于闐佛寺起着重要的作用。梁釋僧佑（445—518）《出三藏記集》（成書當在506—512年）卷九記《賢愚經》的產生經過說：

"……河西沙門釋曇學〔按唐釋智升《開元釋敎錄》卷六作釋慧覺，一云曇覺〕、威德等，凡有八僧，結志游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于闐文 paṃjavaṣṣi, paṁjsi-vaṣāri; 梵文pancavārṣika）。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敎。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胡音，折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旣而逾越流沙，齎到涼州，於時沙門釋慧朗，河西宗匠，道業淵博，總持方等，以爲此經所記源在譬喩，譬喩所明，兼載善惡，善惡相翻則賢愚之分也，前代傳經已多譬喩，故因事改名，號曰《賢愚》焉"①。

這是于闐佛寺中的高僧闡揚佛法、經河西僧人結集成經的一例②。又如《大集部》（Mahāsaṃnipāta）中的《日藏經》（Sūryagarbha-sūtra）和《月藏經》（Candragarbha-sūtra），包含了大量出自塔里木盆地西部地區的內容③。十世紀大寶于闐國國王李聖天之子尉遲

輸邏 (Viśa Śūra, 967—977 在位)贊助纂成的于闐語《佛本生讚》(Jātakastava,闍陀伽讚)④、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駐喀什總領事彼特羅夫斯基(Н. Ф.Петровский) 以及其他一些人從和闐等地搜集到的著名的于闐語韻文長卷《贊巴斯塔書》⑤或其中第二品《跋陀羅緣起》⑥,在性質上,均屬於于闐地區的獨創性佛教撰述。鑒於于闐佛寺在孳乳、發展佛教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本文滙集有關于闐佛寺的資料就不僅僅是考證的旨趣了。

1、贊摩寺/梣摩寺/匝摩寺

《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惠生行紀》稱:"于闐國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名毗盧旃 (Vairocana), 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 卽往看毗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 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 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毗盧旃鳴鐘告佛,卽遣羅睺羅(Rāhula)變形爲佛, 從空而現眞容。王五體投地, 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 令覆瓮之影恆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 (Pratyeka) 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審之。"⑦《大唐西域記》和藏文《于闐國授記》也記載了相似而更加繁複的故事,後者給我們留下此寺的名稱——Tsar-ma。⑧ 前人早已將這裏的 Tsar-ma 比定爲《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于闐條的"贊摩寺", 該傳稱:"城南五十 (應作"十五")里有贊摩寺,卽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據《周書》應作"趺")處,雙迹猶存。"⑨顯然,《北史》的記載和《洛陽伽藍記》一樣也是來源於《宋雲惠生行記》,而可貴的是給我們提供了它的名稱, 使人們很容易地將漢藏文獻的有關記載聯繫在一起。贊摩寺是佛教傳入于闐的標志, 乃"最初之立也",⑩ 因此在于闐佛寺中居突出的地位。公元五世紀初葉至于闐的涼州沙門僧表說:"贊摩伽藍有寶勝像, 外國相傳云, 最似眞

相。"⑪這裏的佛像也名揚域外。由此看來，《宋雲惠生行記》、《西域記》和《授記》都以大量的篇幅和首要的地位記載此寺，並非偶然。

由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從北魏甚至更早，直到唐初，贊摩一直是于闐一所鼎盛的寺院。其後情況如何，漢文正史和僧傳沒有提供更多的史料，而和田、敦煌出土的文書填補了這個空白。

在斯文赫定 (Sven Hedin) 探險隊由今和田東北一帶掘到的紙本文書中，有兩件文書提到贊摩(于闐文作Tcarma)寺。一件編號爲Hedin 7，是《某年二月二十六日贊摩寺法師尉遲跋陀羅(Viśā-bhadra)致媲摩城諸三藏法師書》⑫，這封報問起居平安的信，使我們看出當時于闐國寺院間僧侶的交往與情誼。另一編號爲 Hedin 23，是一篇不知名的佛經的題記，供養者在題記中說，他將與贊摩寺法師 Braṃgala 共同享有寫經的功德⑬。

敦煌卷子中也爲我們保存了一些寶貴的材料。P.2139《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是公元九世紀前後由吐蕃三藏法師法成從藏文《于闐國阿羅漢授記》(Li-yul-gyi Lung-bstan-pa) 譯爲漢文的一部文獻⑭，主要是記載一位于闐國阿羅漢對于闐像法毀滅的預言。其中講到當于闐王不信佛法時，衆僧走投無路，"集桚摩寺評議是事"，然後奔向赤面國(即吐蕃)⑮。這裏的桚(音 zăn)摩寺相對應的藏文原文作 Tsar-ma⑯，也即贊摩。這篇預言雖然是佛徒的捏造，但恰好反映了贊摩寺在于闐佛寺中的主導地位，在他們眼裏，這座最早興建的伽藍，也將最後一個被毀滅。

此外，S 6264 是《天興十二年正月八日南閻浮提大寶于闐國匝摩寺八關戒牒》，授戒師是后晉天福 (936—943) 中入五天竺求法，於宋初還至于闐的"左街內殿講經談論興教法性大師賜紫沙門道圓"，受戒弟子爲于闐人曹清淨，年代是大寶于闐國王李聖天 (Viśa Saṃbhava) 天興十二年(961)正月八日，地點在于闐國匝摩寺⑰。

這裏的匝摩無疑是贊摩的同音異譯。可見，直到宋初，贊摩寺仍是于闐國的重要寺院，它不僅是大法師給俗弟子授戒的場所，而且還是招待東往西去的行脚僧人的地方。

晚期于闐語書寫的敦煌卷子中也常見贊摩寺之名。P. 4099《Mañjuśrīnairātmyāvatāra-sūtra》的題記中提到"贊摩寺住持Maledpranya"⑱，這部長達四百餘行的于闐語寫經是繼李聖天爲王的尉遲輸羅在位期間(967—977)產生的⑲。另外，P.5537《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Kauśaka-prajñā-pāramítā)的題記⑳和 P.2025 雜文書中也都提到贊摩寺㉑。可見，在于闐王國已經開始與疏勒的穆斯林展開聖戰的時候，盡管邊境已是烽火硝烟，而贊摩寺的僧衆仍在譯經弘法，靜心佛事。

歸納起來，贊摩又作桚摩、匝摩，藏文作 Tsar–ma，于闐文作Tcarma。贊摩寺是于闐國興建的第一座寺院，而且一直是于闐重要的寺院之一。

《水經注》卷二記于闐國："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㉒利刹寺的里數和傳說都與贊摩寺相符，但寺名利刹，不解其義。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既記有"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靴"；又記："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靴，非皮非綵，歲久不爛。"㉓可能是抄自不同的史料，並不能由此認爲贊摩和利刹(刹利)寺兩者有別。

2、瞿摩帝寺

寺名最早見於《高僧法顯傳》："國主安頓供給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搥食。……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㉔。据藏文文獻如《授記》記載，寺內有殿堂名光明殿((pra-ba-śa)。"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由於國王崇重大乘，所以行大乘學的瞿摩帝寺較其他諸寺更受敬重，在行像時，以瞿摩帝寺爲首。

其後，北涼王沮渠蒙遜從弟沮渠京聲曾渡流沙至于闐，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大乘法師佛馱斯那，從授禪法，而《禪法要解》二卷當即佛馱斯那於瞿摩帝寺所傳授[25]。這表明此寺一直以大乘學著稱於世，而且還是印度與西域學者交流思想、傳授學問的場所。

《授記》在贊摩寺後接着記載，瞿摩帝（藏文 Hgum-tir）寺是于闐王尉遲毗梨耶（Vijaya Virya）時創建的[26]。遺憾的是尉遲毗梨耶王和《授記》中記載的其他于闐國王一樣，沒有確切的年代標誌。因此，瞿摩帝寺的興建年代還是不得而知。

敦煌出土的晚期于闐語文書中，也常見瞿摩帝一名，于闐文寫作 Gūma-ttirä。如 925 年于闐使者在沙州書寫的所謂《鋼和泰雜卷》第 41—42 行載："張都督命人爲瞿摩帝塔制一新帳，長二十丈。"[27] 因爲這是于闐使臣在沙州做的一種功德，所以，此處的瞿摩帝塔應是著名的于闐瞿摩帝大塔的一個敦煌仿制品，這也正好可以看出瞿摩帝寺大塔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地位。

此外，Ch 00296 和p.2958 兩份于闐使臣報告中，分別提到了瞿摩帝的太子和大師[28]。Or 8212．162 號于闐文雜纂中，不僅提到了兩位瞿摩帝的阿闍梨的名字，而且還記載了 Vijita Sagrauma 王在瞿摩帝一帶興建伽藍的事情[29]。

由以上于闐文寫卷可以看出，瞿摩帝寺和贊摩寺一樣，直到五代宋初仍然香火不絕。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出，一些瞿摩帝的法師還肩負着王朝的神聖使命，與政府的使臣一起，出使沙州、甘州、西夏乃至中原王朝。這對於中原、河西和于闐佛教文化的傳播與交往必然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早年，黃文弼先生曾認爲瞿摩帝寺即贊摩寺[30]。最近出版的周連寬先生的《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已指出其誤[31]。從上引有關兩寺的史料和它們的于闐文、藏文讀音看，兩者絕對無法勘合。

3、牛頭山寺

日本學者光島督在《于闐的名刹瞿摩帝寺考》一文中認爲，法顯所記的瞿摩帝寺，即《授記》中所記尉遲毗梨耶王建造的瞿摩帝寺，而且也就是同一國王所建的牛頭山(hgehu-to-can)寺㉜。按《授記》關於這兩所寺院的記載十分淸楚，雖然它們都建於尉遲毗梨耶王在位時期，但瞿摩帝寺是國王爲善友尊者佛陀杜底(Buddhadūta)阿羅漢所建，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其方位；而牛頭山寺則是因爲國王在牛頭山上一小山谷中找到了遺失的孩童，而發心願在山谷中建造的㉝。玄奘曾簡要記述了後者："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岩隒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㉞

從另一方面看，"瞿摩"或"瞿摩帝"最早是于闐一條河的名字，梵文作 Gomatī，藏文作 Go-ma 或 mgo-ma，于闐語作 Gūmattīrä。《水經注》卷二記："〔河水〕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㉟"仇摩置"是瞿摩帝的同音異譯。學者已考定此河即稍晚文獻中所記載的墨玉河(今哈喇哈什河)㊱，與《水經注》的記載相吻合。至於寺名"瞿摩帝"(Hgum-tir)，藏文意爲"瞿摩河岸"㊲。因此可以推測，瞿摩帝寺當建於王城西南瞿摩河岸邊，這裏正好是牛角山或牛頭山麓，與位於牛頭山某小山谷的牛頭山寺儘管相近，但却不在一處。語源和地理兩方面的考察，也把兩所寺院明顯地區分開來，所以，我們很難接受光島氏的看法。

在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的《日藏經》中，牛頭山就是諸神守護的勝地㊳，在保存至今的藏文文獻《牛角山授記》、《于闐國授記》等書中，都以大量篇幅敍述釋迦牟尼佛如何從王舍城靈鷲山飛來于闐牛頭山講說預言的故事㊴。牛頭山在很早以前就被佛教徒

打上濃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傳說釋迦時代那里曾經建有瞿摩娑羅乾陀大寶塔，在于闐佛教徒的心目中，牛頭山就是于闐的靈鷲山。這樣一處重要的宗教聖地，一定建有許多伽藍，牛頭山寺和瞿摩帝只不過是其中的兩座較大的寺院而已。

牛頭山作爲一座佛教名山，不僅在于闐僧衆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隨着于闐和沙州間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它還以一種"瑞像"的形式，屢屢出現在敦煌的洞窟和寫卷中㊵。在牛頭狀的山峯上，繪着一所輝煌的殿堂，這大概就是我們這裏所說的牛頭山寺吧。

4、娑摩若寺（王新寺）

《西域記》稱："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以下記述一位羅漢手擎此塔，放置舍利的故事㊶。托瑪斯將此寺比定爲《授記》中的 Sum-nya 寺㊷，學者間沒有什麼異議。《授記》關於此寺的來歷是這樣記載的："爾後，尉遲達磨 (Vijaya Dharma) 王之子尉遲信訶(Vijaya Simha) 在位之時，疏勒王率大軍侵入于闐國。尉遲信訶〔率軍〕迎戰，疏勒軍敗北，于闐王以套索(或譯陷阱)擒獲其王，且令斬之。疏勒王祈求赦免，尉遲信訶王曰：'王，若不殺而赦，則當你修成阿羅漢時，回來作我善友。'于闐王赦之，取法名曰阿難陀斯那 (Anandasena)，送回疏勒。爾后，比丘阿難陀斯那尋即成爲阿羅漢，以其與于闐王有誓在先，騰空而來于闐國，爲尉遲信訶王善友。國王以憐憫眞誠之心，爲尊者阿難陀斯那阿羅漢興建娑摩若寺及窣堵波。毗沙門與迦比羅天王爲護持此伽藍而住於此地，故此伽藍威力無邊，顯赫無比。"㊸

斯坦因把《西域記》中的娑摩若寺比定爲《授記》中的瞿摩帝寺㊹，顯然是沒有通盤考慮《授記》的前後記載而致誤。但是，他關於娑摩若寺即法顯所記的王新寺的論證㊺，却是正確的。《法顯傳》

記載:"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㊻和玄奘關於娑摩若寺的記載相對照,除里數略合外,兩者都特別地描繪了寺中的塔,"金銀覆上"而"時燭神光","衆寶合成"而"甚多靈瑞"。盡管不同時代產生的著作取材不同,各有側重,因而有一定的差異,但相似之處使我們也認爲,娑摩若寺卽王新寺。

敦煌出土的于闐語文書進一步豐富了我們關於娑摩若寺的知識。早在1938年,貝利教授在刊布敦煌卷子 Ch. 00274《佛本生讚》(Jātakastava) 的圖版時就曾指出:"這部《佛本生讚》是娑摩若(于闐文 Sāmanyā; 藏文 Sam-nya 或 So-ma-nya) 寺阿闍梨的著作。"㊼ 1955年,貝利的學生德萊斯頓 (M. J. Dresden) 將此于闐文卷全部譯爲英文。娑摩若一名出現在讚詩的序中:"微臣(按:指功德主張金山)以敬信慈愛之心,敬請娑摩若寺三藏法師 Vedyaśīlä,法師有如阿闍梨提婆(Ācāryadeva),精於文辭有如水中漁夫:'而今尊者以愛菩提之心屈尊爲我轉譯,並將此功德善念敬奉與尉遲輸羅大王;並願此國疾病不起,災禍盡消'"㊽。從這部完成於尉遲輸羅王在位時期(967—977)的著作可以得知,公元十世紀中葉,娑摩若寺是于闐王國一處十分重要的譯經場所。

5、毗沙門天王神廟

《西域記》記載于闐建國之王"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傳國君臨,不失其緒"。而其國王則"自雲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㊾在《授記》中,從決海成陸,到涌現軍前,毗沙門天王在于闐建國傳說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㊿。另外,毗沙門天王作爲于闐最主要的守護神祇早就見於漢文《月藏經》(51),有關的藏

文文獻更爲豐富。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于闐條注云:"于彼城中有毗沙門天神廟,七層木樓,神居樓上,甚有靈驗。"[52] 從考古材料看,不僅于闐王城中立有毗沙門天王廟,而且于闐周圍一些寺院中也供有毗沙門的神像[53],甚至"毗沙門和舍利弗决海"的文字和圖像也大量出現在敦煌卷子和洞窟壁畫中[54]。這反映了于闐毗沙門天王信仰的東漸,也表明公元十世紀前後,戰亂頻仍,人們迫切要求神靈庇護的心理。

6、麻射寺

«西域記»和«授記»都記載了一個關於絲絹傳入于闐的美妙傳說[55],盡管內容略有差異,但大的方面還是吻合的。因此,學者們早就將«西域記»中麻射僧伽藍比定爲«授記»中的 ma-źa 寺。這座寺院是由於蠶種的傳入于闐而興建的,在于闐諸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位於今和田東北的丹丹烏里克(Dandān-Oilik)、東方的哈達里克(Khadalik)等于闐佛教寺院遺址,曾出土了八塊木板畫,描繪了漢地公主把絲絹傳入于闐的一幕幕戲劇性場景[56],形象地說明了這個故事的廣泛流傳,也反過來說明麻射寺在于闐國的特殊意義,即她是中國絲綢及其工藝向西傳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這也就是幾乎所有關於絲路的著作中都有麻射寺的名字的原因。

7、龍興寺

此寺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于闐有一漢寺,名龍興寺;有一漢僧,名□□,是彼主寺,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57]。慧超以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回到安西,留下上面這段記載。于闐是唐安西四鎮之一,于闐的這所漢寺——龍興寺或許就是唐中宗復辟,天下寺觀同號龍興時奉敕興建的[58]。這和龜兹的大雲寺、龍興寺,疏勒以及碎葉的大雲寺一樣,都是唐朝政令行使於西域的反映。而且,從這些寺院的興建可以進一步窺測出,唐朝統治者除了利用政治和軍事等手段控制西域外,還利用在西域建立漢寺的方法,讓漢

族佛敎滲透到這些佛敎王國中，使西域在精神文化上也和中原緊密聯繫起來，共同對抗吐蕃和西突厥餘部的侵擾。

根據《授記》的記載，駐扎在于闐鎮的漢族軍使還曾和于闐王一起共建伽藍[59]，這更清楚地說明了唐朝的這種策略；同時，漢寺的興建也爲于闐的佛敎增添了異彩。

8、Dro-tir 寺

《授記》記載，這座寺院是尉遲達磨（Vijaya Dharma）王爲其兄尊者達磨難陀（Dharmānanda）建立的，是于闐城和坎城周圍十六所奉行摩訶僧祇部（Mahāsāṃghika，大衆部）的寺院之一[60]。我們在漢文文獻中沒有找到有關此寺的材料。但在晚期于闐文書寫的敦煌卷子 P. 2958 中，找到了一位 Dro-tir（于闐文 Drūtir）寺的阿闍梨，他和一位瞿摩帝寺的法師一起，作爲于闐的使臣來到沙州，又繼續向東到朔方[61]。另外，Or 8212.162雜纂的最後一件狀文中，也兩次提到一位 Dro-tir 寺的法師[62]。表明此寺和瞿摩帝寺一樣，這裏的僧人在于闐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Dro-tir 寺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僧衆屬於摩訶僧祇部。

《授記》還記載，尉遲達磨王時期，小乘薩婆多部（Sarvāstiva-da，說一切有部）也傳入于闐[63]。玄奘至于闐，即被"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64]由此可見，于闐雖說是大乘佛敎的中心，但對於佛敎的其他派別兼容並蓄。因此，從 Dro-tir 的興盛情況看，僅僅把于闐理解爲大乘佛敎王國是不够的，于闐佛敎其他派別的狀況如何，更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9、Hgu-źan 寺（淨土寺）

根據《授記》，此寺是尉遲散瞿羅摩（Vijaya Sangrāma）王率軍攻滅曾經侵擾于闐的游牧族諸國後，還至于闐玉河下游時，發信心爲七位尊者阿羅漢所建[65]，藏文 Hgu-źan 又作 Hgu-źanta,

意爲"淨土"，貝利教授比定爲于闐文的 Gūsūṃ'dā[66]。此詞作爲地名四次出現於 Or 8212.162 號雜纂中。同文書的最後一件狀文中，還提到了一位出使沙州的 Hgu-źan 寺的大德，名叫 Nāgaidravarda[67]。此人或許就是 S 2528 文書所記載的"于闐僧龍大德"[68]，他在沙州請求令公節度使發給公憑，准備繼續自己的旅程。Hgu-źan 寺雖然還沒有找到漢文材料的記載，但從藏、于闐文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它是于闐較大的寺院之一。

10、地迦婆縛那寺

《西域記》載："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來至此"[69]。關於這所寺院，僅見於玄奘的記載，于闐文寫卷 Ch 00268 第 103—4 行提及 Ditka-banī 菩薩[70]，據此或可推斷此寺之得名殆因其奉祀地迦婆縛那菩薩。

11、護國寺

從宋雲、惠生和玄奘關於捍麼或媲摩的瑞像記載可知，媲摩城南的大寺也是十分隆盛的[71]，它以寺中的瑞像著稱於世，而且在敦煌石窟的壁畫中也是常見的瑞像之一[72]。遺憾的是這所寺院的名字未見記載。

媲摩地區是于闐王城東部的一塊大綠洲，考古和文獻材料都表明這裏曾經是佛寺林立的宗教聖地，但目前我們僅僅從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掘獲的幾件漢文文書中，找到一個寺的名稱，即護國寺。這幾件文書編號分別爲 D. VII.2;VII.4.a;D.VII.7 等。其中前兩件是當地俗人向護國寺僧虔英舉借錢糧的契約，後一件是當寺僧官下的帖[73]。這大概是位於傑謝鎮的一所寺院，從佛寺的名稱和寺僧的法名如虔英、寶明、法進、道超、惠達、惠雲等等來看，這所寺院似乎也是漢僧爲主的寺，其中的僧人大概是隨着唐朝的勢力而來到這裏的。

12. 金輪寺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普遍智藏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條記載，東天竺三藏沙門達摩戰涅(一作坦)羅於開元二十九年由唐西行歸國，路上染疾，“旋騎退入疏勒城中，轉次東南行八百里，至于闐國，住金輪（一作轉）寺……以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此寺矣。”⑭ 關於此寺的進一步研究，有待於新材料的發現。

13、薩迦耶僊寺

法成譯《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開首記載：“有于闐國來六代王已過，至第七代王，名毗尼耶訖多。治國之時，彼國有寺，名薩迦耶般羅訶那。去此寺不遠，有一山谷，名娑迦耶幾那，彼山谷中有一羅漢。”⑮ 以下是羅漢關於于闐像法滅盡的預言。這裏的寺名薩迦耶般羅訶那，相對應的藏文作 San-ka-ya-pra-ha-na-ya，山谷名娑迦耶幾那作 Sa-ka-ya-gyi-ri⑯。這座寺院除了作爲羅漢的住持地外，在其他一些材料中，它還是守護于闐的虛空藏菩薩(Ākāśagarbha)的住所，S 2113《瑞像記》第 56—57 行有“虛空菩薩於西玉河薩伽耶僊寺住”⑰，同樣的題記還見於敦煌莫高窟第 231 和 237 窟的壁畫中⑱。與之相應的是 P.2893 號于闐文寫卷，其中也記載虛空藏菩薩的住所是 Sakāya-gīra⑲，即薩迦耶僊寺。此外，在敦煌藏文卷子 P. t. 960《于闐國教法史》中，虛空藏的住所是 Skohi-brong⑳，其差異或許是由於方言和轉譯造成的。根據以上記載，薩迦耶僊寺是位於深山峽谷，玉河岸邊的一座寺院。有關它的材料相對來講是比較多的，但缺乏當地文書的記載，而且似乎也沒有高僧前去訪道觀瞻。因此，給此寺披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使人感到它好象是在若有若無之間。

14、毗摩寺(附)

最後，我們附帶談談毗摩寺。P. 2007《老子西升化胡經》卷一稱：“(老子)……便即西度，經歷流沙，至于闐國毗摩城所。”㉛ 其方

位,《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載:"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由於《老子化胡經》是道士在遠離于闐的中土虛構的東西,而毗摩寺的記載除了見於有關老子化胡的傳說之外,别無他證,所以,似乎不應把它列入于闐佛寺之林。

最後,應當指出,專門記載于闐佛寺情况的《于闐國授記》一書列舉了大量僧尼寺院,如南無佛寺(na-mo-hbu-gdoṅ)、彌勒寺(hbas-no-nya)、伽師尼寺(Khye-śo-no)、太后正果寺(gus-sde-re-ma)、公主寺(hbah-no-co)等,數量遠遠超過上文列舉的寺院。于闐語文書中也散見一些佛寺名稱[82]。五世紀初,法顯稱于闐有大伽藍十四,小者無數,家家門前皆起小塔[83]。七世紀初,玄奘稱該地伽藍百餘所[84]。《于闐國授記》成書大概在九世紀末或十世紀初,它反映當時當地具有一定規模的寺院達四百餘所,蘭若小塔數逾五千[85]。

二十世紀初以來,考古探察人員在和闐地區找到了大量寺塔遺址,這向人們提出了進一步研究和比定于闐佛寺的任務。我們通過初步搜集有關于闐佛教資料認識到,于闐地區的佛教發展情况值得人們深入地加以研究。

---

①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5,第67頁。

② 參看高楠順次郎《藏文和漢文中的賢愚經故事》,載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RAS),1901年卷,第447—460頁;烈維(S.Levi)《中亞文獻中的賢愚經》,載《亞洲學報》(JA),1925年卷10—12月號,第305—332頁。

③ 參看列維《漢籍有關印度的資料》,載《法國遠東學院學刊》(BEFEO),第二至四卷,1902—1905年;馮承鈞節譯《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中華書局,1958年。

④ 德萊斯頓(M. J. Dresden)《佛本生讚》轉寫譯注,美國費城,1955。

⑤ 恩默瑞克(R. E. Emmerick)《贊巴斯塔書》譯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68。

⑥　沃羅比耶夫·捷俠托夫斯基（B. C.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與沃羅比耶娃·捷俠托夫斯卡婭(М. И.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合刊《跋陀羅緣起——塞語"E"抄本新葉》，莫斯科，1965年。

⑦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1978，第271—272頁。

⑧　玄奘《大唐西域記》，章巽校點本，上海，1977（以下簡稱《西域記》），第297—298頁。《于闐國授記》(Li-yu lung-bstan-pa)，恩默瑞克最新譯本《有關于闐的藏文文獻》(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倫敦，1967（下文簡稱《授記》），第23—29頁。

⑨　《周書》卷五十異域傳下于闐條略同。

⑩　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孫毓棠、謝方校點本，北京，1983，第122頁。

⑪　梁·寶唱《名僧傳》卷二十六，載《大日本續藏經》收《名僧傳抄》。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法林館，1914年，第272，286—7頁；賀昌羣譯本，上海，1956年重印版，第210頁，第220頁。

⑫　貝利（H. W. Bailey)《于闐語文書集》(Khotanese Texts)，第四卷，劍橋，1961年，第82頁。

⑬　同上書，第130頁。

⑭　漢文本見伯希和，羽田亨編《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藏文英譯本見托瑪斯(F.W.Thomas)《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和文書》(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第一卷，倫敦，1935年，第77—78頁。參看烏瑞（G. Uray）《有關公元751年以前中亞史的藏文史料概述》，載哈瑪塔（J. Harmatta）編《伊斯時代以前中亞史史料導論》(Prolegomena for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第289頁；漢譯文載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藏族研究譯文集》第二集，北京，1983年，第98頁。

⑮　《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

⑯　托瑪斯上引書，第一卷，第80頁。

⑰　錄文見拙稿《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載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1982年，第207頁；文書的年代參看文章第二、三節。按文書中將"匝摩"錄

作“迦摩”，是沿日本學者井之口泰淳《于闐語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系譜和年代》一文中錄文的錯誤，見《龍谷大學論集》，第三六四册，第42—43頁；劉銘恕先生錄文亦誤，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238頁。土肥義和撰《歸義軍時代》也誤作迦摩寺，見《講座敦煌》卷二《敦煌的歷史》，大東出版社，1980，第262—263頁。惟翟里斯（L. Giles）《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不誤，作匝摩寺（第211頁）。饒宗頤先生在《巴黎藏最早之敦煌寫卷金光明經(P4506)跋》附錄(一)中談到這件戒牒時說："于闐事摩尼教，故其寺名曰'迦摩寺'"（《選堂集林·史林》上册，香港，1982年，第415—416頁），此說恐怕難以成立。

⑱ 貝利《于闐語文書集》，第二集，劍橋，1954年，第124頁。

⑲ 參看蒲立本(E. G. Pulleyblank)《鋼和泰卷子年份考》(The date of the Stael-Holstein Roll)，《泰東》(AM)，新輯，第四卷，第一期，1954年，第92頁以下。

⑳ 貝利《于闐語文書集》第三集，劍橋，1956年，第120頁。

㉑ 《于闐語文書集》第二集，第79頁。

㉒ 《水經注》，《四部叢刊》本，卷二，頁五A面。

㉓ 《酉陽雜俎》前集卷10，北京，第98頁。

㉔ 日本大正《大藏經》卷51，第857頁；參看《法華傳記》卷7天竺于闐國瞿摩帝寺沙彌條："于闐國有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居，揵搥而食。"見《大正藏》卷51，第79頁。

㉕ 《高僧傳》卷2曇無讖傳，見《大正藏》卷50，第337頁；《開元釋教錄》卷4禪法要解條，見《大正藏》卷55，第521頁。

㉖ 《授記》第29—31頁。

㉗ 貝利《鋼和泰雜卷》(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泰東》新輯，第2卷，第1期，1951年，第44頁；參看貝利《于闐塞語辭典》(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劍橋，1979年，第471頁 haśirma 條。

㉘ 貝利《七王子》(The Seven Princes)，《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學報》(BSOAS)，第7卷，第3—4期，1948年，第621頁；又見貝利《塞語文書：原文轉寫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倫敦，1968年，第

110—111 頁。貝利《金汗》(Altun Khan), 同上《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 1967 年,第 98 頁。

㉙ 《塞語文書》,第 25—29 頁。

㉚ 《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1958 年,第 54 頁。

㉛ 《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北京,1984 年,第 243—244 頁。

㉜ 見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東洋史學論集》, 東京, 1953 年, 第 111—117 頁。

㉝ 《授記》第 29—33 頁。

㉞ 《西域記》第 298 頁。

㉟ 《四部叢刊》本,卷二,頁五 A 面。蒲立本認爲這裏的"仇摩置"是于闐南部山的土名(見恩默瑞克上引書,第 95 頁),似乎於原文理解有誤。

㊱ 參看烏瑞上引文,第 291—294 頁;漢譯文,第 99—100 頁。

㊲ 托瑪斯上引書,第一卷第 108 頁,注 7。

㊳ 《大正藏》卷 13,第 294—295 頁。

㊴ 托瑪斯上引書,第一卷第 11—35 頁;《授記》第 3—15 頁。

㊵ 孫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三)》,《敦煌研究》第二集,甘肅, 1983 年, 第 91—93 頁; 參看拙稿《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三輯。

㊶ 《西域記》第 300—301 頁。

㊷ 托瑪斯上引書,第一卷第 118 頁,注 3。

㊸ 《授記》,第 45—47 頁。

㊹ 斯坦因《古代和田》, (Ancient Khotan),第一卷,新德里, 1981 年版,第 223 頁。羽溪了諦從之, 見《西域之佛教》,賀昌羣譯本, 第 214 頁。其中《于闐國授記》譯作《西藏傳》;瞿摩帝譯作庫恩斯德爾,似有未妥。

㊺ 斯坦因《古代和田》第 1 卷,第 223—224 頁; 《西域之佛教》, 賀譯本第 214—215 頁。

㊻ 《大正藏》卷 51,第 857 頁。

㊼ 格林貝赫 (K. GrΦnbech) 刊《亞洲小語種叢刊》(Monumenta Linguarum Asiae moioris),第二卷《于闐文抄本》(Codices Khotanenses),哥本哈根,1938 年,第十二頁。

㊽ 德萊斯頓《佛本生讚》第 422 頁。

㊾ 《西域記》第 299—297 頁。

㊿ 《授記》第 11,21 頁。

(51) 《大正藏》卷 13,第 368 頁。

(52) 《大正藏》卷 54,第 375 頁。

(53) 威廉斯 (J. Williams)《于闐繪畫中的佛像》(The Iconcgraphy of Khotnese Painting),《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新輯,第 23 卷,第 1—2 期,羅馬,1973 年,第 132—135 頁;圖版 34,36—38。

(54) 拙稿《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反映的于闐》;孫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一)》,《敦煌研究文集》,甘肅,1982 年,第 351—352 頁。

(55) 《西域記》,第 301—302 頁;《授記》,第 33—35 頁。

(56) 威廉斯上引文,第 147—150 頁,圖版 57—64。

(57) 羽田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迻錄》,《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京都,1957 年,第 627 頁。

(58) 參看《唐會要》卷 48;房琯《龍興寺碑序》,《全唐文》卷 332,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第 3368—3369 頁。

(59) 《授記》,第 61 頁。

(60) 《授記》,第 35—41 頁。

(61) 《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第 98 頁。

(62) 《塞語文書》第 28—29 頁。

(63) 《授記》,第 41—45 頁。

(6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 121 頁。

(65) 《授記》,第 51—53 頁。

(66) 《于闐語文書集》,第 4 卷,第 9 頁。

(67) 《塞語文書》,第 25—29 頁。

(68) 參看《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第 255 頁; 圖版見《講座敦煌》,第 2 卷,《敦煌的歷史》,第 240 頁。

(69) 《西域記》,第 298 頁。

(70) 貝利《于闐語佛教文書集》,1951 年版,第 103 頁。

(71) 《洛陽伽藍記校注》,第 265—296 頁;《西域記》,第 303—304 頁。

⑫ 孫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二)》,《敦煌研究》第一集,第98—99頁。

⑬ 《古代和田》第一卷,第527—533頁。

⑭ 《大正藏》卷55,第879頁。

⑮ 《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

⑯ 托瑪斯上引書,第一卷,第77頁。

⑰ 拙稿《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

⑱ 孫修身上引文(二),第1000—101頁;伯希和《敦煌洞窟筆記》第三册,巴黎,1983,第25,29頁。

⑲ 貝利《于闐語雜考》四,(Hvatanica IV),《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報》(BSOAS),第10卷,第4期,1942年,第892—893頁。

⑳ 托瑪斯上引書,第1卷,第311頁。

㉑ 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

㉒ 貝利《于闐語雜考》四,第923頁。

㉓ 《大正藏》,第51卷,第857頁。

㉔ 《西域記》,第296頁。

㉕ 《授記》,第73—75頁。

于闐研究論著目錄

凡　例

1. 本目收錄有關于闐史地、宗教、文學、藝術類的著作和論文，有關于闐語言文字的研究擇要收錄，僅爲考訂語義詞彙者不錄。
2. 本目收錄的年代範圍是伊斯蘭化（約1006年）以前，但有個別例外。
3. 本目分西、日、漢文三部分，西文按人名的拉丁字母順序排列；日、漢文按漢語拚音順序排列，人名下按年代先後爲序。
4. 本目西文部分所用縮略語如下：

AA = Artibus Asiae

AI = Acta Iranica

AM ns = Asia Major, new series

AO = Acta Orientalia, Societates Orientales Batava Danica Norvegica (Leiden)

BEFEO =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eint

BSO(A)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T = Bulletin of Tibetology

CAJ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IBK =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IIJ = Indo-Iranian Journal

JA = Journal Asiatique

JAOS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ASB =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JRAS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RDTB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TS = 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SI = Studia Iranica

SPAW =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hist. Klasse, Berlin

StII =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TP = T'oung Pao

ZDMG =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一、西文部分

Andrews, F. H. Catalogue of Wall-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of Central Asia and Sīstān recovered by Sir A. Stein. Delhi 1933

——,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Antiquities recovered by Sir A.Stein during his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Delhi 1935

——, Wall 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re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2 vols. London 1948

Aquique, Md. "Studies in the Antiquarian Remains of Khotan and Chinese Turkestan", Studies in Orientalogy. Essays in Memory of Professor A. L. Basham. ed. by S. K. Maity et al., Shahganj 1988, 210-221

Asmussen, Jes P. The Khotanese Bhadracaryādeśanā. Text,

translation and glossary, together with the Buddhist Sanskrit original. Copenhagen 1961

——, Xūāstvā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nhagen 1965

Bailey, Harold W. "Handschriften aus Chotan und Tunhuang", ZDMG, XC. 3, 1936, 573-578

——, "An Itinerary in Khotanese Saka", AO, XIV. 4, 1936, 258-267

——, "Hvatanica", BSOS, VIII. 4, 1937, 923-936+pl.VI

——, "Ttaugara", BSOS, VIII.4, 1937, 883-921

——, Codices Khotanenses: India Office Library Ch.ii 002, Ch.ii 003, Ch.00274. Copenhagen 1938

——, "Hvatanica III", BSOS, IX.3, 1938, 521-543; BSOS IX.4 1939, 859-860

——, "Vajra-prajñā-pāramitā", ZDMG, XCII.2-3, 1938, 575-593, 605-606

——, "The Jātaka-stava of Jñānayáśas", BSOS, IX.4, 1939, 851-859

——, "Khotanese Names", A Volume of Eastern and Ind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F. W. Thomas on his 72nd Birthday. ed. by S. M. Katre and P. K. Gode, Bombay 1939, 1-3

——, "The Rāma Story in Khotanese", JAOS, LIX. 4, 1939, 460-468

——,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JRAS, 1939, 85-91

——, "Rāma", BSOS, X.2, 1940, 365-376

——, "Rāma II",BSOAS, X.3, 1940, 559-598

——, "Ttāgutta", BSOAS, X.3, 1940, 559-605

——, "Hvatanica IV", BSOAS, X.4, 1942, 886-924

——, "Kaṇaiska", JRAS, 1942, 14-28

——, "The Colophon of the Jātaka-stava",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n Society, XI.1, 1944, 10-12

——, "A Turkish-Khotanese Vocabulary", BSOAS, XI.2, 1944, 290-296

——, "The Khotan Dharmapada", BSOAS, XI.3, 1945, 488-512

——, Khotanese Texts. vol.I, Cambridge 1945

——, "Gāndhārī", BSOAS, XI.4, 1946, 764-797

——, "Kāñcanasāra", B. C. Law Volume. Part II, ed. by D. R Bhandarkar et al., Poona 1946, 11-13

——, "Recent Work in 'Tokharia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47, 126-153

——, "Irano-Indica", BSOAS, XII.2, 1948, 319-332

——, "Seven Princes", BSOAS, XII.3-4, 1948, 616-624

——, "Candra and Caṇḍa", JRAS, 1949, 2-4

——, "Irano-Indica II", BSOAS, XIII.1, 1949, 121-139

——, "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ṣou", AM, ns, I.1, 1949, 28-52

——, "The Present State of Khotanese Studies", Actes du XXI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Paris, 23-31 juillet 1948. Paris 1949, 166-167

——,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London 1951

——, "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 AM, ns, II.1, 1951, 1-45

——, "Ariaca", BSOAS, XV.3, 1953, 530-540

—— Khotanese Texts, vol. II. Cambridge 1954

——, "An Indo-Scythian Version of the Kuśa Jātaka", Sarūpa-bhāratī, or The Homage of Indology; being the Dr. Lakshman Sarup Memorial Volume. ed. by J. N. Agrawal and B. D. Shastri, Hoshiarpur 1954, 101-105

——, "Turkish Proper Names in Khotanese", 60. doğum gili münasebetiyle Zeki Velidi Togan'a armağan: Symbolae in honorem Z. V. Togan. Istanbul 1955, 200-203

——, Khotanese Texts, vol. III. Cambridge 1956

——, "A Title of Kaniṣka" 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 XX.3-4, 1956, 229-233

——, "Languages of the Sakas",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IV. Bd., Irianistik, 1, Linguistik. Leiden 1958, 131-154

——, "The New Iranian Materials from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K. R. Cama Oriental Institute, No. 39, 1958, 119-136

——, "Vijaya Sangrāma", AM, ns, VII. 1-2, 1959, 11-24

——, "Mā'hyāra", Bulletin of the 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XX.1-4, 1960, 276-280

——, "Sudhana and the Kinnarī", Bhāratīya Vidyā (Munshi Indological Felicitation Volume), XX-XXI, 1960-1(1963), 192-195

——, Khotanese Texts, vol. IV. Cambridge 1961

——, "The Preface to the Siddhasāra-śāstra", A Locust' Leg. Studies in Honour of S. H. Taqiẓadih. London 1962, 31-38

——, "The Profession of Prince Tcūṃ-ttehi", 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 Norman Brown. ed. by E. Bender, New Haven 1962, 18–22

——, Khotanese Texts, vol. V. Cambridge 1963

——, "Romantic Literature in early Khotan", Mélanges d'orientalisme offerts à Henri Massé à l'occasion de son 75ème anniversaire. Téhéran 1963, 17–20

——, "Lyrical Poems of the Sakas", Dr. J. M. Unvala Memorial Volume. Bombay 1965, 1–5

——' "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 AM, ns, XI.1, 1964, 1–26

——, "A Metrical Summary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in Gostana-deśa", BT, II.2, 1965, 5–7

——, "Vajrayāna Texts from Gostana", Studies of Esoteric Buddhism and Tantris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Koyasan. Koyasan 1965, 27–39

——, "Viśa Saṃgrāma", AM, ns, XI.2, 1965, 101–119

——, "The Sudhana Poem of Ṛddhiprabhāva", BSOAS, XXIX.3, 1966, 506–532

——, "A Tale of Aśoka", BT, III.3, 1966, 5–11

——, "Altun Khan", BSOAS, XXX.1, 1967, 95–104

——,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London 1968

——, "Kaniṣka",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ed. by A. L. Basham, Leiden 1968, 35–38

——, "Saka of Khotan and Wakhān", Pratidānam: Indian, Iran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presented to Fran-

ciscus Bernardus Jacobus Kuiper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 by J. C. Heesterman et al., The Hague and Paris 1968, 157–159

——, Khotanese Texts, vols. I-III. Cambridge 1969

——, "Saka Studies: the Ancient Kingdom of Khotan", Ira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III, 1970, 65–72

——,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the Summary in Khotan Saka. Canberra 1971

——, "The Kingdom of Khota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IV, 1971, 1–16

——, "Culture of the Iranian Kingdom of Ancient Khotan in Chinese Turkestan", MRDTB, 29, 1971, 17–29

——, "The Khotanese Summary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大正大學研究紀要» 57, 1971, 530–536

——, "A Half-century of Irano-Indian Studies", JRAS, 1972, 99–110

——, "Story-telling in Buddhist Central Asia", Acta Asiatica, 23, 1972, 63–77

——, "Taklamakan Miscellany", BSOAS, XXXVI.2, 1973, 224–227+pls.I-VIII

——, "Music in Ancient Khotan", Bulletin of the Iranian Cultural Foundation, 12, 1973, 41–46

——, "The Pradakṣiṇa-sūtra of Chang Tsiang-kuin",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I. B. Horner. ed. by L. Cousins et al., Dordrecht and Boston 1974, 15–18

——, "Sakas of Khotan and Ossetia", Philologia Orientalia,

LV, 1976, 34–39

——,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 Studies in Honor of Edward Conze. ed. by L. Lancaster, Berkeley 1977, 153–162

——, "North Iranian Sak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Diamond Jubilee Volume), Poona 1977–78, 45–46

——, "The Bodhisattva in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tudies in South Asian Culture, VII (Senarat Paranavitana Commemoration Volume), ed by Leelananda Prematilleke et al., Leiden 1978, 20–21

——, "Vajrayāna in Gostana-deśa",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1, 1978, 53–56

——,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1979

——, "North Iranian Problems", BSOAS, XLII.2, 1979, 207–210

——, "The Great Prince Tcūṃ-ttehi", 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vol. VI. ed. by L. Chandra, 1980, 49–50

——,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revised ed., Cambridge 1981

——, 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1982

——, "Khotanese Saka Literatur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III.2, 1983, 1230–1243

——, Khotanese Texts, vol. VII. Cambridge 1985

——, "Khotan-Saka Khyeṣa",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I. ed. by G. Gnoli et L. Lanciotti, Roma

1985, 39–40

——, "Māṃkuya", «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 下, 南昌, 1991, 975–976

Bailey, H. W. & R. E. Emmerick, Saka Documents, Plates. I-VI, London 1960–1973

Bailey, H. W. & E. H. Johnston, "A Fragment of the Uttaratantra in Sanskrit", BSOS, VIII.1, 1935, 77–83+pl.II

Banerjee, A. C. "Buddhism in Khotan", BT, IV, 1984, 1–3

Barnett, L. D. & A. H. Francke,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Sraffiti discovered at Endere", Appendix B of Ancient Khotan, II, Oxford 1907, 549–569

Barua, Benimadhab M. & Sailendranath Mitra, Prakrit Dhammapada, based upon M. Senart's Kharoṣṭhi Manuscript, with text, translation and notes. Calcutta 1921

Bazin, L. 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 Budapest 1991

Bečka, J. "A Continuator of Judeo-Persian Literature", AI, 28, 1988, 199–204

Beckwith, Christopher, I.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1987

Bernhard, F. "Gāndhārī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Añjali, 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 O. H. de A. Wijesekera Felicitation Volume. ed. by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1970, 55–62

Bongard-Levin, G. M. Studies in Ancient India and Central

Asia. Calcutta 1971

——, "New Sanskrit and Prakrit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Indologica Taurinensia, III-IV, 1975—1976, 73–80

——, "A New Fragment of the Sanskrit Sumukhadhāraṇī and its Saka Version", Indologica Taurinensia, VIII-IX, 1980–1981, 45–49

——, "A New Fragment of the Sanskrit Sumukhadharhāraṇī",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I. ed. by L. Ligeti, Budapest 1984, 125–130

——, "New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Mahāyāna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 Collection at Leningrad). Tokyo 1986

——, "Sanskrit Texts from Eastern Turkestan", 《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 南昌, 1991, 525–532

Bongard-Levin, G. M. & E. N. Tyomkin, "Fragment of an Unknown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from the N. F. Petrovsky Collection", IIJ, VIII.4, 1965, 268–274+ 4 pls.

——, "Otryvok sakskoj versii Dharmaśarirasūtra", Istoriko-filologiceskie issledovanija, Moscow 1967, 247–252

——, "New Buddhist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Paper presented to XXV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1967, 13 pp

——, "Fragment of the Saka Version of the Dharmaśarirasūtra from the N. F. Petrovsky Collection", IIJ, XI.4, 1969, 269–280

Bongard-Levin, G. M. & M. I. Vorobyeva-Desjatovskaja, "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Collection of the Manuscript Fund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USSR)",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I. Roma 1985, 159–176

——, Pamyatniki indijskoi Pismennosti v Tsentralnoi Azii, I. Moscow 1985; II, 1990

——, 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 Tokyo 1986

Boyer, M. A., E. J. Rapson & E. Senart,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I. Oxford 1920–1929

Brough, J. "Legends of Khotan and Nepal", BSOAS, XII. 2, 1948, 333–339

——,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

Burrow, T.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Bussagli, M. Painting of Central Asia. Geneva 1963

Caffarelli, P. M. V. "Proposte per una nuova cronologia e per un Ulterire esame critico Dell'opera di Yu-ch'ih I-seng",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XLVI, 1971, 63–85+ pls. I-XVIII

Chavannes, E. "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ān-uiliq, Niya and Endere", Appendix A to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521–547

……,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Clausen, G. L. M. "The Geographical Names in the Staël-Holstein Scroll", JRAS, 1931, 297–309

——, "The Turkish-Khotanese Vocabulary re-edited", islâm Tikikleri Enstitüsü Dergisi, V, 1973, 37–45

Cribb, J. "The Sino-Kharoṣṭhī Coins of Khotan. Their Attribution and Relevance to the Kushan Chronology", I, Numismatic Chronicle, 144, 1984, 128–152; II, Ibid., 145 1985, 136–149

Csongor, B. "A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Brāhmī Script", Unicorn (Chi-lin), 10, 1972, 36–77

Daffinà, P. "Sulla piu antica diffusione del buddismo nell Serindia e nell'Iran orientale", AI, 4, 1975, 179–192

Das, Sarat C. "Buddhist and other Legends about Khotan", JASB, IV, 1886,

De Jong, J. W.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Kāśyapaparivarta", 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 Geburtstag gewidmet, Berlin 1977, 247–255

Degener, A. "Sudhanas Wanderung in khotanischer Fassung", StII, 11–12, 1986, 21–32

——, "Läuterung im Book of Zambasta", StII, 15, 1989, 51–58

——, "Zur Übersetzungstechnik in der khotanischen Vajracchedikā", ZDMG, CXXXIX.2, 1989, 346–367

——, "Indisches Lehngut im khotanischen", ZDMG Supplement VIII. XXIV. Deutscher Orientalisteutag. Stuttgart 1990. 381–390

D'jakonova, Natalja V. "A Document of Khotanese Bud-

dhist Iconography", AA, XXIII.1, 1960,

——, "Materialy po Kul'tovoj ikonografii Khotana", Soobschcheniy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Leningrad), XVII, 1960, 65–67+illus.

——, "Buddhiiskaia ikonka iz sobraniia Petrovskogo", Soobschcheniy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Leningrad), XIX, 1960, 35–37+illus.

——, "Materialy po Kul'tovoj ikonografii central'noj Azii domusul'manskogo perioda", Trudy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V, 1961, 257–272

D'jakonova, N. V. & S. S. Sorokin khotankis drevnosti: Katalog drevnosti. Leningrad 1960

Dresden, M. J. "Introduction ad linguam hvatanicam", Jaarbericht No.9 van het vooraziatisch-egyptisch Gezelschap, Ex Oriente Lux, 1944, 200–206

——, The Jātakastava of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S, 45.5). Philadelphia 1955; rep. 1962

——, "Note on Khotanese Poetry", 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 Norman Brown. New Haven 1962, 42–50

——, "Khotanese (Saka) Manuscripts: A Provisional Handlist", AI, 12, 1977, 27–85

——, "A Lyrical Poem in Khotanese, part I: Text", 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Berlin 1977, 81–103

Duan Qing, Aparimitāyuḥ-sūtra und das S2471. University of Hamburg Dissertation 1987

Emmerick, R. E.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

——, "The Nine New Fragments from the Book of Zambasta", AM, ns, XII.2, 1966, 148–178

——, "Notes on the 'Tale of Bhadra'", BSOAS, XXX.1, 1967, 83–94

—— "The Ten New Folios of Khotanese", AM, ns, XIII. 1–2, 1967, 1–47

——, "Notes on the Prophecy of the Arhat Samghavardhana", AM, ns, XIV.1, 1968, 96–100

——, "Names from Central Asia", CAJ, XII.2, 1968, 88–91

——, "Some Khotanese Inscriptions on objets d'art", JRAS, 1968, 140–143+pls.I–II

——,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London 1968

——, The Book of Zambasta, 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 London 1968

——, "The Khotanese Manuscript 'Huntington K'", AM, ns, XV.1, 1969, 1–16

——, "Notes on the Book of Zambasta", JRAS, 1969, 59–74

——, "Nanda the Merchant", BSOAS, XXXIII.1, 1970, 72–81

——, The Khotanese Śūraṅgamasamādhisūtra. London 1970

——, "Khotanese Glossary to Nanda the Merchant", AO, XXXV, 1973, 115–126

——, "Some Khotanese Donors", Mémorial Jean de Menasce. ed. by Ph. Gignoux et A. Tafazzoli, Louvain 1974, 383–388

——, "Note on a Khotanese Inscription in the Bremen Überseemuseum", Archa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y G. Gropp, Bremen 1974, 362–364

——, "A Khotanese Fragment: P5536 bis", AI, 4, 1975, 223–236

——, "Three Monsters in Khotan", SI, VI.1. 1977, 65–74

——, "The Confession of Acts", AI, 12, 1977, 87–115

——,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Khotanese Manuscripts",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1979, 167–177

——,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Jīvaka-pustaka", BSOAS, XLII.2, 1979, 235–243

——,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79

——, "The Concluding Verses of the Khotanese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 Berkeley 1977, 83–92

——, "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 SI, IX.2, 1980, 1980, 185–193

——, "Hoernle and the Jīvaka-pustaka", BSOAS, XLV.?, 1982, 343

——, "A Stanza from 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 Societies and Languag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dies in Honour of I. M. Diakonoff. ed. by M. A. Dandamayer et al., Warminster 1982, 62–63

——, "Iranian Settlements to the East of the Pamir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III(1). Cambridge 1983,

263–275

——, "Buddhist among Iranian Peoples",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III(2). Cambridge 1983, 949–964

——, "Some Remarks on Translation Techniques of the khotanese", Sprachen des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 ed. by L. Röhrborn & W. Veenker, Wiesbader 1983, 17–26

——, "Some more Loanwords in Khotanese", Die Sprache, XXIX.1, 1983, 43–49

——, "Newly-discovered Buddhist Texts from Khotan",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ed. by T. Yamamoto, Tokyo 1984, vol.1, 219–220

——, "Research on Khotanese: a Survey (1979–1982)", Middle Iranian Studies. ed. by W. Skalmowski & A. van Tongerloo, Leuven 1984, 127–145

——, "A New Khotanese Document from China,", SI, 13.2, 1984, 193–198+pl.XIV

——, Cā tteya khī in the Musée Guimet", SI, 13.2, 251–252+pl. XVI

——, "Tibetan Loanwords in Khotanese and Khotanese Loanwords in Tibetan",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Roma 1985, 301–317

——, "A Khotanese Version of the Sūtra of the Lord of Healing",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Religions: Essays in Honour of Dr. Shozen Kumoi on his 70th Birthday. Kyoto 1985, 225–232

——,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anā Text. Stuttgart-Wiesb-

aden 1985, 30pp.
——, "The Crosby Collection", Paper presented to XXX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25-30 August 1986 Hamburg
——, "Another Fragment of the Sanskrit Sumukhadhāraṇī", Deyadharma: Studies in Memory of Dr. D. C. Sircar. ed. by G. Bhattacharya, Delhi 1986, 165-167+pls. 1-2
——, "The Transition from Old to Late Khotanese", 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 (Studia Iranica. Cahier 5). Leuven 1987, 33-42
——, "Two Problems in the Khotanese Rāmaya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European Seminar on Central Asian Studies, 7-10 April 1987 London, 4pp
——, "Some Verses from the Laṅkāvatārasūtra in Khotanese", AI, 28, 1988, 125-133
——, "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ed. by R. Schmitt, Wiesbaden 1989, 204-229
——, "Two more Khotanese Ghostwords", AI, 30, 1990, 80-82
——, "Khotanese birre", JRAS, 1990, 8-9
——, "The Dunhuang MS. Ch00120: its Importance for Reconstracting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Khotanese", Turfan and Tuhuang. The Texts. Firenze 1992, 145-170
Emmerick, R. E. & G. Dudbridge, "Pelliot tibétain 0821", SI, VII.2, 1978, 283-285+pl.XV
Emmerick, R. E. & P. O. Skjaervø,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I. Wien 1982–1987

Enoki, K. "On the So-called Sino-Kharoṣṭhī Coins", East and West, XV, 1965, 231–267

Forte, A. "Le moine khotanais Devendraprajña", BEFEO, LXVI, 1979. 289–297

Francke, A. H. "Notes on Sir Aurel Stein's Collection of Tibetan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14, 37–59

——, "Notes on Sir Aurel Stein's Collection of Tibetan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Appendix G to Serindia III. by A. Stein, Oxford 1921, 1460–1466

——, Konigsnamen von Khotan (a. ma. ca) auf tibetischen Documnenten der Turkistansammlungen von London und Berlin", SPAW, 1928, 671–676

——, "Notes on Khotan and Ladakh", Indian Antiquary, 1939

Franke, Otto R. "Zum Manuskript Dutreuil de Rhins", ZDMG, 60, 1906, 477–511

Golden, P. "The Karakhanids and Early Isla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New York 1990, 343–370

Gropp, G.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remen. 1974

——, "Eine neuentdeckte Sammlung khotanesischer Handschriften-fragmente in Deutschland", Middle Iranian Studies. Leuveu 1984, 147–150

Hamilton, J. "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 TP,

XLVI, 1958, 115–153

——, "Nasales instables en turc khotanais du Xe siècle", BSOAS, XL.3, 1977, 508–521

——, "Le pays des Tchong-yun, Čungul, ou Cumuḍa au Xe siècle", JA, CCLXV, 1977, 351–379

——, "Les règnes khotanais entre 851–1001",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ed. by M. Soymie, Genève-Paris 1979, 49–54

——, "Sur la chronologie khotanaise au IXe-Xe siècle"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vol. III. ed. by M. Soymie, Paris 1984, 47–53

——,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6

Hansen, O.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der Chotansake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IV. Bd,2. Abschnitt, Literatur, Leiden-Köln 1968, 79–83

Henning, W. B.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SOS, IX.3, 1938, 545–571

——, "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 AM, I.2, 1949, 158–162

Herzenberg, L. G. Xotano-sakskij Jazyk. Moscow 1965

Hill, John E. "Notes on the Dating of Khotanese History", IIJ, 31.3, 1988, 179–190

Hitch, D. "Kharoṣṭhī Influences on the Saka Brāhmī Scripts", Middle Iranian Studies. Leuven 1984, 187–202

——, "Penalty Clauses in Tumshuqese, Khotanese and the Shanshan Prakrit", SI, 17.2, 1988, 147–152

——, "Kushan Tarim Domination", CAJ, 32.3–4, 1988, 170–192

Hoernle, A. F. R.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JASB, LXVI.1, No.4, 1897, 213–260+24 pls.

——, "A Note on Some Block-Prints from Khotan", JASB, LXVII 1898, 124–131+2 pls.

——, "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 JASB, LXVIII.1, Extra No.1, 1899, 110 pp.

——, "On an Ancient Block-print from Khotan", JRAS, 1900, 321–333

——,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 JASB, LXX.1, Extra No. 1, 1901, 55 pp. 13 pls.

——, "The Vajracchedikā", JRAS, 1903, 364–365

——,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Khotan", JRAS, 1906, 695–698

——, "The 'Unknown Languages' of E. Turkestan", JRAS, 1910, 834–838; 1283–1300+1 pl.

——, "Note on the 'Unknown Languages' of Eastern Turkestan", JRAS, 1911, 201–203

——, "The 'Unknown Languages' of Eastern Turkestan, II", JRAS, 1911, 447–477+pls. I-VI

——, "An early Text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JRAS, 1916, 267–277

——,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 I. Oxford 1916; rep. Amsterdam

1970

——, "An Ancient Medical Manuscript from Eastern Turkestan", Commemorative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Ramakrishna Gopal Bhandarkar. Poona 1917, 415–432

——,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Appendix F to Serindia, III. Oxford 1921, 1432–1459

Hoffmann, Helmut H. R. "The Tibetan Names of the Saka and the Sogdians", Asiatische Studien, XXV, 1971, 440–455

Hopkins, L. C. "Notes on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by Édouard Chavannes", JRAS, 1914, 428–435

Hovdhaugen, E. "Turkish Words in Khotanese: a Linguistic Analysis", NTS, XXIV, 1971, 163–209

Hulsewé, A. F. P.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A, D.23. Leiden 1979

Inokuchi, T.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at Tunhuang", JA, CCLXIX, 1981, 99–100

Kojima, B. "On the Fragment of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dharma-bhānaka-anuśamsa-parivarto' Unearthed in Khādalik", IBK, V.1, 1957, 316–317

——, "On Some Variants in the Lotus Sūtra", IBK, VI.1 1958, 11–13

——, "On Some Colophons of the Lotus Sūtra Discovered in Central Asia", IBK, VII.2, 1959, 97–99

——, "On the Gatha of Sadaparibhuta-parivartah in the

Lotus Sūtra", IBK, VIII.1, 1960, 35–38

Konow, S. "Fragments of a Buddhist Work in the Ancient Aryan Language of Chinese Turkistan", Memoir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2, 1914, 13–41+pls. XXXIII-XXXV

——, "Bemerkungen über die Khaoṣṭhī-Handschrift des Dhammapada", Festschrift für Ernst Windisch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Leipzig 1914, 85–97

——, "Khotan Studies", JRAS, 1914, 339–353

——, "Inventory Lists of Manuscript Remain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Appendix F to Innermost Asia, II. by A. Stein, Oxford 1928, 1026–1028

——, Saka Versions of the Bhadrakalpikāsūtra. Oslo 1929, 22 pp.+1 pl.

——, "The Dates in Saka Texts from Khotan and Tunhuang", AO, VII, 1929, 66–76

——, "Where was the Saka Language reduced to Writing?", AO, X, 1932, 67–80

——, Saka Studies. Oslo 1932

——, "The late Professor Leumann's Edition of a New Saka Text, I", NTS, VII, 1934, 1–55

——, "Roruka and Chinese Turkestan", AO, XII, 1934, 136–141

——, "Zwölf Blatter einer Handschrift des Suvarṇabhāsasūtra in Khotan-Sakisch", Sonderausgabe aus den S. P. A. W., Phil.-hist. Kl., XVIII, 1935, 428–486

——, " Noto on Khotanī Saka and the Central Asian Pra-

krit", AO, XIV, 1936, 231–240

——, "Note on the Ancient North-Western Prakrit", BSOS, VIII.2–3, 1936, 603–612

——, "A Saka Name of Mazār-tāgh", A Volume of Eastern and Ind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F. W. Thomas on his 72 nd Birthday. ed. by S. M. Kater & P. K. Gode, Bambay 1939, 146–147

——, "The late Professor Leumann's Edition of a New Saka Text, II", NTS, XI, 1939, 1–85

——, A Medical Text in Khotanese: Ch. II 003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with Translation and Vocabulary. Oslo 1941, 104 pp

——, "The Oldenburg Folio of the Kharoṣṭhī Dhammapada", AO, XIX.1, 1941, 7–20

——, Khotansak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941

——, "The Khotanese Text of the Staël-Holstein Scroll", AO, XX, 1948, 133–160

——, "The Calender", AO, XX, 1948, 293–294

——, "Primer of Khotanese Saka", NTS, XV, 1949, 5–136

——,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d turquoise", AO, XVIII. 1–2, 1950, 316–318

Kumamoto, H. Khotanese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Tenth Century A. 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issertation 1982

——,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of the Pelliot MS P2786",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II. Tokyo 1984, 987–989

——, "Some Problems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ed. by R. Schmitt & P. O. Skjaervø, München 1986, 227–244

——, "A New Look at the Chronology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Aug. 1990 Toronto, 1–9+pls.+tables

——, "Two Khotanese Fragments concerning Thyai Padatsa", 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s Paper, 11, 1991, 101–120

——, "Some Khotanese Letters in Verse", 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s Paper, 12, 1991, 59–80

Lalou, M. "Mythologie indienne et peintures de Haute Asie", AA, IX. 1–3, 1946, 97–111+pls. I-IV & figs. 1-10

——, "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and Tibet au VIIIe siècle", JA, CCXLIII, 1955, 171–212

Lamotte, E. "Mañjuśrī", TP, XLVIII, 1960, 1–96

Lancaster, L. "A Study of a Khotanese Prajñāpāramitā Text: After the Work of Sir Harold Bailey",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 Berkeley 1977, 163–183

Lazard, G. "Remarques sur le fragment Judéo-Persian de Dandān-Uiliq", AI, 28, 1988, 205–210

Le Coq, A. von, "Ein spätantiker Krug aus Chotän", Turan, 1918, 337–343+figs. 1–7

Leumann, E. Zur nordar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Strassburg 1912

——, "Bibliographische Notizen über zwei nordarische und

zwei sanskritisch Fragmente", ZDMG, 67, 1913, 679–680
——, Maitreya-samiti, das Zukunftsideal der Buddhisten. Die nordarische Schilderung in Text und Übersetzung. 2 vols, Strassburg 1919, 282 pp
——,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nordarisch und deutsch. Teil. Nebenstücke. Leipzig 1920, ix+179 pp
——, "Angoka, der Name eines Grosskönigs von Khotan", 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6, 1928, 184–186
——, "Die Nordarischen Abschnitte des Adhyardha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大正大學學報» 6–7, 1930, 47–87
Leumann, E. & M. Leumann, Das Nordarische (sakische) Lehrgedicht des Buddismus. Leipzig 1933–1936, rep. Liechtenstein 1966
Leumann, M. Sakische Handschriftproben. Zürich 1934, 24 pp
——, "Zu zwei khotansakischen Fragmenten", ZDMG, 113 1963, 80–86
——, "Neue Fragmente des altkhotanischen 'Lehrgedichts'", ZDMG, 117, 1967, 366–375
——, "Zur altkhotanischen Metrik", Asiatische Studien, XXV, 1971, 456–480
Levi, S. " 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 BEFEO, V. 3–4, 1905, 253–303
——, "Trois Notes", JRAS, 1914, 1016–1021
——, "Le Catalogue géographique des Yakṣa dans la Mahāmāyūrī", JA, 1915, 19–138
——, "Le sūtra du sage et du fou dans la littérature de l'Asie centrale", JA, 1925, 304–332

Litvinskij, B. A., Pogrebova M. N., Raevskij D. S. "K rannej Istorii Sakov Vostocnogo Turkestana", Narody Azii i Afriki, 1985,5, 65–74; English summary, 219–220

Lüders, H. "Bemerkungen zu dem Kharoṣṭhī Manuskript des Dhammapada, Ms. Dutreuil de Rhins", Nachrichten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hist. Kl., 1899, 474–494

——, "Die Sakas und die 'nordarische' Sprache", SPAW, 1913, 406–427

Ma Yong,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Sino-Kharoṣṭhī Bilingual Coins of Khota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III. 1, 1985, 111–121

Macdonald, A. et Y.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e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 Paris 1978

Maillard, M. "A propos de deux statuettes en terre raportées par la Mission Ōtani: sarapis et harpocrates en Asie centrale", JA, CCLXIII, 1975, 223–230

Margoliough, D. S. "An early Judaeo-Persian Document from Kho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with other early Persian Documents", JRAS 1903, 735–760

——, "The Judaeo-Persian Document from Dandān-Uiliq", Appendix C to Ancient Khotan. by A. Stein, Oxford 1907, 570–574

Maspero, H.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Matsuda, K. "New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Mahāyāna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in the Stein/Hoernle Collection: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Eastern Buddhist, XX.2, 1987, 105–114

Mayer, A. "Die Gründungslegende Khotans", Buddhistische Erzählliteratur und Hagiographie in 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 Wiesbaden 1990, 37–66

Minorsky, V. Ḥ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London 1937

Montell, G. "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Khotan, (I)-I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II, 1935, 145–221+pls. I-XX; X, 1938, 83–113+pls. I-X

——,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Central Asia by the Sven Hedin Expedition", Ethnos, XVII, 1952, 1–14+illus.

Morgenstierne, G. "Iranica", NTS, XII, 1942, 258–271

Müller, H. "Der Devaraja des Wei-ch'ih I-seng",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XIII (Festchrift für F. Hirth), 1920, 300–309

Nagahiro, T. "On Wei-ch'ih I-sêng, a Painter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riental Art, ns, I, 1955, 70–74

Nakatani, H. "Remarques sur la transmission des Dharmapada", Bulletin des études indiennes, II, 1984, 135–151

Nattier, J. "Church Language and Vernacular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n Buddhism", Numen, 37, 1990, 195–219

Noble, Peter S.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Endere", BSOS, VI.2, 1931, 445–455

Norman, K. R. "Notes on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Indian Linguistics, XXXII, 1974, 213–220

——, "The Gāndhārī Version of the Dharmapada",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I. B. Horner. Dordrecht 1974, 171–180
——, "Gāndhārī", «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卷，南昌，1991，133–143
Pelliot, P. "Un fragmemt du Suvarṇaprabhāsasūtra en iranien oriental",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XVIII, 1913, 89–215
——, "Notes à propos d'un catalogue du Kanjur", JA, IV, 1914, 111–150
——, Notes on Marco Polo, 3 vols. Paris 1959–1973
——,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 et peintures murales, I-VI. Paris 1981–1992
Poussin, L. de V. "Documents sanscrits de la seconde collection M. A. Stein", JRAS, 1911, 759–777; 1063–1079; 1912, 355–377; 1913, 569–580
——, "Nouveaux fragments de la collection Stein", JRAS, 1913, 843–855
——,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by Kazuo Enoki. London 1962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AM, ns, IV.1, 1954, 90–97
——,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RAS, 1966, 9–39
——, "Chinese in Khotanese Brāhmī",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Rémusat, J. P. A.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 tirée des annales de la Chine et traduite de chinoines. Paris 1820

Reuter, J. N. "Some Buddhist Frag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Sanskrit and 'Khotanese'",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igrienn, XXX, 1913–1918, 1–37;

Rice, Talbot T.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 New York 1965

Rockhill, W. W.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 London 1884

Rong, Xin-jiang.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Encyclopaedia Iranica, V.1, 1990, 97–99

Rowland, B. Jr. "Indian Images in Chinese Sculpture", AA, X, 1947, 5–20+illus.

——,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70

Saha, K. Buddhism and Buddhist Literature in Central Asia. New Delhi 1970

Samolin, W.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s", Palaeologia, IV.1, 1955, 33–44

——, "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 CAJ, IV, 1958–1959, 45–67

——, East Turke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Hague 1964

Sander, L.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Wiesbaden 1968

——,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Eighty Years of Research Work", Prajñā-Bharati 1983, 1–18

——, "Zu dem projekt 'Paläographie khotan-sakischer Handschriften'", Middle Iranian Studies. Leuven 1984, 159–186

——, "Remarks on the Formal Brāhmī Script of Gilgit,

Bamiyan, and Khota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III.1, 1985, 69–92

——, "Brāhmī Scripts on the Eastern Silk Roads", StII, 11/12, 1986, 159–192

——, "Oṃ or siddhaṃ – Remarks on Openings of Buddhist Manuscripts and Inscriptions from Gilgit and Central Asia", Deyadharma. Studies in Memory of D. C. Sircar, Delhi 1986, 251–261

——, "Auftraggeber, Schreiber und Schreibegenheiten im Spiegel khotansakischer Handschriften iṇ formaler Brāhmī", Studia indogermanica et slavica, Festgabe für Werner Thomas zum 65. Geburtstag. ed. by P. Kosta, München 1988, 533–549

——, "Remarks on the Formal Brāhmī of Gilgit, Bamiyan, and Khotan",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1, Rock 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 ed. by K. Jettmar, Mainz 1989, 107–130+ pls. 196–215

Senart, E. "Le manuscrit Kharoṣṭhī du Dhammapada: les fragments Dutreuil de Rhins", JA, ns, XII, 1898, 193–308+5 pls.

Seth, H. C. "Central Asiatic Provinces of the Maurya Empir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XIII.2, 1937,

——, "The Kingdom of Khotan under the Mauryas",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XV.3, 1939

Shafer, R. "Languages of Ancient Khotan", Archiv Orientální, 29, 1961, 35–52

——, "Place Names in Khotani Saka", Monumenta Serica,

XXVI, 1967, 445–454

Skjaervø, P.O. The Khotanese Suvarṇabhāsottamasūtra. Mainz 1983

——, "On the Editing of Khotanese Buddhist Texts", Middle Iranian Studies. Leuven 1984, 151–158

——, "Khotanese Fragments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Kalyāṇamitrārāgaṇam: Essays in Honour of Nils Simonsson. ed. by E. Kahrs, Oslo 1986, 229–260

——, "The Kings of Khotan: Current Research on Royal Succession",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AS meeting at Boston 4/12/1987

——, "On the Tumshuqese Karmavācanā Text", JRAS, 1987, 77–90

——. "The Khotanese Hṛdayasūtra", AI, 28, 1988, 157–171

Snellgrove, D. Indo-Tibetan Buddhism. London 1987

Soper, A.C. "Representations of Famous Images at Tun-huang", AA, XXVII, 1964–1965, 349–364+figs. 1–9

Soymiè, M. "Quelques representations de statues miraculeuses dans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4, 77–102

Spanien, A. et Y.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I. Paris 1979

Stein, M.A. "Archaeological Work about Khotan", JRAS, 1901, 295–300

——,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01

——,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
——,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Verhandlungen, XIII. Internat. Or.-kongr., 1904, 85–87
——, "Hsuan-Tsang's Notice of Pi-mo and Marco Polo's Pein", TP, II, 1906, 469–480
——, Ancient Khotan, 2 vols. Oxford 1907
——, Ruins of Desert Cathay, 2 vols. London 1912
——, Serindia, 5 vols. Oxford 1921
——, Innermost Asia, 4 vols. Oxford 1928
——, "A 'Persian Bodhisattva'", Studia Indo-Iranica: Ehrengabe für Wilhelm Geiger zur Vollendung des 75. Lebensjahres 1856–21. Juli–1931. ed. by W. Wüst, Leipzig 1931, 267–273
——,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London 1933
Stein, R. A. "Un genre particulier d'exposés du Tantrisme ancien tibétain et khotanais", JA, CCLXXV. 3–4, 1987, 265–282
Thomas, F. W. "Extracts from Tibetan Accounts of Khotan", Appendix E to Ancient Khotan. by A.Stein, Oxford 1907, 581–585
——, "Drakhme and Stater in Khotan", JRAS, 1924, 671–672
——, "Notes relating to Sir M. A. Stein's Ancient Khotan", Zeitschrift für Buddhismus, VI, 1924–1925, 184–187
——, "The Language of Ancient Khotan", AM, II, 1925, 251–271

——, Chinese in Ancient Khotan", JRAS, 1925, 108–110
——, "'No-le' and 'Ratuara'", JRAS, 1925, 498–501
——, "Names of Places and Persons in Ancient Khotan", Beiträge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Indiens. Festgabe Hermann Jacobi zum 75. Geburtstag. ed. by W. Kirfel, Bonn 1926, 46–73
——, "Peoples and Languages in Ancient Khotan", JRAS, 1926, 391–392
——, "Buddhism in Khotan: its Decling according to Two Tibetan Accounts", Sir Asutosh Mookerjee Silver Jubilee Volumes, Vol. III, Orientalia, Part 3. Calcutta 1927, 30–52
——, "Amātya-A-mo-chih", JRAS, 1927, 121–123
——, "A Plural Form in the Prakrit of Khotan", JRAS, 1927, 544–546
——,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V: The Khotan Region", JRAS, 1930, 47–94+pl. I; Part II, 1930, 251–300
——,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I: The Tibetan Army", JRAS, 1933, 379–400; 537–568
——, "Some Notes o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AO, XII, 1933, 37–70
——,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VII: Government and Social Conditions", JRAS, 1934, 85–112, 249–282, 457–504
——,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4 parts. London 1935–1963

——, "Khotan: a Few Particulars concerning its Topography and Social Usages", JA, CCXXVII, 1935, 148–149

——, "A Buddhist Chinese Text in Brāhmī Script", ZDMG, 91, 1938, 1–48

——, An old Name for the Khotan Country", JRAS, 1938, 281–282

——, "Notes in Consideration of Professor Bailey's Critical Observations", ZDMG, 92, 1938, 594–604, 606–610

——, "Sino-Kharoṣṭhī Coins", Numismatic Chronicle, IV, 1944, 83–98

——, "Some Notes on Central-Asia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BSOAS, XI. 3, 1945, 513–549

——, "Brāhmī Script in Central-Asian Sanskrit Manuscripts", Asiatica. Festschrift F. Weller. Leipzig 1954, 667–700

Thomas, F. W. & S. Konow,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Oslo Et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 III. 3, 1929, 122–160

Toda, H. Notes on the Kashgar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Tokyo 1977; rep. 1980

——,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Tokushima 1981

Uray, G.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 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 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275–304

——.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9th Centurie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ed. by M. Aris and Aung San Sun Kyi, Warminster 1979, 310–318

——,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á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JA, CCLXIX, 1981, 81–90

——,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 tan Studies Schlosse Hohenkammer-Munich 1985. ed. by H. Uebach & J. L. Panglung, München 1988, 515–528

Utas, B. "The Jewish-Persian Fragment from Dandän-Uiliq", Or. Suec., 17, 1969, 123–136

Vorob'ev-Desjatovskij, V. S. "Novye listy sakskoj rukopisi 'E'", Kratkie soobscenija instituta vostokovedenija, XVI Moscow, 1955, 68–71

——, Skazanie o Bchadre. Moscow 1965

Vorob'eva-Desjatovskaja, M. I. "Rukopisnaya Kniga v Kul'ture Central'noj Azii v domusul'manskij period", Rukopisnaya Kniga II. Moscow 1988, 313–357

——, "The Leningrad Collection of the Sakish Business Document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Asian Texts",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Firenze 1992, 85–95

Watters, T.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London 1904–1905

Whitfield, R.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3 vols. Tokyo 1982–1984

Williams, J. "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 East and West, ns, XXIII. 1-2, 1973, 109-154

Yaldiz, M. Archä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 (Xinjiang). Wiesbaden 1988

Yamamoto, T. & O. Ikeda,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I. Contracts (A) (B). Tokyo 1987

Yarshater, E. (ed.) Encyclopaedia Iranica. London and New York 1982-

Yuyama, A. "Supplementary Remarks on 'Fragment of an Unknown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uṇḍarīka from the N. F. Petrovsky Collection' by G. M. Bongard-Levin and E. N. Tyomkin", IIJ, IX. 2, 1966, 85-112

Yuyama, A. & H. Toda, The Huntington Fragment F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Tokyo 1977

Zaleman, K. "Po povodu evrejsko-persidskago otryvka iz Xotana", Zapiski vostocnago otdelenija, 16, 1904-1905, 046-057

Zeymal, E. V. "Sino-Kharostiiskie Moneti", Strany i Naroda Vostoka, 10, 1971, 109-120

Zhang Guang-da et Rong Xinjiang, "Les noms du royaume de Khotan, les noms d'ère et la lignée royale de la fin des Tang au début des Song",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4, 23-46+pls. I-IV

——, "Notes à propos d'un manuscrit chinois découvert à Cira de Khotan", Cahiers d'Extrême-Asie, No. 3, 1987, 77-92

Zieme, P. "Xuanzangs Biographie und das Xiyuji in alt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 Erzählliteratur und Hagiographie in türkischen Überlieferung, Wiesbaden 1990, 75–108

Zürcher, E.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2 vols. Leiden 1972

——, "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 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Leiden 1990, 158–182

二、日文部分

白井長助，上代于闐國の位置に就いて——特に河水問題を中心として，《市村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33，463–489

北村高，コータン出身譯經僧と華嚴經について，《龍谷大學佛敎文化研究所紀要》17，1978，88–93

本田義英，于闐出土梵文法華經と妙本との關係，《宗敎研究》2：7，1918，115–152

——，西域出土梵文法華方便品の一斷簡，《宗敎研究》新 8：3，1931，108–119

——，《佛典の內相と外相》，東京/京都，1934

濱田耕作，和闐發見の希臘的印章を有する文書に就いて，《東洋時報》118，1908，56–58

長澤和俊，拘彌國考，《史觀》100，1979，51–67

——，《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1979

——，漢、唐の染織と西域への傳播，《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30，1985，259–279

池田百合子，西域南道とインドの關係，《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1985，58–74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1979

大谷勝眞，安西四鎮の建置と其の異同に就いて，《白鳥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25，271-292
代田貴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發展，《中央大學大學院研究年報》5，1976，255-270
島田貞彥，中央亞細亞和闐出土の陶製動物小像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27:8，1937，8-12
渡邊海旭，《壺月全集——渡邊海旭遺文集》，二卷，東京，1933
渡邊照宏，理趣經于闐文和譯，《聖語研究》3，1935，83-93
——，理趣經于闐文並に語に，《智山學報》新 7:8，1935，174-204
——，法華經梵語諸本の系統について，《福井博士頌壽記念東洋文化論集》，東京，1969，59-78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東京，1988
——，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漢語史の諸問題》別冊，京都，1988，77-128
光島督，于闐の名刹ゲマライ寺について，《東洋史學論集》1，1953，119-130
——，シアルマ寺の僧侶達の流轉について，《東洋史學論集》3，1954，359-368
後藤勝，唐代の西域南道經營，《東洋史學論集》3，1954，141-156
戶田宏文，西域出土梵文法華經研究覺書(1)-(7)，《德島大學敎養部紀要人文社會科學》4-11，1969-1976
——，西域出土梵文法華經研究覺え書，《日本佛敎學會年報》36，1971，33-49
——，中央アジア出土梵文法華經斷片，《印度學佛敎學研究》22:2，1974，47-54
——，梵文法華經寫本研究ノート，《印度學佛敎學研究》27:2，

1979, 36-41

榎一雄, ベイリイ氏《コータン語のラーマ王物語》, 《東洋學報》28:2, 1940, 139-150; 同上補訂, 《東洋學報》28:3, 1941, 143-144

——, 所謂シノーカロシュテイー錢について, 《東洋學報》42:3, 1959, 1-56

——, 仲雲族の牙帳の所在地について, 《鈴木俊教授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 東京, 1964, 89-102

——, 小月氏と尉遲氏, 《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 東京, 1978, 391-418

——, 禺氏邊山の玉, 《東洋學報》66:1-4, 1985, 109-132

金倉圓照, 陀羅尼一滴, 《印度哲學佛教學研究》(一)佛教學篇, 東京, 1973, 175-193

金岡照光, 敦煌本讚偈類數則, 《東方宗教》46, 1975, 1-14

金子良太, 敦煌出土未解明文書一、二に就いて, 《豐山學報》17.18, 1973, 142-150

——, 敦煌出土張金山關係文書, 《豐山學報》19, 1974, 109-118

——, Pelliot 2782 文書所見の Ḍyau Tcuyi-śiṅä, 《豐山學報》22, 1977, 125-130

井ノ口泰淳, ウテン語普賢行願讚考, 《佛教學研究》16/17, 1959, 87-97

——, ウテン語佛名經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8:2, 1960, 208-211

——, ウテン語資料による Viśa 王家の系譜と年代, 《龍谷大學論集》364, 1960, 27-43

——, トカラ語及びウテン語の佛典, 《西域文化研究》IV 別册, 京都, 1961, 317-388

——, 中央アジア古代語佛典——中央アジア・サカ語, 《佛教學

研究》22, 1966, 1-17
——, ウテン語普賢行願讚考(二), 《龍谷大學論集》420, 23-33
境野黄洋, 支那佛教史上の四大翻譯と于闐國, 《東洋哲學》13:1, 1906, 8-18
——, 于闐及龜兹佛教, 《支那佛教史講話》1, 1927, 102-140
——, 于闐及び龜兹の佛教, 《支那佛教精史》, 1935, 251-303
鷲見秀芳, 于闐の言語文字に關する資料, 《無礙光》17:5, 1921, 21-24
橘瑞超, 于闐の絹についての資料, 《無礙光》17:5, 1921, 12-16
——, 西域旅行記の一つの記錄と于闐の玉に就きて, 《大乘》6:4, 1927, 69-77
堀謙德, 于闐考, 《史學雜誌》23:4-5, 1912, 1-20
——, 《解說西域記》, 東京, 1912
鈴木隆一, 青唐阿里骨政權の成立と契丹公主, 《史滴》4, 1983, 35-50
ネフスキイーと石濱純太郎, 于闐文智炬陀羅尼經の斷片, 《龍谷大學論集》302, 1932, 111-113
片山章雄, Toquz Oγ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 《史學雜誌》90:12, 1981, 39-55
清田寂雲, ペトロフスキー本法華經原典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1, 1957, 188-191
泉芳璟, 西域發掘の梵語古經典——ヘルンレ文書を回顧して, 《佛教研究》3:4, 1922, 113-124
榮新江(木田知生譯), 唐宋時代于闐史概說, 《龍谷史壇》97, 1991, 28-38
森安孝夫, イスラム化以前の中央アジア史研究の現狀について, 《史學雜誌》89:10, 1980, 50-71

——, 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 《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史學科篇》4, 1984, 1-85

山崎元一, 于闐建國傳說の一考察, 《山本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 東京, 1972, 469-480

——, 于闐建國傳說成立の背景, 《國學院雜誌》73:3, 1972, 6-16

——, 《アツユーカ王傳說の研究》, 東京, 1979

山田龍成, 末法思想について——大集經の成立問題, 《印度學佛敎學研究》4:2, 1956, 54-63

上山大峻, 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の研究, 《東方學報》京都 38, 1967, 133-198; 同上誌 39, 1968, 119-222

——, 曇倩《金剛壇廣大清淨陀羅尼經》, 《龍谷大學論集》399, 1972, 60-82

——, 《敦煌佛敎の研究》, 京都, 1990

石濱純太郎, 無量壽宗要經とその諸寫本, 《西域文化研究》I, 京都, 1958, 216-219

——, 西域古代語の佛典——研究の回顧と展望, 《西域文化研究》IV, 1961, 9-48

水谷眞成, Brāhmī 文字轉寫《羅什譯金剛經》の漢字音, 《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十周年記念論集》, 名古屋, 1959, 749-774

——, 《大唐西域記》, 東京, 1971

水野弘元, Gāndhārī Dharmapada 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敎學研究》11:2, 1963, 370-376

寺本婉雅, 西藏文于闐國史について, 《親鸞と祖國》1:4, 1919, 91-93

——, 《于闐國史》, 京都, 1921

——, 于闐國史の批評に就いて, 《支那學》2:7, 1922, 75-81

——, 《于闐國佛教史の研究》, 東京, 1974

松本榮一,于闐國王李聖天と莫高窟,《國華》410,1925,14-19
——,和闐地方の佛畫に見る一特殊性とその流傳,《東方學報》東京 2,1931,227-237
——,和闐壁畫の一斷片に就いて,《國華》43:2,1933,37-41
——,《敦煌畫の研究——圖像篇》,二卷,東京,1937
松田和信,ロンドン・インド省圖書館の一室から——スタイン・ヘルンレ中亞梵語寫本を調查して,《大谷大學眞宗綜合研究所研究所報》16,1987,13-15
——,中央アジア出土《首楞嚴三昧經》梵文寫本殘葉——インド省圖書館の知られざるヘルンレ・コレクション,《佛教學セミナー》46,1987,34-48
——,《インド省圖書館所藏中央アジア出土大乘涅槃經梵文斷簡集》,東京,1988
藤田豐八,《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1932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一)-(四),《東方學報》京都 12:3,1941,58-98;12:4,1942,42-75; 13:1, 1942, 63-95; 13:2, 1943,46-98
——,于闐の鼠,《日本美術工藝》400,1972,26-33
田久保周譽,《敦煌出土于闐語秘密經典集の研究》,東京,1975
武內紹人,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說,《チベットの佛教と社會》,東京,1986,563-602
香川默識,《西域考古圖譜》,二卷,東京,1915
香川孝雄,カダリック出土 Bhadrapāla-sūtra の梵文斷簡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0:2,1962,199-203
小島文保,ファルハード・ベーグ出土梵文法華經寶塔品に就て,《佛教學研究》7,1952,54-59
——,カタリツカ出土梵本法華經如來神力品に就ける一二の問

題，《佛教學研究》8:9,1953,9-16
——,ファルハード・ベーグ出土梵本法華經如來壽量品に就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1955,132-133
——,梵本法華經如來壽量品覺え書,《龍谷大學論集》353, 1956, 44-48
——,西域出土梵本法華經の諸問題,《龍谷大學論集》361, 1959, 1-6
——,カダリツク出土梵文本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の一斷簡,《佛教學研究》16/17,1959,84-89
——,法華經の原典解明,《龍谷大學論集》367,1961,1-8
——,カダリツク本法華經序品斷簡,《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13:1, 1965,65-69
——,カタリツク本法華經法師功德品偈頌斷簡,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4:1,1965,55-59
小森彥次,中央亞細亞和闐地方に於ける埋沒寺院に就いて, 《東洋》25:10,1922,209-225
小田義久,西域における寺院經濟について, 《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1962,140-147
——,《大谷文書集成》一、二,京都,1984,1990
小野勝年,敦煌の釋迦瑞像圖,《龍谷史壇》63,1970,28-61
——, 空海將來の《悟空入竺記》とその行程, 《東洋學術研究》15:3,1976,33-52
小野玄妙,于闐國の佛教,《宗粹雜誌》7:8,1909,
——,于闐及び龜茲附近の古代文明,《宗教界》4:5,1908,
熊本裕,イラン學の現段階,《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16,1983,27-103
——, Hagauṣṭa. sūlī,《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文學部紀要》 17,

1984, 1-22
——, コータン語文獻概說, «敦煌胡語文獻», 東京, 1985, 101-140
——, 西域旅行者用サンスクリットニコータン語會話練習帳, «西南アジア研究»28, 1988, 53-82
熊谷宣夫, 中央アジア壁畫毘沙門天像, «大和文華»19, 1956, 10-12
——, 西域出土の雙面壺と人面のアプリケ, «美術研究» 186, 1956, 7-20
——, 西域出土のテラ・コッタ共命鳥像, «美術研究»194, 1957, 119-129
——, コオタン將來の金銅佛頭, «美術研究»200, 1959, 85-103
——, 西域の美術, «西域文化研究» V, 京都, 1962, 31-170
岩松淺夫, 敦煌のコータン語佛教文獻, «敦煌胡語文獻», 東京, 1985, 141-183
伊瀨仙太郎, «西域經營史の研究», 東京, 1955
伊藤唯信, 于闐文金剛經歸敬文について, «佛教學紀要»1, 1952, 1-5
——, ウテン文金剛般若經に於ける二三の問題,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2, 1954, 207-209
——, 翻譯佛典を通じてみるウテン佛教受容の態度について, «史峯»2, 1954, 33-39
野村博, 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書麗73號于闐文, «東洋史苑» 7, 1973, 16-25
友松圓諦, 于闐考, «無礙光»17:3, 4, 2-18, 49
——, 于闐の物產玉についての資料, «無礙光»17:6, 1921, 28-32
——, スタイン于闐發見の貨幣卑見, «無礙光»17:7, 1921, 28-30
魚尾舜與, 于闐古代史, «宗粹雜誌»9:4, 6, 213-219, 348-355

羽田亨,龜茲・于闐の研究,«史林»2:3,1917,100-108
——, «西域文明史概論»,東京,1931
——,«西域文化史»,東京,1948
——,«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下卷,京都,1957-1958
羽溪了諦, 西域に於ける純大乘國, «六條學報»118,1911,16-26
——,于闐と迦濕彌羅との佛敎的交涉,«六條學報»128,1912,20-28
——,于闐國の佛敎(1)-(2),«藝文»4:1,2,1913,105-123;76-86
——,«西域之佛敎»,京都,1914
澤村專太郎,尉遲派の畫家について,«美術寫眞畫報»1:2, 1920, 22-31
——,尉遲派の繪畫に就いて, «東洋美術の研究», 東京, 1932, 348-362
眞田有美,西域出土梵本法華經の斷簡に就いて, «印度學佛敎學研究»3:1,1954,94-97
——,西域梵本法華經の一寫本に就いて, «石濱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學論叢»,大阪,1958,54-61
——,スタイン氏將來中央アジア梵文佛典資料について, «龍谷大學佛敎文化研究所紀要»2,1963,16-26
眞田有美と淸田寂雲,ペトロフスキー本法華經梵本の研究, «西域文化研究» IV,1961,119-170
中野三男,于闐國都考,«鈴木俊敎授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4,409-418
舟橋水哉,龍樹の所謂龍宮と于闐國,«無盡燈»10:6,1905,27-35
諏訪義讓,于闐王家尉遲氏についての資料,«無礙光»17:5,1921,
——,于闐の建國傳說に對する一考察,«宗敎研究»新 8:5, 1931, 115-126

——,《于闐國懸記》漢譯考,《支那佛敎史學》1:4,1937,79-88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二卷,京都,1942-1943

三、漢文部分

阿合買提,洛浦縣山普拉古墓地,《新疆文物》1985:1,109-111
巴桑旺堆,藏文文獻中的若干古于闐史料,《敦煌學輯刊》 1986:1, 69-73
貝利(榮新江譯),于闐王國,《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9:3,37-43
——(許章眞譯),中亞佛敎時期的說講故事, 《西域與佛敎文史論集》,台北,1989,3-34
伯希和(馮承鈞譯),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二編》,北京,1962,46-46
陳華,《和田綠洲研究》,烏魯木齊,1988
陳世良,敦煌菩薩竺法護與于闐和尙無羅叉, 《新疆文物》1991:4, 99-106
陳祚龍, 李唐開天時代于闐僧侶的物質生活之一斑, 《敦煌學散策新集》,台北,1989,89-134
程溯洛,《宋史・于闐傳》中的幾個問題補正, 《西北史地》1990:1, 1-17
恩默瑞克(榮新江譯), 于闐語中的藏文借詞和藏語中的于闐文借詞,《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6,拉薩,1989,136-161
方壯猷,三種古西域語之發現及其考釋, 《女師大學術季刊》 1:4, 1930,1-32
福安敦(許章眞譯),于闐僧提雲般若,《西域與佛敎文史論集》, 台北,1989,233-246
高永久,絲綢之路上的于闐國,《西北史地》1990:4,89-96
高永久、王國華,吐蕃統治下的于闐,《西北民族研究》1991:2, 60-

66
耿昇，哈密頓《鋼和泰藏卷考釋》述要，《亞洲文明論叢》，成都，1986，247-259
哈密屯（耿昇譯），仲雲考，《西域史論叢》2，烏魯木齊，1985，163-189
——，（——），九至十紀的于闐紀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1987:1，21-24
——，（榮新江譯），公元851—-1001年于闐年號考，《新疆文物》1988:2，133-138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種族人類學研究和維吾爾族的體質特點，《西域研究》1991:2，1-14
韓康信、左崇新，新疆洛浦桑普拉古代叢墓葬頭骨的研究與復原，《考古與文物》1937:5，91-99
侯燦，從麻札塔格古戍堡考察看絲路南道走向與和田綠洲的變遷，《新疆文物》1987:1，36-44
——，麻札塔格古戍堡及其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位置，《文物》1987:3，63-75
華濤，薩圖克布格拉汗與天山地區伊斯蘭化的開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3，10-23
黄惠賢，從西州高昌縣征鎮名籍看垂拱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1983，396-438
黄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1989，414-431
黄盛璋，和田塞語七件文書考釋，《新疆社會科學》1983:3，107-120
——，和田文《于闐王尉遲徐拉與沙州大王曹元忠書》與西北史地問題，《歷史地理》3，1983，203-219
——，敦煌寫卷于闐文《克什米爾行程》地理研究（提要），1983年

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論文,油印 8 頁

——,《鋼和泰藏卷》與西北史地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4:2,60-73

——,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3,

——,于闐文《使河西記》的歷史地理研究,《敦煌學輯刊》1986:2,1-18;1987:1,235-246

——,敦煌于闐文書與漢文書中關於甘州回鶻史實異同及回鶻進占甘州的年代問題,《西北史地》1989:1,1-8

——,敦煌文書中"南山"與仲雲,《西北民族研究》1989:1,4-12,116

——,關於甘州回鶻的四篇于闐語文書疏證,《新疆文物》1989:1,1-33

——,敦煌于闐文 P 2741, Ch 00296, P 2790 號文書疏證,《西北民族研究》1989:2,41-71(以上兩文內容全同)

——,敦煌于闐文幾篇使臣奏稿及其相關問題綜述,《敦煌研究》1989:2,51-60

——,再論于闐王尉遲徐拉與沙州大王曹元忠書,《新疆社會科學》1990:1,99-111

——,敦煌于闐文書中河西部族考證,《敦煌學輯刊》1990:1,51-67

——,關於沙州曹氏和于闐交往的諸藏文文書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1992:1,35-43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1958

——,古代于闐國都之研究,《史學季刊》1:1,1940,

黃振華,于闐文及其文獻,《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3,20-23

——,于闐文研究概述,《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1984,64-86

——,敦煌所出于闐文千佛名經校釋,《敦煌吐魯番文集》,北京,

1988, 109-227

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北京，1982，51-96

——，《羅摩衍那》在中國，《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南昌，1990，78-116

金維諾，閻立本與尉遲乙僧，《文物》1960:3，61-69

井之口泰淳(榮新江譯)，于闐語資料所記之尉遲王家的系譜和年代，《新疆文物》1988:2，113-124，131

克力勃(姚朔民編譯)，和田漢佉二體錢，《中國錢幣》1987:2，31-40

李吟屏，和田地區沙漠與綠洲的變遷，《新疆大學學報》1985:3，70-80

——，古代于闐國都再研究，《西北史地》1990:3，23-36

——，克里雅河末端古遺址踏察簡記及其有關問題，《新疆文物》1991:1，54-58

——，《佛國于闐》，烏魯木齊，1991

李遇春，新疆和田縣買力克阿瓦提遺址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1:1，33-37

李正宇，歸義軍曹氏"表文三件"考釋，《文獻》1988:3，3-14

列維(馮承鈞譯)，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北京，1958，160-234

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闐王譜系迄始年代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5:5，83-90

——，佉盧文書及漢佉二體錢所記于闐大王考，《文物》1987:2，35-43

——，再論漢佉二體錢，《中國錢幣》1987:4，3-11，20

——，中國出土佉盧文書研究述評，《新疆社會科學》1988:2，81-92

——，漢佉二體錢佉盧文解詁，《考古與文物》1988:2，85-87，84

——,《沙海古卷——中國所出佉盧文書初集》,北京,1988
——,新疆佉盧文書釋地,《西北民族研究》1989:1,72-80
——,于闐漢文錢幣考,《中國錢幣》1989:3,3-7
——,犍陀羅語《法句經》殘卷初步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1989,253-262
——,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1990,715-755
劉秉鈞,于闐國之研究,《磐石雜誌》1:2-4,1933,
劉文鎖,安迪爾新出漢佉二體錢考,《中國錢幣》1991:3,
羅常培,梵文顎音五母的藏漢對音研究,《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北京,1963,54-64
馬國榮,漢唐時期和田地區之經濟述略,《新疆歷史研究》1985:3,14-25
馬雍,新疆出土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文史》7,1979,73-98
——,薩曼王朝與中國的交往,《學習與思考》1983:5,69-75
——,古代鄯善,于闐地區佉盧文字資料綜考,《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1984,6-49
莫任南,東漢和貴霜關係史上的兩個問題,《世界歷史》1981:2,67-74
蒲立本(榮新江譯),鋼和泰藏卷年份考,《新疆文物》1988:2,125-131
饒宗頤,《敦煌曲》,巴黎,1971
——,論釋氏之崐崘說,《選堂集林·史林》,香港,1982,446-458
——,劉薩河事蹟與瑞像圖,《(1987)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1990,336-349
榮新江,歐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獻聞見錄,《敦煌學輯刊》1986:1,119-133

——,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初探,《敦煌學輯刊》1986:2,24-44
——,九、十世紀于闐族屬考辨,《新疆社會科學》1987:4,76-83
——,吐魯番文書《唐某人自書歷官狀》所記西域史事鉤沉,《西北史地》1987:4,53-55
——,敦煌文獻和繪畫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與西北地區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學學報》1988:2,55-62
——,關於敦煌和田出土于闐文獻年代問題研究概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1988:1,17-27
——,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西域史事二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5,1990,339-354
——,敦煌學研究揭開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中國文化》2,1990,7-9
——,小月氏考,《中亞學刊》3,1990,47-62
山崎元一(榮新江譯),于闐建國傳說成立的背景,《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4,44—53
施萍亭,本所藏《酒帳》研究,《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142-155
史樹青,新疆文物調查隨筆,《文物》1960:6
石泰安(耿昇譯),古代吐蕃和于闐的一種特殊密教論述法,《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7,拉薩,1990,140-161
斯坦因(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上海,1936
蘇北海、丁谷山,瓜沙曹氏政權與甘州回鶻、于闐回鶻的關係,《敦煌研究》1990:3,32-39
孫修身,于闐媲摩城、坎城兩地考,《西北史地》1981:2,
——,莫高窟佛教史跡畫內容考釋(一),《敦煌研究文集》,蘭州,1982,332-353;(二)《敦煌研究》試刊1,1982,98-110;(三)《敦煌研究》2,1983,88-107;(九)《敦煌研究》1988:4,26-35

——,莫高窟的佛教史跡故事畫,《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4, 北京,1984,204-213

——,敦煌佛教藝術和古代于闐,《新疆社會科學》1986:1,52-59

孫毓修,唐寫本公牘契約考,《考古學零簡》,上海,1923,65-79

湯開建、王叔凱,關於于闐政權與喀剌汗王朝關係的探討,《敦煌學輯刊》1984:1,110-121

唐長孺, 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出土文獻研究》,北京,1985,146-151

藤枝晃,關於220窟改修的若干問題, 《(1987)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1990,67-84

佟柱臣,從考古材料看漢唐對西域的管理,《社會科學戰線》 1981:4,214-221

王邦維,略論大乘《大般涅槃經》的傳譯, 《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南昌,1991,769-787

王北辰,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歷史地理問題, 《地理研究》 2:3,1983,30-43

——,《大唐西域記》中的覩貨邏、折摩馱那、納縛波故國考, 《西北史地》1985:3,26-38

王國維,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跋,《觀堂集林》20,f. 23a-25a

王冀青,古代和田派美術初探,《敦煌學輯刊》1984:2,91-100

——,《英國博物院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 中誤收的斯坦因所獲和闐文書辨釋,《敦煌學輯刊》1987:2,94-108

——,英國圖書館東方部藏“霍爾寧搜集品” 漢文寫本的調查與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1:1,143-150

王琳,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錢幣,《中國錢幣》1987:2,26-29

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鎮的棄置,《歷史研究》1991:4,117-128

王堯、陳踐,《敦煌吐蕃文獻選》,成都,1983

——,《吐蕃簡牘綜錄》,北京,1986

——,歸義軍曹氏與于闐之關係補正,《西北史地》1987:2,60-62

——,《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成都,1988

韋陀,瑞像圖(摘要),《(1987)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編》,瀋陽,1990,328-329

烏瑞(耿昇譯),吐蕃統治結束以後甘州和于闐官府中使用藏語的情況,《敦煌譯叢》1,蘭州,1985,212-220

——,(榮新江譯),KHROM(軍鎮):公元七至九世紀吐蕃帝國的行政單位,《西北史地》1986:4,106-113

——,(——),有關公元 751 年以前中亞史的古藏文史料概述,《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5,拉薩,1989,39-81

吳焯,從考古遺存看佛教傳入西域的時間,《敦煌學輯刊》 1985:2,62-72

——,《佛教東傳與中國佛教藝術》,杭州,1991

奚國金,歷史時期的塔里木盆地南部綠洲分佈,《中國干旱半干旱地區自然資源研究》,北京,1988,132-141

夏鼐,"和田馬錢"考,《文物》1962:7-8,

——,《考古學與科技史》,北京,1979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1957

新疆博物館,洛浦縣山普拉古墓發掘報告,《新疆文物》1989:2,1-48+圖版壹-肆

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國古代的印歐語和印歐人,《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卷,南昌,1991,373-403

閻文儒,就斯坦因在我國新疆丹丹烏里克、磨朗遺址發現幾塊壁畫問題的新評述,《現代佛學》1962:5

楊銘,唐代吐蕃統治于闐的若干問題,《西北師院學報》增刊《敦煌學研究》,1986,39-45

——,吐蕃簡牘中所見的西域地名,《新疆社會科學》1989:1,87-94
殷晴,絲綢之路和古代于闐,《新疆史學》1980:1,53-65
——,和田玉古今談,《新疆社會科學》1981:1,83-87
——,關於大寶于闐國的若干問題,《新疆歷史論文續集》,烏魯木齊,1982,241-258
——,于闐尉遲王家世系考述,《新疆社會科學》1983:2,123-146
——,湮埋在沙漠中的綠洲古國,《新疆社會科學》1985:1,65-79
——,歷史上新疆和田地區的人類活動與土地沙漠化的演變,《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86:1,
——,唐代塔里木盆地南緣的社會經濟生活,《新疆文物》1987:3,60-73
——,和田水系變動和綠洲興衰的歷史考察,《新疆社會科學》1987:5,79-91
——,一件新發現的于闐語文書——兼析古代塔里木南端的社會經濟情況,《民族研究》1987:6,94-101
——,唐代于闐的社會經濟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9:6,67-80
——,于闐都城研究,《西域史論叢》3,烏魯木齊,1990,133-155
余太山,柔然與西域的關係述考,《新疆社會科學》1985:4,67-77,80-81
——,《塞種史研究》,北京,1992
月氏,漢佉二體錢(和田馬錢)研究概況,《中國錢幣》1987:2,41-47
張光福,尉遲乙僧的繪畫藝術,《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9:1-2,
——,尉遲乙僧畫跡考,《中央民族學院學術論文選集》,北京,1980,
——,尉遲跋質那與大雲寺壁畫和《外國寶樹圖》,《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1,87-88
——,尉遲跋質那和尉遲乙僧,《新疆藝術》1981:3,

——，關於尉遲乙僧的《天王圖》，《考古與文物》1982:5，105-112
——，尉遲跋質那、尉遲乙僧史料鉤稽，《中國畫研究》2，1982，90-113
——，尉遲乙僧的繪畫及其成就，《新疆藝術》1983:2，
張廣達，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5:4，1-13
——，唐滅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勢，《東洋文化》68，1988，69-107
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1982年，179-209
——，和田、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新疆社會科學》1983:4，78-88
——，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3，1986，69-147，圖 20-34
——，于闐佛寺志，《世界宗教研究》1986:3，140-149
——，敦煌文書P.3510 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擬）及其年代，《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蘭州，1987，163-175
——，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4，北京，1987，90-127
——，《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新疆社會科學》1988:1，60-69
——，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東洋學報》69:1.2，1988，59-62
——，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1989，284-306
——，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1.172-183
鍾興麒，《鋼和泰藏卷》中的一首抒情詩，《新疆師範大學學報》

1988:3,74-76

朱雲寶,絲綢之路上的佛塔,《西域研究》1992:2,63-68

莊申,隋唐時代于闐祖籍之父子畫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4種上冊,台北,1960,403-454+4pls.

後　記

位於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和闐，古稱于闐，在十一世紀突厥化以前，居民操一種中古伊朗語，卽于闐語。作爲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綠洲王國，她曾在東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過去，由於解讀研究于闐文獻的伊朗語專家大多不諳漢文，而熟悉漢文材料的中亞史學者又難以接觸中古伊朗語文獻，因此，于闐的歷史在中亞史家筆下往往輕描淡寫，幾筆帶過。然而，我們認爲，對於像于闐這樣的中亞王國做細緻的個案考察，是推動中亞研究的進步，深入闡釋西域歷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環節。

1980年，我們開始以敦煌漢文文書爲基礎，參照歐美學者數十年來研究于闐文獻的成果，探討于闐歷史。1982年發表了第一篇研究報告——《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雖然現在看來有些結論不免粗疏，但卻受到海內外中亞史、敦煌學和伊朗學研究者的重視，並被譯成法文，發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上。感謝法國突厥學家J. Hamilton教授和日本伊朗語學者熊本裕博士，他們針對我們的論述的商榷文章，推動了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此後，我們有機會先後游學歐洲和日本，較爲系統全面地收集了國外學者有關的研究成果，幷與一些學者如H. W. Bailey, R. E. Emmerick, J. Hamliton, 熊本裕等先生，就有關問題交換了看法。與此同時，我們還系統地收集了漢、藏及其它文獻中的于闐史料，將研究視野擴大到伊斯蘭時代以前的整個于闐歷史和文化。1988-1989年發表的《關於和闐出土

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和《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是我們系統探討于闐語文獻年代的姊妹篇，同時也是整理唐宋時代于闐史料的基礎性工作。與此相關聯的文章還有《和闐、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敦煌文書 P3510(于闐文)〈從德太子發願文〉及其年代》、《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諸文。此外，收入本集的《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是對有關于闐瑞像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全面整理，並借以探討晚期于闐佛教思想。《于闐佛寺誌》一文，則是從佛寺的角度來看于闐的佛教史。而《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是用文獻史料，印證考古研究的結果。

與豐富的于闐歷史文化內涵相比，我們的工作是初步的，今後尚有許多課題有待我們去努力研究。近日欣聞，聖彼得堡藏有242件于闐語世俗文書，這接近了今天已知的于闐語文書三百件的數量。在這 242 件文書中，118 件較大，124 件爲小片，這批文書尚待拚接，其中 20 件完整，98 件爲碎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文書出于人們已知的傑謝鎮(Gayseta)，村正也是斯略(Sīḍaki)。聞 Emmerick 教授已有該批文書的複印件，其中不少件上有漢文，我們對傑謝鎮斯略留下的文獻所做的研究，因而需做大大的補充。

我們借此機會，感謝以下學者對我們這項研究給予的鼓勵和幫助，他(她)們是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鄧廣銘教授、周一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英國劍橋大學 Harold Walter Bailey 教授、德國漢堡大學 Annemarie von Gabain 教授、Ronald E. Emmerick 教授、日本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熊本裕博士、荷蘭萊頓大學 Eric Zürcher 教授、法國法蘭西學院 Jacques Gernet 教授、高等實驗研究院 Michel Soymié 教授、James Hamilton 教授、Jean-Pierre Drège 教授、法國科研中

心吳其昱先生、法國國立圖書館 Monique Cohen 夫人、Hélèn Vetch 女士、英國圖書館 Frances Wood 博士、Beth Mickillop 博士、新疆社會科學院殷晴先生、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美國哈佛大學 Prods Oktor Skjaervø 博士以及已故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Mark J. Dresden 教授、匈牙利科學院 Geza Uray 教授等。我們還要衷心感謝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同志們，他們不計名利，爲學術專著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　者

1992.7.10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于阗史丛考
作者=张广达
页数=356
SS号=10445388
出版日期=1993年12月第1版